

极限投机

投机巨人乔治·索罗斯
和他的投机理念风暴 *George Soros*



麦金生 编译
中国言实出版社

极限投机

投机巨人乔治·索罗斯和他的投机理念风暴

麦金生 编译
中国言实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极限投机：投机巨人乔治·索罗斯和他的投机理念风暴

—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1997，11

ISBN7-80128-109-8

I. 极… II. 麦… III. 金融投资—方法 N. F830.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23565 号

极限投机

麦金生 编译

中国言实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西城区府右街 2 号 邮政编码 100017)

电话：63099063 63094366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通县兰空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大 32 开 11 印张 275 千字

1997 年 11 月第一版 1997 年 11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5000

ISBN7-80128-109-8/F·20

定价：18.60 元

(如印装质量不合格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目 录

目 录

引子 “国际金融界的坏孩子” 5

 焦点人物

 股市天才，业余哲学家和慈善家

第一章 超级资本家 14

 索罗斯印记

 索罗斯与巴菲特：两种赌博方式

第二章 乱世逍遥 22

 父性异师，母性哲学

 诗意逃亡

 卡尔·波普慧眼难识怪杰

 告别欧洲

极限投机

第三章 金融炼金术 58

帝国的雏形
合伙人
无限扩张
心灵的裂隙
黑暴龙卷风
让每个士兵都成为将军

第四章 理念风暴 77

华尔街的“总统”
起于青萍之末
本能避险
离经叛道
唯我独尊的赌博

第五章 极限投机 100

反射——选择：随机漫步
盛衰程序
历史的阵痛

第六章 横扫一切 115

阴云密布

目 录

英镑大崩盘	
日本泡沫	
墨西哥——世界的伤口	
第七章 金钱推动主义	146
金钱面前人人平等	
男人有钱会变得更好	
拯救东欧	
金钱军团全球出击	
第八章 看不见的巨手	185
无处不在的基金力量	
投资就是革命	
把住历史的脉搏	
第九章 奇谈怪论说欧美	209
后冷战政治	
新的危机	
向传统挑衅	
第十章 另一种恐惧：我不辩论，我只开枪	236
量子基金的廷伸观论	
开放社会的光芒	

极限投机

漫步的历史
重建价值观

第十一章 他并不想赚很多钱 265

权力之迷
犹太血统：理念风暴的血肉基础
如何躲开媒体那只怪兽
金钱与快乐

附 录 索罗斯演讲与文选 281

引子 “国际金融界的坏孩子”

引子

“国际金融界的坏孩子”

焦点人物

1997年7月29日，东盟和西方发达国家的会议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结束，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在会议上对美国金融投机家乔治·索罗斯进行了抨击。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全然不顾马来西亚领导人对西方的批评。她在吉隆坡召开的重要的地区会议后对记者说：“我认为马哈蒂尔是在为他自己说话。”

马哈蒂尔在地区会议开幕式上指责“无道德原则的”西方货币投机商。这位马来西亚总理还在会议期间重申了他对美国的批评。他的发言赢得了南亚和东南亚一些国家的欢迎。

奥尔布赖特说：“我认为他的观点表达得太激烈了。”

马哈蒂尔对西方提出直率批评的起因是，东南亚几个

极限投机

国家的货币自5月中旬以来因受到投机商的冲击而严重贬值。措辞强硬的马哈蒂尔称以索罗斯为首的货币投机商是“无赖”、“强盗”、“无法无天的人”和“土匪”。这些人怀有“政治企图”，“想破坏我们已取得的所有进展。”

乔治·索罗斯已是第三次引发世界性的惊涛骇浪，以前，他曾于1992年和1994年与英国中央银行和日本中央银行豪赌了两局，并从英格兰银行赢得了20亿美元，被称为有史以来以最短时间赚取最多金钱的人。

德国《图片报》以“今日焦点人物”为题介绍了这个令人害怕的“坏孩子”。

一个人倚仗自己的资金来对付整个国家及其货币并获得了成功。此人就是66岁的亿万富翁乔治·索罗斯。这个国家是泰国，它的货币是铢。

现在是不是又要故伎重演呢？像索罗斯这样的人是怎样作好准备来冲击泰铢这样的货币呢？他如何从铢中获得几十亿利润呢？他需要耐心、许多钱（索罗斯可操纵150亿马克基金）和一次经济危机（就像泰国现在的危机）。

泰国这头小老虎受了伤。此时“国际金融界的坏孩子”出动了。他的做法很简单：他只是散布谣言。他的话对于全世界投机倒把分子来说就是金科玉律，谣言在全世界不径而走。

6月27日的德国《法兰克福汇报》写道：“像索罗斯这样的大投机家不排除使铢贬值20个或者更多个百分点的可能性。”

引子 “国际金融界的坏孩子”

这是对铢宣判了死刑。现在全世界投机家都知道这一点：卖掉铢，卖掉泰国股票。

而泰国政府却无能为力。最后的出路是：它在7月2日放开泰铢的汇价（过去是同美元挂钩），其后果是泰铢自由下落。一美元可以买30泰铢（此前是近20铢）。

索罗斯现在等待泰国铢落到最低点，然后便大量买进泰铢和泰国股票。全世界投机倒把分子都在等待索罗斯发出信号。他一购买，大家都跟着购买，泰铢和股票也跟着上涨。行市上升，交易所的交易赢利便滚滚流入他的私囊。他不顾交易所投机家的大忌而同中央银行对抗，并且又一次得手。

股市天才、业余哲学家和慈善家

“下一次金融危机肯定会到来。问题只在于什么时间。”这是乔治·索罗斯不久前在纽约宣布的。对于他自己以数以十亿计的资金作赌注来对付泰国铢，从而会给危机火上加油，他却保持沉默。索罗斯量子基金会的经理斯坦利·德鲁肯米勒在泰国中央银行宣告屈服之后承认：“我们赢利了。”

索罗斯闻名于世是在1992年，当时英格兰银行不得不向这位匈牙利人俯首称臣。通过货币投机，索罗斯在使他的投资者的财富增加的同时，也为自己聚集了25亿美元以上的私人财产，索罗斯正慷慨地把这些钱花出去。他是美国，可能也是世界上最大的慈善家。他设立的基金会

极限投机

即开放社会研究所在全世界有 50 多家分支机构，雇员超过 1000 人。

这位 1930 年出生的大投机家早在 1989 年就已经从日常交易中抽身引退。只有在采取向英镑或泰国铢进攻这样的大行动时，索罗斯才积极参与。在这种行动中，没有人愿意放弃利用这位老人的辨别力。

真正的爱好是为别人花钱

尽管这位老人完全有财力享受世界上每一种奢华，但乔治·索罗斯对此却很少有兴趣，他自己的生活十分简朴。他真正的爱好是为别人花钱。如果对某个慈善项目感兴趣，索罗斯就会慷慨向其提供资助，为此他可以在一天之内掏出 1 亿美元。只有一件事索罗斯是一个子儿也不掏的：有关犹太人的项目。“我保持中立。”这位生于匈牙利的犹太人说。

索罗斯最想拯救整个世界。这位金融投机商承认，他有时把自己视作一个神。无论如何，这名白手起家的亿万富翁所做的善事是不容抹杀的。例如，他捐献了 5000 万美元以上的资金，用以在受战争破坏的波黑采取援助措施和在萨拉热窝建造一个紧急供水系统。为了防止俄罗斯科学家在苏联解体之后为中东的独裁者服务，索罗斯承担了他们中接近 1/3 的人的年薪。

索罗斯对世界进行改良的愿望与他个人的经历是分不开的。但是，这位业余哲学家却不能容忍世人以一种完全

引子 “国际金融界的坏孩子”

扭曲的理论来解释他的善行。索罗斯认为，在后冷战社会中无节制的资本主义会成为自由人类最大的威胁。他说：“我只能一再对盲目信任市场的魔力发出警告。”“市场中留有投机的空间是各国政府的错误。”

对索罗斯影响最大的是英国哲学家卡尔·波普，索罗斯在伦敦经济学院学习时听过他的课。波普尔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一书为索罗斯向世界专制政权宣战提供了合适的理论依据。索罗斯亲身经历过独裁政体的暴政。在纳粹占领匈牙利时期，当时还是一名犹太儿童的索罗斯曾被父亲用篡改过的身分证明隐藏在一个信奉基督教政府官员家中。二战之后，索罗斯一家被迫流亡英国。

索罗斯把自己看作是一个“未能实现当哲学家抱负的人”。如果读了他最近就全球化问题发表的长篇大论，你也一定会得出同样的印象。按照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史蒂夫·汉克的说法，他以此证明了“一个清楚的头脑和大量的金钱并不是必然一起出现的”。

索罗斯自己也认为他离精神错乱并不太远。他的祖父就是偏执狂。他偶尔也幻想自己会发疯。对个人健康的担心使他开始追寻人生的意义，为此他成立了开放社会研究所。

索罗斯被看作是一个变化无常、思想跳跃性很强的人。他多年的老友、摩根——斯坦利资产管理公司老板巴顿·比格斯说：“他（索罗斯）对市场有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直觉。”

当然，这并不能保证这位金融界的杂技演员偶尔也会

极限投机

失误。例如，在 1994 年对日元的投机活动中他在一天之内就损失了 6 亿美元，对此他个人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乔治·索罗斯在有生之年永远不会得到英格兰银行的原谅。1992 年他投下巨额赌注与英镑较量，结果严重损害了英国为防止货币贬值和被迫退出欧洲货币体系所作的努力。

而积极投身于社会公益事业给索罗斯带来的也不仅仅是朋友。例如，当索罗斯捐资 1600 万美元支持那些主张开放软毒品市场的团体时，克林顿政府就感到很恼火。此外，索罗斯还是极端政权的不遗余力的反对者。他甚至对保守的政治家也提出批评，认为他们有民族主义倾向。

东南亚经济危机的由来

当泰国人 7 月 2 日早晨醒来时，他们一下子明显地变穷了：他们的货币 铢在一夜之间失去了五分之一的国际购买力。在国外负有高额债务的企业在其结算中将感觉到这一点，据估计，由于货币贬值，29 家最大的企业不得不筹措约 12 亿美元支付利息和清偿债务。据摩根公司估计，1997 年和 1998 年，泰国的经济增长率可能降到 2% 至 3%，这对一个在过去 10 年里已习惯于平均近 10% 的增长率的国家来说是个坏消息。

泰国的金融危机将给“虎”国的成功史投下一层阴影。像新加坡的缔造者李光耀这样一些亚洲领导人多年来一直鄙视性地向经济上停滞不前的欧洲国家显示亚洲的发

引子 “国际金融界的坏孩子”

展模式。

亚洲的崛起似乎是不可阻挡的，但铢大幅度贬值的情况表明，老虎并不是不可伤害的。有一个人被认为对此负有责任，这个人就是乔治·索罗斯。他和其他一些大投资者自2月份以来一直对铢发起进攻，直到泰国政府在上个星期终于屈服，使铢与美元主宰的货币体系脱钩。将来中央银行将仅仅在汇率达到一定程度时进行干预。泰国货币铢的对外价值已从1美元兑换24.5铢迅速下跌到1美元兑换29铢。

但摩根公司主管亚洲的首席经济学家埃施魏勒说，投机者们“不是这场游戏中的恶棍”，东南亚经危机是泰国政府自讨苦吃。泰国政府坚持固定不变的汇兑率时间太久，同时又忽视金融部门的彻底改革。这对印度尼西亚政府、马来西亚政府、韩国政府和菲律宾政府来说是一个警告性的例子：它们不得不担心，现在它们也将成为投机商们的目标，如果它不及时采取行动的话。因为这些国家的问题与泰国的类似：它们由于奉行僵硬的汇率政策而自己削弱它们对日本的竞争能力，如果美元像前两年那样对日元升值的话。结果是出口增长放慢。新加坡的出口经济前几年也以两位数增长，而到1996年却停止了增长。

与此同时，与美元的稳定汇率曾为各银行和筹资机构带来似乎是有利可图的生意：摆脱了管制、但在风险管理方面还没有经验的它们，曾在海外借低息贷款，用于在国内高息放出。结果是吹起了一个巨大的信贷气泡，导致许多国家出现了实实在在的银行危机和房地产危机。例如在

极限投机

菲律宾，过去两年发放的贷款增加了将近 68%。在印度尼西亚每 11 笔贷款中就已经有 1 笔是收不回的。在这种情况下，往往只有国家才能使银行免于破产。例如在韩国，1997 春天韩宝钢铁康采恩破产，中央银行以 70 亿美元帮助遇到危险的金融机构摆脱了困境。一些亚洲银行特别向建筑业借出许多钱。现在在曼谷、雅加达、吉隆坡和马尼拉等都市出现了太多的办公楼。价格的下降使建筑业主和债主受到了压力。

不断增加的贸易逆差和国外债务使一些老虎国家的经常项目出现了大笔赤字。它们的拖延将使老虎国家更加痛苦。为了避免眼看就要发生的货币贬值和“消灭”投机者，泰国中央银行仅在 5 月份就抛出了约 40 亿美元，这相当于泰国外汇储备的 1/9。可这是徒劳的。在曼谷的一家德国银行的代表说：“放开汇率是不可避免，是早就该发生的事情。”

IKB 德意志工业银行的东亚代表汉斯-维尔纳·赛德尔认为，泰国的货币危机在其他地方重演是“完全可能的”。事实上马来西亚和菲律宾在过去几周里就不得不抛出美元来捍卫林吉特和比索。香港萨洛蒙公司的马克·马德贝格认为，投机者的下一次进攻“最可能对准菲律宾”。尽管其通货膨胀率高达 12%，可是菲律宾中央银行仍企图保持对美元汇率的稳定。因此，比索的对外实际价值从 1994 年初以来上升了 25%——这简直就是对索罗斯这类人发出的邀请书。

另外一些国家作了比较好的准备。印度尼西亚早在泰

引子 “国际金融界的坏孩子”

铱发生危机之前就实行了较为灵活的汇率，把汇率浮动幅度扩大到 8%。汉城政府也及早作出了反应，1996 年初以来把韩元的比价下浮了 15%。

亚洲各虎如果把泰国的危机作为契机进行自己的改革，那么它们将可以重新乐观地面对未来。因为自由的市场、面向出口和比较积极的劳动态度在将来也会带来取得相当高的生产率和经济增长率的机会。香港美林公司的尼古拉斯·关（音）就说，他不能想象这些老虎会持久地陷入危机，因为“基础非常扎实”。

更有可能的是，新的老虎成长起来，并且（像中国或越南）显得越来越突出。麻省理工学院吕迪格尔·多恩布施认为：“较老的老虎的削弱是自然的，年轻的老虎会填补进去。”

极限投机

第一章

超级资本家

索罗斯印记

1994年初在一次访问伦敦之行中，传奇色彩浓厚的投资人兼金融市场宗师索罗斯，在伦敦希斯罗机场受到英国财政大臣的盛大欢迎，这位匈牙利人在世界金融界的影响力由此展现。事实上，索罗斯是世界上公认最具影响力的非官方财经领袖；他现在对于各国政府给予的优厚待遇，皆安之若素。部分是因为他在金融市场的权势，部分则是他在至少19个国家中，颇有慈善与慷慨之名。

自然，索罗斯在金融市场中的成功，助长了他的慷慨，可是另一个问题也无可避免地浮上了水面；是否他的慷慨行为也助长了他的成功？索罗斯是否利用政界的交情、关系与朋友，接近那些无法用其他方法得以接近的消息，而成为一位内线交易的典范呢？

第一章 超级资本家

绝对可能。美国的防止内线交易法律有很多漏洞；可是至少有制定那样的法律，在某些时候与某些地方也执行了那些法律。在其他国家，可就不一定了；虽然德国最近已采取行动，成立一个类似美国证券交易管理委员会形式的机构来管制市场。但大多数的国家对于内线交易的制裁，都是马马虎虎的。

我们可以回溯到 1977 年，至少可找出一个索罗斯不那什么喜欢美国股市的理由。事实上，一位政府前任顾问不避讳地说，这位全球投资宗师并非因挑股本事而享有盛名。（那个人说，索罗斯的确在 1989 年那次股市暴跌之前，便预测日本股市会大崩盘。）

这位前任顾问凑巧在设立索罗斯的全球内线消息网路上出过力，他受雇帮助索罗斯打开欧洲某些国家的门户，他认为索罗斯对股票的厌恶，可能始自 1977 年，他因为卖出一大票未上市的电脑科技公司的股票，而与证券交易管理委员会交过手。那件事刚好发生在电脑科技公司公开发行股票的前一天。索罗斯大量抛售，使得这家股票迫降了 50 分最后变成一股 8.37 美元。他接着以那个价位开始买进，总共买了 16500 股。

证券交易管理委员会声称，索罗斯操纵股票。索罗斯为了避免被提起诉讼，签下一张双方同意的判决。既不承认有罪，也不否认有罪。但是，不久之后，因电脑科技公司股票而损失惨重的佛莱契尔斯基基金会控告索罗斯，并且同意以 100 万美元达成庭外和解。从那时起，索罗斯便更加喜欢“旁门左道”的交易。海天之际一望无云的国外

极限投机

正是他的发展之地。

索罗斯事业的核心是拥有 100 亿美元资产的量子集团。该集团操作货币、债券、商品、外国衍生性证券以及利率，虽然量子集团旗下有 14 位精明过人的证券商在纽约工作，但在法律上，量子集团却在海外，量子集团得以置身于美国证券法的管辖之外，此举当然是利多于害的。

克劳利 1994 年在《纽约时报杂志》上撰文，称索罗斯为“技艺精湛的内线人士……金融世界中叛徒型人物、敢冒风险、作风大胆，甚至连美国国会议员都在猜测，他到底在玩什么把戏。”

人们对他投资技巧的细节所知甚少，但是以下的许多事例却可以确定，由于“海外的”据点，索罗斯可以自由自在利用他那无以伦比的接触网路，达到的层次之高，用“接触”来描述显然是太客气了。他的最佳消息来源包括：伦敦的财政部办公室、德国法兰克福的联邦银行以及全球其他重要金融中心的决策者。这个内线人士网路使索罗斯得以大展鸿图，而不仅只限于“有联系、有交情”，怪不得在这方面他是华尔街最令人羡慕的对象。

他讲的话与他勇往直前的交易，可以成为自我实现的预言，而那同时也是个危险的预言。1993 年 8 月 4 日，索罗斯公开宣布他对英镑的表现感到不悦。他说，这个货币被过份高估了，将会大跌。他宣布想卖掉英镑而多买些美元。不出所料，金融市场立即对英镑失去了信心，开始往下跌。英国银行虽然努力支撑英镑。但英镑几乎在一夜之间变成废纸。英国政府算是受够了，随后干脆放弃了欧

第一章 超级资本家

洲汇率制度，不再通过货币市场的干预而力守英镑。

同时，索罗斯因为是第一位摆脱英镑、捞到美元的人，他挟着不折不扣的 20 亿美元扬长而去，留下了不可抹灭的“索罗斯记号”。

索罗斯的一些仰慕者与他的公关小组都跟进，将他们大胆抛售英镑归功于老板的英明，以及他们预先研读过英国基本的经济与货币情况。或许是如此，有人认为，索罗斯得力于旁人帮忙策划那些自我实现的预言，而其他在英国财政部“非常内线的”消息来源曾经给他小道消息说，因为英国无法在欧洲货币制度之内运作，市场上对英镑的需求不会很强劲，将转而强烈需求其他欧洲货币。

索罗斯的宣布与迅雷不及掩耳的交易动作，触发了那个危机，他一定早知道会这样。就像克劳利在《纽约时报》上所写的，索罗斯是位终极内线人士，而且是位“典型的外线人士、逆向操作者，仰赖打赌他人的死亡而创造财富。”

像《商业周刊》一篇封面故事中所说的，索罗斯是“欧洲中央银行的祸害”他每次有什么信息公开时，都“使政府的银行高级员工畏缩，特别是欧洲国家政府；因为欧洲的汇率机制逼得他们与索罗斯对立；而且各国政府最后常是输家。”

索罗斯有许多上好的连系与交情，那是他的一项秘密。他说，他的另一项秘密是他直率而又悲观地评估人情以及人类决策。他自己的“逆向”投资是以他所说的“反射率”为基础概念的，这个概念强调人的决策通常都有瑕

极限投机

疵。

他告诉《商业周刊》：“我早已认清人类思想天生就容易犯错的本质。”

索罗斯所著的《金融炼金术》，全书都在讨论此一煽动性的古老理论。按照这种说法，在经济事务上，所有有瑕疵的人的决策，均会导致对市场产生错误的看法，而影响所及的是，也错看了盛衰周期。索罗斯告诉《商业周刊》，他在利用这些周期的战役中，唯一的长处就是承认自己有犯错的倾向。他古铜色的脸上展露着笑容，并且俏皮地说：“像我们这样的业余玩家，别人根本没料到我们会知道全球金融市场在 1994 年或其他任何时候的走向如何。”

“我跟别人一样，犯了许多错误。”他说。

或许如此。不过索罗斯从未犯过“杀鸡取卵”的错误，他并没有凭着不牢靠的消息而与银行对赌，他最喜欢的理论可能站不住脚，不过索罗斯拥有其他人绝对缺少的——伦敦财政部办公室超内线的消息来源。

截至目前为止，这位 60 多岁的匈牙利人的理论与人际网路，都发挥了卓越的作用。当事情出了贫子，那么可以说，此一理论正是预言许多人类的判断都必将有错的“索罗斯理论”。在这个令人眼红的“怎么说都是他赢”的情况中，索罗斯的声誉得以维持不坠。1994 年 2 月，美国总统克林顿与日本首相细川护熙举行双边贸易会谈时，索罗斯的名声在金融市场上变得更加响亮。会谈进行得很凝重，索罗斯确定会谈的破裂迫在眉睫，而其结果会是日

第一章 超级资本家

元贬值而美元升值。于是索罗斯买入美元、卖出日元，典型的“索罗斯式豪赌”。不过这一次他并没有来自日本的消息来源，也没有来自任何地方的内线小道消息。

这是人类事务中一项不可避免的错误。日元实际上坚挺地对抗美元，部部原因是：日本投资人与其他交易专家，都将美日会谈视认为是对日本出口与整体日本经济的正面助力。因此，这一次没留下任何“索罗斯记号”。而索罗斯在那场战役中足足亏损了6亿美元。

索罗斯与巴菲特：两种赌博方式

根据美国《福布斯》杂志公布的今年度200个亿万富豪排行榜，有两位是完全凭靠纵横国际金融市场致富的美国投资大家，一位是名列第二的沃伦·巴菲特，一位则是名列第131的乔治·索罗斯。这两人在国际金融圈都是赫赫有名的，然而他们的投资策略却是南辕北辙。

现年67岁的巴菲特自小就展露出他在数字与投资方面的天份。他在8岁时就开始阅读父亲所收集的股市书籍。他的父亲是一位股票经纪人，而他在11岁时就投入美国股市，买进他的第一种股票。1956年，当时才26岁的巴菲特真正开展他的投资事业，与6位朋友共同出资10.5万美元，投资美国股市。此一合伙投资事业在往后的13年间平均每年有29.5%的投资报酬率，总资产高达2600万美元。而同期间道一琼斯指数有5年是呈下跌的，由此可见巴菲特投资策略的高明。1965年，巴菲特买下

极限投机

英国波克夏哈萨威公司，并以此为基础不断扩张他的投资版图。

巴菲特的投资策略可归纳为四大步骤：一、不要理会股市每天的起伏。巴菲特认为股市的存在只是提供大家一个投资活动场所，投资人不应随着股市行情起舞，而应先有万全的准备，彻底了解自己所要投资的目标，并且坚信自己能够打败股市指数的变动。二、不要过度担心经济情势的变化。巴菲特认为没有人能够预测经济情势未来的变化，而因应经济景气变化所做的投资决定往往会在下一波经济景气中变成错误的抉择，因此投资人所应做的是选择在任何经济情势下都有获利空间的企业。三、买下公司，而不是股票。巴菲特认为投资必须能够看得长，想得远。买下一种股票，也就等于是拥有一家公司部分的所有权，而这家公司未来的任何获得总有部分是归你所有。四、管理企业的投资组合。他认为投资的最终目的是拥有企业，让这些企业为其创造财富。

被当前国际金融市场视为超级玩家的索罗斯出生于匈牙利，他的发迹是靠着 1969 年与另一位投资专家吉姆·罗杰斯联手成立的量子基金。该基金自成立以来平均每年的投资报酬率高达 35%，而且只有在 1981 年出现过赔钱的记录。索罗斯的投资理论是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而市场行情则是涨久必跌，跌久必涨，只要能够掌握到其中的契机与矛盾，在国际金融市场中就可战无不胜，这也就是他著名的“错误理论”与“大起大落理论”。而他最著名的战绩是他在 1992 年利用欧盟各国之间在迈向统一大业的

第一章 超级资本家

路途中的矛盾，大力放空意大利里拉与英镑等相对弱势货币，造成欧洲汇率危机，进而迫使里拉与英镑相继脱离欧洲货币机制。当然，他也从其中大捞一票。索罗斯在国际上建立有庞大的人际关系网络。通过投资与慈善活动与各国政要建立良好的关系，然后利用这些关系获得由其他一般管道无从得知的消息，在市场上进行炒作。而国际金融界有些人士也因此指责索罗斯所从事的投资活动根本就是内线交易。

巴菲特与索罗斯可说是当前全球投资热潮中完全不同的两种典型，前者是注重基本点，是做长不做短的保守派。后者则是强调信息来源，逮到机会一定要大捞一笔的豪赌派。

近来，索罗斯因为慷慨捐资而成了引人注目的新闻人物。1996年他捐出了3.5亿美元，成为美国著名的慈善家。同时，他也因为把钱捐给一系列与他个人的“开放社会”主张有关的已经成为热点问题的政治事业，以及撰写有关自由资本主义的离经叛道的评论文章而引起争议。

虽然他仍然是东欧地区从事慈善事业的力量之一，但他已开始将很多慈善活动转向美国。1996年他为帮助加利福尼亚州和亚利桑那州通过使医用大麻合法化的公民提案捐献了100万美元；为一项旨在对身患绝症的人提供更有人情味和更实际的治疗的“临终关怀”计划捐出了1500万美元；向一家对合法移民提供帮助的基金会捐献了5000万美元；另外还捐献了1200万美元，用以改进老城区和乡村地区的数学教学。

极限投机

第二章

乱世逍遥

父性导师，母性哲学

进入 90 年代，华尔街便开始传播出这样的说法：在总统雕像山的对面的那另一座山，将献给世界最伟大的投资商。山顶将首先刻上两座雕像，以纪念当今在世的两位最杰出的金融奇才。一位是沃伦·巴菲特，另一位就是本书的主人翁——乔治·索罗斯。

可是，美国历史学家伯纳德·格伦在主编他那部被丹尼尔·布尔斯廷称之为“奇异的包罗万象的书”——《世界七千年大事总览》——的时候，他并没有想到要在 1930 年编入乔治·索罗斯出生于一个匈牙利犹太人家庭这件事，他可能认为根本不值得编进去，或者是他根本就还不知道华尔街有一个索罗斯，这个人居然影响着当今世界的金融以及生态环境、政治、民主活动等等。在 1930 年

第二章 乱世逍遥

这一年的大事记中，伯纳德·格伦只注意到这样一些事和人：在这一年，纳粹政治家威廉·弗里克成为图林根政府的部长。这可不是一个好兆头，特别是对乔治·索罗斯一家来说。奥地利同意大利签署和约，但这并没有使意大利在目睹希特勒入侵奥地利时伸手援助。这一年，前美国总统塔夫脱去世，西班牙政治家米格尔·里韦拉去世，英国政治家 A·J·鲍尔去世，日本首相滨口雄幸被刺，德国将军弗里德里希·冯·伯恩哈迪去世，美国著名军人、1917 年美国军队的参谋长塔斯克·布利斯去世，一战时期的德国海军司令阿尔弗雷德·冯·蒂尔皮茨去世，英国小说家柯南道尔去世（尽管他写了《福尔摩斯探案集》），德国神学家阿道夫·冯·哈纳克去世，俄国画家、列宁喜欢的伊利亚·列宾去世，美国漫画家、很多人讨厌很多人欢喜的弗兰克·麦金尼·哈伯特去世，美国雕塑家爱德华·瓦伦丁去世，他似乎并没有什么可供一般老百姓回忆的作品留存于世；捷克女高音歌唱家埃米·德斯廷去世，生前她一直与男仆保持着放纵的肉体关系；德国发明家、飞行员格伦·柯蒂斯去世，美国电力工程师、发明家埃尔默·斯佩里去世，挪威探险家、人道主义者弗里德约夫·南森去世，英国小说家 D·H·劳伦斯去世，人们还忘不了一边偷看他写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一边喝着茶诽谤他；俄国诗人马雅可夫斯基自杀，据说是斯大林对他的压力太大；美国侦探小说家梅尔维尔·波斯特去世，美国作家、记者爱德华·博克去世，英国文人威廉·博莱索去世。老天！不知格伦为啥要把这么些莫名其妙的人的死编进“世界大事记”。这

极限投机

一年还有瓦格纳的第二位妻子科西玛去世，她也是瓦格纳放纵的牺牲品，瓦格纳之子西格弗里德也随之而逝，匈牙利小提琴家利奥波德·奥尔去世，英国政治家、著名的讼棍伯肯里德勋爵 F·E·史密斯去世，他终于闭上了他那张能言善道的刻薄的双唇；出生于英国的美国边疆居民“没用的人迪克”（理查德·克拉克）也去世了，他的死使他变成了“有用的人”，他为美国边疆史留下一个专用名词或典故。英国诗人、桂冠诗人罗伯特·布里奇斯也死了，美国作家玛丽·威尔金斯·费里曼也死了，英国小说家威廉·洛克也死了，他们都荣幸地被格伦写进了历史。甚至英国梵语学者阿瑟·麦克唐奈的死也被记录在案。

这一年还发生了这样一些事：君士坦丁堡更名为伊斯坦布尔，海因里希·布吕宁在德国成立右翼联合政府，关于门罗主义的《1928 年鲁宾·克拉克备忘录》发表，被控在蒂波特多姆油田丑闻中向 A·F·福尔行贿的爱德华·多亨尼被宣判无罪（这就是美国最开明的法律），康拉德·艾肯的《诗选》获得普利策诗歌奖，马克斯韦尔·安德森发表《伊丽莎白女王》，W·H·奥登发表《诗作》，波士顿查禁所有列昂·托洛茨基的作品，阿尔弗雷德·阿德勒著成《个性心理学的技能》和《自卑情结》，艾伯特·爱因斯坦著成《论犹太复国主义》，多年以后索罗斯读了这本书。西格蒙·弗洛伊德著成了《文明与对文明不满意的人》，贝克曼完成表现主义派绘画《演奏萨克斯管的自画像》，电影《布卢·安格尔》、《西线无战事》获得奥斯卡奖，电影《亚伯拉罕·林肯》、《安娜·克里斯蒂》、《在巴黎的家里》、《谋

第二章 乱世逍遥

杀》、《大房子》、《地狱的守护神》也在这一年上映。保罗·亚伯拉罕创作的《维多利亚及其轻骑兵》在莱比锡上演，英国广播公司交响乐团成立，P·J·W·德拜利用 X 光射线研究分子结构，A·S·爱丁顿试图将广义相对论与量子力学统一，汉斯·费雪因其对叶绿素的研究成就以及氟高铁血红素综合法而获诺贝尔化学奖金，埃里克·哈尔曼著成《振荡论》，卡尔·兰茨泰纳因对人类血型进行分类的成果而获诺贝尔医学奖，维克托·巴尔纳（匈牙利）获得世界乒乓球冠军，唐纳德·布雷德曼在利兹板球决赛中为澳大利亚赢得 334 分，合约桥牌成为一项流行的纸牌比赛，美国流行连环漫画《布朗迪》丛书，英·美·日·法·意签署海军裁军条约，最后一批协约国军队离开莱茵兰，在德国举行的选举中，纳粹党在中间派中共得到 107 个席位，美国会建立退伍军人管理局和联邦麻醉剂管理局，保尔·克洛岱尔著成《缎鞋》，马克·康内利的《绿色牧场》获普利策戏剧奖，诺埃尔·考沃德创作的《私生活》在伦敦上演，T·S·艾略特著成《圣灰星期三》，威廉·福克纳著成《在我弥留之际》，布鲁诺·弗兰克著成《茶杯中的风暴》，C·S·约翰逊著成《美国文明中的黑人》，J·M·凯恩斯著成《货币论》，梅特林克发表《蚂蚁的生活》，红衣主教欧金尼奥·帕奇利被任命为梵蒂冈教廷国务卿，他后来成为十二世教皇，阿尔弗雷德·罗森堡著成纳粹哲学作品《二十世纪的神话》，亨利·马蒂斯绘成《三重冕》，凡·杜斯堡首次使用“具体艺术”一词，美国物理学家奥内斯特·劳伦斯开创了回旋加速器的发展，美国生物化学家 J·H·诺恩

极限投机

罗普将胃脘酶和胰脘酶制成结晶体，C·W·汤博在洛维尔天文台发现冥王星，丑角格罗克出版回忆录《我喜欢欢快》，艾米·约翰逊独自从伦敦飞抵澳大利亚，历时 19.5 天，法国开始建造马其诺防线，照相闪光灯开始使用，英国同德国之间开始传真电报业务，辛克莱·刘易斯获诺贝尔文学奖，约翰·考珀·波伊斯发表散文集《为淫荡辩护》，柏林的弗里德里希·特劳特魏恩发明电子乐器，希特勒不喜欢这种带有金属味的乐器发出的奇异音响。马克斯·施梅林对杰克·夏基的拳击赛在纽约城举行，门票收入达 750000 美元，观众达 80000 人。技术的绝对统治、技术统治论成为被谈论的现象，连结土耳其和西伯利亚的铁路开始运行，马克斯·施梅林被承认为世界重量级拳击冠军，这有助于在一战中败北的德国人恢复其信心，导致他们拥护纳粹。

这是一个花里胡哨的年代，没有人会注意到布达佩斯犹太人聚居区的一个普通家庭中诞生的这个似乎也很一般的婴儿。老索罗斯是一位世界语学者，索罗斯夫人是一个犹太富商的独生女，他俩的结合出人意料，遭到许多方面的反对，因为，他俩是那么迥然相异的一对，而索罗斯在他 60 多岁时却声称，他幼年时所受的最重要的影响就是来自于父母这种两种性格巨大的差异，这样的影响干预着他未来的生活直至终身，他的自相矛盾的性格，正是来自这样相差巨大的影响。

索罗斯非常爱他的父母，虽然他俩是极不相同的人，他们之间有很多紧张的关系，比如索罗斯从小就觉得有趣

第二章 乱世逍遥

的父母的分床而睡，每个月有那么几次，不是父亲就是母亲，会穿着睡衣从自己的房间里冲出来闯进对方的卧室，然后就是压抑而歇斯底里的呻吟和翻腾。随后的宁静顶多保持一分钟，其中一方又冲出来回到自己的房间，脸色显得生动闪亮，像是在瓦格纳的进行曲中所表现的一样。索罗斯把对双亲的爱深藏心底，也把他们的这种紧张关系深藏于心底。他日后坚持认为，双亲的这种紧张是他生命的动力，在他内心里，一直在上演着两个性格迥异的人物的悲喜剧，这样经常能够使他从一个 person 身上看到另一个人的观点。

索罗斯几乎同意老索罗斯的每一种观点，只是不同意他对待母亲的方式，老索罗斯不轻易流露感情，即便其夫人那样抑制不住地想向他倾诉心曲，他也故意做出一副冷漠样而回避这种儿女之情，这使索罗斯夫人大为伤心，她正是精力和情感都非常旺盛的中年时光，需要有宣泄的渠道，而老索罗斯仅仅是在与她同房时才歇斯底里地在黑暗中给予她这样的机会。老索罗斯教给儿子最有用的东西就是如何应付事世，而母亲教给儿子的却是如何内省。索罗斯从小就知道了这样的区别：他采用父亲的观点，天性上却跟母亲亲近。

他父亲在家里这样呆板，在外面却是一个外向、合群的人。他对别人的命运有着浓厚的发自内心的兴趣，极喜欢分析别人的命运，他却不愿别人一道分享他自己的内心情感。他很可能根本就不愿意面对自己的情感问题，所以他才那么感兴趣于他人的命运和日常故事。

极限投机

老索罗斯看待文物容易停留于表面，而索罗斯夫人却喜欢探究底细，她自我反省的程度已到了自戕的地步。她的宗教感特强，且具有神秘倾向，这是日后的索罗斯所没有的，但他却继承了母亲对人的存在之秘的兴趣。索罗斯夫人非常崇拜丈夫，毫不犹豫地接受丈夫对所有事情的判断，以至在他们的性生活中，她也违背天性地仍然如此，这样的状态造成了他们之间的一些冲突。在其他方面他们也有冲突。索罗斯夫人深受匈牙利社会流行的反犹太主义的伤害，并且在二战初就患了溃疡，她在压抑为自己没有自己的事业而很觉得不满意的情绪，在某些方面，她是她自己的敌人。索罗斯从小就把对母亲的感情深藏心底，但他又时刻得打起精神来对抗母亲这种失败情绪，有时候，他在母亲面前觉得自己身为一个男子汉真值得骄傲。他的这种骄傲促使他随时都必须战胜内心里被母亲植入的失败倾向。1982年他在华尔街受到巨大动荡的干扰，那时候，他回想了自己的幼年时光，想到当年是怎样排除母亲失败情绪的困惑。作了这样的反省后，他坚决排除了一切干扰，使困惑浮出表面，思想一下子变得豁然开朗，思路清晰，逻辑分明。所以他经常说，双亲的影响在他生命中持续不断。

当有人问他何以这么非同寻常地亲近父母，他坦然笑道：“我母亲本就是容易亲近的人，我也是容易亲近的人。我父亲是一个非凡的人，我崇拜他。我知道这种崇拜有点偏心，但即使到了我现在已是人生的暮年，我仍认为父亲是一个杰出的人。”

第二章 乱世逍遥

在索罗斯的童年时代，他父亲花很多时间跟他在一起，与他聊天，什么都聊，有很多内容是他那个年龄根本不可能懂的东西，但他父亲仍是不断地聊给他听，他现在终于明白了这样聊天的意义。他父亲还花很多时间陪他一块玩。经常的情形是，父亲等候在学校门外，索罗斯放学时，他们就去游泳，游泳后，他们坐在河边晾干身子，这时，父亲就跟索罗斯讲故事。索罗斯说：“那些故事就像以后我看过的肥皂剧一样，精彩极了，我完全沉迷在里面，我父亲的这些人生故事变成了我生命体验的一部分。”

其实，索罗斯父亲的一生也像是由无数个精彩的肥皂剧构成，索罗斯经常回忆这些极有戏剧性的父亲的经历。这些经历让他兴奋不已，从中受益良多。

老索罗斯曾是一个野心勃勃的年轻人。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开始他就自愿进入军队参战。军衔升到少尉时，他在俄国前线被俘，被送到西伯利亚去。即使在战俘营，他也仍然野心勃勃，自己编了一份叫《木板报》的报纸，是用手写的，贴在厚木板上，作者们就躲在木板后，听读者的说三道四。后来，年幼的索罗斯曾翻看过父亲编的《木板报》的合订本，是他父亲从西伯利亚带回来的。老索罗斯在战俘营中很有号召力，被选为囚犯的代表，战俘营中若有战俘逃跑，作为报复，囚犯代表就会被枪毙。老索罗斯心下认为，与其因别人逃亡而被枪决，还不如自己先逃脱。于是，他暗中策划，精心挑选了大约 30 个有一技之长的囚犯，包括木匠、厨师、医生等等，老索罗斯自己无一技之长，他深知这些人对逃亡的成功与否的重要性。这

极限投机

样，在一番无懈可击的安排后，他们终于逃离了战俘营。

老索罗斯按计划建造了一艘木筏，漂流到海上。但因为他们对地理知识的严重欠缺，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们不知道西伯利亚所有的河流都注入北冰洋。他们造好木筏后，便沿河而漂，希望漂入大西洋，结果漂了好几周他们才发现他们正朝北冰洋漂去。最后，他们只得从荒漠跋山涉水，又回到文明世界，这样又耗去了好几个月的时间。就在这耗费的一段时间中，外面的世界发生了巨变。俄国内部发生了革命，列宁夺了沙皇的政权，接着宣布退出战争，旋即，俄国内乱又起。老索罗斯率领的囚犯们正好陷入这个地带的动乱当中。当时，一名捷克军官控制着这个地带，他坐镇在一节装甲火车厢中，统治西伯利亚，指挥一场又一场杀戮。红军攻击白军，白军袭击红军，老百姓在其间惨遭蹂躏。老索罗斯亲身经历其间，目睹许多转瞬即逝的生死景象，他深刻理解了活着的意义和价值。

回到匈牙利后，老索罗斯变了。整个人沉默寡言，温和而小心，昔日的野心勃勃一扫而空，他再也不想成名，只想享受生活和维持自身的独立。他不想变成什么有钱人或影响力的人了。事实上，从此他都是靠自己现成的资本过日子。他和夫人结婚后，他们共同拥有很多不动产，其中相当部分当然是来自夫人的陪嫁，富有的岳父为女儿考虑，送了一大笔不动产给这个古怪但很不错的女婿。还有一部分资本则是用老索罗斯出版他的著作《世界语手册》所得到的钱购置的。老索罗斯不为人知的一项经常性的工作是律师，他很少承揽什么生意，他不喜欢做超过绝

第二章 乱世逍遥

对必要分量的工作，也就是说，只要他和家人衣食无忧，他就不想再从事工作。

索罗斯印象很深的事是，自他年幼时，他父亲就教他怎样去父亲的主要的客户那里借钱，只要筹足必需的款项，他们就去度假滑雪。当然，情形总是这样：父亲度假回来后，总有好几个星期心情都不好，因为他得去工作，想法子赚钱还债。

后来，这样的生活方式延续到二战前，变得居然渐渐地对他们有利了。

设法赚钱还债使老索罗斯彻底地对工作充满了厌倦，他开始出售不动产，一点一点地出售，以持续保证他们休闲逍遥的生活。等到德军占领布达佩斯时，他几乎已经把拥有的不动产统统卖光。从这一点来看，他似乎显示出了他那天生优秀的判断力。那时，布达佩斯的所有犹太人整天处于财产被抢掠的惊恐之中，他们还没有意识到他们的生命也在被剥夺的范围内，希特勒每天出现在收音机里的声音还是那么坚定地声称他想要和平。不管形势怎样发展，老索罗斯那时就理智地意识到了这一点：出售不动产是明智的。就撤资而言，这时候是最佳时机。但是，当时很少有人有勇气仅靠自己的资本生活，他们怕一旦不工作就会陷入危机，所以他们宁愿屈辱地活着，仍固执地想积攒自己的财产。当然，索罗斯说：“这些人因此而葬送了自己和家人的性命。”他父亲曾说过：“我把我的资本放在脑子里。”索罗斯很欣赏父亲的这种态度，虽然这样的观点与他后来的事业有着天地之差！真正有趣的是，索罗斯

极限投机

这样说道：“我模仿父亲的这种生活方式，这使我从未变成财富的囚犯。”

诗意逃亡

老索罗斯对付纳粹入侵匈牙利的方式对儿子显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至多年以后年轻的索罗斯还一直对此议论不休。

1944年3月，德军占领匈牙利。当时索罗斯还不到14岁。那是他父亲一生中最完美的时刻，他所有的智慧和行动能力都得以最充分和完美地发挥。老索罗斯知道该怎么行动，他对局势有非常清醒的认识，明白在那关键时刻，正常的规则已失去效用，守法遵纪已是危险的习惯，只有玩弄现成法规才是生存之道。他经历过俄国的大革命，知道在这种时候该怎么做。他替家人安排好藏身之所，然后搞到了假身份证。同时，他不仅帮助最亲近的家人，还协助左邻右舍。在犹太人逃离布达佩斯期间，他救了几十条人命。他比当律师更适合做这种事，显得紧张忙碌，但他情绪饱满，口中哼着小调。有很长一段时间，他们一家人躲在一小套租来的房间中，只有穿过浴室才能进房间，而经常就有很多人在浴室里排队等着听老索罗斯的妙计良方。

这是刺激冒险的年代，这个年代不是以恐怖和血腥烙印在索罗斯记忆中，却是以快乐和美妙的感觉长久地激荡在他的心间。他经常这样说，他的这种奇怪的、太矛盾的

第二章 乱世逍遥

感觉可能会令许多遭受过纳粹迫害的犹太人反感和憎恨，但他抑制不住地要说：“1944年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这太离奇了，而且这样说几乎令人反感，因为，1944年是犹太人遭到大屠杀的一年。”

但是，情况确乎是这样，在这一年里，小索罗斯在最刺激的冒险生涯中体验到了为生存而拼搏的美妙快感。他那时才14岁，对父亲充满崇敬。父亲善于主导形势，知道该做什么，能帮助谁。他们一家也处在生命受到严重威胁的境地中，但是小索罗斯甚至在那时就已坚信他已免于死亡的影响。想想，才14岁，却又相信自己不可能受到真正的伤害，这真是求之不得的感觉和机会，这是最刺激而又安全的冒险。就是在这段时期中，诸多事情形成了对索罗斯一生有着决定性的影响。他从父亲这位大师那儿学到了生存的艺术。他说：“这和我日后的投资事业的生涯有着必然的联系。”

接着，战争结束了，俄国人涌进了匈牙利并控制了个国家。生活中仍有刺激和冒险，但总的趋势却是越来越因循。随着苏联政府对整个匈牙利各个领域的越来越广泛和深度的渗透，正在成长定型的索罗斯开始感受到了限制、挤压和封锁。他这时才深刻发觉，他父亲对他的影响实在太多了，以至他早早地就开始在高压制度下思考人的生存问题。

他对父亲说：“15岁的人象50岁的人一样想问题，那太不自然了。”

“那你没想过自己闯一条生路吗？”父亲说，“你应该

极限投机

去一个什么地方，比如，你考虑过你想去哪儿呢？”

索罗斯居然平静地回答父亲：“英国，我想去英国。”因为他一直在听英国广播公司的广播，他对英国人公平竞争意识和客观报道政治形势的印象非常深刻。但出乎他父亲意料的是，索罗斯提出想去英国后又说道：“我还想去苏联。既然我们有可能要在这样的制度中生活下去，那我就想去这种制度所来源的国家，去探究一下它的本质。”

老索罗斯想必是在儿子的神色中看到了自己的年轻时代，那时他充满好奇和冒险精神。但他必须把一些事情的真相告诉儿子，然后再由儿子自己去作判断。

“哦，我去过苏联。”老索罗斯说，“我可以告诉你一些我在苏联看到和听到的事。”

他们谈了很久，索罗斯异常震惊，他难以想象出苏联怎么也会有劳动集中营这样的东西；以前他只知道纳粹德国有，在那里有上百万犹太人遇难。

就这样，索罗斯决定去英国。多年以后，他才明白，那其实是父亲的决定，而非他自己的决定。因为这种省悟，他更加爱戴父亲。他父亲告诉他，在英国有位亲戚，说不定可以帮助他进一所学校去学习。索罗斯一到英国就给这个亲戚写了信，但久久未得到回音。他写信回家向父亲求援，父亲来信很简短地指示他：“你为什么不每周寄张明信片给他，提醒他你的存在？”索罗斯照着父亲的指示去办；最后，那个尴尬而有点恼怒的亲戚送来了一张一家学校的入学许可证。

于是，索罗斯立刻行动起来，首先去申请英国护照。

第二章 乱世逍遥

但当时很难办理到这个手续，时间一周接一周地蹉跎过去，索罗斯几乎陷入绝望的境地。这次，又是父亲提醒了他：“你应当去申诉，要求见主管官员。不断地去找他。”索罗斯都照办了。不久，他就成了护照部门相当讨厌的人。当时他的一个哥哥有个同学在替政治警察工作，他哥哥就替这个同学拿着弟弟的档案到护照部门的各个办公室去走动，又让索罗斯跟在这个警察的身后。这样做令索罗斯丢尽脸面，受尽窝囊气。所有办公室的主管都这样说：“我愿意给任何人护照，但就是不想给这个讨厌的小伙子。”当然，索罗斯铁定了心，最后他还是拿到了护照。

他17岁离开故乡，此后他父亲虽然没再给予过他直接的影响，但从幼年到成年这段时期，他父亲的影响都一直存在于他日后全部的冒险生涯；如果说投资就是冒险的话。

索罗斯常说，苦难并没有给他造成过什么影响，而且，即便是在纳粹统治匈牙利时，他也没受到过多少真正的苦难。他认为，真正造成他成长中的激历因素的东西是危险，生存的危机感。

在德军占领布达佩斯期间，索罗斯知道有危险，但他更必然地相信，没有人能伤害他。他和家人处于灾难的包围之中，但他们仍是尽力去帮助别人。有一个小小的例子，索罗斯常把它告诉记者：他和家人曾经站在配给香烟的队伍里——占领军每天配给一个人五支香烟——领取份内的香烟，然后把香烟送给被封禁在犹太人住处、不能去排队的犹太人。他经常说，如果战争曾深刻地影响了他的

极限投机

话，那就是在布达佩斯被包围时，他看到死尸到处横陈，有一次他甚至看到一具尸体的头盖骨整个陷进了头颅里去了。他一直为这个印象而恶心。

索罗斯也常常谈起他母亲在战争中的奇异遭遇。当时，索罗斯夫人独自一人躲在一间度假的小屋里，深居简出，这引起了邻居的怀疑。他们认为她是犹太人，告发了警察局，警察立刻上门盘问索罗斯夫人。当时，索罗斯夫人不知是吓坏了还是失去了知觉，总之，她反常地表现得极为镇定，极为自然，一句多余的话也没有。在接受盘问时，她的表情一派漠然，长时间盯着天花板，好像要从天花板上审视自己，以确定自己给警察的印象如何。警察离开那间小屋时向她道歉，她很高贵地微笑了一刹那。此事过去很久后，索罗斯夫人才渐渐从震动中惊醒过来，她这才开始意识到她的生命曾受到多么严峻的威胁。从此，她似乎变得异常脆弱。她逃到了布达佩斯，老索罗斯把她安置在一家旅馆里。当时，索罗斯为母亲持续不停的惊悸而不耐烦，他反复提醒母亲，要保持镇静，别让父亲伤心。

总结这段非常时期的经验，索罗斯明智地说：“我认为我从母亲那儿继承了分析、自我批判的天性，但是，人生中大部分有益的经验教训都是来自于我父亲。特别是在布达佩斯被纳粹占领的那段时间里，父亲的意见始终被证明是正确的，而母亲只要跟他发生争执，事后总是被证明是错误的。这不是我的看法，我母亲后来就承认了这一点。”

第二章 乱世逍遥

17岁离开匈牙利后，索罗斯在漫长的一段时间里不能再回到故乡。苏联控制下的布达佩斯也不允许他回去。

他拿到护照后先前往瑞士，参加一个世界语会议，因为他父亲是世界语专家。当时的情况仍然不妙，他要持有苏联的出境许可证才能出境，而他并没有。他拿到的出境许可证是发给参加世界语会议的团体许可证。他因为没有及时拿到护照，错过了这个团体的行程，所以必须在他们之后出发，这样，他上了火车，以他父亲的名义前往瑞士。幸运得很，在边境上，查证件的人并没有要他出示许可证。在瑞士的伯恩，他见到了父亲，但是，会议之后他父亲就得回匈牙利，而他还得继续留在伯恩等候英国的签证。他不知道要等多久，身上只有父亲留下的几百瑞士法郎，得尽量节省。也许就是在那段难熬的时间里，年轻的索罗斯第一次蒙生出一个念头：或许可以借此机会放松一下自己。

在他那个年龄的人很少有“放松一下自己”这样的概念，这是中年人才会有想法。但年轻的索罗斯当时确实是感觉到了来自生存本身的巨大的压力。

他离开旅店，在伯恩这个安静的小城里无所适从地徜徉，青石板铺就的小街巷道令他镇静下来，他进了一家门帘罩着的小小的酒吧，要了一杯低度酒精的混合饮料。当时酒吧里几乎没有什么人，只有一个卢梭似的流浪文人在喝酒，不时独自发表自己对这个世界的见解。索罗斯靠着吧台慢慢呷着饮料，开始跟柜台后面的老板娘搭上了话。那老板娘懒洋洋的，40岁左右，抱着双臂伏在柜台

极限投机

上看着索罗斯，索罗斯避开她的目光，垂下视线，却瞥见了老板娘衣领处透出的深深的乳沟。他心底里一颤，一股生命的原初力量借着酒精饮料的作用涌上胸膛。他迅速喝完饮料离开了这间酒吧，回到小旅店后他一直沉浸在这种感觉中。他后来回忆道，瑞士那时是没有妓院之类的场所的，所以他无法受到诱惑。

两星期后，他拿到了签证，马上就去了英国。他说：“从此，远离我父亲，只是不时接到他设法寄来的一点钱。”

1956年，老索罗斯携夫人一起出国，他们全家在英国团聚。

老索罗斯于1968年去世，享年75岁。

索罗斯夫人直至1989年才去世，享86岁的高龄。她在丈夫去世后变得卓然独立，60岁时还上大学，一直在继续成长。

卡尔·波普慧眼难识怪杰

除去父母而外，索罗斯还记得另一些人对他的影响。首先是他哥哥。他哥哥给他的最大影响便是把不公平的概念以最具体的方式灌输给了他。哥哥比他大4岁，常常恃强凌弱，痛打他、捉弄他，父母亲却从未因此保护过他。他经常在父亲面前抱怨，但从未得到满意的答复。现在他明白了，不可能有满意的答复，这世界不可能有绝对的公

第二章 乱世逍遥

平。在他 24 岁时，与哥哥重逢，他们变成了好朋友。

索罗斯这个胞兄从未参与过投资业务，但索罗斯称赞他是家里真正的天才。

他说：“我哥 30 岁时，在他自己的地下室开创了一个工程公司，他彻底改革了大宗原料港埠设备的科技，而且他的公司在 15 年内便成为世界第一。他因为在工程方面的创造而得到很多次奖，他设计的设备处理了全球三分之一的大宗原料贸易。”

60 年代末期，索罗斯在集团企业的热潮中把他哥哥的公司出售给了奥登公司。这是一次很有趣的谈判，他替哥哥争取到的价钱比哥哥的公司价值高两倍，因为奥登公司可以宣扬说，索罗斯的胞兄是在他们公司任职的天才，他们公司的股票会因而更有价值。索罗斯明白，奥登公司是想借重他的名声，但他仍无不得意地说：“这笔交易是我的经典之作，我替哥哥争取到额外的收入。”

不幸的是，奥登公司是以股票支付这笔交易，索罗斯又只得替哥哥谈判争取到防止股票下跌的保障，要求对方不得使股价跌过目前市场的一半。但是，股价却下跌了四分之三，最后索罗斯只得把公司再次买回来，重新恢复独立，让它能够赚钱。不久，索罗斯的哥哥认为时机真正成熟了，自行主张把公司又卖掉，并且开始跟弟弟在各方面合作。

除了这个胞兄外，索罗斯认为谁的影响都不会比得上他父母的影响。

极限投机

当然，也还有人影响过他。他的老师，20 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卡尔·波普。索罗斯每次谈到这位伟大的导师时，语气和心情都极为复杂。他认为，不是卡尔·波普这个人影响过他，而只是他的著作和思想。他和卡尔·波普基本上没有私人关系。在伦敦经济学院，波普不是索罗斯的专任老师。索罗斯非常勤奋，他只花了两年的时间便完成了三年的课程，但他还必须多花一年时间来当注册学生，那样才有资格取得学位。他获准选择一位导师，他选择了波普，因为他非常喜欢波普的哲学。索罗斯说：“我经历过纳粹的迫害和苏联的占领，波普的书《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使我感受到启示的力量。”他认为，法西斯主义和集权社会有很多共同之处，两者都违反社会组织的另一种原则：开放社会的原则。因此，他受波普科学方法的理念影响更大，写了一系列关于波普理念的文章。后来，索罗斯在波普家见到他时，波普对他大加鼓励。索罗斯后来还是心情很异样地告诉记者：“我们的见面不超过两次。”

1962 年前后，索罗斯写出了他最重要的哲学论文《良知的负担》。这篇论文反复申论了卡尔·波普的理念，亦反映出索罗斯的思想倾向，这种倾向在他日后的投资生涯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他把论文交给了波普，立即得到波普非常热切的反应。索罗斯深受波普的热切反应的鼓舞，他决定前去探望这位伟大的哲学家。波普约他在伦敦经济学院见面，但已经有很多人守候在那里要见波普，他们发现索罗斯居然很随便地和波普约见时，群情愤慨，因

第二章 乱世逍遥

为他们都是波普的学生，需要得到波普的关照。当时的情景颇令索罗斯尴尬，他觉得自己像是不速之客。所以他退出那些人守候的房间，在电梯前面的走廊上去等着。不一会儿，波普终于走出了电梯。索罗斯迎上前去作自我介绍，波普迅疾瞥他一眼说：“你不是美国人！”索罗斯很诧异，他不知波普是什么意思。但他仍很镇静地回答：“不是。”波普说：“这有点令人失望。我会跟你解释原因的。我拿到你的论文时，觉得终于有一个美国人了解我就开放社会和封闭社会的说理了，这表示我已经让我的理念传过了大洋。但是，你经历过欧洲人经历过的一切，所以不能把你算成是我的传播对象，这就是我失望的原因。”

波普的话使索罗斯有那么一会儿感到全身僵硬，他实在无法理解波普的意思：为什么一定要让一个美国人接受了这种理论，才足以证明该理论已成功地传播出去了？索罗斯暗自想，即便是这么卓越的哲学家，对山姆大叔也是如此看重。不过，那次会面结局还是让索罗斯非常欣慰，因为波普表示他仍然支持索罗斯的研究，他对索罗斯讲了很多鼓励的话。索罗斯告别波普时暗自觉得有趣，这老头子非常可爱，他觉得。

自那次会面后，索罗斯只是偶尔去见波普，可他却说他跟波普很少见面。他也是很有趣的家伙。到了波普年事渐高时，索罗斯与他的接触更加频繁，在波普生命最后的10年里，索罗斯和他建立了真正的友谊，但是在那个时候，波普已经不再处在影响力的顶峰了。1994年6月，就在波普去世之前，他俩在布拉格有过一次美妙而令人感

极限投机

动的聚会。当时，波普到布拉格是要在中欧大学发表演讲的，他本人非常喜欢那次演讲，所以他准备9月时再来，并且还要在布达佩斯主持这所大学的学年开学。但是，他在开学之前就去世了。索罗斯对波普的去世表现得似乎很克制，在记者面前他基本上没有动情的表示，他甚至这样回答记者：“我和他的关系其实就正如你们所了解的那样，没有什么特别可称道的。我想再度说明这点，不是他本人，而是他的理念影响了我。”随后，索罗斯又再度重申，他不过是主要提到了波普而已，但他还受到另外一些思想家的深刻影响，比如海耶克、怀海德等人。

索罗斯功成名就后经常和一些重要人物来往，在媒体面前大出风头，对此，他甚为得意。他说，这虽然与他先前的形象差异太大了，但他必须承认他比较喜欢现在这个样子。他曾有几次被媒体追踪，说他和一位总统共进早餐，晚上又和另一位总统共进晚餐。他毫不隐晦这种情况。他过去的生活几乎遗世独立，现在打开了生活之门，他当然倍感放松和开心。他唯一遗憾的是没有时间和精力去使这样的名流生活更一以贯通地无休止延续并扩展下去。他多次强调，周旋于名人之中，这本身就是一种高层次的精神投资。他希望有更多的时间去跟那些人在一起度过。当然，他也强调，那些人不是指掌权的人，而是指知名的人。

当记者就“知名的人”这个概念的含义追问他时，他避而不答，但他却说了他最想见到的是物理学家沙卡洛

第二章 乱世逍遥

夫。他说：“他是我所见过的最诚实的人，他根本不能忍受说谎。”的确，不管沙卡洛夫的意见有多么激烈，但他其实是一个很温和的人，他体现出了科学家追求真理的典范——这就是沙卡洛夫普遍受到尊敬的原因。沙氏非常严肃的看待自己的责任，索罗斯对此钦佩不已。索罗斯认为，许多投资商，包括一些很成功很杰出的投资商，他们并没有很严肃地对待自己的事业，他们只是在投机，一味地投机。

沙卡洛夫在一次大致算是自由的选举中，当选进入了最高苏维埃，成为人民阵线的领袖之一。他未曾料到，这件事害了他。他在国会度过辛苦的一天后，因心脏病发作而去世。索罗斯痛心疾首地说：“我觉得他是因为没办法做更多的事而死于忧伤。”

索罗斯不反对知识分子从政，但他又对知识分子在政治中的位置感到担忧。

索罗斯也喜欢哈维尔，正如米兰·昆德拉所言，哈维尔其实是一位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索罗斯喜欢他，认为他把他担任总统的初期，变成了鼓舞人心的欢乐时光。索罗斯深深记得，他在一个国家假日去探望哈维尔，因为有人神秘地宣布总统官邸要向公众开放，到场的人会和受邀的贵宾得到同等的招待。那天，民众闻讯而来时，庭院里已摆好很多桌子，上面堆满了香肠和啤酒。这是索罗斯声称的他见过的最欢乐的场面。哈维尔对索罗斯说：“我故意把消息弄得模糊一点，免得总统府被挤翻。”

极限投机

索罗斯和波兰的布朗尼斯罗·吉勒梅在 1988 年认识，从一开始，他俩就保持了很好的关系。吉勒梅在团结工会时期，担任瓦文萨的政治顾问，他不常跟索罗斯见面，但每次会面都使索罗斯记忆深刻。吉勒梅很看重索罗斯对政治和投资的关系的分析，有时索罗斯也以他开放社会的理念去谈论波兰的民主运动，吉勒梅总是一言不发地注意听着。

在政治人物当中，索罗斯最亲近的是俄罗斯的格利哥里·雅夫林斯基。雅夫林斯基是夏塔林计划的主要起草人，也是 1990 年索罗斯率团参加世界银行会议时的代表团领队，他扮演的角色完全是他自己创造的，是他凭空创造出来的，他的宏愿与索罗斯的愿望最接近——现在仍然如此。他们之间曾有一些歧见，但随着时间的流逝，索罗斯对雅夫林斯基的尊敬与日俱增，原因是索罗斯认为雅夫林斯基真的把生命奉献给了自己的信念。

索罗斯说：“我还见过很多名人，我的努力所得到的最大的回报就是和有趣的人见面，以及参与有趣的事件。”

索罗斯的投资哲学都是从他的个人经验演变出来的，而他的第一个工作却和金融无关，那是在英国当一家装饰厂商的储训人员。这家公司专门生产一些新奇产品、纪念品、人造珠宝等等。他从学校刚毕业时，找工作并不容易，又是一个没有多少关系的外国人，只好通过一个朋友、一个在这家公司兼差的同学，得到了这个工作。

第二章 乱世逍遥

他的那个职位是一个所谓的储备干部，但这家公司并没有什么训练计划，所以最后索罗斯反倒成了业务代表。接着，他开始替一位从事批发的顾客工作，成为巡回业务代表，负责在威尔士海滨度假区对零售商做销售工作。那是他事业生涯的低潮时期，那个工作与他对自己的期望差得非常远，而且又是很艰难的工作。也有一些好处，那就是公司给了他一部汽车，是福特的安格里亚车型，在英国的福特车系列中，这是最低价的车种。这位批发商给他的第一个工作，是设法对伦敦的香烟店促销，但是这些香烟店已经有组织，已成为不同批发商的团体，所以索罗斯很少有机会销售东西给他们。在伦敦停车也很难，他有一种被排拒在这个英吉利社会之外的感觉。到威尔士海滨地区时，这种感觉稍稍获得舒解，他开始做成了一些买卖。但是，他时刻都深知，这样的工作根本不是他艰辛求学的目的，更不是父母期望他做的事，所以他决定放弃这份工作。他写信给伦敦每一家商业银行，在信封上写上这些公司的总经理的尊姓大名。当时那些求职的人没有谁会做这种事，谁都不会想到写信给不认识的人。而索罗斯从求学时就这样做过了。

他的这种行为招来一些相当有趣的答复。有一位叫华特·所罗门的人打电话给他，要求和他面谈，目的只是要指出索罗斯把他的名字拼错了。索罗斯还获得与拉查德·傅瑞勒斯公司面谈的机会，这次面谈很有启发性，因为总经理很好心地告诉他，说他想进伦敦金融圈好比缘木求鱼。这位总经理说：“在伦敦金融里，我们采取一种我们

极限投机

所谓的聪明人裙带主义，也就是说，每一个总经理都有很多侄儿、甥儿，其中总有一位聪明的人会变成下一位总经理。如果你和他出身同一所学院，你可能会有机会被这家公司聘用，可是，你甚至不是我们的同胞啊。”

这位总经理建议索罗斯远离伦敦金融圈，因为进入商业银行的人，主要是要管理他们自己的钱，因此他们对薪水的期望比在产业界工作的人低很多，他们40岁时的薪水，可能只是在产业界就业的人30岁时拿的薪水。

索罗斯非常失望，这就是他在威尔士的人生低潮，没想到是这样的结论。但多年以后，回想这件事时，他又微微一笑，认为这时期的挫折只不过是他人人生低潮之一了。他还遇到过其他的挫折。比如，他的人生方向似乎并不符合别人对他的期望，而他却对自己抱着很高的期望。

他对自己一向期望过高，这一点毫无疑问是他父母灌输给他的。他认为，他崇敬的父亲那么看重他这个儿子，他自己也就必须看重自己。当然，直到中年以后，他认为实际情况才达到了他的期望。

正因为他的期望值跟父母的是这样一般高，他就从未放弃过努力，即使那位很矜持的总经理给他揭示了伦敦金融界的所谓聪明人裙带主义的实质之后，他仍坚持努力去寻求机会。

有趣的是，就在他与拉查德·傅瑞勒斯公司会谈之后，他在辛格暨傅利兰德公司找到了工作。事实上，这家公司的总经理是匈牙利人，所以拉查德·傅瑞勒斯经理的命题仍然是对的。索罗斯和他找到工作的那家公司的董事出身

第二章 乱世逍遥

于同一个国家，这一点很重要。那是 1953 年的事。

关于这份工作，有人问索罗斯，是否跟他是犹太人有关系，索罗斯坦承，那可能有关系。但是，主要的还是因为他是匈牙利人。他的国籍其实成了别人拒绝他或聘用他的最重要的参数。

在辛格暨傅利兰德公司，索罗斯真正变成了储训人员，而且有了一份薪水，好像是每周 7 英镑。

这份薪水比他当业务代表时少一点。他仅仅只是奉命做一些很平凡很单调的事，而他又做得很差。最糟糕的是他必须用手登录复式分录帐，因为他们没有记录外汇的机器，所以索罗斯必须在一块很大的铝板上放好贷方和借方的帐目表和一张控制表。一天结束时，贷方和借方应当平衡，在控制表上变成 0。不幸的是，索罗斯自干上这份工作以来，没有一天结果是正确的，弄得他的上司还得亲自来调整这些数字。这样，上司当然就不喜欢索罗斯了。

后来，索罗斯在交易部门接受一些训练，进入交易室工作。交易室在证券交易所隔壁，经纪人四处散坐，等待订单。索罗斯的上司随时都和约翰内斯堡、布鲁塞尔、巴黎和纽约谈话，以了解那边的行情。他主要是交易黄金股。索罗斯在这里也没有绽放出光芒，虽然这已是符合他的要接触真正的金融工作的愿望。他的上司是一位很谨慎，办事精确的人，那不是索罗斯的长处，所以上司又把他送回了总公司。

接着在一个周末，索罗斯去巴黎度周末，和他哥哥见了面。不想却被大雾困住，一直拖到星期二才得以回公

极限投机

司。星期二当他走进办公室时，大家看他的表情令他吃惊，那些人好像都不认识他似的，仿佛他已不存在。过了一会儿，聘用他的那位总经理把他叫了进去。

总经理问道：“星期一你为什么没来？”

索罗斯没有向他解释原因，而是抓住这个机会问总经理，他在这个公司里的前途究竟如何？总经理告诉他，从他收到的报告看来，索罗斯的行为不是那么令人满意。他告诉索罗斯，如果他能设法带一些业务进来，那他的前途会非常光明，但是如果索罗斯只期待他们替他找到一个重点业务，那么他就只有永远等待下去了。因为公司并不会想到要给他一个什么特殊的工作。总经理还告知索罗斯，公司并不在乎他继续留下来，反正他也花不了多少他们的钱，但是在他做过的部门里始终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人。

关于带进业务，索罗斯明白，任何顾客或交易，任何能赚钱的东西，这些都是业务。索罗斯冒险问总经理：“如果我另谋工作，您会不会介意？”

总经理说：“随便，如果是那样的话，我会祝福你的。”

谈话到此结束了。出来后，索罗斯和一位叫罗伯特·梅尔的储训人员共进午餐。梅尔是从纽约来的，他父亲在纽约拥有一家小经纪公司。索罗斯告诉了梅尔他刚才和总经理的谈话。梅尔就说，他父亲正在纽约找合适的人手，他本来要向他父亲提起索罗斯，但是因为他觉得索罗斯只是一个储训人员，他从公司把他挖走并不妥当。梅尔问索

第二章 乱世逍遥

罗斯愿不愿意去纽约，他可以安排好一切。

索罗斯未曾料到这是改变他一生的决定，但他决定下来了，这便是他到华尔街工作的整个过程。

告别欧洲

1956年9月，索罗斯抵达纽约。

那一年，苏丹宣布成立为独立的民主共和国，铁托同纳赛尔在开罗会晤并访问了莫斯科。约旦和以色列接受了联合国的停火建议，约旦国王侯赛因解雇了英国将军格拉布，以色列同黎巴嫩、叙利亚和约旦实行停火，接着又入侵西奈半岛；英法向埃及和以色列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双方停火；但美国却向以色列提供援助。

那一年，约翰·奥斯本著成《愤怒地回顾》，安格斯·威尔逊著成《桑木林游戏》，布莱希特的“柏林剧团”访问英国，门肯去世，《安妮·弗兰克日记》获普利策戏剧奖，兰佩杜萨著成《豹》，埃德温·奥康纳著成《最后一声欢呼》，约翰·肯尼迪的作品《勇气的侧面》获普利策传记文学奖。

那一年，犹太人神学家利奥·贝克去世，汤因比发表《一位史学家对宗教的探讨》，诺曼·圣约翰—史蒂瓦斯著成《海淫与法律》，威尔金斯和莫尔著成《月亮》，丘吉尔发表《英语民族史》，琼·穆罗乌克斯发表《基督的历程》。

那一年，一种叫作中微子的无电荷核粒子在美国的洛斯阿拉莫斯试验室制成，兰伯特森、皮西奥尼和温策尔发

极限投机

现反中子，F·W·米勒制作成离子显微镜，贝尔电话公司开始研制视听电话，穿越大西洋的电报电缆安装完毕，M·D·罗斯同 M·L·刘易斯乘汽球上升到同温层高度 22.8 公里，艾伯特·萨宾研究出抗脊髓灰质炎的口服疫苗。

那一年，英国银行的利率提高到 5.5%，为 1932 年来的最高率，核裁军运动在奥尔德马斯顿举行首次长征，“摇摆舞”成为时髦舞，意大利定期班船“安德烈亚·多里亚号”在楠塔基特岛附近同“斯德哥尔摩号”相撞后沉没。

那一年，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赫鲁晓夫谴责斯大林的政策，布尔加林和赫鲁晓夫访问英国。苏联军队进军匈牙利，联合国安理会的要求被否决，联合国代表大会谴责苏联，匈牙利实行军管，大批人员被捕。艾森豪威尔再次当先总统，尼克松出任副总统。艾登首相离开伦敦前往牙买加疗养，巴特勒被任命为代首相。日本被接纳为联合国成员国。马丁·路德·金成为废除种族隔离运动的领袖。

那一年的电影有：《第七个封印》、《情人》、《战争与和平》、《周游世界 80 天》、《十诫》、《生活的欲望》、《罗密欧与朱丽叶》等。

那一年，冯·卡拉扬成为维也纳国家歌剧团的乐队指挥。斯特拉文斯基发表《圣歌与尊敬的圣马尔奇的名字》。伯恩斯坦创作的音乐喜剧《忠厚》在纽约上演。流行歌曲有：《蓝色羊皮鞋》、《猎狗》、《我满可以跳一夜舞》、《在你居住的街道上》、《不要那么无情》、《奎·塞拉，塞拉》。

第二章 乱世逍遥

那一年，罗基·马西亚诺以保持不败记录从拳坛退休，年仅 21 岁的最年轻的弗洛伊德·帕特森在重最级拳击赛中击倒阿尔奇·穆尔获得冠军。

但是，当索罗斯申请签证时，主管部门拒绝他，他们说索罗斯太年轻了，才 26 岁，不可能成为专家，不能提供本地人才无法提供又迫切需要的服务。即便多年以后，当索罗斯在华尔街震动世界金融界时，也无人追溯他进入美国的那一年的情形，那一年毕竟发生了那么多大事，谁会注意到一个失意的匈牙利犹太小伙子呢？

梅尔的父亲老梅尔随后请《黑市年鉴》的作者法兰兹·皮克写了一封资格推荐信，上面这样写道：“套利交易员一定得年轻，因为他们很年轻就去世了。”这样，索罗斯才因此得到了进入美国的签证，但是他从未忘掉关于他的推荐信，于是，他一到华尔街就尽他所能，迅速地脱离套利交易业务。

他先开始在国际套利部门交易，也就是在某个国家购买证券，然后在另一国家出售。当时他交易的股票主要是石油股。那一年，纳赛尔当选为埃及总统；美国和英国通知埃及，它们将不参加对阿斯旺高坝的投资；纳赛尔就宣布将苏伊士运河收为国有；法国公民纷纷逃离埃及，纳赛尔接着又拒绝了解决苏伊士运河问题的《达勒斯方案》；英一法部队于 10 月 31 日轰炸埃及机场，美国和苏联于 11 月 6 日在其间强制实行了停火协定，英、法撤军，联合国舰队清除了苏伊士河上的障碍物，纳赛尔的阴谋未能完全得逞。

极限投机

苏伊士运河危机消退后，石油股票的业务开始走下坡路，于是索罗斯开发出一种新形式的套利。他把这种新形式叫作内部套利。有些新证券发行时，会把不能立刻分割的普通股、认股权证和债券合并发行。索罗斯发展出一种方法，在这种合并证券可以正式分割前，就能够进行个别的交易。结果，这种作法变成了一项很好的业务，公司在这种特殊的利基上赚了相当多的钱。

可以这么说，索罗斯从他的金融生涯的一开始就几乎是一名国际投资者了。但索罗斯并不这么看，他只把自己那时的身份看作是一名普通的交易员，这与“国际投资者”有很大的差别。他认为，他那时不是在投资，只是在交易。迅速地买进、卖出，除了在很严格的限制下，他不得保留部分。接着，欧洲煤钢共同体形成，欧洲股票热潮开始出现，共同体后来干脆变成了欧洲共同市场。

美国银行和投资机构认为，他们站在欧洲合众国创始时期的有利地位上，他们对欧洲证券有惊人的兴趣。

这时，渥特海姆公司来找索罗斯，要他加入这家公司，索罗斯同意了。他在这家公司担任欧洲证券分析师，也担任交易员，后来不久，他成为了对机构销售的业务代表。当时有关欧洲公司的讯讯极为原始，索罗斯写出的研究报告如果在今天来看，那肯定会令某个银行老板大为伤心，那些报告实在太业余了。但那毕竟奠基了索罗斯未来几十年的宏伟大厦。

说实话，那些报告并不肤浅，但却是推测的东西，没有多少实据。当时讯讯很不容易得到，因此许多分析结论

第二章 乱世逍遥

都必须从有限的信料导引出来。索罗斯也正因此而变成欧洲投资热潮中的领袖，成为瞎子王国中的独眼国王。德瑞福斯基金和摩根银行之流的机构，当时对索罗斯几乎是言听计从，因为他们也需要这样的讯，他们投资了很大一笔金钱，他们不想血本无收，索罗斯当然就变成了这其中的主角，这是他事业生涯中的第一个重大突破。那是1959年到1961年间的事。

索罗斯是第一个研究德国银行的人，他指出他们的股票组合价值远比他们的资本总额大许多。这之后，他把兴趣又转向了同盟保险公司。他写了一本有真凭实据、有关德国保险业的书，他指出一家保险公司集团、就是阿亨——慕尼黑集团，集团成员彼此都交叉持股，他把这些交叉股加总在一起，指出：如果把交叉持股的价值算进去，你可以用远比实际价值低得多的低价购买其中一些股票。

在当时，美国还没有人做这种工作。

索罗斯和他的同行们以仅在发行时有效的基础，出售这些美国存托凭证。如果美国存托凭证没有发行，公司帐户就会留下这家公司普通股的持股，他们必须把这些股票在东京卖出，承担重大亏损。当然，几天之后，东京海上及火灾保险公司发行了美国存托凭证，利润实现了。索罗斯和公司其他人谈论，跟他们解释事实，但对他的那种怀疑气氛仍是不可能完全消除。因为如果他说的是事实，就表示他的合伙人在说谎，只要他继续留在公司，这件事就会萦绕在他的心头，挥之不去。所以他等待了相当长的时间后，便开始寻找了另外一个工作。他离开公司时，这位

极限投机

负责的合伙人说，只要索罗斯不说他任何坏话，他也保证以后永远不说索罗斯的坏话。于是，索罗斯进了安贺暨布莱公司。

安贺暨布莱公司早先就曾放话出来，他们随时欢迎索罗斯加盟进去。索罗斯在这种时刻接受了那个公司的工作。他们找这方面的人才已找了好久，但当索罗斯进去时，他其实在那里已无事可做，因为欧洲证券业务已经被利益平衡税摧毁。可是在把美国投资机构的持股卖回欧洲方面，仍然可以做一些利润非常高的交易。在这方面，又有一个相当有趣的轶事。索罗斯最初发现同盟保险公司、并且推出有关保险业的报告时，同盟保险公司的经营层写一封信告诉德瑞福斯公司，说他们买同盟集团的股票犯了一个错误；同盟保险公司认为索罗斯的分析不正确，误导大家，他们的股票已经高估。德瑞福斯公司不理这封信，继续买进，结果股票涨了两三倍。利益平衡税实施后，德瑞福斯公司想要退出，摩根银行也想退出，索罗斯便直接去找同盟保险公司，劝他们兜售这些股票。这时，同盟保险公司又写了一封信，向德瑞福斯公司解释说，卖这些股票是极为严重的错误，因为他们公司会有很高盈余，会提高股利，并且要做一些其他多利的事情。不过，这时的股价远比他们说股价高估时高多了，最后他们把这些股票纳进控制股权的联合机构里。

索罗斯这时候似乎能做的都做了，业务越来越稀少。他又退回到哲学领域里，从1963年到1966年，他花了很

第二章 乱世逍遥

多时间修改他的哲学论文。

当然，他并没有放弃投资事业。他继续受雇，但是他的心思放在哲学上，而不是放在投资事业上。

他继续修改《良知的负担》，并于1961年到1962年完成，由渥特海姆公司的内刊部门予以发行。应该说，那是他最想从事的工作，但似乎没有多大进展。有一次，他重读前一天写好的东西，竟然看不懂。直至那时，他才猛然省悟过来，他是在浪费生命。于是，他决定重新回到商场。

关于《良知的负担》这部哲学著作，索罗斯在其中寄予了很多希望，亦设置了某种理念作为目标。他认为自己有一些重大的哲学新构想，他想把它们发表出来。到了后来他才明白，所谓那些构想，主要的还是在重述卡尔·波普的理念。但当时他并未放弃幻想，坚持认为自己在哲学领域有一些新发现。

他认为，我们对所处世界的理解天生就不完整，在参与者的看法、期望和事情的实际情况之间，总是有差距。有时差距很小，可以不理睬，但有时差距会很大，甚至变成决定事件过程的重要因素。历史就是由参与者的错误、偏见和误解造成的。

那么，股市的潮涨潮落难道不是吗？索罗斯的哲学尽管在真正的哲学意义上并无多大创建，但他却能恰入其分地把这些理念融入他对股市的判断中去。

极限投机

1966年，索罗斯放弃了他的哲学，再度返回商场。当时他对美国证券了解不多，想找个方法进行自我教育。他用公司的资金设立了一个10万美元的模型帐户，并且把这些钱分成16份，然后用其中的一份或两份投资在他认为特别有吸引力的任何股票上。他写了一篇简短的报告，解释他买每一种股票的原因，并且用月报继续追踪，检讨这个投资组合，讨论其中的发展。他还提供一个每月绩效记录表。他用这个模型帐户作为销售工具，开发投资机构的业务。这个模式被证明很成功，它使索罗斯得以重新接触投资圈。在他研究哲学并进行写作的那几年里，他一直生活在真空中，现在，他可以用潜在的投资者测试自己的投资理念了。如果他得到的回应良好，那么他就明白他的构想很好，如果得到负面的回应，他就必须认真地质问自己是不是走在正道上？结果，他得到一些很有价值的反馈。

这似乎有点不像索罗斯的风格，华尔街都知道，他通常不会让别人来决定他的构想是好是坏。

但他认为，在金融市场的运作中，测试自己的看法很重要。他举了一个例子，有一家公司叫美国特盖公司，他去那儿拜访其经营阶层时，他们告诉他一个很动听的故事，他深信不疑。后来，他的一个潜在的顾客打电话给他，说这个故事很动人，但是其中有一个问题：这家公司的经营阶层因经常说谎而臭名昭著。这个讯息对索罗斯非常有用，也显示出这种反馈多么有其价值。

索罗斯的第一个重大行动是在卡车货运业上。他把模

第二章 乱世逍遥

型帐户 16 个单位中的 4 个单位投资在货运股上，成果非常好，使模型帐户获得相当好的绩效。接着他根据这个投资模型组合设立了一个小规模的投资基金，叫作第一老鹰基金。隔了一年，也就是 1966 年，他们又筹组另一个小规模基金，资本额为 400 万美元，叫做双鹰基金，这是一个避险基金，可以卖空，可以做多，也容许使用融资。后来，随着这两个基金开始成长，出现了潜在的利益冲突。因为他们一方面为顾客推荐股票，另一方面又替自己的帐户购买这些股票。虽然他们把所有的购股行为透明化，但是情形仍然变得无法承受，在卖出股票时尤其如此。公司的利益和顾客的利益发生了严重分歧。最后，索罗斯只好放弃这个模型投资组合，离开安贺暨布莱公司，并于 1973 年创设了他自己的避险基金。

这个基金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量子基金，在它创建初期是叫作索罗斯基金。

他离开安贺暨布莱公司时，双鹰基金的股东可以决定是跟他走，还是继续留在公司里。他们的分手很友善，一直到今天，安贺暨布莱公司仍是他的交割经纪商和主要保管商。

极限投机

第三章

金融炼金术

帝国的雏形

量子基金的前身是双鹰基金，于 1973 年改名为索罗斯基金时，资本额约为 1200 万美元。这些钱中属于索罗斯本人的很少。管理团队可以获得利润的 20%。当时他有一位资金合伙人吉姆·罗杰斯，他们持续把应得的利润投资在基金里，并且像所有其他股东一样，获得同样的投资报酬率，加上他们每年得到利润的 20%，他们在基金里的持股便持续提高。

这是索罗斯的事业走向峰巅的开始。

罗杰斯和女友苔碧莎骑 BMW 摩托环绕世界后，写了一本书叫《投资骑士》，罗杰斯现在亦以投资骑士而闻名，本人又是 CNBC 的分析师。他原来在华尔街一家小公司当分析师，后来到了安贺暨布莱公司，与索罗斯一块儿工

第三章 金融炼金术

作，当时只有他们两人合力齐心奋斗。

罗杰斯是杰出的分析师，而且特别勤劳，一个人做 6 个人的工作，同时他也了解并且赞同索罗斯的理念架构和投资哲学，所以，他俩协作的情形非常良好。他们合伙后，成就斐然，不断地成长，但也因而产生一些问题，因为罗杰斯不希望再增加员工，他满意他们的合伙关系，不希望外人介入。索罗斯不得不对他施压，要求扩大管理团队，以便配合他们日渐扩大的规模。罗杰斯抗拒这种做法，但经过索罗斯的反复争取，他们还是聘请了一些储训人员，由罗杰斯从头开始训练，因为他们当时的理念是不要与华尔街发生任何关系，他们认为任何人有了华尔街经纪商的背景后，就遭到蹂躏，再也无法补救了。

他们认为华尔街肯定有什么地方不对头。

他们的出发点都假设市场经常是错误的，实际上，索罗斯和罗杰斯最大的差别，是罗杰斯认为流行的观点总是错误的，索罗斯却认为他们也可能错误。他们把华尔街的看法视为凡俗之见，因为他们不但希望与众不同，而且事实上他们也与众不同，带着凡俗之见加入的人，一定不能配合他们的操作。罗杰斯对这一点非常坚持，索罗斯没有那么固执，他愿意从华尔街聘请一些人，但是因为罗杰斯的观念如此，而且他又做了所有的工作，索罗斯只好屈从他的意见。

有趣的是，罗杰斯做所有的工作，而索罗斯做所有的决定。罗杰斯从来没有负责过决策，索罗斯也不容许他负责决策。这是因为罗杰斯不擅长做决定，他只精通分析。

极限投机

这就是他俩之间的分工。

所以，经常的情况是，罗杰斯提构想给索罗斯，然后说：“你打算怎么做？”

当然，也有的时候是索罗斯想出一些构想，然后罗杰斯去做研究。索罗斯也做一些研究，在他们进入新的领域或出了问题时，尤其如此。一般说来，他们都遵循先投资、再研究的原则。索罗斯负责投资，罗杰斯负责研究。

也有这种情形：索罗斯做了投资，罗杰斯去研究后，发现构想有错误，而索罗斯仍然继续持有那种股票。事实上，对索罗斯来说，出现这种情形是非常好的状况，因为他们都知道其中的缺陷，他们知道在哪里找问题、什么时候该退出。他们走在游戏的前端，很安心地抱紧这种股票，他们总是在寻找缺陷，偶尔他们会知道构想完全错误，然后他们就会尽快地退出。

有个记者跟索罗斯的私交不错，他也买一些股票，就挑选索罗斯感兴趣的股票。而那时索罗斯跟这位记者打电话分析股票时早已忘了他说的他很少做分析工作的那些话。那时候他相当努力地工作，而且已成为某些产业的专家。他说：他必须做速成的专家，因为如果他有了新的构想，他只有几天的时间去熟悉一个新的产业，不过，也有很多情形他研究得相当深入。

比如，汤姆布朗公司，那是一家石油服务公司。

石油服务业其实是罗杰斯的构想，他们做多头赚到很多钱，然后做空头又亏了很多钱。“一个人控制石油的时候，”索罗斯说，“如果他宣扬油井的好处，你很难跟他对

第三章 金融炼金术

抗，他夸称要把他的油井命名为‘索罗斯一号’、‘索罗斯二号’等等，以便纪念我们所持有的大量空头部位，他很有幽默感，但我们不觉得有趣。”

有一家抵押保险公司，索罗斯和罗杰斯根据它名字的缩写，把它称为神奇公司。加州住宅市场崩溃时，市场认为这家公司可能破产，但是这家公司熬了过来，他们因此赚了一大笔财富。索罗斯就是在这个时候制定了一个规则，规定企业成功熬过艰苦的考验时，应该拥有他们的股票，但是在考验期间应该避开这些股票。索罗斯也知道，其实这种事说来容易做起来难。

接着是不动产投资信托业类的股票，这个行业可以说是索罗斯让他们出名的，索罗斯抓对了进出的时机。他发表了一篇研究报告，描述这是开始时会自我强化、最后会自我毁灭的程序，结局会很凄惨，大多数不动产投资信托公司会倒闭。但是，结局至少要3年以后才出现，因此现在应该购买这些股票。他们在做多头方面表现良好，早在这些股票到达天价前就卖光了。好几年之后，这些股票开始下跌，索罗斯觉得当时放空已经太晚了，但重新看自己以前的报告，报告里预测这些公司最后会倒闭，于是他才明白做空永远不会太晚。这次是索罗斯放空获利超过百分之百的唯一一次，因为在股价下跌时，他不断地在空头部位加码，大约投资了100万美元，对他当时的避险基金来说，这个金额是很大一笔钱。

这期间，罗杰斯也提出过一些杰出的构想。他最重要的构想应该是国防工业类股，当时国防工业完全被人忽

极限投机

略。从上次国防工业景气结束后，只残存一两位分析师继续研究这个行业，罗杰斯发现 E 系统和桑德斯公司之类的股票。

索罗斯也有一个特别自傲的研究计划。

他在 1978 年或 1979 年抓准了科技股，他认为这是他这辈子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罗杰斯先有这个构想，认为世界会从类比式转变成数位式，他希望抛空类比式产品的公司，但索罗斯对做多头比较有兴趣。这时候，科技股备受冷落，分配式资料处理的业务成长像野火一样蔓延，而股票的本益比却很低，因为市场成长太快了，现有的供应厂商无法维持市场占有率，投资者担心商业界巨人会介入市场，把这些新兴公司彻底击败。因为有这种恐惧存在，这些新兴公司不能从外界筹集任何资本，只好依靠内部产生的现金，供成长之用。他们不能满足需求，当时的大电脑公司确实有机会打进市场。用自己的资金成长，这是最糟糕的自我实现预言。当投资人的心理反转时，就提供一个惊人的获利机会。

罗杰斯和索罗斯到蒙特瑞参加美国电子协会的年会，整个星期里，他们每天与 8 到 10 家公司的经营阶层见面。他们探索这个完全不同的天地，选择 5 个最有成长希望的领域，每个领域挑选一支以上的股票。这是他们这个团队最美好的时刻，随后的一两年里，他们享受这份努力的成果，基金的表现比以前更好，但是他们之间的紧张关系变得无法忍受，因为基金迅速成长，管理团队却没有成长。索罗斯和罗杰斯之间的分歧在这时已非常明显地暴露出

第三章 金融炼金术

来。

那时候，索罗斯已经聘请了一些人。

他们引进一些非常有天份的人，这些人不是完全没有经验，而是经验很有限。他们开始学习，开始和罗杰斯讨论事情。罗杰斯不能忍受来自底下的批评，对于索罗斯的批评他从来没有过不满，但是他不能忍受索罗斯的徒弟批评他或与他意见不同，所以，在这些人真正开始发挥生产力时，他会离奇地把他们摧毁，这样就造成了很不愉快的气氛，也使他们丧失了这些刚刚能够独立作业的人才。因此他们的公司出现了真空。

他们的基金规模越来越大，但是他们不得不做所有的工作；他们成功了，却又遭受到工作和责任的不断增加的惩罚，这终于演变到他俩之间的合伙关系破裂的地步。

合伙人

索罗斯也曾试图让罗杰斯对现状有个清醒的认识。他们在蒙特瑞的时候，索罗斯提出一个三阶段的策略。第一阶段是他们合力设法组成一个团队，如果这个做法不成功，第二阶段就是组成一个没有罗杰斯的团队；如果这样还是不行，第三阶段就组成一个没有索罗斯本人的团队，实际情形就像这样子。为了预作准备，索罗斯把公司的名子从索罗斯基金改为量子基金，他说这样是为了庆祝基金规模像量子一样跳跃成长。他对量子机能的不确定原则当然很感兴趣，但是真正的原因是要把他的名子撤走。

极限投机

后来发生了一系列事情。

他们在1978年开始第一阶段的策略，在1980年初承认第一阶段的策略无效，他们散伙了。但是基金在整个1980年到1981年初，继续以惊人的速度成长。索罗斯完全独力管理这个基金，只有非常少的员工，压力变得无法忍受，这是第二阶段。这种情形导致1981年的危机，那年9月，索罗斯从积极管理基金方面退出，把基金的资本移交给其他经理人经管，这是第三阶段。

1981年的危机很早之前就开始了——大约是在索罗斯说出三阶段策略时，当时他极为成功，却极力否认自己的成就，他累得像狗一样，觉得如果自己放弃戒心，他的成就会受到威胁。那他有什么报酬呢？更高的资金，更多的责任、更多的工作、还有更多的痛苦——因为他依靠痛苦作为决策工具。基金规模达到一亿美元了，他个人的财富应该也有2500万美元上下，他却接近崩溃边缘。这样毫无意义，他决定和自己的成就妥协，方法是接受自己确实很成功的事实，即使这样表示他此后不再成功，也要这样做，因为他的成就是靠自我否认、自我批评、自我折磨的态度得来的。或许他会把生金蛋的鹅杀掉，但是如果继续生金蛋，而他的生活却愈来愈痛苦，这又有什么意义？他认为，他必须开始享受自己成功的果实，否则他所有的努力都毫无意义。

在索罗斯的定义中，成功和他的生活是毫无关系的。他说：“成功只和我的工作有关。”他认为，一般来说，成

第三章 金融炼金术

功的好处之一是可以享受他想要的东西，但是他并没有任何豪奢的兴趣。与他的财力比较，他的生活一向简朴得多，但是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他愿意承受的痛苦、压力和戒心的程度。

他说和自己的成就妥协的意思就是：改变态度，接受自己很成功的事实，放弃自己的戒心，完全承认其中的危险。

随之而来的是相当狂乱的时期，索罗斯不但与罗杰斯分手，也和他的第一任妻子分了手。

无限扩张

说到索罗斯的婚姻破裂，这是他心理混乱经历的一部分，两者没有直接关系。

索罗斯的太太一直都很支持他，很能容忍他投入事业，但是索罗斯心理的剧烈矛盾瓦解了他们的关系，因此带来一个相当狂乱的时期。在这个时期里，他和合伙人散伙，和太太分手，独自管理一亿美元的基金。他故意放松到当时为止所遵循的操作限制，结果很好笑，竟然是一段成绩绝对令人吃惊的时期。在随后的两年里，他们实际上每年都使基金扩增一倍，基金规模从1亿美元跳到近4亿美元。

索罗斯所谓的放松限制就是，情况显示他一直过度自我批评、过度自制。他一直坚持要对每一种状况深入了解，才做一笔投资，又经常太早卖出这笔投资，因为他认

极限投机

为它不像应有的情形那么健全。发生这种现象的原因之一是他总是有很丰富的新构想，这些新构想会奋力地挤入投资组合里，排除掉很多既有的投资。

他掌控的时机的确太早，他的管理风格太严谨，太绑手绑脚，因此他改用放任的态度，有人认为他开始比较注重直觉了，但他认为，真正的意义是他不再做那些基础工作了，他让自己拥有的资讯慢慢地消耗。进入这段狂乱的时期时，索罗斯已拥有丰富的知识，所以他几乎可以根据这些知识应付可能出现的任何新机会。他曾经有这样的情形：他惊讶地看着自己，对于自己反应速度之快、对于自己可以掌握的丰富资讯、以及自己可以应用的推断深感讶异。他主导每一个状况，能够推断出别人看不出的关系，但是他也觉得他正在消耗自己的资产，他这部机器正在瓦解。基金从1亿美元成长到4亿美元，他觉得他慢慢地失去了对它的控制，他比较明白自己现在所处的状况，但是他又不知道他会进入什么样的状况。他明白，他不可能长此以往，因为，要支撑4亿美元的基金所需的构想，这比在这个狂乱时期开始时多得多，压力确实变得几乎无法忍受。虽然他设法使自己放松，却不能负责任，即使他远不如以前那么谨慎的行动，他仍然觉得职责在身。这种情形事实上变成一种内部冲突，使他觉得基金像是一种生物、一种寄生虫，正在吸噬他的鲜血，消耗他的精力。他自问谁比较重要：基金还是他自己？基金是他成功的工具，或者他成了基金的奴隶？这种情形促使他实施第三阶段的策略性计划，这个计划在他1978年时就说给罗杰斯听过，

第三章 金融炼金术

他想从火线上退下来。

心灵的裂隙

索罗斯没有想到，他设法让基金进入新阶段，却遭遇许多困难。他想找人分担管理基金的责任却找不到，于是他开始找可以把全部责任授权下去的人。这样，当然就形成了不幸的结果。那就是他把他内心的混乱公诸于世了。他越和很多人谈，越是很多人知道他的心理状态，他的心理状态就变得越是糟糕。

他陷入某种危机的流言开始传播开去。接着，他又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在找人管理基金时并没有停止基金的操作。其实他应该冻结基金，然后改组管理阶层，但是他却在约谈别人的同时又继续做投资决策。

这一切混乱给基金造成了严重的影响。

首先是造成基金创立以来的第一次亏损。他把自己的问题通知股东，给他们退出基金的选择权利。1981年9月，基金净值下降约26%时，他们又遭到相当大笔的赎回，基金规模一下子从4亿美元降成2亿，这是他和基金之间内部斗争的结果。基金输了，因为那一年的净值下降22%；他赢了，因为他恢复了主导权。

那么，索罗斯是如何界定恢复主导权的定义呢？

首先，他拒绝再做事业的奴隶，确立了只有人，只有他才是主人，而非奴隶。这点在很多方面是极大的改变，因为他开始接受自己是成功者的事实，他克服了如果承认

极限投机

自己成功恶运就可能来临的恐惧。

他几乎认为，承认自己成功是一种罪恶。

而且比这还要严重。他认为承认自己成功，成功就会丧失。索罗斯不断强调，这种恐惧很有道理。他说：“如果你是个认真从事冒险的人，你就需要纪律。”他所依靠的纪律是很深的戒心，戒心协助他在问题失控前警告他。如果他放松了这种纪律，他一定会理所当然地重新陷入勤奋工作和其他不是他专长的例行事务上。他害怕承认自己成功，因为承认了自己的成功就有可能侵蚀他的戒心。他说：“一旦你把成功视为理所当然，戒心就会降低，等碰到问题时，你会静坐不动，你知道自己很成功，总是会设法摆脱困难。到了这种地步，你就已经丧失摆脱困难的能力了。”

索罗斯非常害怕自满自适。不过，经过这段狂乱的时期后，他的人格历经了重大的变化。在他的情感结构中，罪恶感和羞耻感因素占相当大的一部分。但是他熬过了这段狂乱的时期。他甚至寻求心理医生的帮助，去看过几次心理分析师，事实上并没有多大效果，也毫无意义。他从未接受过精神治疗。他一周去看一两次心理医生，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程序，至少他会主动地透露出自己的偏见，把偏见公开后，他会轻松，并且认识到这些偏见毫无意义，因此，他就可以肯定地抛弃那些偏见。

过去他嘴里的唾液腺有一颗结石，极为疼痛，医生动手术拿出结石，手术也很痛。这颗结石是坚硬的小圆球，因为这颗结石造成他那么多痛苦，所以他希望保留这颗结

第三章 金融炼金术

石。但几天之后，他再察看结石时，发现它已经变成灰，它是纯粹的钙，干燥之后会变成粉末。他就想，他的烦恼其实也是这样。其实，正如结石一般，烦恼公开之后就立即烟消云散了。

可以说，在那一段时间之后，索罗斯的人生变得比较积极了。

他觉得他已经完成某些成就，的确变得比较容易与别人共同生活了。他说：“我敢说我的第一任和第二任妻子对我的看法一定完全不同，我告诉现任的妻子苏珊我以前是什么样的人，我想她不很相信我的话。”

到了1981年9月，索罗斯已经把基金分散成由很多基金组成的基金，他的计划是把基金分成好几个部分，发交给其他的经理人，他变成监督，而不再是活跃的经理人。随后的1982年到1984年期间，是死气沉沉的岁月，这种安排似乎并没有很好的成效。

在这段期间里，把基金发交出去的管理方法并非都很成功。索罗斯任用了一些外部的经理人，有些人表现很好，而且很多年来都继续替他管理资金，但有些人做得没有那么好。他聘请了一位驻在公司的资金经理吉姆·马魁斯，这种安排的整体绩效并不好，他开始对这种安排不满意了，所以决定重作冯妇，变得比较主动、积极。马魁斯不能够忍受索罗斯的积极主动，他离开了。

1984年，索罗斯决定不再把所有的资金发交给其他

极限投机

基金经理人，自身重回投资事业，并且建立一个团队，问题就剩下找出一个好手了。

当然那都是后来的事，一开始他并没有管理团队，他认为，他必须重新进场，独立奋斗。

从那时起他开始了他的即时实验。

为了让自己在心智上重新与投资结合，他决定设法写一本书，谈他的投资方法，就这样开始了他所说的即时实验。他的构想是在决策过程逐步开展时，把过程记录下来，因为他认为投资是一种历史过程。对他而言，这正是该做的适当实验。这不是科学实验，而有点像炼金术。因为他预期他所进行的实验会影响结果，他希望这种影响是正面的，也希望他的期望能够达成。结果他们创造了另一段爆炸性的成长时期。因此，虽然根据科学标准，实验并没有确实证明他的理论经验，但是根据这个理论所建立的标准来看，实验证明了理论的正确性。索罗斯的论点之一是理论和实验会影响有关的主题事件，所以到 1985 年，他开始着手即时实验。

他在《金融炼金术》这本书里描述了这件事。

这个即时实验变成了非常好的构想，因为它刺激索罗斯的思考。由于他必须解释作决策的原因，他被迫变得比较前后一贯，这等于在他身上强加了若干纪律，这点对他非常有帮助。即时实验涵盖了 1985 年 9 月的广场协定，对索罗斯和基金来说，这个实验是个重大的胜利。他们在即时实验的 15 个月里，大约赚进 114% 的利润，对作家来说，这可能是写一本书所能获得的最高酬劳了。

第三章 金融炼金术

索罗斯声称广场协定很契合他的即时实验。1985年9月22日，星期日，5大工业国领袖在纽约广场大饭店开会，认定80年代初期极为强劲的美元已经高过头，他们达成了打压美元的协定。索罗斯认识到这件事情的重要性，他采取了行动。

他在《金融炼金术》这本书里描述过，广场协定代表自由浮动汇率制度结束，代之而起的是所谓的“管理浮动汇率制度”。旧的模式打破了，这是新的游戏。他认为对五大工业国而言，这是个必须采取的行动，他看出这个新起点的意义。虽然他已经承接日元和德国马克的多头部位，他还是进而大量增加这些部位。他不记得自己当时是否立即这样做了，很可能是。然后，他停了下来，接着又再多买一些。但是无论如何，这是 he 觉得自己走在波浪之前的一个案例，他已经拥有多头部位，又有能力再加码去追逐成果，他承接了非常大的部位，成果很丰硕。

黑暴龙卷风

索罗斯的策略在广场协定上成效非常优异，但是不久之后，他遭到了不同的经验。那就是“黑色星期一”。

他的书在1987年出版，接着他到处去演讲，探讨这本书，他到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去讨论他的盛衰理论，他没想到，当他从会场出来时，发现股市正遭到庞大的压力而暴跌。他想这是黑色星期一之前的星期三，这是他应该留在办公室里，奋力退出市场的时候。但他错过

极限投机

了，他看得出市场会出现麻烦，但是他以为应该先在日本出现，因为日本正在形成金融泡沫，所以他放空日本股票，作多头美国股票。结果问题在美国出现，日本市场没有崩溃，因为政府当局支撑住了。他在日本的空头部位，实际上变成了重大负担，这迫使他卖出他的多头部位，以避免追缴保证金。他必须撤退，而他也做得干净利落，因为他的原则是生存第一，赚钱其次。他们在几天里遭到重大亏损，但是以全年来说，他们仍然领先，所以实际上在1987年结束时，他们仍然处在增长的一方，索罗斯获得的利率是14%。

1987年时，索罗斯已建立了一部分的管理团队。

他拥有一个由4位资深分析师兼经理人组成的团队。当时有人相当怀疑他能不能和他们共事，并且给他们充分的自由。但是，索罗斯对能够授权真是高兴都来不及，而且，他还避免经管业务，他把大部分业务都交给他的团队，而实际上他自己又没有放弃领导的职位。

1987年时，他的那本《金融炼金术》吸引了朱肯米勒，当时他是德瑞福斯的基金经理人，他看了索罗斯的书，便来找索罗斯讨论，因为他发现了这本书可能刺激他的心智。他们熟识后，索罗斯请他加入团队，但他很忠诚，他拒绝离开德瑞福斯。他觉得他在这艰难的一年里，赚了很多钱，应该会得到很高的酬劳。在应付股市大崩盘方面，索罗斯认为朱肯米勒比他好，但是到那年年底，朱肯米勒预期的酬劳落空了，他当然就觉得可以自由地加入索罗斯的公司了，于是在1988年9月，他加入了索罗斯

第三章 金融炼金术

的团队。

朱肯米勒负责索罗斯所说的宏观投资。索罗斯仍然是老板，但他渐渐地不在公司里，因为他开始深深介入中国大陆、俄罗斯和东欧的事务。朱肯米勒做宏观决定，索罗斯在1987年初组成的团队负责选股。朱肯米勒加入公司的第一年表现得没有预期的好，他把原因怪罪到是因为索罗斯在场，这点多少妨碍了他产生自我意识，或者说是索罗斯对他的风格绑手绑脚，他相当懊恼。索罗斯和朱肯米勒之间并没有冲突，但是，朱肯米勒觉得对索罗斯很失望，而且他并不隐藏这件事。因此在索罗斯变得极度涉入东欧事务时，常常根本不在公司，就让朱肯米勒全权负责任，他们之间做了比较正式的安排，不过，索罗斯对这一点有所谅解。然而这样对朱肯米勒仍然大有帮助。在此之前，朱肯米勒很可能有这样的认识，他觉得只要他做得很好，他就是负责人，而一旦他做得不好就很可能不是主导者。他真正接管主导权后，他和索罗斯发展出一种教练和球员的关系，从此以后，他们运作得很顺畅。索罗斯是教练，朱肯米勒和团队是球员，他们可以去找索罗斯，寻求建议，提出构想，而不觉得得索罗斯会介入他们的打法，或者就是索罗斯从他们手中拿过球，亲自带球。

让每个士兵都成为将军

索罗斯认为这是非常有用的运作方法，他也负责分配他们之间的利润比率，基金管理公司所获盈余的一半保留

极限投机

给管理团队，索罗斯负责分大饼。这一点又非常有用，因为团队知道索罗斯在意的是基金长期的整体绩效，他们承认索罗斯是公正无私的裁判，这点促成了良好的团队士气。索罗斯也负责公司整体策略，例如决定创立新基金，结束既有的基金，或是踏入新的业务领域。

索罗斯完成这种角色转换是在 1989 年夏末，当时东欧的革命加速进行，索罗斯不能再每天继续管理基金，就决策而言，他不能够随时在场。结果这样做变成了非常美妙的行动。他们连续 3 年有极为优异的绩效，在这个基金的历史上，这是另一段繁荣时期。

这 3 年就是 1991、1992 年和 1993 年。

但是，1994 年的成绩并没有这么好。1994 年是基金成立以来第二差的一年，但是他们仍然设法得到一些利润，而且经过连续 3 年的优异成效后，这样也不差了。在一个重大波动结束后，把一部分的成果还回去是很正常的，这次也是这样，这就是索罗斯的看法。与 1982 年和 1987 年的情形相比，这次吐回去的幅度小多了。1995 年显然比 1994 年更困难，他们一开始就出现将近 10% 的亏损，但是索罗斯相信最后他们会领先群雄，他们的团队领导得人，又拥有基金成立以来最有深度的管理者，绝对没有一个基金可以像他们的基金一样，缔造这种成果，而没有高潮和低潮。

许多人都被量子基金的故事所震动，对外人而言，这看似一连串毫不中断的成功故事，其实是一系列的高低潮。索罗斯的记录惊人，在 26 年里，他替股东缔造了将

第三章 金融炼金术

近 35% 的年平均投资报酬率——这还是扣除了管理团队分得的利润后的成绩。1969 年投资 1000 美元，如果红利可能再投资的话，现在应该成长到大约 215 万美元。但是，仔细一看，又可以发现好几个不同的时期：第一个 10 年里，索罗斯和罗杰斯共同奋斗；接着是 1979 年到 1981 年的盛衰期；然后是一段短暂的中断期，索罗斯把基金分成很多份，发交给其他经理人，接下来是即时实验期；接着是朱肯米勒负责控管的时期。

当然，基金的规模也成为一个问题。这是生态环境的问题。就他们的环境来说，他们的规模太大了。索罗斯在 1989 年看出这个问题，决定开始把利润分给股东。他们也开始多元化，建立一个新兴市场基金，他们踏入不动产行业，也踏入了工业投资。

那样看来是有危险的，看看施乐这类极为优异之至的成长公司，看看他们多元化之后发生的结果就知道了。

索罗斯也毫不隐讳这一点，但是他认为这是一种挑战，可以协助他们集中心智。如果他们不尝试调整做法，配合他们日增的规模，索罗斯认为那样危险会更大。

索罗斯变得家喻户晓，大家都密切注意他的行动，这在某种程度妨碍了他的行动自由，当时，有关他们的活动出现了极多的流言蜚语，这经常掩盖了他们的实际作为。他们的名声也带来一些好处，特别是在谈到有关工业投资的事情时。但是，最大的好处在于他们能够吸引优秀的管理团队。索罗斯说：“我们还不准备寿终正寝，虽然如此，

极限投机

我们不能够把目标定得太高，我们不可能再重复等一个25年的优异成绩。真正能这样，最后岂不是会拥有世界的股票？”索罗斯认为，他们也不能够再继续成长，变得更大。未来25年里，如果他们能够表现出过去25年的一半成绩，索罗斯就觉得很满意了。

他的这种心态与那段狂乱时期后的自我反省有着直接的关系，不能太压迫自己，应该使自己有一个开放的思维空间和广阔轻松的心情，这在这个开放社会中是有好处的。

索罗斯的精神状态进入了最佳时期。

第四章

理念风暴

华尔街的“总统”

近来华尔街流传着一个故事，说在美国总统雕像山的对面，另有一座山，将献给世界最伟大的投资经理人，山的表面已经刻了两座雕像，那就是沃伦·巴菲特和索罗斯的雕像。

索罗斯也听到了这个传说，他说：“你再也找不到差异这么大的两个人了。”

巴菲特是属于老派的旧式投资人，从不玩花招，生活极为古怪，在索罗斯开放社会的理论面前，他也许会目瞪口呆。但他确实是一位杰出的投资金融家。

同样，索罗斯也认为，他必须承认他应当被视为世界上最伟大的投资经理人。不过，他又说：“我能保持这种地位多久，那是另一个问题了。”

极限投机

在投资管理上，索罗斯已没有过去那么活跃，他认为这就是他有机会保持地位的原因。

量子基金是开天辟地以来最成功的投资实体，要是股利能够再投资的话，在 1969 年投资的 1000 美元，今天的价值会超过 200 万美元。量子基金何以这般杰出？除了索罗斯的投资技巧外，基金的结构特殊之处也是主要原因。

量子基金的结构相当罕见，因为他们利用融资，安排量子基金利用比较大的趋势——他们把这一点叫做“宏观投资”，然后在这些比较大的趋势里，他们也挑选股票和类股，所以他们是在很多不同的层面上操作。索罗斯认为，如果把一般投资组合像名称所显示的一样，看成是扁平或二度空间的东西，那是最容易了解这一点的。他们的投资组合比较像建筑物，有结构，有融资，他们用他们的股本作为基础，建立一个三度空间的结构，由基本持股的质押价值来支撑。

索罗斯这样叙述这件事：他们用自己的钱买股票，付 5% 的现金，另外 5% 的资金用借来的支付；如果用债券做抵押，可以借更多钱。他们用 1000 美元，至少可以买进价值 50000 美元的长期债券；他们也放空股票或债券，他们借来自己并不拥有的证券卖出，希望后来用比较低廉的价格买回来；他们也操作外汇或指数期货的部位——多、头都有；不同的部位互相强化，创造出这个由风险和获利机会组成的立体结构。通常两天——一个上涨日和一

第四章 理念风暴

个下跌日——就足以告诉他们这个基金的状况。

因此，索罗斯基金和一般的投资组合有多重差异：第一，他利用融资。第二，他投资很多不同的资产类别，他投资在外汇和其他金融资产上。第三，他在这些不同的资产类别上多空都做。

他认为，在他的各种投资中，让投资组合具有某种程度的风险，足以反映他所谓的“宏观”看法。

衍生性金融商品也担任一部分角色。不过，比大家想象的少，索罗斯的确应用指数期货，有时候是为了避险，有时候是为了在多方或空方得到市场部位。他们不常用选择权，因为他们不知道如何让选择权和他们愿意承担的风险程度相搭配。购买选择权时，是支付高额的溢价给供融资的专家，但他们可以用证券质押造成本比较低廉的融资。索罗斯承认，实际承接股票，并且用股票质押借钱，比买选择权的风险高，但是，他们在处理实际的部位时，比处理选择权更能和他们的风险配合。

索罗斯说：“你卖出选择权时，是因为承担风险而得到报酬，这样可能是有利可图的业务，但是和融资性投资组合的潜在风险不能搭配，因此，我们很少买卖选择权，选择根本不符合我们三度空间结构——倒有点像突出窗户的棍棒，有让建筑物摇晃的危险。这就是我们相当少用选择权的原因。”

极限投机

起于青萍之末

索罗斯目前承担的风险已比基金规模小的时候小多了，早年他们是尽其所能地融资。

这样说的意思是不是就一亿美元而言，他们平均会借多少钱吗？

索罗斯认为这个数字没有意义。因为投资国库券一亿美元，风险因素和投资 30 年期债券大不相同。他们设法把事情简化，他们没有真正或科学的方法衡量风险。操作衍生性金融商品的人有精密的风险计算方法，而他们是业余人士，他们活在石器时代，他们故意这么做。

过去的 20 年，衡量投资组合风险的方法已有长足的进步，为什么索罗斯不用这些科学的计量统计方法呢？

他说：“因为我们不相信这些方法。”

这些方法通常是以效率市场理论为基础，这个理论和索罗斯的不完全理解及反射理论冲突，他认为这些方法 99% 的时候有效，1% 的时候会失败，而他比较关心那 1%。索罗斯发现有若干系统风险，不能简化在这些通常假定市场持续运作的假设里面，他对不持续特别有兴趣，而且他发现这些衡量方法对他毫无用处。

但是他们的确会设法简化，而不是使事情复杂化。例如，他们处理利率部位的多寡时，把一切简化为等于 30 年期债券，因此他们甚至把国库券视同 30 年债券。而且他们愿意根据三个轴把资本投资下去：他们有股票部位，

第四章 理念风暴

有利率部位，还有外汇部位。他们的部位沿着每个主轴的正负 100 % 之间变动，但是，其中一部分风险会彼此加强，因此，他们很不愿意在任何一个主轴上，拿 100 % 的资本去冒险。

偶尔，他们会有第四个主轴，因为他们有时候会承接商品部位。最近他们还增加了第五个层面。索罗斯设立了一个新基金，叫作“量子工业股权基金”，从事工业投资，实际上握有企业的全部或部分所有权，这个基金保留 20 % 的资产，从事和量子基金一样的总体投资，实际上，这 20 % 足以为涵盖整个基金的宏观结构提供质押或购买力，其余就保留来做工业投资；然后，基金未应用的部分，也就是说保留做工业投资、但并未实际支用的钱，就暂时投资在量子集团的股票上。这是一个新观念，或许能够使资金的运用比量子基金本身更有效率。

显然，融资对索罗斯的成功极为重要。

有人问：“如果你没有利用融资，那一亿美元会增长到多少？换句话说，这么多年来，量子基金的利润有多少是靠融资赚来的？”

索罗斯答道：“这是我无法回答的另一个问题，那样的话，量子基金会变成完全不同的东西，有很多部位是因为我们利用融资才有意义。如果不利用融资，我们就不能做那些特定的投资。”

索罗斯认为，融资使他们得到的弹性，远比他们操作二度空间投资组合大多了，债券基金经理人如果预期利率会上升，可以把投资组合的到期日最多延长到 15 年，他

极限投机

们认为利率会降低时，可以把平均到期日缩到很短。

他们运作的自由度大多了。他们看空时，可以放空，看好时，可以做多，他们不必买到期日很长的东西，他们可以买到期日很短的东西，但得应用大量的融资。

索罗斯认为，这样可能比较有效。他举了一个最近的例子。1995年开年时，如果有人像他们一样，看好利率不会再上升，也就是说，如果有人相信美国联邦储备理事会（等于美国的中央银行）可能不再收缩银根，那么，他就会在到期日短的东西上可以赚很多钱，在到期日长的东西上赚的钱都很少，因为短期的东西比长期的东西表现好多了。

这是因为收益曲线改变了。

索罗斯有时候从事所谓的“收益曲线交易”，也就是说，把到期日长和到期日短的东西彼此搭配，很多想控制风险的专家都这样做。

但是，他们并不做太多收益曲线交易，因为他们通常对利率采取大方向的看法，在债券市场的哪一个端点操作，只是额外求其完美的问题，相形之下，很多专家不做别的事，只搭配不同的到期日进行交易。

有很多研究分析投资经理人的成功之道，认定资产配置至少决定投资组合绩效的80%，选股和其他因素大约只占20%。

对此，索罗斯不得不发表他的明确的观点。

他认为这种说法可能很正确，因为他们把大部分资金

第四章 理念风暴

投在“宏观”投资里，宏观投资等于是三度空间的资产配置，这样做比较有效率，因为在二度空间的投资组合里，你只能在任何特定的投资观念中，投下一部分的股本，而他们配置在宏观投资观念上的资金，有时候可以超过他们资产的 100%。

而且，量子基金还有另外一些与众不同、有助于它成功的特点。

和其他基金经理人相比，他们和他们的投资之间，有着不同的谅解，他们是一种绩效基金，也就是说，他们的报酬主要是得自操作利润的一部分，而不是根据他们管理的资金金额而定。大多数基金经理人的目标，是尽可能吸引最多的资金，好好管理，以便投资人不致失望、离开。换句话说，那些经理们尽量设法扩大基金的规模，因为他们的报酬是根据他们管理的资金总额而定。而索罗斯则设法尽量扩大量子基金的利润，因为他们可以从利润中分得一定的百分比。此外，量子基金的利润是按绝对值计算，而不是根据什么指数计算。

另外还有一个重大差异，他们自己有钱放在这个基金里，索罗斯自己就是量子基金的大股东，因为他们把赚来的绩效奖金投资在基金里，基金存在越久、表现越成功，经理人拥有的股分比率越高。这表示他们和基金荣辱与共，股东和经理人的利益相同，因此他们和投资人之间有着不成文的谅解，亦即量子基金开车，他们是车上的乘客，大家的目的地相同。这个不成文约定的性质是伙伴关系，而不是信托责任；当然，他们也于善尽他们的信托责

极限投机

任。

本能避险

是什么特质使量子基金和其他基金不同呢？虽然有很多基金模仿他们，但量子基金仍然是先驱。

没有一个基金和他们一模一样。现在有一大群基金叫做避险基金，但是，“避险基金”这个名词其实是涵盖范围很广的词语，索罗斯认为把所有的避险基金一视同仁是错误的。首先，有很多避险基金不运用宏观投资技巧，或是应用的方式和他们不同，而且有很多避险基金只应用宏观投资工具，并不投资特定股票。他们用三度空间的方法，在不同的层面上做决定，他们有宏观决定，这是他们基金所采取的立场，在这种宏观立场里，还有关于股票买卖和应用哪一种工具的决定。整体而言，如果他们可以用一种宏观工具执行一个宏观决定，他们就那样做，比较不愿意利用更多的特定投资工具。

索罗斯举了一个例子，假设有一个股票基金看好债券，这个基金中能买进公用事业股票。量子基金绝对不会这么做，他们可能购买公用事业股票，但是只有在对某些特定公用事业股特别有兴趣时，他们才会这样做，否则，他们会购买债券，因为这样会让他们取得比较直接的债券部位。

索罗斯在这里提到有一大群宏观避险基金，量子基金显然没有什么与其他宏观基金不同的特质。这就是比较个

第四章 理念风暴

人化的特质，是特定态度和风格发挥作用的部分了。

索罗斯这样描述他的投资风格的特点。

他说：“我的特点就是没有特别的投资风格。”

说得准确一点，就是索罗斯设法改变他的风格去配合各种情况。回顾量子基金的历史，人们就会发现这个基金改变过很多次特性：在头 10 年里，量子基金几乎从来没有应用过宏观投资工具；然后，宏观投资变成主流；但是，近来他们开始在工业资产上投资。索罗斯愿意用下面这个说法来说明：他不是根据一定的规则来操作，他寻找游戏规则里的变化。

索罗斯说过，直觉在他的投资成就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所以他说他拿直觉当做一种投资工具。

他根据假设运作，把预期的系列事件看成一个命题，再拿他的命题和实际事件过程比较，这样可以让他得到一个标准，据以评估他的假设。

这样做涉及若干直觉因素，但是，索罗斯认为他不能确定直觉的角色是否有这么重要，因为他也有一个理论架构，他寻找不均衡的状况，这种状况会发出促使他行动的信号，所以他实际是合并运用理论和本能做决定，如果喜欢的话，我们可以把它叫做直觉。

一般说来，大家认为投资经理人同时拥有想象力和分析能力，如果把所有的技巧分成这两类，索罗斯在哪一类上面特别强呢？想象力还是分析能力？

索罗斯认为他的分析能力相当不足，但是，他的确拥

极限投机

有很强的批判能力，他不是专业证券分析师，他宁可把自己叫做没有安全感的分析师。

这倒是令人好奇的说法，有人请教他这是什么意思。

索罗斯说：“我承认自己可能犯错，这点使我觉得不安全，我的戒心使我保持警觉，总是准备改正我的错误。”

他在两个层面上这么做：在抽象的层面上，他把相信自己难免犯错的信念化成一种复杂哲学的基石；在个人的层面上，他是一个很挑剔的人，他挑自己、也挑别人的毛病，但是因为这么挑剔，他也很有原谅的能力，如果他不能原谅自己，就不能承认他的错误，对别人来说，犯错是耻辱的来源，对他来说，承认他的错误是骄傲的来源。一旦人们知道不完全理解是人之常情，犯错就没什么好羞耻的，只有知错不改才是耻辱。

索罗斯总是强调他察觉错误比别人快，在投资方面，这好像是必要的特质。但是，索罗斯怎么会知道自己是否错了呢？

前面提到过，他根据股资假设操作，他注意事件的实际过程是否符合他的期望，如果不符合，他就判断他肯定是错了。

但是，有时候事情会有短期的脱序，然后又回到正轨，而索罗斯怎么知道是哪一种情形？这种地方就需要天分了。

他的期望和事件的实际过程有歧异时，那并不表示他会抛售股票，他会重新检查命题，设法确定什么地方出了差错，他可能调整他的命题，或者他可能发现在某种外在

第四章 理念风暴

影响介入整个大事件；实际上，最后他可能增加他的部位，而不是抛售它。但是，他绝对不会闻风不动，不会忽略歧异，他会批判性的检查自己，一般说来，索罗斯在改变命题、适应情势的变化方面，会保持相当怀疑的态度，但是，他不完全排除这种事。

索罗斯谈过“逆势而行之乐”，他寻找什么样的迹象以决定什么时候该违反趋势呢？

因为他这么有批判性，别人经常认为他是反市场派，但是，他对于逆势而行非常谨慎，他可能惨遭趋势蹂躏。根据他的趋势理论，趋势最初会自我强化、最后会自我毁灭，因此在大多数情况下，趋势是追随者的朋友，只有在趋势变化的转折点时趋势追随者才会受到伤害。大部分时间索罗斯都是趋势追随者，但是，他随时警觉自己是群众的一分子，一直在注意转折点。

凡俗之见认定市场始终是正确的，索罗斯的看法正好相反，他假设市场总是错误的，即使他的假设偶尔出错，他还是用它作为操作的假设。这并不是说大家应该总是逆势而行，正好相反，大部分的时间里，趋势会占优势，只是偶尔会自行修正错误，只有在这种状况下，大家才应该违反趋势。这种思考方式引导他寻找每一种投资理论的缺陷，他知道缺陷是什么时，他的戒心才会得到满足，这样不会让他抛弃这个命题，反而让他能以更强的信心去运作，因为他知道有什么地方不对，而市场并不知道。索罗斯身在波浪之前，他密切注意趋势可能衰竭的迹象；如果

极限投机

他认为趋势走过了头，他可能尝试违反趋势。大部分情况下，量子基金如果违反趋势，通常都会遭到惩罚，只有在转折点时才会得到报偿。

除了违反趋势之外，索罗斯说过他的技巧之一是把自已置身于过程之外。

他是处在外面，他是个思考型的参与者，思考的意思是把自己放在所思考的事情之外，这样做对他或许比很多人容易，因为他有很抽象的心灵；而且他确实乐于从外面看事情，包括看他自己。

索罗斯以自制和超然闻名，他认为这是必要的条件。

他说：“说超然是对的；自制就不对。亏钱会让我痛苦，胜利会让我快乐，没有什么东西比否认自己的感觉更具自我毁灭的力量，你了解自己的感觉后，可能觉得没有必要显露出来，但是，有时候，尤其是你遭遇庞大的压力时，隐藏感觉的需要可能使压力变得无法忍受。”他记得他刚开始做这一行时，有一次他个人的帐户事实上赔得干干净净，但是他必须像没事的人一样，继续尽责做事，那种压力令人无法忍受，午餐之后，他几乎没有办法让自己回办公室去。这就是他鼓励同事共同承担问题的原因，他很愿意支持他们，但是他们必须愿意承认他们有问题。

在索罗斯目前的运作模式中，无论从内部举才，还是挑选外面的投资经理人，找出人才都很重要，所以，他在寻找从事投资行业可能成功的人才，包括可能把资金外交

第四章 理念风暴

以后他们管理的基金经理，以及可能纳为公司员工的人时，他很注意的是这样的特质：

他认为，最重要的东西是人的品格，有些人他可以信任，也有一些人他希望他们当他的合伙人，却也有些才气纵横的赚钱高手他不能信任，也绝不希望他们当合伙人。麦克·米尔肯（垃圾债券之王，因为涉嫌不法，被美国证监会起诉）被迫放弃业务时，在垃圾债券业务上出现真空，索罗斯面临很大的诱惑，很想进入这个真空地带，因为其中有很多钱可以赚，他约谈了好多位在米尔肯手下做事的人，试图请他们在他的公司之外代为操作资金。或做为他们的合伙人，但是，他发现他们有某种忽视道德的态度，这也是他们这帮人交易方面的特性（和投资银行业明显不同）。他们的确积极进取又聪明能干，很有天分，但是，这种不道德的态度会让业主警觉，而索罗斯不想成为这样的放款人，他就是觉得不舒服。

摩根的公子有一次应别人的要求，说明他在贷款给一个人之前，会注意这个人的哪些特质，他说品格是最重要的事情，“如果我不信任一个人，我绝不会借他半毛钱，即使他拿来基督教世界的所有担保品，情形也是一样。”

索罗斯对此评价道：“我没有他那么纯洁，但是，话说回来，我也不会向这样的人放款。”

投资显然需要冒很大的风险，上面提到的那种不道德的方式和负责、进取、高度冒险的方式有很大区别。

冒险很痛苦，不是你自己愿意承担风险，就是你设法

极限投机

把风险转嫁到别人身上，任何从事冒险业务却不能面对后果的人，都不是好手。

那么，索罗斯认为什么因素有助于成为好的投资人呢？是智慧吗？在成为好的投资人方面，智慧扮演什么角色？

智慧相同的人性格可能不同，有人会走到临界点，但是永远不会越过去；有人走到临界点，而且偶尔会越过界。这是很难确认的事情，但是，他不希望替他工作的人越过临界点。

他常说自己是个偶尔走到临界点的人，但是他有自己累积的所有财富做靠山，他不希望别人拿他的钱走到临界点。他曾经有过一位很有天分的外汇交易员，但这个交易员在索罗斯不知情的情况下承担了很大的外汇风险，那次交易有利润，但是，索罗斯立刻切断公司和他之间的关系，因为他觉得他已经得到警告：如果他们遭到意外的损失打击，他除了自责外，不能责怪任何人。

离经叛道

有些人相信，在这个行业里，可能有人太聪明而不能成事，最聪明的人很少成为最成功的投资人。

索罗斯恰恰认为这样说是错误的。

这点让人想到索罗斯在以前写的书里提到、现在又迂回提到的事情，就是他对自已的看法。以前说过他有一种菩萨心肠，他的确把这种感觉付诸实施，把他获得的成

第四章 理念风暴

就布施到世界上，这是他成功的心理原因，这是他结合品格、智慧和大家没有谈到的什么东西，也就是他提到的和临界观念有关的某种无畏精神，所得到的结果。

就投资而言，索罗斯的确不觉得有什么菩萨心肠，他把他已经赚到的钱布施出去，满足他的救世幻想，他不容许这种幻想在赚钱方面发挥，他设法抑制他的幻想，而且他认为赚钱和菩萨心肠没啥关系。但是，走到临界是另一回事——是为了某个目的才这么做。没有什么事比集中心智更危险，但他的确需要这种和冒险有关的刺激，才能清楚的思考，这是他思考能力的根本，对索罗斯而言，冒险是清楚思考的一个根本要素。

他是从对这种游戏的热爱——也是从它的危险中——得到兴奋的。

他从危险中得到兴奋。危险会刺激他，但是别误解它，他其实并不喜欢危险，他喜欢避免危险，这才是使他活力四射的东西。

他怎么能够走在这种游戏的潮流之前？

就像前面说过的，他寻找每一种投资命题的缺陷，找到缺陷时，他就会安心；要是他只能看到好的一面，他就会担心。他不会因为看不出一个投资命题不好的地方就排斥他，他只是保持警觉。另一方面，他特别注意市场不愿意接受的投资命题，这一类的投资命题最强而有力，他常请大家记住这句俗话：“市场总在重重忧虑中攀升。”

极限投机

投资令人着迷，是因为有这么多种不同的操作方法。人们可以称索罗斯他们为大势投资者，但是，索罗斯公司里也有表现极为优异的价值投资者。有人觉得价值投资者在索罗斯他们这里的表现没有这么好，因为他们没有任何可以对话的命题。

索罗斯和柴德基有过一段很有趣的经验。柴德基是索罗斯的投资顾问之一，他的观念是把科技公司看成资产丰富的公司，把顾客视为资产，如果一家公司拥有强大的顾客基础，即使公司的经营阶层差劲，又缺少产品，也有很大的价值。他觉得只要稍加推动，这些价值就会释放出来。事实证明这是言之成理的观念，例如，他买了一大笔的巴拉丁公司股票，索罗斯和他一起去看这家公司，一了解他们的所有问题，他就很沮丧的走出来，索罗斯不知道他们到底为什么要拥有巴拉丁公司的股票，也不知道他们要怎么摆脱，但是，几个星期后，美国电话电报公司买下这家公司，价格是他们买进价格的两倍。柴德基看准了拥有厚实顾客基础的公司有价值，观念很正确，但是他寻找公司的方式和索罗斯不合。

索罗斯还有这样的看法：市场会有波涛汹涌的时期，使他的投资风格一无是处。他坚持在投资一些部位之前，先形成一种命题。但是，要发现一个可以辨认的市场趋势，需要花些时间，有时候，市场在他刚刚设法形成一种理论来证明它的状况时，趋势就逆转了，如果这种情形一再发生，可能有毁灭性的影响。他善于操控浪潮，却不善于驾驭游泳池里的涟漪。80年代初期有一段期间，市场

第四章 理念风暴

似乎没有浪潮，只有涟漪，索罗斯找到商品基金经理人维多·倪德霍夫，他拥有一种驾驭涟漪的系统，他精于随机漫步理论，把市场看成赌场，市场中人像赌客一样行动，研究赌客就可以了解市场行为。例如，赌客在星期一和星期五的行为会不相同，早上和下午的行为也不一样，如此不一而足。他根据这个理论交易，经常赚到小笔的钱，索罗斯把资金交给他管理，他创造了良好的投资报酬率。但是，他的方法有个缺陷，它只在毫无趋势的市场里有用，要是来了一个历史性的趋势、一上大浪，可能完全压倒赌博行为造成的这些小波浪，他可能受到很严重的伤害，因为他没有适当的预防机制。索罗斯提到他，是因为他的方法和索罗斯南辕北辙，有的时候，他的方法很适用。关于正确的方法，索罗斯已经学到兼容并蓄，他愿意聘请应用不同方法的各种人，先决条件是他能信任他们的品格。

倪德霍夫在市场盘整、毫无方向时，赚了不少钱，随后开始亏钱。可是他有品格和勇气，结束了帐户，量子基金率先退出，很少有商品交易者愿意这样做的。

倪德霍夫的表现后来一直不错，当然，他也没有资金在索罗斯那儿了。

索罗斯和别人面谈时并不擅长对人的其他方面的品格进行判断，他不善于判断品格，却善于判断股票，而且对历史有相当精明的看法。由于他在判断品格方面相当差劲，所以犯下不少错误。他花了五年时间，经历很多痛苦

极限投机

经验，才发现合宜的管理团队，他很高兴终于找到这个团队，但是，他不能说他在挑选管理团队方面，像他实际管理资金一样成功。

他认为他善于当资深合伙人或当老板，因为他深深同情基金经理人面临的困难，他们有问题时，他可以给他们很多支持，他认为这一点有助于在他的公司里创造良好的气氛，但是，他并不是那么善于选择他们。

索罗斯的能力，有相当部分来自选择市场，而不是来自选择投资类别。

有很多时候，他专注于个股，但也有很多时候他选择市场或市场区隔。就像前面说过的，他不根据特定的规则玩游戏，他寻找游戏规则的变化。

可以这样说：

如果索罗斯寻找游戏规则的变化，在他的生涯当中，一定有一段时间至为重要，如果他持续在庞大的压力下工作，他就辨认不出这段期间。他与很多人之间的差别之一，就是他似乎看得出那些特别的日子。

索罗斯刚开始做这一行时，他在伦敦证券交易所对面的交易间工作，他的老板溥杰西上校是极为小心谨慎的人，他每天早上一来，就把要用的铅笔削得非常尖。他告诉索罗斯说，如果没有生意可做，那么铅笔尖在你离开时，应该保持得跟你进来时一样尖，索罗斯一直没有忘记他的忠告。

第四章 理念风暴

用普通一点的话来说，管理投资组合并不像它字面所显示的，是不同的工作，是冒险，你的工作量和你的成就成反比。换句话说，假如你做的是正常的工作，如果你是业务代表或工匠，你的成就和你的工作量直接相关，人工作越勤奋，产品越多，拜访越多客户，就可能拿到越多的订单，其中有直接的关系。不过你在冒风险时，如果你做出正确的判断，如果你有正确的洞察力，那么你不需要埋头苦干。但是如果你犯错，而且你的假设和事件的实际过程有歧异，你需要做非常认真的研究，找出错误的地方，你越不成功，越必须工作，来改正这种状况，如果投资组合的绩效很好，你要做的事情越少，其中有一种反比的关系。

这就是索罗斯的组合理论。可是，真的是这样吗？他不是开自己的玩笑吧？有时候，一切都顺利进行时，就是要开始急转直下了，难道他不曾在某些时候，在一切顺利时，做很多预期的工作，就刚好迎接一切都不对劲的时候吗？

当然，情形理当如此。但是，索罗斯不喜欢工作，他只做达成决定所需要的绝对最少量的工作。很多人热爱工作，他们搜集过量的资讯，远远超过达成结论所需要的数量，而且变得沉迷在某些投资项目上，原因是他们切身了解这些东西。索罗斯不同，他专注基本要素。必须工作时，他会疯狂地工作，因为他很气自己必须工作，这是他的方法里的基本要素，如果他知道什么地方不对，他会设

极限投机

法防止。但事情不是这样运作的，还是面对现实吧，个别投资经理人的表现也有盛衰相间的情形，他们先是判断正确，表现非常优异，然后变得趾高气昂扬，最后就被情势牵着走。索罗斯也不能免俗，事情经常会这样子，一切顺利时，他会松懈下来，接着就会开始出错，情势可能变化得非常快，不是他驾驭情势，就是情势牵着他走，这就是他们永远不应该丧失戒心的原因。经验告诉索罗斯，通常 he 可以把损害控制在 20% 的限度内。要是他回顾自己的表现，曾有很多次，他在特定变动的一年之中，顶端到底部损失达到 20%，然后他修正错误，在年度时呈现良好的结果。

唯我独尊的赌博

完全不用正式的程序来减少损失。事实上，如果事情出错，而且他知道错在哪里，但他认为原始的命题正确，损害是来自外在的原因，他比较可能增加投资，而不是抛售一空，他必须知道为什么会亏钱。

事情出错时，索罗斯会觉得痛苦，他很仰赖动物本能，过去他实际经管理量子基金时，他会背痛，他把开始剧痛当做他的投资组合出问题的信号。背痛不会告诉他什么地方不对——比如下背痛代表空头部位、左肩代表外汇之类的情形——但是背痛确实促使他寻找缺失，否则他可能不会这样做，这不是管理投资组合最科学的方法。

第四章 理念风暴

但是，事实上是索罗斯后来已经不再实际管量子基金了。如果他还在管理，他认为，他就不会到处去与人谈他的组合理论。

有好长一段期间，他实际上是完全独自管理量子基金，他是船长兼加煤的火夫，在驾驶舱里，他会敲钟，并且喊出“左满舵”的命令，然后跑到下面的轮机房，亲自执行这个命令；当中的时间他会停下来，做些该买什么股票之类的研究。这样的日子已经过去了，现在他有一个机构，他已经把船长的位置交给别人，他只担任董事长，处理策略性问题。

可以说他只是船上的乘客，但事实上，他连乘客都不想做，用他的话说就是：“我比较像是船东。”

他会走进驾驶舱，但他不是去接管控制权，他说：“我会去看船长，但是，我从来不接管控制权，因为那是责任重大的工作，如果我插手其间，一定会造成大的伤害。”

1989年，当时索罗斯变得深深涉入参与在东欧发生的革命，不能继续每天经管业务，不能继续留在线上，就把管理权交给由史丹利·朱肯米勒带领、由比较年轻的人组成的团队。

但是，一般人认为是索罗斯使量子基金在1992年在英镑上赚进10亿美元——而这是他把控制权交给朱肯米勒之后发生的事。这应是朱肯米勒的功劳。

是的。他从来没有在这件事上居功，他参与过程，他

极限投机

像教练一样，告诉朱肯米勒这是终身难逢的大好机会，风险和报酬的关系极为有利，因此他们应该用比平常还大的规模去玩，而朱肯米勒也接受索罗斯的建议。

所以，索罗斯对量子基金集团当时的融资水准，也算是尽了一些责任。但是，放空英镑的原始构想却是朱肯米勒首先提出来的，虽然他事先和索罗斯商量过，但最后却是他独自作的决定。

如果说没有索罗斯的鼓励，朱肯米勒绝对不会融资到量子基金当时那种程度，这样说还算公道的话，索罗斯却压迫他尽量举债。

他建议米勒放手去做，没有索罗斯，米勒也可能这样做。实际上，他们用的融资并没有这么大，因为他们只拿他们的股本去冒险，或许比股本多一些，在那种情况下，他们可以冒他们的股本好多倍的风险。

这是索罗斯最大的成就之一，过去几年来，他的基金在外汇的方向上，也犯了若干结果并没有那么好的错误判断，在这些决策上，索罗斯担任了一个微妙的角色。

和在英镑上的决策完全相同，1994年，他们在日元上犯了错误，但是他们的损失程度被过度夸大了，外面传说他们损失10亿美元，这个数字不对，他们在1994年2月损失6亿美元，可是在当年年底就补赚回来。毫无疑问的，他们在那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步调错误，索罗斯是这种思考过程中的一部分，因此他应该负的责任和在英镑上完全一样，他在判定他们在什么地方出错这件事上，也扮

第四章 理念风暴

演了一个角色，他们专注在逐步开展的美国和日本贸易争执上，在同一个时间里，他们没有认识到日元强势有更根本的原因。

索罗斯在纽约的时间越来越少，他主要是在东欧，插手那儿的事务，从事他的基金会的活动。后来，东欧革命的趋势越来越明显时，他又开始渐少在那儿呆的时间了。

虽然他大部分时间在外旅行，但他和纽约办公室的联络始终是频繁的，几乎每天都和他的办公室通越洋电话，除了跟米勒交谈，也和其他人交谈。

至于米勒是否寻求索罗斯的建议，或是否需要索罗斯指引方向，索罗斯对此不作正面回答，他知道记者问这样的问题显然是别有用心。

他只说：“他负责管理量子基金，我完全不规定他什么，40岁的朱肯米勒在很多方面，比我在他这个年纪时高明。”

那么，这是量子基金继续成就斐然的原因吗？

索罗斯认为只是部分原因，朱肯米勒是个很公平、心胸开阔的人，所以他能够吸引素质高的人才来公司。量子基金的名声也提高了，在英镑事件之后尤其如此，他们一直能够吸引最好的年轻人加入公司，所以他们现在拥有精明的经营阶层，这是他们过去从来没有过的。

极限投机

第五章

极限投机

反射——选择：随机漫步

关于索罗斯用在投资上的理论架构，他在《金融炼金术》里第一次说出了这个架构。他指出这本书在他的思想中是一大突破。可以说，这本书在他的投资生涯中乃至整个人生历程中都占着至关重要的位置。

这是他一生的力作，他人倒下去后，哲学就是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不过让每一个人困惑的，正好就是他的哲学。

他的主要理念是，我们对所处世界的理解注定天生就不完全，我们对于作成决定所需要了解的状况，其实是受这些决定影响。在参与其事者的期望和事件的实际结果之间，天生就有一种歧异。有的时候歧异小到可以不理睬。

第五章 极限投机

但是有时候歧异太大，就会成为决定事件过程的重要因素。这一点不是很容易沟通的理念。

索罗斯把主要理念用几个字简要说明——事实上，就是不完全理解。但是这个说法不足以传达全部的理念，因为他说的不完全仅和我们的理解有关，也和我们所参与、设法了解的实际情况有关。实际情况受我们的了解所影响，它是一个移动的目标。

一方面，实际情况反映人的思想——这是认知功能；另一方面，人做出影响实际情况的决定，这些决定并非根据实际情况做成，而是根据人对实际情况的解释做成——他把这一点叫做参与功能。两个功能从相反的方向作用，在某些情况下，彼此会互相干扰，两者间的互动以反射反馈机能的形态表现出来。

索罗斯之所以用到“反射”这个概念，跟反身动词有关。

主词和受词相同，这是法文的特点，反射这个字也和反映有关，但不应该与非自主性混淆。

对他来说，《金融炼金术》是重要的突破，因为他设法陈述反射的理念，这个理念对他分析市场行为至为重要。但是，他的陈述并不完美，这本书一开始并不是非常成功，很少有人知道他想说什么，他没有得到他想要的知性反馈。然而他仍然有一些令人满意的意外，例如和朱肯米勒认识，他读这本书后来找索罗斯，保罗·琼斯也是一

极限投机

个例子，他坚持任何想替他工作的人必须先读通这本书。少数人似乎弄懂了索罗斯的理念。

现在索罗斯变成了公众人物，这本书开始被人认真看待，他开始得到一些有价值的反馈，从而显示他所陈述的理论有一些弱点。他现在承认他在某些字词的使用上相当不精确，甚至连“反射”这个名词也是一样，他用它描述包括有思考能力的参与者参与其间的事件结构，也用它描述双向反馈机能破坏事件过程和参与者的认知，以致造成不均衡的特殊情况。

前面一种是看待事情的方法，是具有普遍正确性的一般理论。第二种是指会间歇发生的现象，但是这种现象发生时，就会创造历史。

读者可先探讨索罗斯的反射一般理论。

基本上，它和有思考能力的参与者角色有关，也和角色的思想以及所参与事件的关系有关，因为他要设法了解自己身在其中，作为演员的状况。传统上我们认为，了解基本上是被动的角色，参与是积极主动的角色，事实上两个角色彼此干扰，使参与者不可能根据纯粹或完全的知识，做出任何决定。

古典经济理论假设市场参与者根据完全的知识行动，这个假设是错误的，参与者的认知影响他们所参与的市场，但是，市场行为也影响参与者的思考。在这种情形下要分析市场行为，和在“完全的知识”的假设正确的情况相比较，分析工作难多了。

第五章 极限投机

经济理论必须从根本上来重新考虑，在经济过程中，有一个不确定因素，大致上从来没有人钻研过。和自然科学相比，没有一种社会科学能够产生确定的结果，经济学也不例外。对于思考在塑造事件上扮演的角色，我们必须改用截然不同的看法。

我们习惯于认为事件由一系列的事实构成，也就是在一组事件之后会出现另一组事件，形成永不中止的锁链。在具有思考能力的参与者参与其间的状况里，锁链并不是由一系列的事实连接在一起的。

在设法了解有思考能力的参与者角色时，读者必须了解什么呢？

首先必须了解的第一件事，是参与者不能够把思考局限于事实，他们必须考虑包括自己在内的所有参与者的思想，这样就带来一种不确定的因素，因为参与者的思想虽然不等于事实，但却在塑造事实方面担任一种重要角色，参与者的认知和事情的实际状态之间几乎总是有差距，在参与者的意愿和实际结果方面总是有差别，这种差别是了解历史过程的关键，更是了解金融市场动力的关键。在索罗斯看来，误解和错误在人类事物上扮演的角色，和生物学中突变所扮演的角色等量齐观。

这就是索罗斯的核心理念，这点当然有很多的影响，对别人来说可能不重要，对索罗斯来说却至关紧要，他的一切事情都是以这一点为根本，而且他注意到他对事件的看法，在很多方面和流行的看法大不相同。

极限投机

流行的看法说金融市场处在均衡状态，有时候当然会出现异常，因为市场并非是完美的，而是具有随机漫步的性质，通常会随其他的随机事件而改变。这种看法不是根据牛顿物理学而错误类推出来的。

索罗斯的看法截然不同，他认为歧异状态天生就潜藏在我们的不完全理解中，金融市场有个特性，就是参与者的认知和事情的实际状态之间有差别，有时这种差别可以忽略，有的时候，如果不考虑这点，就不能了解事件的过程。

可以举一些例子：

歧异状态通常以盛衰程序出现，但并非总是如此，盛衰过程不很匀衡：它先慢慢加速，然后在灾难性的趋势反转中到达顶峰。索罗斯在《金融炼金术》中，讨论过很多例子，包括 60 年代的集团企业热潮、不动产投资信托业典型的例子，以及 70 年代兴起的国际借贷热潮，在 1992 年的墨西哥危机时到达巅峰等等例子。他发展出有关自由浮动汇率制度的理论，这种制度例也有走向极端的倾向，但是这种极端通常还是均衡。他探讨过一些比较不纯粹的歧异案例，像 80 年代的融资兼并热潮，所有这些案例中，流行的偏见和流行的趋势之间，都有反射性的互动。重点是，从某方面来说，其实这些歧异的例子都是例外，任何事件序列的反射性互动，都有很长一段期间相当不明显。

索罗斯在《金融炼金术》中没有把这一点说得很清楚，他用同样的字眼——反射——来描述双向互动，也描

第五章 极限投机

述造成这种互动的事件结构。他现在仍然这样做，但是他希望说明一点，就是反射性互动只偶尔出现，而反射性结构是永久性的。

在你可能认为是正常的状况中，思考和实际状况的差异并不很大，而且通常有一些力量会把它们拉近一些。原因之一是大家可以从经验中学习；原因之二是大家实际上可以根据自己的愿望，改变和塑造社会状况。这就是索罗斯所谓的近乎均衡状态。

但是，在某些状况下，大家的思想和事情的实际状态差距很大，又没有拉近的可能，索罗斯把这种情形称为远离均衡的状态。远离均衡的状态分为两类：一种是动态不均衡。在这种情形下，流行的偏见和流行趋势彼此会互相加强，直到差距太大，造成灾难性的崩溃为止；另一种是静态不均衡，不过这种情形在金融市场中很少发现，特征是十分僵化的独断思考模式，以及十分僵化的社会状态，这两种情形都不会改变，教条和现实状况差距很大。事实上，在实际状况改变时，不管改变的速度多么缓慢，如果教条不做调整来适应这些改变的话，思想和实际状况的差异就越来越大。静态不均衡的情形可以持续非常久，举一个人们熟悉的例子，就像苏联的状况一样。相形之下，苏维埃制度崩溃，可以视为动态不均衡的例子。

我们可以把动态和静态不均衡视为两个极端，两者之间的近乎均衡状态视为中道。索罗斯喜欢把事物的这三种状态比作自然界中水的三态：液态、固态或气态。事物的三种状态、性质很不相同，水在三态中的行为也很不一

极限投机

样。同样的道理适用在有思考能力的参与者身上，在我们认为“可能是正常”的状态下，他所谓的双向反射回馈机能不很重要，可以忽略；但在接近或到达远离均衡的状态时，反射变成很重要，我们会看到盛衰程序。

那么，索罗斯如何划分近乎均衡和远离均衡两种状态呢？

界线很模糊，几乎随时都有很多力量在运作，带领我们进入远离均衡的状态，这些力量受到反作用力的抵抗；通常促使回复原状的反作用力会占上风，但是，偶尔反作用力会失效，那就是我们看到制度兴替或革命的时候。索罗斯对这种情况特别有兴趣，但是，如果有人告诉你，索罗斯有一个发展很完全的理论，可以解释和预测这些情况，那个人就是在说谎，索罗斯仍然处在探索阶段。他在金融市场上的表现，比处理一般的历史高明，因为金融市场提供一个界线比较清楚的空间，而且资料都经过量化，可以公开取得。

现在读者可以专注于金融市场，索罗斯在这里可以很容易地解释他的盛衰理论。

他在《金融炼金术》里尝试这样做，但显然做得并不是很好，大部分人从中得到的是市场价格受参与者的偏见影响，如果仅仅是这样就太明显了，不必讨论。盛衰过程只有在市场价格有办法影响基本面时，也就是影响到一般认为已经反应在市场价格的基本面时，才会发生。

看看索罗斯在书里所举的几个例子，在集团企业热潮

第五章 极限投机

中，集团企业用他们高估的股票做为通货，购买获利能力，获利能力随后用来证明高估的股票价值。在国际借贷热潮中，银行用所谓的负债比率来衡量债务国的贷款能力，这些比率包括债务余额占国民生产总额的比率，或是债务本息支出占出口额的比率（偿债比率）。他们认为这些比率是客观的衡量标准，但是事实证明债务比率受到银行本身的活动影响，例如银行停止贷款时，国民生产毛额就会恶化等等。在所谓的基本面和价值之间，冲突并不经常发生，然而一旦发生，就会推动一种开始可能自我强化、但最后会自我失败的过程。

通常估价行为中会包括一些错误，最常见的错误是：不能看出的基本面价值，其实不能独立于估价行为之外，集团企业热潮是这样子，每股盈余成长率可以靠兼并制造出来。在国际借贷热潮中也是如此，银行放款活动会有助于改变银行用来指导本身放款活动的相关比率数字。

但是，情况并非始终如此，日本土地热潮并非错误，是刻意而有远见的行动，意在鼓励储蓄，压低生活水准，以便为日本追求更大的荣耀。日本人似乎利用反射性作为工具，原因很可能是他们来自不同的知识传统，对他们来说，操纵所谓的基本面似乎很自然，而美国人则相信看不见的手。就在他们身陷其中、做法自毙的时候，我们现在却设法模仿他们。

那么，反射会遵循预先决定的形态吗？

绝对不会，但是反射为了变成明显到让人注意的程

极限投机

度，开始时至少必须能够自我强化。如果这种自我强化的过程持续的时间够长，最后一定会变得无法支持下去，因为思想和实际状况之间的鸿沟会变得太大，不然就是参与者的偏见变得太深。因此发展成具有历史重要意义的反射过程，通常会遵循一种开始自我强化、但是最后会自我摧毁的形态，这就是索罗斯所说的盛衰程序。反射性互动如果在到达繁荣阶段前自我修正，就不会发展成具有历史意义，但是这种情形和导致衰败的全面性繁荣相比，出现的情形少多了。

盛衰程序

当然，有没有一种特定的盛衰形态呢？

索罗斯建立了一个形态，一部分是根据观察，一部分是根据逻辑，但他想强调的是，这个形态没有决定性或强制性。首先，盛衰过程可能在任何阶段停止，其次这个形态的模型描述在孤立状态下的过程，在实际情况下很多过程同时发生，彼此互相干扰，盛衰程序会受到外力打断，实际事件的过程和孤立模式相同的情况很少见。这个模型建立了某种程序，分为若干阶段，而且他们找不到主要阶段脱序的盛衰过程，因此如果盛衰程序发生时，确实会遵循一定的形态。

谈到盛衰程序时，一般要涉及一些主要的阶段。

过程通常以尚未被人认识的趋势做为开始，趋势广为人知后，这种认识通常会强化趋势，在这个最初阶段，流

第五章 极限投机

行趋势和流行偏见会彼此补充，在这个阶段，我们还不能说是远离均衡的状态，只有过程逐渐开展时，才会发生这种状况。趋势变得逐渐依赖偏见，偏见变成逐渐加大。在这段期间，偏见和趋势可能重复受到外在震撼力量的考验，如果它们熬过考验，就会变得更加强大，一直到变成似乎无法动摇为止，索罗斯把这一阶段叫做“加速期”。等到信念和实际状况之间的差距变得太大，使参与者的偏见受到极度重视时，就会出现一个高点，这个高点叫做“考验期”，趋势可能靠着惯性继续维持，但是已不能再由信念强化，因而导致走向平缓的状态，这个阶段叫做“曙光期”或“停滞期”，最后趋势依赖日渐加深的偏见，丧失信仰注定会促成趋势反转，这种趋势反转就是临界点，相反的趋势会在相反的方向催生一种偏见，导致可以称为崩溃的灾难性加速状态。

盛衰模式有一种不均衡的形状，开始时很缓慢，然后逐渐加速，到达极为过度的形态，接下来是曙光期和灾难性的崩溃，过程结束时，趋势和偏见都不会和以前一样，盛衰过程本身不会自行重复，它会出现一次制度变革。

有人问索罗斯是否能够像在金融市场一样，也能用他的盛衰理论来精确地指出历史上的盛衰模式。

索罗斯答道：“这种事不常发生，因为经常有太多的过程在进行，而且彼此互相干扰，但是偶尔会有一个过程极度重要，压倒所有其他的因素。苏联的兴衰就是例子，欧洲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可能也是这种情形。”

盛衰模式怎么能够适用在苏联呢？

极限投机

苏维埃是一种涵盖全面的制度，是一种政府形式、经济制度、有领土的帝国和一种意识形态，这种制度也几乎和外在世界隔绝，这就是这种模式适用的原因。但是苏联很僵化，流行的偏见和流行的制度都很僵化，因此在加速期里，偏见和趋势变得几乎无法动摇，以过度僵化的形态表现出来，斯大林统治期间进入这个时期，尤其是这个制度熬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严格考验后，进入这个时期。斯大林死后，考验期来临，而以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的演说为代表，但是这个政权终于重新站定脚跟，于是曙光期开始，教条靠行政手段维护，却不再由颠扑不破的信仰来强化。有趣的是，制度的僵化程度更为增加，过去只要有一个极权领袖在位统治，这样的路线可以随着他的兴致改变，但是现在这种弹性丧失了。同时恐怖也消退了，难以察觉的衰败程序开始，每一个机构开始争取地位，因为没有机构享有真正的自主权，他们必须参与和其他机构交换利益的形态。

一种机构间讨价还价的复杂制度逐渐出现，取代原本属于中央计划的制度，同时非正式的经济开始发展，补充并且填满正式制度留下来的空隙，这个曙光期现在称为停滞期。制度的不适宜日渐明显，改革的压力上升，戈尔巴乔夫成为党的领袖，这是关键时刻，改革加速瓦解的过程，因为改革引进了替代方案，或使替代方案合法化，而这个制度能够生存，是依靠缺少替代方案才能生存，经济改革显示政府改革的必要性，开放和改革出现后，瓦解过程进入终结期，导致悲剧性的加速阶段，最后以制度的完

第五章 极限投机

全崩溃终结。

这里呈现一个有趣的地方，就是并非从近乎均衡走向远离均衡状况，而是从极端僵化走向革命性变革的另一个极端。

历史的阵痛

这样说来，这就和金融市场的盛衰过程有相似之处。

索罗斯至少可以指出金融市场一个相似例子，信不信由你，就是美国的银行制度。美国银行制度从极端僵化，走向极端多变，过程相似，却反其道而行，是从衰落开始，而以繁荣结束。美国银行制度在 30 年代崩溃，变成受到国家高度管制的机构，银行业结构几乎被管制冻结了，禁止跨州扩张业务，在某些州里，连设分行都不合法，管理阶层受到伤害，安全性成为最高的考虑，压倒利润成长，沉闷的业务只能吸引沉闷的人，业界毫无创新，银行股受到投资人忽略。

这种状况一直盛行到 70 年代初期，此时，改变在安静的表面下酝酿，接受商学院教育的新一代银行家开始出现，注重成本和利润，新思潮的精神中心是纽约第一国民城市银行，在那里训练的人扩散出去，占据其他银行的最高职位，新的金融工具陆续推出，有些银行开始较积极的运用资本，创造出很值得称道的盈余表现。

在州的范围内，出现若干兼并活动，促使较大的银行出现，银行的融资规模通常是股本的十 14 到 16 倍，美国

极限投机

银行的比率更高达 20 倍，比较优异的银行股东权益报酬率超过 13%，在任何其他行业里，这种股东权益报酬率，加上超过 10% 的每股税前纯益成长率，股票都应该以超过资产价值很多的溢价出售作为奖励，但是，银行股的溢价很少，甚至无溢价。银行股分析师了解这种相对低估的情形，却对这种状况的修正不抱希望，因为根本的变革太渐进，流行的估价方式太稳定，可是许多银行已经到达临界点，即将推翻一般认定适度融资规模的限制，如果他们想继续成长，就必须筹募额外股本。

在这种背景下，第一国民城市银行在 1972 年的某一个晚上，为证券分析师举办一个晚餐会，这是银行业前所未有的事情，索罗斯没有受到邀请，但是这件事促使他发表一篇报告，推荐大家购买一些管理比较进取的银行，他的报告认为银行股即将反转，因为经营阶层有很好的绩效可告知大众，而且他们已经开始说话。索罗斯写道，“成长”和“银行”似乎是互相抵触的名词，但是这种冲突即将解决，银行股的本益比会逐渐上升作为报酬。

事实上，银行股在 1972 年有过相当大的涨幅，索罗斯在自己选择的银行上赚到大约 50%。一些比较警觉的银行设法筹募若干资本，如果以高于帐面价值的溢价筹募资本的过程确立，银行可以在健全的基础上扩张，银行制度就会遵照近乎均衡的道路发展。实际情形却是这个程序几乎还没有开始，就发生了 1973 年的第一次石油危机，通货膨胀加速，利率上升，13% 的股东权益报酬率不足以让银行用溢价出售股票。第一次石油冲击后，流向石油生

第五章 极限投机

产国的资金巨量增加，开始了美元回流和 70 年代庞大的借贷热潮，这个热潮在 1982 年以墨西哥危机作为终结。人们可以看出来，美国银行制度也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却在 1972 年错失机会，不能够在近乎均衡路线下稳定下来，美国银行制度的衰落、兴起和苏联的盛衰相似。

这点很有趣，索罗斯当时根本不会想到苏联和美国银行制度之间有相似的地方。

这的确有趣。不过不要被其中相似之处冲昏头，在现实世界里，很难找到孤立的盛衰程序，苏维埃制度和美国银行制度都具有充分的意义和孤立程序，足以展现一个完整盛衰程序的特性，其中有相似的地方。两者是很有趣的理论样本，因为他们都显示盛衰过程不只是从近乎均衡走向动态不均衡，也显示这种过程也可能包括静态不均衡，在静态不均衡的状态下，加速期会变得僵化程度日渐加深。但是在现实世界里，别指望看到很多完整的盛衰程序，这种程序很少，两者之间也间隔很久，制度不是在孤立状态下作用的，每一个制度都有附属的制度，而其本身又是现实大型制度的一部分，不同的制度和附属的制度彼此互相干扰。

科学界最近有一种新发展，名称有好几个，叫做复合科学、进化系统理论、或浑沌理论，要了解历史过程，这种方法远比传统分析式的方法有用。不幸的是，人们看事情的方法是由分析式的科学塑造而成，并且影响到达不见得对我们有好处的程度。经济学想成为分析式的科学，但

极限投机

所有的历史过程，包括金融市场在内，都很复杂，不能根据分析式的科学来了解，我们需要一个全新的方法，索罗斯的反射理论只是初步的尝试，不应该过度重视盛衰模式，它的目的只是指引方向，不应该作为一种模型，把实际情况纳入这个模式。在相同的时间里，有很多不同的过程在进行，有些是动态的，有些是静态的，还有一些是近乎均衡的，他们之间的互动，会产生另一些属于相同类别的过程。

这里已变得非常抽象了，有人干脆就问索罗斯：“你可以给我们一些特定的例子吗？”

索罗斯说：“我乐于举例，但首先我想说一个一般性的要点，经济学家探讨不均衡状态时，谈到冲击和外界的影响，我指出孤立程度不同的盛衰程序存在，是希望显示不均衡状态不见得是由外界引进，而是起因于参与者天生的不完全理解；换句话说，金融市场天生就不稳定，流行的理论——均衡，只有在它本身就是我们不完全理解的产物的情况下才会盛行。”

第六章 横扫一切

第六章

横扫一切

阴云密布

索罗斯最著名的事迹莫过于他的利用英镑危机获得巨额利润，在这个金融市场的纯粹运作中，可以很令人满意地解释清楚他是如何运用他的盛衰理论的。

英镑是欧洲汇率机制的一部分，这个机制在近乎均衡的状况下运作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它其实是很高明、很精密的制度，容许经常性的调整，而且调整幅度不太大，不足以让像索罗斯这样的投机客从中赚取暴利，所以是一个近乎均衡的制度，大约已经到达汇率机制所能及的完美程度。

接着发生的苏联崩溃和德国统一事件，使这个制度陷入动态不均衡，根据索罗斯的理论，每一种汇率制度都有缺点，欧洲汇率机制一样有潜在的缺陷，但是一直到德国

极限投机

统一之后，才浮上表面。它的缺陷在于：德国联邦银行在这个制度中扮演双重角色，既是欧洲汇率机制的基础，也是德国货币稳定的法定保护者，在近乎均衡期间，德国联邦银行可以毫无困难地扮好两种角色，但是德国统一后，促成东德货币以高得过度的汇率兑换德国马克，因而在德国联邦的两个角色——也就是宪法上的角色和担任欧洲汇率机制的角色——之间创造出冲突。

而东德马克和德国马克的汇率显然跟政治目标比较有关，与经济现实无多大关联。而且西德的资金大量注入东德，在德国经济中引发强大的通货膨胀压力，德国联邦银行职责所在——由宪法规定而不仅是由法律规定——必须提高利率以对抗这种压力，德国联邦银行也真的这样强力运作。这时欧洲、特别是英国深深陷在经济衰退之中，德国的利率政策完全不适于英国的状况，德国联邦银行两种角色之间的冲突出现，然而根据宪法，哪一种角色优先毫无疑问，德国联邦银行在欧洲其他国家经济衰退时强力紧缩货币，导致德国联邦银行不适合担任欧洲汇率机制的稳定基础，从而使一向处于近乎均衡状态中运作的欧洲汇率机制陷入动态不均衡。

还有其他冲突使这种情况恶化，在德国总理科尔和德国联邦银行之间，对于东德马克和德国马克之间的汇率有冲突，对于政府赤字如何融通也有争执。但是，这种冲突有更深层的原因。

苏联崩溃时，科尔总理和法国总统密特朗会面，说他们希望在欧洲的架构下完成德国的统一，他们两人同意欧洲

第六章 横扫一切

共同体的结构需要强化，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当然不同意，艰苦的谈判随之而来，最后谈成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这个条约谈定的事情中，有一点是建立一种机制，以便创造一种共同的欧洲货币，结果证明这个观念有很大的缺陷。

倡议中的欧洲共同货币是德国联邦银行的丧钟，因为要由欧洲中央银行取代德国联邦银行。我们或许可以说，欧洲中央银行是德国联邦银行的精神继承者，但是，对一个极有权力而且享受权力的机构而言，这样丝毫没有值得安慰之处。机构似乎天生有一种让自己永垂不朽的意愿，它们对保存本身生命的决心似乎比其他生物还要顽强，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危害了德国联邦银行的生存。

所以有三件事情发生冲突：第一，德国需要的货币政策和欧洲其他国家不同。第二，德国联邦银行主张的财政政策，和科尔总理实际采行的政策不同；第三，德国联邦银行正在为自己的生存而战。在索罗斯的眼里，这三种冲突中，第三种最不为人所了解，而且最具有决定性。这些冲突已经酝酿一些时日，虽然德国是在1990年完成统一，危机却一直到了1992年才浮现，但是真正了解这些事的人，都可以看出危机逐渐发展。

在造成1992年9月的危机事件中，人们自然要猜测索罗斯最先想到英镑崩溃在即是什么时候？

从德国联邦银行总裁史勒辛格那里得到第一个暗示，史勒辛格在一个重要的集会上发表演说时指出，如果投资人认为欧洲货币单位是由一篮固定的货币组成，那么投资

极限投机

人就想错了。史勒辛格特别提到，意大利里拉不是非常健全的货币。索罗斯在演讲之后问他，是否喜欢欧洲货币单位变成一种货币？他说他喜欢这种观念，但不喜欢这个名称，如果这种货币叫做马克，他一定会喜欢。

索罗斯心领神会，史勒辛格的话鼓励他们放空意大利里拉，而且事实上，意大利里拉在很短时间内，就被迫退出欧洲汇率机制。这点很明显地指出英镑也岌岌可危，而他们在放空里拉时所得到的利润，让他们有了在英镑上冒险的资金。索罗斯已经不记得事件的正确顺序，幸运的是，他的记忆力很差，这点使他偏向处理未来而不是过去。他记得丹麦公民投票否决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接着是在法国公民投票之前的周末，欧洲国家举行极为紧张的谈判。随着英镑受到的压力逐渐升高，情况变得益发紧张，英国政府为了防卫英镑，把利率提高两个百分点，这时高潮终于来到。这是绝望的行动，告诉人们英国的立场无法维持，因此鼓励索罗斯比以前更大胆地继续放空英镑。结局就是这样：利率在中午提高，到傍晚，英镑被迫退出欧洲汇率机制。

有人批评索罗斯说，英国提高利率两个百分点是正确的做法，要是索罗斯在这种状况下没有发动集体攻击，整个下午都抛空英镑的话，英国的做法应该会成功。

最重要的是，这是无法维持下去的行动，因为如果可以支撑得住，那么索罗斯的集体攻击就不会把英镑赶出欧洲汇率机制。其次，他们不是唯一的参与者，即使索罗斯

第六章 横扫一切

这个人从来没有存在过，大致上这种过程都会用同样的方式展开。英格兰银行提高利率时，他们可能在最后阶段扮演某种角色，因为当时市场的参与者可能会迟疑，而他们决定性的反应可能促使群众再度攻击。他们可能略微加快了这个过程，但是索罗斯敢断定，无论如何，这种状况都会发生。

英镑大崩盘

现在能够把这件事再和索罗斯的理论扯上关系了。

一种制度性的结构，例如欧洲汇率机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都在近乎均衡的状况下运行，然后突然陷入动态不均衡。另有一个索罗斯还没有提到的因素使整个情势恶化，就是市场参与者的认知中有一个缺陷。人们可以回想一下，应该可以记得，投资机构预期欧洲各种货币会在持续进行的程序中统一成单一货币，因此他们决定汇率波动会比过去缩小，每个人因而争相购买比较弱势货币的高收益债券，这点使欧洲汇率机制变得比以前更僵化，使它必须面对激烈的变革，而不是渐进的调整。

索罗斯看出大家都预期渐进的改变，而且他看出庞大的差异逐渐形成，所以他在这件事情上，洞察到这是重大的不均衡，因此他认为机会十分难得，应该把融资增加到最大限度。

当时他准备面对制度的变革，别人却在既有的制度下行动。在这方面他认为，他看得出情势可能经历革命性变

极限投机

化的敏锐感觉很有用。人们应该还记得，英国政府一直到最后一分钟，还向大众保证欧洲汇率机制稳如磐石，他们可能影响了某些投资人，但绝对不能让索罗斯信服。

结果证明索罗斯是对的，英镑真的崩溃了，他从中赚到惊人的利润。但是他也因此变得洞察先机，受到比以前更多的关注，而且并非所有的关注都是正面的。这次的行动虽然利润惊人，索罗斯也因此受到攻击，他对攻击作出了索罗斯式的反应。

在他一生中，为很多目标奋斗，但是他并不特别想替外汇投机辩护，他认为这是没有必要的。他认为外汇投机胜过外汇管制，但是统一的货币应该会更好。他想辩护的是，他在规则限制之内运作，如果规则崩溃，那不是他这种合法参与者的错误，而是制订规则的人犯错，他认为这样是很有道理、很站得住脚的立场。他对于被人称为投机客绝对没有任何道德上的不安；但是就像他所说的，他也不想发起运动，设法为投机辩护。他还有更美好的仗要打，他认为主管当局应该设计一种不会奖励投机客的制度，投机客能够赚到利润，代表主管当局在某些方面失败；但是他们不喜欢承认失败，他们宁可呼吁把投机客吊死在街灯柱上，也不愿花一点小小的心思自我检讨，看看自己什么地方做错了。

这件事是否把索罗斯的反射理论带到新境界？一般认为参与者可以影响结果，但是在这件事情上，参与者其实

第六章 横扫一切

是促成了结果。索罗斯的理论告诉他说“这是一个岌岌可危的状况，如果你用够分量的规模参与其事，就能够事先决定结果”。

这是多么容易就事先决定的，索罗斯回顾时，看起来像是事先决定了，但当时在展望未来时绝非事先决定。相信索罗斯投机绝不是毫无风险，结果根本不确定。无论如何，他们不是自由行动，他们遵照他们的主人德国联邦银行的命令，或许他们比别人更了解他们的主人是谁，他们的耳朵比别人好，善于听取讯息。但是在索罗斯心里，谁是狩猎的主人毫无疑问。他们可能误信德国联邦银行决心摧毁欧洲汇率机制，以便保护自己是欧洲货币政策仲裁者的地位；但是事实证明，这是歪打正着，结果丰硕。

而且，这场游戏还没有结束，欧洲货币同盟对于德国联邦银行这个机构的生存，仍然构成威胁，而且就在索罗斯就“此事接受记者采访时，狩猎正在全面开展：美国正在走软，原因之一是墨西哥危机，另一个原因是美国经济明显走软。德国联邦银行采取强烈的态度，在它们刚刚发表的季报里漠视最新的国际情势，放出要继续在德国紧缩银根的讯号。结果是德国马克对所有的欧洲货币走强，法国因为爆发政治丑闻，加上巴拉杜的声望降低，使法国法郎走软；在墨西哥危机造成的后遗症之下，意大利出现资金外逃。这些国家为了支撑本国的货币，卖出美元，进一步打压美元对德国马克的汇率。这是一种自我强化的循环，德国联邦银行又使它进一步强化。量子基金已经进入另一个汇率动荡不安的时期，他们注意将德国联邦银行作

极限投机

为他们行动的指引，因为到目前为止，德国联邦银行是外汇市场上最强大的力量。

这点和一般人的看法相反，大家认为投机客比主管当局更有力量。就德国联邦银行而言，他们确实最有力量，用索罗斯的话说：“我们跳舞，但是在由他们指挥。”

无论怎样，大家普遍认为索罗斯是能够影响市场的人。

经过英镑危机之后，他被称为“击败英格兰银行的人”，声名远播，这点使他得到可以撼动市场的名声。但是在英镑危机时，他只是群众的一分子，他的规模可能比较大，可能也比大多数人成功，但他仍然只是人群中的一员，即使是现在，索罗斯认为他的影响力大部分还是虚幻的。市场波动可能会和他的名字连结在一起，就像黄金市场所发生的情形一样；但是如果他尝试逆势推动市场，他就会陷入困境，这种事情不只碰到一次，最近的一次例子是日元。

实际的情况只是市场注意他们的行动，也注意索罗斯的谈话。他的行动经常被虚假的谣言掩盖，但是他的谈话可能撼动市场的事实，使他处在一种很特别的地位，他必须很小心自己的话，这样的想法使他的生活变得大为复杂。

因为他相信金融市场天生不稳定，他必须小心在意，以免制造不稳定。例如法国法郎遭到攻击时，他其实认为如果他参与其事，或许能够扳倒法国法郎，这样使他采取

第六章 横扫一切

相当愚蠢的行动，他决定不参与投机法国法郎，以便表明他想稳定金融市场的建设性的建议。这样做造成双重不利的结果：一则失去获利的机会，二则他的谈话比参与投机法国法郎更惹火法国当局。这件事让他学到一个教训：投机客应该保持沉默，只要投机就行了。

最后，索罗斯说他不再限制自己买卖法国法郎，而且他在法郎上，的确赚了一点钱。用他的话说：“不很多，当时获利机会已经相当小了。”

当然，如果他现在看到另一个获利机会，他会毫不犹豫地抓住它。

他上次已经学到教训。但是他会尽力不发表公开谈话，或许也不应该和记者谈话，但是等记者采访的实录发表时，事件应该已经开展，他就认为现在说的话不可能影响市场了。

但是索罗斯的确发表了一些公开的言论。他认为，只有心里想到公众利益时才这样做。例如他主张共同的欧洲货币，根据他的理论，所有的汇率机制都有缺陷，维护共同市场的唯一方法是制订共同货币。而且索罗斯相当怀疑靠渐进融合的程序能否建立一种共同的货币，因为趋势是朝向分歧的。这件事需要政治决定、打破现状，并且订出完成目标的日期。

极限投机

日本泡沫

他谈到英镑危机是欧洲不均衡的例子，但是在 80 年代末期，日本发展出一种泡沫，显然是这种不均衡现象的远东版。“是否有人能解释一下，给我们一些提示，让我们了解日本的情况是否符合盛衰程序，我们应该如何应付。”索罗斯的思绪锁定了日本金融市场。

这是让他相当痛苦的问题，因为他在 80 年代中期，看出日本正在形成一种金融泡沫，他推断这个泡沫一定会崩溃，于是他就在日本股市放空，因为他预期 1987 年的大崩盘会在日本开始，但是实际上却从美国开始。他发现自己在日本放空，在美国做多，因而当时在市场上受到严重的伤害，不过日本的盛衰过程的性质很清楚。

日本有很高的储蓄率、强劲的货币、极低的通货膨胀率和利率，又有本益比很高的股票市场，使日本公司可以用很低的成本筹募资金，从而获得竞争优势。同时日本的土地供应有限，阳光法案之类的僵化法令又强化了这种状况，这些法案限制高楼大厦的兴建，因此造成实质的供应不足，住宅成本上升的速度远比工资的提高快，促使大家更努力的节约储蓄，以便购买住宅，人们可以看到一种自我强化的程序在运作，使大家尽量提高储蓄，尽量压制生活水准的提高。设计这种制度，目的是要使日本成为世界经济大国，同时驱使日本人努力工作，即得到极少的报酬。这种制度很有效，事实上也让日本几乎在每一方面得

第六章 横扫一切

到竞争优势。但是它像所有这一类自我强化的程序一样，也有缺点，这种制度扩大了有自用住宅者和无自用住宅者的差距，形成分裂社会的力量。对这种制度的怨恨持续上升，最后终于发生政治颠覆，结束自民党一党独大的局面，开启了制度的改革。在这个时点之前，日本有一场惊人的土地热潮，规模甚至比股票热潮还庞大，土地热潮最后终于戳破，房地产市场出现大规模的衰退，衰退幅度也比股市的下跌幅度大。

索罗斯多少有点误判了这场衰微的时机，因而在1987年受到伤害。1987年之后，日本出现人为延伸的热潮，大藏省在当年支撑市场，避免了大崩盘，然后开始实施一种精心设计的政策，提供资金给全世界。索罗斯记得和一位日本官员见面，他对索罗斯说明这个政策，他说，1987年的大崩盘不会有1929年大崩盘的那种后果，因为日本准备上阵填补缺口，供应流动性资金给全世界，他们希望日本的金融力量可以和工业实力媲美。相信人们还记得，1987年以后，日本银行成为世界主要的贷放者；三菱地所（不动产）公司买下洛克菲勒中心。但是这次日本高估了自己，日本的金融泡沫继续膨胀，海外贷款和投资热潮最后凄惨收场，等到日本中央银行最后收缩金融泡沫时，日本的商业银行抱着多得惊人的不良债务，到现在还让他们继续受到伤害，大部分的海外金融投资失利，这是最近资金大规模汇回日本的重要因素。

空头市场最后出现时，量子基金仍然在旁边准备从中获利，索罗斯记得空头市场在1990年出现，但是他必须

极限投机

称赞日本主管当局，他们设法缩小这个泡沫，却没有造成崩溃，或许这是有史以来，用有程序的方法缩小，而不是靠灾难性崩溃戳破的最大泡沫。

是什么因素使索罗斯看好日本？

索罗斯认为日本已历经大规模的调整，毕竟日本经济已历经三年左右的衰退，土地价格已经下降，银行经过考验，股票市场已经下跌一半以上。日本已经因应情势的变化作了调整，把很多需要廉价劳工的工厂能移转到拥有大量廉价劳的东南亚国家。

索罗斯在1994年初形成一种假设，认定日本市场即将上扬，因为日本经济即将开始复苏。日本体制中数量惊人的资金，他觉得一部分资金会投入股市，事实上，量子基金在日本股市做多赚了一些钱。

当然，这绝非新的盛衰程序的开始。有很多反作用力在运作，一方面景气出现复苏的希望，这点代表股价会走高；另一方面，日本发生重要的结构性变化，这些变化可能进行到底，也可能半途而废，都会对股价有不利的影响。日元强劲打击企业盈余和经济活力，使日本的经济复苏因此中断。现在没有明显的趋势，索罗斯不清楚最后的结果如何，他只是在摸索，他认为日本是可以交易、选股或敬而远之的市场。

记者采访索罗斯时问到他对日本的态度：“你没有明确的想法时，宁可袖手旁观，对吗？”

第六章 横扫一切

索罗斯回答：“对，请记住，发展完整的盛衰程序很少，而且间隔的时间很久，市场的波动通常是不规则的，市场接纳一种命题，随后又放弃。如果可能，我们尝试抓住波动，但是如果做不到，我们最好不要轻易尝试。”

那么，他是如何用这种方法在日本交易呢？

索罗斯根据他们对日本景气复苏的命题，在日本赚了一些钱，后来因为日元强劲，他们抛售一空，然后他们再度尝试，却亏了一些钱。1995年量子基金出现亏损，平均说来他们是损益两平。这件事显示，你困惑时，最好什么都不要做，你只是在追逐股价的随机漫步，这时你可能受到打击，因为你没有持久的力量，你可能被一些奇突的波动欺骗，而决定退出场外，因为你缺乏因信念而来的勇气。就像索罗斯的朋友维多·倪德霍夫所说的，市场总是摧毁弱者，也就是摧毁没有坚强信念的人。但是如果你的信念不正确，因信念而产生的勇气也可能使你亏得尸骨无存。所以索罗斯喜欢在有坚实的信念时才采取行动。

他就是这样，通常在市场混乱时采取行动，但他有信念。在日本的情形正是这样。索罗斯预期到：日本股市即将再下跌一段。

这主要是因为日元，日元好久以来都在1美元对95到105日元之间交易，股市也在一个范围内交易。但是最近日元突破了交易范围，索罗斯预期股市会随之突破。目前日本人一致尝试在日本会计年度结束前，也就是在3月底前，使日经指数站稳1.6万大关。但是索罗斯不相信这种行动可以无限期的维持下去，毕竟维持日元在一定交易

极限投机

范围内的尝试也已经失败了，日元强劲会压低企业的盈余和资产价值，这样会带动日本股市再下跌一段，就像1989到1993年的情形一样。这就表示维护日本现行金融制度的努力不会成功，而且金融结构里正在酝酿其他影响深远的变化。

索罗斯不像人们认为的那样把这看成是什么相当令人震撼的预测。他说：“不是预测，是假设。而且还是暂时性的假设，毕竟一直到1995年初，我们还是在日本做多，但是我们现在愿意重回日本市场，因为风险报酬比率相当有利。”

索罗斯说的现行金融制度是指由大藏省主控、由听令于大藏省而非市场的机构——银行、经纪商、信托银行和保险公司——组成的制度。这是以主导权为基础的整体制度里的一环，并且在整个制度中，已经取得主导权。在日本工业奇迹的早期，通产省的影响力大多了，但是近年来，大藏省已经变成权力结构的主角，表现却差劲之至。工业部门一直创造数量惊人的剩余，并把剩余交给金融部门，金融部门却浪费掉了。日本遵循19世纪英国的脚步，想成为世界金融盟主的伟大冒险完全失败，国内资产泡沫也已经戳破了。金融部门享受工业奇迹的果实，满载隐藏的资产，却白白浪费这些资产，整个过程花的时间非常久，因为日本有太多的资产可以浪费。索罗斯不相信大藏省或金融机构充分了解本身的遭遇，他们觉得不安，却不完全了解自己的困境，金融部门表现的这么差，一点也不足为奇。他们以帐面价值而不是由市场价值作为指引，因

第六章 横扫一切

此他们遵循的是错误的讯号，他们习于根据法令运作，大藏省则习于发布法令。他们都是官僚，官僚并没有受过在市场环境中运作的训练，巧合的是法国也有类似的情形，想想里昂信贷银行就知道了。

索罗斯永远无法了解日本金融机构在做什么打算，他们总是因应某些法令行动，而不是因应现实的世界。这方面有很多例子，但是这些例子都太技术性了，而索罗斯对有关的法令并没有充分的了解。例如大藏省推出一种法令，容许金融机构根据成本认列日本政府债券，外国债券却必须认列市场价值和外汇损失，如果外汇损失超过15%就必须提到。这是日本金融机构汇回资本和日元强势的重要原因。显然民间发行的债券和柜台买卖的债券，不必遵照市场价值认列，因此出现溢价，正好和人们所预期的相反。

人们无法随着自己的兴致起舞，同时又在市场上有良好的表现，此外，市场发明了衍生性金融商品，这种金融商品的一个主要用途是回避法令规章。外国经纪商介绍衍生性金融商品给日本金融机构时，就像白人把烈酒介绍给印第安人一样，索罗斯不知道日本金融机构帐面上有多少衍生性金融商品，但是，衍生性金融商品使日本本来就复杂之至的作帐制度变得更为复杂。

为什么这种制度应该崩溃呢？大藏省有充分的理由维持这个制度，到目前为止，他们一直做得很成功。

这是因为日元的关系，主管当局尽一切力量压低日

极限投机

元，却失败了，强劲的日元对企业盈余和经济活动不利的影响，效果正好和金融泡沫相反。压低日元正确的名称是通货紧缩。

国内物价正在下跌，利润率和销售额也在萎缩，劳工的奖金遭到削减，消费者也退缩不前，实质利率很高，主管当局却无能为力。无奈之余，他们想到降低重贴现率，但是那样做又产生新问题：日本一部分的人口靠储蓄过活，降低邮政储蓄利率会减少他们的所得；此外保险公司以 4.75% 的利率出售大量保证年金，营业全都出现亏损。但资本遭到侵蚀，需要筹募现金，日本股市目前本益比仍然高达 50 倍，殖利率不到 1%。谁能够吸收股票的卖压呢？奇怪得很，外国人近年一直是买方，日元升值弥补了他们在股票上的部分亏损，在日元目前这种汇率下，他们会继续买进吗？

这是日本的情形，美国市场的情形又如何呢？索罗斯直言道：“展望很好，而且愈来愈好。”

这就谈到共同基金在美国所扮演的角色。投资在股票基金的资金达到空前高峰，共同基金这个行业从 50 年代起，规模从 500 亿成长到两兆美元，从 1990 年开始，个人投资者对共同基金展现出惊人的热忱。

但是他们当中很多人都没有经验。

大部分人都是新手，但是到目前为止，他们还没有不好的经验。每一个市场循环都有过度的现象，这就是目前正在蓄积力量的过度现象，索罗斯如何用他的理论来解释

第六章 横扫一切

这种过度现象呢？

这是潜在盛衰程序的一个明确案例，在这个案例中，人们可以说，投资人在接到通知之后，很快就可以在不同种类的基金之间转移资金，所以人们只要打一通电话，就可以把资金从股票基金转到货币市场基金。金额惊人的资金会流动，是由利率下降引发的，利率下降。人们从货币市场基金和银行定期存单所能得到的收益就减少。很多买共同基金的人在股票市场是新手，不完全了解其中的风险。现在利率又开始上升，大家有可能把资金转回货币市场的基金，这一方面是由于利率上升，股市已经停止上涨；另一方面是因为货币市场基金的收益率持续上升。

毫无疑问，这是一次繁荣期，因此就有衰落的可能，但是必须记住，事件的过程没有什么量定的，所以繁荣之后，不见得就一定会出现衰落。会引发衰落，必定有一些特别的東西出现，所以人们很可能不会看到衰落特有的加速下降现象，这是个过度现象，可能在经济持续成长的背景下，靠着基金的逐渐转移而化解掉。

但是这点正是目前危险之处，人们也可以说富达基金，或者说得更明确一点，麦哲伦基金是震中，就像1972到1974年间超级成长股的盛衰程序中，摩根银行和花旗银行是重心一样。

但是麦哲伦基金所代表的风险已经上了报纸头条，市场不可能毫无警觉。这样不代表瓦解过程或许不会发生，有些真正具有意义的情势可以清楚地预测，但还是照样发

极限投机

生，就像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一样，或像 1982 年的国际债务危机一样。新兴市场正在形成重大的危机，到 1994 年繁荣期步向终点时，一大部分流进股票共同基金的资金——可能有高达四分之一的资金——将流入新兴市场基金。从定义上来说，新兴市场比较小，而且比较不成熟。相形之下，美国共同基金的比重就比较大。瓦解的过程已经开始，照索罗斯的看法，要很久之前才会结束，引发这个过程的，正在墨西哥危机。就美国国内市场而言，他比较不能肯定会发生崩溃，因为他不能确定什么事件会引发崩溃，的确如此，墨西哥危机使美国的多头市场期间得以延长。

墨西哥——世界的伤口

墨西哥的情形似乎是典型的盛衰程序，其中一个特点是，这么多在墨西哥做最大量投资的人当中，居然不了解墨西哥货币高估得吓人。索罗斯这样解释墨西哥的情形，更重要的是，他解释墨西哥危机对新兴市场的意义，甚至对比较成熟市场的意义。

外国投资通常和盛衰程序有关，他一开始工作就从事外国投资事业，看过很多循环，而且他很早就认为，必须把对外投资者视为一个群体来看，他们的行动总是错误的。这一点适用于 50 年代末期和 60 年代初期，当时美国投资者购买欧洲证券，到 1962 年，美国实施利益平衡税，使这股热潮凄惨结束。这也适用 1972 年的情形，当时美

第六章 横扫一切

国投资机构购买日本证券，事后证明这是错误的行动。到80年代末期和90年代初期，日本投资机构的对外投资也是如此，这些资金汇回日本，是1994年日元强劲的原因。这一次的全球投资狂潮在1994年12月达到高峰，的确也适用这一点，这是索罗斯所见过最大的投资热潮，相对的衰落也同样可能的庞大，这是他一生经历中，所见过和1929年大崩盘最接近的情况。

索罗斯有这样的意思：墨西哥是第一张倒下的冒牌，还会有很多共同国家跟着倒下。

这件事一定会有影响，对拉丁美洲国家尤其如此，损害的程序很难估计，但对实质的世界大势和金融市场一定会有相当大的损害。在索罗斯看来，很可能不只导致金融制度崩溃，也可能导致国际贸易制度崩溃。

当时，许多投资人怎么可能对墨西哥事件这么没有警觉呢？这个问题一定经过很多年的发展。事实上，从1994年年初开始，情形就相当明显了。麻省理工学院鲁迪·唐布奇教授早在1994年2月，就相当明确地说墨西哥货币必须贬值，事实上他是统治墨西哥那些技术官僚的老师。

但是没有人理会他，墨西哥市场继续表现得比其他市场好。投资人对墨西哥的态度，就像他们在60年代末期对新兴成长股一样，有着同样信心十足的傲慢。

事后回顾这件事，其实相当容易解释，墨西哥希望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立法。而在美国方面，对外贸易出现庞大

极限投机

赤字，是促使国内支持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好理由。随后，墨西哥进行选举；由于墨西哥已经比过去民主，因此选举不再是事先就可以决定的事实。前任总统马德里在把权力交给萨林纳斯之前，还可以采取所有令人不愉快的措施，因为萨林纳斯能当选总统，普遍被认为有操纵选举之嫌，但是在萨林纳斯任期内，民主制度的短处就暴露无遗。萨林纳斯担心，如果比索在总统大选前贬值，可能伤害到他的继承人当选的希望。人们应该记得，当时在1994年元月发生嘉巴省暴动，原来的总统候选人柯罗修遭到谋杀，墨西哥的政治情况相当不稳定，大家认为贬值可能对选举有不利的影响。

选举之后，萨林纳斯在交出政权之前，比索可以贬值，而且也应该贬值，但是在他正在角逐世界贸易组织首脑的位置，所以不希望留下污点。最糟糕的是，墨西哥这些技术官僚在外国投资协助下，表现极为杰出，把墨西哥从第三世界迅速提升到第一世界，这些官僚开始相信自己的法力，这是魔术师的际遇中最糟糕的事情。虽然幻影和实际之间的鸿沟已经大得无法维持，这些官僚还认为他们可以继续支撑墨西哥的繁荣。

投资人开始担心以比索为票面的债务，所以墨西哥政府开始借入美元而不是比索，这点使墨西哥比索贬值的压力大为加强。在墨西哥几乎丧失所有汇存底之后比索才贬值，为时已晚，墨西哥积欠的美元债务，以美元计算，债务的总额不变，但是以比索计算却大大的增加。这点使政府的财政状况受到怀疑，大部分民间企业部门的债务也受

第六章 横扫一切

到怀疑。贬值 15% 不但没有提供调整的机会，反而加速资金外流，然后在一天之内，整个汇率制度被冲垮，比索失去支持，又贬值了 25% 左右，就这样引发了危机。

许多人听到墨西哥状况的时候，深感惊讶，一些应该拥有最好财政管理的国家，怎么可能最后都遭遇到最严重的财政问题？墨西哥理当有杰出的人才，索罗斯针对日本大藏省的谈话，也让人们深感震惊。

还有，人们记得巴西的德芬·尼托，他是 70 年代巴西大繁荣期的导师，但是到 1982 年，一切都崩溃了。善泳者死于水，索罗斯过去对于日本人和墨西哥人这么了解反射理论，印象深刻。现在他可以看出来，他们忘记了最重要的一点：承认自己不是金刚不坏之身。

这种事要花很多年才能解决，有人这么想，但索罗斯反问：问题是到底能不能解决？美国和国际货币当局觉得如此，他也认为如此。如果墨西哥倒债，或是像 1982 年那次一样调整偿债期限，就会动摇整个国际市场，所以他们发动一场拯救行动，但是这个行动却被糟蹋了。

出了什么问题？他们动作太慢，行动又没有经过正确的协调，而且没有动员足够的财力，要是他们动作快一点，坚决一点，需要的资金应该比较少，但是他们错过展示力量、安定市场和稳定比索的机会，单是拼凑拯救方案就花费了太长的时间，美国财政部觉得应该寻求国会的同意，但是国会行动缓慢，所以财政部只好动用外汇稳定基

极限投机

金，其实，这个基金一开始就应该动用了，他们也没有争取到欧洲和日本的支持。在这段时间里，情势持续恶化，比索在自我强化的形势下继续贬值，因为比索跌得厉害，银行体系的地位越危险，越会鼓励更多的资金外逃，到最后连国际货币机构都心惊胆战，缩小拯救计划的规模，原来应该是 520 亿美元的拯救计划，结果可能大为缩小。

那么，墨西哥本身会采取必要的措施以解决这个状况吗？

索罗斯认为，他们在国外的压力下，已经吞下苦药，墨西哥人尽其所能地抗拒，利率已经升到 50% 或 70%，这是一种自我毁灭的药方，墨西哥会发生惊人的衰退，带来无法估计的政治和社会后果。

大家应该体认到：这次墨西哥危机造成的问题，远比 1982 年的危机棘手，因为在当年银行握有债权，货币主管当局可以对银行施压，说服银行停利息，或者说是正确一点，可以把够多的利息收入重新贷出，确保可以收到利息。原本是自发性的贷款，由索罗斯所说的集体贷款制度取代，这个方法成功了。但是你不能对市场上的投资者施加同样的压力，因为他们一旦获得偿付，绝对没有诱因叫他们把这些钱再投资在这个国家里，因此市场债务远比银行债务难以解决。

理想的情况是：美国应该让墨西哥把美元票面的国库卷转化成长期债务，然后应该提供一个拯救方案，让墨西哥银行体系生存下来。美国财政部为什么要拯救精明的投资人？！他们在持有的墨西哥美元票面债券上，已经收到

第六章 横扫一切

很高的风险利润，持有这些债券的人应该有义务承担后果，如此拯救墨西哥所需要的资金应该会小得多。国际机构应该有更多的资金去拯救其他的国家，但是这种计划一定很难安排。如今，美国财政部能够在美国投资人利益受损的情况下，提供援助给墨西哥吗？墨西哥政府调整偿债期限后，墨西哥银行能够继续借到钱吗？能够避免其他金融市场的恐慌吗？事后回头来看，面对这些不确定事项，情况会比陷入一场失败的拯救行动来得好。这些都是难以解决的问题，主管机关会像目前的情况一样，一定会受到批评。

至于以后会有什么变化，索罗斯说这是他不应该回答的问题，因为不管他说什么，都会被事件淹没。金融危机目前正处在高潮，拯救计划太软弱无力，不能安定市场，而且墨西哥政府在震撼之下余悸犹存，只有高利率能够阻止资金外流，但是高利率却严重伤害银行体系和经济，从而鼓励进一步的资金外流。如果金融危机安然度过，一定会有政治和经济的影响，预期这种影响大约在本书出版之时，也就是1995年8、9月时会达到高潮，经济衰退的全面影响会出现，墨西哥的工人会收到三个月的薪水，然后被资遣。如果这个危机也度过了，美国也会受到影响，因为墨西哥的经济能否生存，要靠能从美国赚取庞大的贸易盈余而定，这点对美国股市和债券市场会有一些好的影响，会有助于降低美国经济的热度，并且略为抑制通货膨胀；但是政客可能注意不利的影响——失业和不公平的劳

极限投机

工竞争，这件事情可能成为 1996 年总统大选的重大议题，如果美国走向保护主义，人们可能看到 30 年代的惨剧重演，大家等着瞧吧！

而且，如果墨西哥的情况真象索罗斯说的那么严重的话，在其他地方肯定也会造成影响。

拉丁美洲国家已经遭到伤害，债权工具的收益率高得惊人，巴西股价已经下跌 70% 以上。墨西哥之后，下一个国家是阿根廷，阿根廷维持一种外汇局的制度，这是很僵化的制度，让人想起 19 世纪的金本位制度。想要发行本地货币，一定要在外汇局里存入等量的美元，而且银行必须在外汇局里维持最低限度的存款准备金，这样为汇率提供一种自动防卫机能，因为如果阿根廷比索兑换成美元，或者存款从银行中提出，利率就会被迫上升。理论上，所有的本地货币都可以兑换成美元，而不会对汇率造成任何影响，只是利率一定会上升到惊人的水准，这种情况已经发生。

事实上，阿根廷经济正在美元化，但是即使以美元计算，利率也高得无法维持，因为存款正从银行体系中流失。危险不在于贬值，而在于银行危机，因为银行收不到客户该交的利息，更别提收回本金。随着利率上升，债券和股票价格下跌，引发追缴保证金，强迫性的卖压会使恐慌加深，今天的情形就是这样。这个危机显露出外汇局制度的缺陷，就是没有一个最后的贷款者（中央银行），这是 19 世纪金本位制度的缺失，也是导致中央银行发展、最后抛弃金本位的原因，这种情形再度死灰复燃。阿根廷

第六章 横扫一切

当局在外汇局里，劝服比较强大的银行把部分最低存款准备转移，为比较脆弱的银行提供生命线，但是，这是一种危险的方法，一颗老鼠屎会搞坏一锅粥，墨西哥危机达到顶点时，阿根廷也会到达高潮。

索罗斯对墨西哥采取观望的态度，但是相形之下，他相信阿根廷可以挽救，这是典型的流动性危机，因此也有典型的救治良方，就是最后的贷款者。因为阿根廷本身没有最后贷款者，必须由国际提供，这就是国际金融当局的作用。美洲开发银行已经筹募 10 亿美元的贷款，供阿根廷各省银行改组之用，国际货币基金应该修正平常的做法，运用手中 20 亿美元的紧急贷款额度，为阿根廷的存款保险制度保证，世界银行也应该加入，国际清算银行应该提供临时贷款。最后，货币局应该获准持有美元票面的债券，作为一部分资产，货币局在关键时刻采用市场力量，应该可以扭转债券市场的趋势，吸收强迫性卖压，缓解银行的压力，并且让利率降下来，这就是可以发生作用的拯救计划！

还有，巴西的情形如何？

巴西并未陷入严重困境，巴西经济略为过热，货币略为高估，已经出现美国 1929 年大崩盘式的股市崩盘，恐慌卖压压低了外债，但是贸易上可以改善，汇率已经逐渐降低，贸易盈余可能重新出现。巴西是个大型经济体，而且大致可以自给自足，可以独立存活，如果阿根廷能熬过考验，生存下来，巴西也没问题。

如果墨西哥救得起来，风暴就会过去。但是会留下很

极限投机

多残骸，而且对世界其他地方也会有影响。新兴股市的热潮已经结束，绝无可能恢复风暴前的状况。

索罗斯预测到还会有其他金融危机。

他分析，负债比率比较高的其他国家已经遭遇压力，只举几个最明显的国家，就有意大利、瑞典、加拿大、匈牙利和希腊，这些国家的压力可能升高，如果墨西哥没有救成，尤其会这样。

同时，索罗斯也提到菲律宾和中国大陆的情况令人担心。

在所有新兴市场中，中国大陆的活力最充沛，索罗斯在他的担心之余，似乎更充满了乐观的情绪。

到目前为止，中国能够靠着吸引外国资金，确保经济进步，如果资金的流动逆转，难以预料的事情都可能发生。

政治动荡可能强化资金外流，反之亦然。幸好，几乎所有外国资金都是以直接投资的形态出现，直接投资可能不受新兴市场动荡的影响，只有香港容易受到投资组合资金流向的影响。香港的情形令人鼓舞，但是对中国大陆的直接投资是否会下降，还根本不能确定。新的投资承诺减少了，既有的投资承诺资金到位的情形即将到达顶峰，中国大陆要通过考验，新的投资承诺必须增加。再看亚洲其他新兴工业国家，大多数亚洲国家因为国内储蓄率高，情况远胜于拉丁美洲国家，好几个亚洲国家最近提高利率，这样可能抑制这些国家的经济，并且促成世界性的经济减

第六章 横扫一切

缓。

索罗斯由此认为，可能会出现世界性的经济减缓。有这么多的秩序，怎么能够避免这样减缓呢？首先是外汇市场。这是多事之秋，有太多不同的因素互相激荡，难以区隔开来，有很多理由使美元疲弱，日元和马克强劲，有些因素交织在一起，有些因素相当无关。

日元因为资本汇回本国的关系，遭遇升值压力，在恐慌的时期，国际投资通常会回到本国去，大部分的国际性投资组合的资金来自美国，但是这些资金投资的大多数国家属于美元区，就汇率而言，这些资金的流窜大致上是中性的。但是相反的，日本资金汇回国，对日元美国汇率会有直接的影响，外汇选择权又使这种影响大大的加强。

索罗斯曾提到过，日元一直在 105 到 95 日元兑 1 美元的范围内交易，日本出口商信心十足，认为在 1995 年 3 月结束的会计年度剩余的月份里，这种交易范围会维持不变，所以他们买进所谓的“击倒卖出选择权”，买进的数量很大，索罗斯说数量很大时，指的是几百亿美元的价值。击倒卖出选择权是很奇怪的东西，让你有权在某一个成交价，卖出一种外汇，但是市场价格下跌到某一点之后你就丧失权利；在这种情形下，一般合约的成交价是 105 日元兑 1 美元，也就是这个交易范围的顶点，失效价格是 95 日元，也就是交易范围的最低价——只要美元汇价维持在这个范围内，对日本出口商来说，这是非常有吸引力的诱惑，对选择权的卖方也很有吸引力，因为他们可以用 105 和 95 日元兑 1 美元，卖出额外的卖出和买进选择权。

极限投机

但美元跌破 95 日元时，选择权的卖方必须匆匆忙忙的回补他们的日元合约，日本出口商也发现手中的美元没有避险，于是他们的美元卖压合并在一起，在几天之内，把美元打压到 88 日元，形成外汇市场崩盘，规模可以跟 1987 年的股市崩盘比美。两种崩盘原因大致相同，就是选择权部位严重失衡时，可能造成崩盘。

德国马克强劲的原因相当不同，德国经济以生产资本权为导向，世界各地的需求一直很强劲，德国的利率很可能已经触底，可能会开始回升，这点在德国马克兑其他欧洲货币的汇率上形成压力。意大利苦于持续不断的政治危机，法国面临总统选举，英国保守党政府执政的时间即将走到尽头，经济也开始变差，西班牙有自己的问题。新兴市场的崩溃，促使资金流向强势货币的压力大增，德国联邦银行看到欧洲单一货币的希望逐渐破灭，不见得会很不高。在某种程度来说，任何国家想要支撑本国货币对德国马克的汇率，都必须运用本身的美元外汇存底，这样就对美元造成压力。

美元疲弱在某种程度上，是日元和德国马克强劲的相反关系，但是也有其他的原因，最重要的原因是墨西哥危机；事实上，引发外汇市场动荡不安的原因就是墨西哥危机。墨西哥被视为美国的负债，美国财政被迫动用外汇稳定基金时，实际上等于宣称美元毫无防卫能力。美国和墨西哥之间贸易收支转为对墨西哥有利，会使美国的经济成长减缓，墨西哥出口产品的竞争还会使美国的通货膨胀率下降；同时，因为墨西哥可能发生银行危机，会让美国联

第六章 横扫一切

邦储备理事会无法提高利率。美国经济成长率反正都会下降的展望，更强化了前面所说的这些因素，美国政府平衡预算法案的修正案在国会被击败，也影响了市场人心，引发美元的卖出狂潮。更让人困扰的是，很多国家的中央银行——尤其是亚洲国家的中央银行——已经开始分散所持有的美元外汇存底，这一点动摇了国际货币制度的根基，就像大陆块开始碰撞一样。

看来，世界不是只面临一个盛衰过程，而是要面临很多个这样的过程。索罗斯就是这么想的！盛衰程序很少孤立发生，他在《金融炼金术》这本书里，设法分辨出几个盛衰过程，但是通常情形下，同时会有好几个盛衰过程同时进行，而且彼此互相影响。通常这些过程被视为外在的震撼，但是事实上，他们可能互相都构成密不可分的部分。例如，新兴市场狂潮是墨西哥繁荣景气不可分的一部分，而墨西哥危机是结束这种狂潮必要的因素，如果不是墨西哥，也一定会有别的国家出问题，但这样的话，事件就会呈现不同的局面。根据同样的道理，墨西哥危机可能引发一些其他事件，影响麦哲伦基金的事件。同样的，无论如何，加拿大和意大利过度借贷都不可能长久维持，但是如果墨西哥倒债，或重新调整偿债期限，就可能加速这些国家的危机，然而目前的情况还是有点不寻常，因为太多的动态不均衡同时在发生作用。

检讨一下，现在有新兴市场盛衰过程、墨西哥的盛衰过程、每一个拉丁美洲又有不同的问题、日元和日本市场

极限投机

的问题、中国大陆政权遇到资本主义式不景气的可能性，以及欧洲的紧张……

在这一切之后，世界上还有一个分崩离析的过程在进行，这个过程蔓延到政治和安全问题，也蔓延到经济和金融问题。和广场协定时期相比，各国当局的合作已经脆弱多了，虽然有很多的问题要讨论，人们现在很少听到七大工业国紧急集会了，每个国家都在追求自己的利益，有的时候，个别的机构各自追求其本身的利益，丝毫不顾共同利益，但是金融市场天生就不稳定，除非政府在政策中明白地把稳定列为目标，否则金融市场有可能崩溃。

当然，很少有人会同意索罗斯的这种观点。但是这观点是从他的动态不均衡理论中直接引申出来的，前美国联邦储备理事会主席保罗·伏克尔说得很好：“每个人都同意过度的波动有害，但是没有人支持对这个问题加以处理。”政府忙于追求本身的利益，而民间部门、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事实上可以从波动中获利，原因不但是他们可以有更大的交易量，也因为他们可以出售避险合同和选择权，横竖他们都会获利。索罗斯还要补充一点，避险合约和选择权通常会加大市场的波动，因为这种做法会促成自动遵循趋势的行为，最近的经验显示，所谓的“击倒选择权”在这方面特别有害，他们和普通选择权的关系，就好比精制古柯硷和普通古柯硷一样。

索罗斯认为应该禁止这种选择权。几个月前，他在国内作证时绝对不会这么说，但是随后外汇市场出现真正的崩盘，就像他曾提到的一样，击倒选择权在 1995 年日元

第六章 横扫一切

暴涨方面所扮演的角色，就和投资组合保险在 1987 年股市崩盘的角色一样，而且两次崩盘的原因都很相像。后来美国证券交易管理委员会推出所谓的“断路器”机制，投资组合保险才形同废弃，现在对击倒选择权也需要采取类似的做法。

索罗斯认为，银行交易的所有衍生性金融商品，都应该透过各个国家的主管机构，向设在瑞士巴塞尔的国际清算银行登记，国际清算银行可以研究这些商品，收集资料，建立资本额规定，而且有必要提高资金额规定以抑制衍生性金融商品，或者完全禁止这些商品。他认为击倒选择权属于应该禁止的部分。

人们很惊讶听到索罗斯居然会主张这么激烈的行动，因为作为市场参与者，他是应当能从波动中获利的。

但索罗斯说：“我更希望金融市场生存下去。”

极限投机

第七章

金钱推动主义

• 金钱面前人人平等

索罗斯为东欧的困难局面捐出了数百万美元，他被人们认为，这是因为他曾频繁插手东欧经济，有罪恶感，他这是想寻求某种心理上的补偿。

但他严厉反驳：“完全不对，我这么做，是因为我喜欢开放社会的原则，则且我有这个能力，这两点是很独特的结合。”

但他仍受到普遍的指责，说他从事金融投机，赚取不当利润。他投机英镑时，是从每一个英国纳税人手里把钱拿走。

他说他是在赚取利润，但绝无不当利润。人们在金融市场投机时，会免于正常企业家所面对的大多数道德关切，市场正常运作时，没有一个无名的投资人可以造成任

第七章 金钱推动主义

何可见的变化。没有索罗斯这个人，也一定会有英镑危机，英镑危机之后，他的地位改变了，成为大师级的人物，但这是最近的发展，在这件事之前，他在金融市场中不必关心道德问题。

洛克菲勒被人指责赚取垄断的利润后，建立了洛克菲勒基金会，他希望用基金会改善自己的公共形象，很多大公司也为了同样的目的设立基金会。索罗斯的情形不同，他1979年设立第一个基金会时，没有公共形象，当时他在市场上只是小人物，管理资本额为1亿美元的基金，今天他们的基金超过100亿美元。

他开始时或许没有公共形象，但是现在的确有了。他成了著名的慈善家，这可能对他的事业有帮助。

这样让他得到更好的关系，但是坦白说，他在商业目的方面不需要什么关系，他害怕这种关系可能扭曲他的判断。他过去不与有钱有势的人交往，照样创造了自己的事业，现在他可以交往了，却没有时间。他得到的主要好处是大家喜欢和他在一起，这一点包括向他提出商业交易建议的人，以及管理团队中的成员。他成为慈善家不是这件事唯一的原因，但是无疑的，这种名声有助于团队中的良好士气。

那么索罗斯行善的真正目的是什么？

大约15年前，索罗斯的基金达到1亿美元的规模时，他个人的财富也成长到大约2500万美元，一番思量后，他认定自己已经拥有足够的财富，再经过深深的思考之

极限投机

后，他得到的结论是：“对我而言，真正重要的是开放社会的观念。”

开放社会的定义？

索罗斯如何界定，波普教导他不应该界定观念的定义，应该去解释。在他的哲学里，开放社会的基础是承认人们都根据不完全的理论行动，没有一个人拥有最高的真理，因此人们需要一种批判的思考模式，人们需要制度，需要在和平状态下共同生活的利益，人们需要民主的政府形式，确保政权有秩序的移转，人们需要能够提供回馈、容许错误改正的市场经济，人们需要保护少数，尊重少数的意见，最重要的是，人们需要法治。法西斯主义或集权主义的意识形态，促成封闭社会兴起，在这种社会中，个人必须服从集体，社会由国家主宰，国家为教条服务，教条则宣称具体表现了最高的真理，在这种社会中，没有自由。

索罗斯还可以举出比较个人化的看法：开放社会是像他这种人可以生活和发展的地方。他是匈牙利出生的犹太人，早年被纳粹追捕过，然后又在匈牙利首先尝试过苏联人的统治，所以他并不是无的放矢，17岁时他移民英国，他是在伦敦经济学院当学生时，了解到开放社会和封闭社会的差别。

索罗斯基金会的目的就是帮助封闭的社会，协助开放社会变得更有活力，并且培养批判思考模式。不过他是逐

第七章 金钱推动主义

步学会如何管理基金会的，他很怀疑基金会，对基金会有很强烈的反感，到现在仍然如此。他认为行善容易把受益人变成慈善的奴隶，这不是基金会想要达成的目的，他把这一点叫做慈善的矛盾。他也认为行善基本上是一种让人腐化的影响力，不只腐化收受者，也腐化行善者，因为大家会谄媚他，绝对不会告诉他真相。

申请者的角色是找出方法从基金会拿到钱，基金会的角色是防止被人利用，为了免于被人利用，基金会不是被迫像福特基金会或国家一样，变得非常官僚，制订非常严格的规定，就是应该保持低姿态，在背后悄悄地努力，索罗斯选择后面这个方法。就是采取“别找我们，我们会找你”的原则。理论上，他希望所有活动和捐赠，都在无名氏的名义下进行，他刻意排除自己的自我意识，因为他觉得基金会必须靠成就来证明本身有存在的理由，如果基金会的目的只是为了满足自我，他的自我一定不会满足。但好笔的是，今天他经营世界最大的基金会之一，而且亲自深入参与其中。

索罗斯第一个重大行动是在南非，那里的确是一个以种族隔离为基础的封闭社会，他认为破坏种族隔离制度最好的方法是通过教育，让黑人在平等的立足点上和白人对抗。他有一个祖鲁族的朋友，是纽约大学的讲师，后来回到南非，索罗斯 1980 年去看他，通过他，索罗斯和一些南非黑人见面，逐渐了解他们，并且变成朋友。索罗斯也去拜访开普敦大学，开普敦大学校长司图亚特·桑德斯决

极限投机

心致力教育黑人学生，让他深受感动，他认为开普敦大学是根据开放社会原则建立的机构，努力设法平等对待大家。在南非，学费由国家支付，他以为协助黑人学生进入开普敦大学，就可以让国家支付他们的教育费用，这一来，他就占了这个种族隔离国家的便宜。

结果事情并没有完全照这个方向发展，总的来说，开普敦大学绝不是像校长那样心胸开放。索罗斯的初步行动是捐赠 80 个黑人学生奖学金，但是，增加的黑人学生不到 80 个，开普敦大学显然把本身的一部分经费移用到其他目标上。第二年他再去南非和这些学生见面，他与黑人学生遭到极度的隔离，学校对他们有着极深切的敌意和憎恨，索罗斯决定照顾第一批 80 位学生到毕业，但是不再继续这个计划。这点非常的可惜，因为如果他继续做，现在应该会有很多成材的黑人，来领导和开发这个国家。索罗斯在南非尝试做其他的计划，但是他得出一个结论，就是他不但没有占这个种族隔离国家的便宜，反而是这个种族隔离国家占了他的便宜，这种制度非常阴险，不管他做什么，都会让你成为这种制度的共犯，他继续推动一些计划，像支持黑人记者的训练，以及一些人权计划，但是基本上，他在南非没有很多事情，这点他现在很后悔，后来，他在南非设立了一个开放社会基金会。

同一年，也就是 1980 年，他开始捐赠奖学金给东欧沙卡洛夫运动。

当然，他并没有意料到迫在眉睫的东欧政治情况变

第七章 金钱推动主义

化。他捐助别人，他支持这些人继续奋斗，不论他们做什么，因为是他们冒风险和负责任，他没有自己的计划，没有任何堂皇的计划。他根本不相信他可以改变什么，但是他的确有一些看法，他知道教条是错误的，因为它是一种教条。要是有人能够培养替代的方案，替其他理念打开门户，教条的错误就会变得明显。事实上，靠着侵蚀这种教条，一定会削弱这种教条。他并没有预期什么，但是他的确希望从内部削弱他们，方法是提供替代方针，和支持批判思想。他认为他能独立推动这一切计划。一切都是在个人的方式下推动，他参加赫尔辛基观察组织，他参加他们每一周的会议，认为这是一种学习期，当时东欧人权组织的领袖是阿叶·奈尔， he 现在是索罗斯基金会的总裁。但是当时开放社会基金其实是一个很小的实验性活动。在南非的尝试之后，索罗斯的工作重点是提供机会，让东欧反对派的知识分子来美国，他每次都邀请十多个人，他认识了其中的一些人，这对他非常有帮助，因为当时他不了解这个地区的问题，他毕竟离开很多年了。

可以肯定的说，索罗斯的这些活动与他的匈牙利背景是有一点关系的。毕竟他是说匈牙利语的，而且他的根在匈牙利，但是并非因为在匈牙利出生，他才决定支持那里的经济。接受他的基金会奖学金的人当中，至少波兰人和匈牙利人一样多，但是他从匈牙利人身上学到的东西最多，而且他和匈牙利人建立了最好的私人关系。

这就是索罗斯在匈牙利设立第一个东欧基金会的原

极限投机

因。人们告诉索罗斯，说他选择候选人的方法开始有不良的影响，因为是秘密作业，受资助的人是因为身为自由经济学家而得到报偿，从某一点来说，奖学金反而让他们蒙羞，他们可能被人指控是靠着标新立异谋生。自由经济学家都是道德高尚的人，有着人们不常找到的正直性格，所以他们的意见对索罗斯很有影响。1984年，他和匈牙利驻美国大使接触，他问大使：是否可以在匈牙利设立一个基金会，以便在竞争的基础上发给奖学金，并且推动其他文化和教育活动。让索罗斯相当惊讶的是，他的建议得到大使的积极回应，显然匈牙利官员认为，对他们来说，索罗斯这个生意人可能成为他们在美国很有用的关系，认为他是愿意捐钱、又没有太多限制的人，他们认为索罗斯是出了名、又天真到足以让人利用的美国大叔。

当时索罗斯在美国的基金会没有全职员工，而且事实上，基金会的事务是在他家里进行的，夫人苏珊当时是主要的管理人员，她管理得非常好，他们没有任何经常支出；或者你也可以说，这个基金会费用极为昂贵，要看怎么估计索罗斯太太的服务价值而定。

到1984年下半年，也就是在匈牙利建立索罗斯基金会之后，索罗斯基金会和开放社会基金分开设立，因为匈牙利政府不能够接受开放社会的名称，索罗斯基金会在纽约有一个办公室，也有一个负责的全职员工，不过，开放社会基金没有全职员工，苏珊继续管理了好多年。

1984年，索罗斯在匈牙利常常被人攻击，说他是为

第七章 金钱推动主义

了基金会的利益和政府当局合作。索罗斯说：“我们当然要合作，他们想利用我，我想利用他们，这就是我们的合作基础，最大的问题是谁赢了谁。我们研究出这样的安排，由匈牙利科学院和纽约的索罗斯基金会合设委员会，当时匈牙利科学院还是完全由政府控制的机构，我们达成协议，确保双方对支出都有否决权，只有双方主席批准的计划才能够用钱，我是其中一位主席，科学院的副秘书长是另一位主席。”

结果，毫无疑问的是索罗斯赢了，他有一些很好的顾问，其中一位是米克罗斯·华沙赫伊，他曾经在 1956 年的伊默·奈吉政府中，担任过政府发言人，他因为在匈牙利事件革中扮演的角色，几乎被判死刑，并且在监牢里关了很多年，匈牙利这个基金会能够成就斐然，很大部分是靠他的政治智慧和技巧，也和他普受尊崇有关。当时索罗斯如果没有先跟他商量，绝对不会做任何事情，他远比索罗斯了解整个形势，索罗斯也远比匈牙利主管当局敏感，他们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但是一开始时，索罗斯想打退堂鼓。

他们签好建立基金会的协定后，对基金会如何运作有过歧见，索罗斯的想法是员工应该要独立，而且要由索罗斯一方选择，可是政府希望委员会的决定由一个相当可疑的，叫做国际文化关系联盟的组织推动，目的是要将基金会当作美国文化交换全部对手的机关，当时华沙赫伊向索罗斯建议：“不应该妥协，我们需要自己的员工。”这件事

极限投机

导致他第一次和权势滔天、主管文化事务的领袖乔治·艾瑟会面时无法达成协议，所以索罗斯告诉艾瑟，他要打退堂鼓。艾瑟说索罗斯不应该不高兴的离开，于是索罗斯回答说，他枉费一番努力，没有办法不生气。当时索罗斯已经走到门口，艾瑟问索罗斯说：“你到底要什么？”索罗斯回答说：“要独立的秘书处。”最后他们在秘书处这件事情上，达成与主席相同的妥协：双方都任命自己的主管人员，所有的文件都需要他们共同签字。

男人有钱会变得更好

当时，索罗斯每年的捐赠是 300 万美元，但是，最初几年基金会没有把钱全部花光，基金会最初的计划之一是提供影印机给文化和科学机构使用，以便变换匈牙利福林（货币）。他们需要匈牙利福林，以便支付当地发出的捐赠，但是影印机也发挥了很大的功用，这等于是一笔钱用了两次。这是因为，当时匈牙利仅有的一些影印机都不能利用，实际上都锁了起来，每一个使用者都要经过批准，越来越多的影印机出现后，促进了传媒的发已。

有意思的是，当局并没有禁止索罗斯的这个计划。

学术机关工作迫切需要这些机器，匈牙利政府并没有加强管制，但是，有这么多机器之后，也无从管制了。然后索罗斯一伙再利用从学术机构得到的当地货币，支持各式各样的经济活动。

匈牙利的基金会当时免于一般基金会面临的所有问

第七章 金钱推动主义

题，所有和慈善行为有关的矛盾都解决了，因为，基金会变成公民社会的机构，不需要保护自己，因为它受到它所支持的人的保护，基金会不需要官僚化，不需要任何控制、报告和评估程序，因为接受补助的人如果占基金会的便宜，一定会觉得羞惭，如果有滥用的地方，一定会有人告诉索罗斯。

这个基金会运作是这么顺畅有很多原因，最重要的是，匈牙利极为缺少强势货币，美元价值远超过官方汇率，对于满手本地货币，却少有机会得到强势货币的机构而言，美元的价值甚至更高。他们谈笑时，还谈过“文化美元汇率”的笑话。

在本地货币方面，大家为了小小的补助，几乎是志愿奉献，因为这个基金会让他们有力量做他们本来就想做的事情。所以，几乎没有一个人不是无偿工作，他们所需要的只是一些物质支持，例如影印机之类的东西，或者是到外国做研究的机会。索罗斯也利用国家的设备从事与党派无关的活动，因为大多数人实际上都是由国家雇用的，举办各种课程、集会和表演，可以不必付场租，这是基金会扩大影响的另一种方式。到最后，索罗斯被人指控是阴险的投机家，索罗斯认为这是他们所能得到的最高赞美，别忘了，他们一年只花 300 万美元，用这些钱，他们影响整个经济体系的运作，这个体系的预算是他们年度经费的好几百倍。

当局也曾试图阻止索罗斯的行为，这个问题经过激烈

极限投机

辩论。索罗斯在政府中也有同情者，他们主要是经济部门的人；索罗斯在政府里的主要支持者是费伦·巴塔，他当时负责对外经济关系，政府要他负责这个基金会，他确实希望基金会成功，他和其他一些经济学家，如马顿·塔多斯一样，都希望改革。

基金会小心翼翼，如果他们举办会惹恼当局的计划，他们会小心的安排当局不得不批准的其他计划作为平衡，而且他们确定，在平衡之后，他们总是得到积极的影响。他们从事爱国文化经济研究计划，以及对大家普遍有利的社会计划，来平衡分发影印机的行动，政府对索罗斯补助经济学家的计划特别感到震惊，因为这样提高了经常学家的独立性，索罗斯甚至被指控为煽动投机生意的罪魁。

回首前尘时，索罗斯认为他在匈牙利的活动很成功。他说：“这是我们最奇妙、最美好的时光。基金会让匈牙利货币像美元一样行动，教师、大学教授和研究人员，都能够继续保持自己的工作，同时从事投机的活动，所以，这一切的确是很成功的活动，并且形成一种十分普及的美妙现象，此后我们所做的一切，就不太比得上了。基金会的动作干净而顺利，我偶尔会去探访，讨论策略，下次我去看时，策略已经付诸实施，我不知道他们怎么做到的，或许是因为这个基金会是当地唯一可以做的事。社会上所有知识分子的精力都用在上面。1989年自由化之后，大家有很多其他的机会，但是从1984到1989年，基金会确

第七章 金钱推动主义

实是匈牙利知识分子生活中的重心。”

索罗斯谈到这段岁月时，怀念之情非常的深刻。他相信每一个参与其事的人回顾时，都会念念不忘，因为他们用很少的钱达到惊人的成就，而且他们觉得很快乐，觉得他们在和更有钱的对手赌博，以后再也没有这么有利的环境了。后来在大变革之后，匈牙利的基金会在适应新的现实状况方面遭遇很多问题。

索罗斯当时积极管理量子基金，这段时间是他从事即时实验的时期，对他来说，这件事确实重要多了。虽然他积极参与其事，基金会的工作仍然很像是一种副业，他并没有与基金会认同为一，他也不追求出名，他觉得基金会属于匈牙利人，这是基金会成功的秘诀，基金会也不出名，这一点也对基金会的成功有帮助。匈牙利政府的宣传机关放话说，媒体应该忽略基金会的活动，因此，虽然他们获准为他们的计划作广告，新闻界却完全没有报道，大多数人是靠着口耳相传发现这些活动的，基金会是匈牙利唯一确实做了有价值的事情、却没有声张的机构。相形之下，所有的官方组织总是夸夸而谈，宣扬他们其实没有做到的事情，所以，在某方面，基金会的形象是靠着缺乏知名度而建立起来的。索罗斯坚决认定他个人没有任何功劳，因为他认为，是经营基金会的这些人自立自强做到的，他只是提供工具给他们而已，他们的成就使他钦佩不已，所以这一切其实是他们、而不是基金会创造出来的。

但是，是基金会的钱使这一切得以实现。

极限投机

他发现这一切让人非常、非常满意，但是就像他说过的，基金会是和索罗斯分开的东西，所以他几乎是以外人的身分在欣赏，这和他今天参与其中的情形很不相同。

在匈牙利成功之后，索罗斯把基金会的活动扩大了。1986年起，他开始尝试在其他地方活动。不久之后，他也以团结工会的附属地下文化机构“窗户”为基础，在波兰设立一个基金会；接着，在1987年，安德烈·沙卡洛夫获准回到莫斯科时，苏联的基金会也设立了；1989年的东欧剧变之后，新基金会的数目呈爆炸性成长，这时基金会已变成一个网路。

拯救东欧

现在索罗斯在25个国家设立基金会，大部分是设在东欧，他的基金会实际上做些什么事呢？

这一点不可能说得明白，从计划经济转型为市场经济，是一种制度性的转型，几乎每一件事情都必须改变，又没有蓝图可循，基金会所做的事情是，改变转型发生的方式，动员各个相关国家人民的精力。

索罗斯在每一个国家找出一群和他观念相同，相信市场经济的人，有些是知名人士，有些比较不出名，他委托他们确立事情的先后顺序，他有一个整体的构想，随着时间流失，他从不同基金会的经验中学习，加强成功的计划，放弃不成功的行动。他尝试把一个国家成功的计划移

第七章 金钱推动主义

植到其他国家，他也推出地区性的计划，但是他不从外面规定任何事情，他给这些基金会自主权，只是用他所提供的额外资金发挥控制功能。

市场经济的目的是要成为自行组织的制度，索罗斯希望各个基金会不但协助建立市场经济，也要作为市场经济的典型，索罗斯在混乱的状况下创办基金会。基金会的活动范围几乎没有限制，他们尝试选择真正能够发挥力量的计划，是什么计划，要看他们所认定出来的需要，以及可以运用的技术而定。优先顺序迅速的变化，例如，在早年，旅行补助通常很有效，但是现在却行不通。他们的主要优先工作是教育、公民社会、法律、媒体、文化、图书馆、和国际网络，但是这些项目并不能够确切说明他们的活动范围。活动优先，分类是次要的事。没有人知道他们所做的一切事情，索罗斯喜欢从自己毫无所悉却偶然碰上的活动中，得到最大的满足，他设法动员其他人的精力，于是，因为超出他的理解，一些他想不到、事实上是他不能想到的事情发生了，这一点，让他有一种解脱感；最后他打破自己的孤立，和实际的世界结合。他去了解各个基金会各种不同的活动时，所看到的事情并非样样都让他喜欢，但是，他从这一切活动都在进行的事实中得到绝大的满足，这点是他以前所没有体验过的。

他碰到维多·欧夏汀斯基，这是个才华横溢的经济学家，曾经因为酗酒，接受过匿名戒酒组织的治疗，他把匿名戒酒组织先介绍到波兰，然后介绍到其他国家，他拥有

极限投机

惊人的影响力，在波兰监狱的酗酒治疗方面就是如此。索罗斯与欧夏汀斯基向波兰当局介绍一种健康教育的新方法，而且为这事索罗斯还去访问一个教师研习营，不同国家的老师共同研习一星期，他们的热诚令人惊叹。但是影响最大的可能是索罗斯他们建立的当代经济中心网络，这些中心里的大部分思想索罗斯其实都不喜欢，但是他知道他没有资格当裁判。人们或许认为这一点很奇怪，但是在索罗斯看来，这点正是市场经济的一个基本特色，不是每件事情都应该合他口味，如果他尝试控制每一个计划的内容，他就不能创造市场经济，也绝对不能这么快速扩张基金会的网路，基金会过去呈现几何级数般的成长速度也不会出现。

索罗斯有办法应付他所需的资金。苏联解体正好碰上量子基金表现最好的几年，他可以提供的资金远超过各个基金会所能使用的金额，革命性的机会和丰沛的资金结合在一起，产生了爆炸性的效果，基金会网路在5年内急剧成长，将使量子基金的成长率都相形失色。

索罗斯用詹诺斯·柯奈所说的“柔性预算限制”原则来运作，这个原则会造成国家经济的惨剧，但是用在基金会上成效非常好。从某一点来说，基金会是和企业相反的东西，企业界最重要的是利润，在基金会中，花钱的方式最重要。运用柔性预算限制，基金会可以专注在真正重要的地方。

基金会似乎失去控制，从某方面来说，的确如此。但

第七章 金钱推动主义

是索罗斯要求很高的绩效标准，也要求很高的伦理道德标准，他希望基金会精简而廉洁，但是如果他们能得到他的信任，他乐意在他们通知他之后很短的时间里，就授权任何数量的新计划，这就是他所谓的柔性预算控制。

金钱只是成功的必要因素之一，在某些情况下，金钱的伤害远比好处大，如果一个基金会除了钱什么都没有，它就是一个自利的机构，没有其他任何的正当性的理由。索罗斯不断让各个基金会接受严格的考验。

方法之一是保持很低的经常费用，确保替基金会工作的人不是为金钱而来，不过即使是这样，毫无限制的供应工作计划的资金也可能毁了这些人。例如，索罗斯在俄罗斯犯下重大失误，经过几次错误的尝试后，索罗斯的基金会终于在市场经济的转型方面，找到一个极为成功的计划，最初他提供这个计划 500 万美元，这个计划对俄罗斯整个市场经济体制都造成实质的影响，但是他乐昏了头，把预算增为 1500 万美元，还计划再提高到 2.5 亿美元，对计划的管理者来说，这种诱惑太大了，原本精简的作业开始腐化，几乎把这个基金会摧毁了。

索罗斯提到过，不是每一个基金会都像在匈牙利那样成功，那么，到底他们有什么问题？

所有的基金会都不相同，没有两个基金会的问题是一样的。

波兰的基金会开始时也带给索罗斯很多困扰，很可能问题出现在他自己身上，在设法复制匈牙利的成功模式

极限投机

时，他依靠支持者，认为他们知道如何经营基金会，他以为只需要和政府打好交道，然后给他们一些资金，他们就可以顺利的达成他的期望。但是结果并非如此，支持者不知道要做什么事，甚至连申请装设电话线都做不好。后来，索罗斯把基金会交给西格纽·布杰负责，即使如此改善也有限。后来他们找到合适的人担任执行长，但是这时索罗斯和基金会之间爆发了重大冲突，他仍然期望他们像匈牙利的基金会一样，成为分配补助的组织，对所有人开放但是推动基金会的人有不同的看法，他们希望有基金会积极动作，拥有先后顺序和自己的计划，结果证明他们正确，索罗斯错了。他们的方式比较适合新时代。这些年来，波兰的基金会已经成为网路最好的基金会之一。

保加利亚的基金会和波兰的很像，但是，在设立时没有遭遇和波兰一样的问题，保加利亚的基金会像雅典娜一样，全副武装的设立起来。索罗斯得到美国文化参事约翰·曼齐的协助，他曾经在匈牙利工作过，了解这个基金会的目标，他准备好一切，索罗斯只需要祝福他们就行了。这不是说基金会没有碰到一些问题，例如，理事会有一位理事当过人权团体的领袖，后来发现他是狂热的民族主义分子，激烈的反土耳其和反吉普赛人。俄罗斯基金会的情形又相当不同，这样的事可以让索罗斯整整写一本书，就这么说好了，他希望基金会领导市场经济，基金会却陷在市场经济当中，大致上和俄罗斯社会一样，经历相同的动乱。

索罗斯在1987年开始组织俄罗斯的基金会，说得正

第七章 金钱推动主义

确一点，应该是苏联的基金会。他先以旅客的身分前往莫斯科，希望说服沙卡洛夫主持基金会，沙卡洛夫强烈反对进行这个计划，因为他相信这些钱最后会进入贪官的口袋里，但是索罗斯坚持要做。他设法组织一个理事会，理事会真的是很奇怪的组合，因为其中包括在正常情形下彼此甚至不交谈的人，一方面是历史学家尤利·艾凡纳西夫和社会学家塔迪亚纳·萨斯拉夫卡雅；另一方面是作家范伦亨·拉斯普汀，拉斯普汀后来变成极端的民族主义分子。这种组合在今天看来一定是不可思议的。

这个基金会叫做文化行动基金会，管理权落在共产主义青年团改革派官员手里，他们组成一个封闭的社团来推展市场经济，索罗斯尝试劝导他们把心胸开放一点，但是他们不能摆脱苏联心态，索罗斯了解之后，被迫安排了一场政变，排除他们。这件事正好在1991年8月苏联政变之前不久发生，但是安排政变的人，也就是索罗斯在莫斯科的律师，随后把基金会变成个人的禁脔，所以他只好再发动第二次政变把他赶走。

在索罗斯开办转型计划之前，基金会的业务一直低迷不振。转型计划的野心很大，目的在取代学校和大学里的经济学课程。索罗斯一行人在各部会的全力合作下，在很短的时间里创造了惊人的成就，分发将近一千种教科书，训练学校校长，捐款给有创新精神的学校，推出一种股票学的新课程，赞助杰出少年成就奖。整个计划极为成功，所以索罗斯决定投入一大笔基金，这就是下一个危机的原因。

极限投机

这件事发生在 1994 年上半年，正是“强盗资本主义”事件的高潮，当时俄罗斯国营企业的股票，在大规模民营化计划中大量分发给人民，这些股票可以用极低的价格买到，资金极度短缺、信誉较差的银行付出高达十分的月息以吸收美元存款，每一个有钱的人都迅速赚取大量利差。对这个计划的管理人员来说，诱惑一定大到难以抗拒，索罗斯发现一大笔银行存款——大约 1200 万美元——存在信用并非最好的银行里，不过他们收回了这笔钱，没有遭到任何损失。他们做一番彻底的稽核，解聘主要的会计人员。到现在，基金会还没有从这个事件中复原，经过三次改组，他们丧失五年的宝贵时光。索罗斯从痛苦的经验中学到，在动荡环境里，经营基金会是多么的困难。

但是索罗斯说过，他正是这种动荡状况的专家。

出问题是他看得出来，他会改正错误，但是他找不到合适的人把事情做好。如果他能学俄文并且奉献其全部时间，或许可以做得更好。

这件事听来令人伤心，但是索罗斯在前苏联其他成员国的基金会，却办得很成功。

的确如此。他不满意的只是莫斯科的文化行动基金会，他们正在撤销这个基金会，用一个新的组织来取代，索罗斯也负责国际科学基金会和国际科学教育计划。国际科学基金会的任务，是拯救前苏联自然科学界的精英，这是两个超大型的计划，规模远超过他们平常推动的计划。索罗斯捐给国际科学基金会 1 亿美元，两年不到，他们就把这

第七章 金钱推动主义

笔钱用完了，他们对大约 3 万名科学家提供每人 500 百美元的紧急补助，这笔钱足以支持他们度过一整年，索罗斯根据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模式，组织一个庞大计划，负责分配大部分的资金。像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一样，索罗斯向这些科学家提供旅行补助和科学学刊，基金会目前正致力推广国际网络网路，不但要让科学可以利用，也要让所有的用户，包括学校、大学、图书馆、医院和媒体，都可以使用。国际科学教育计划有自己的预算，每年超过 2000 万美元，和国际科学基金会相比，这个计划可以接触到更多的人，所有事情都根据清清楚楚的规定去做，很有效率，对科学界有很庞大的影响。

索罗斯为什么决定在前苏联针对科学界花这么庞大的费用，而实际上，他却把自然科学从基金会的正规活动中排除？

索罗斯想证明西方援助可以很有效果，自然科学界是证明这一点最好的地方，原因有好几个。苏联科学和西方科学界略有不同，代表人类知识的一种杰出成就，值得保存。在为开放社会奋斗中，科学家一直是先锋，而且这个做法有相当高的成功机会，因为有可靠的标准可以判断能力和成就，而且，也可以动员国际科学界的力量，在选择过程中提供协助。

索罗斯证明了他的观点相当正确，这个计划非常成功，索罗斯最近遭到俄罗斯反情报单位的攻击，国会展开调查，整个科学界起来替他辩护，受攻击反而变成基金会

极限投机

的胜利。

在前苏联境内的其他基金会，大部分都表现良好。乌克兰的基金会表现特别优异，它取代了索罗斯期望俄罗斯基金会应该扮演的角色。其他机构以乌克兰的基金会为中心，发展出一整个网路，不过每个机构在不同的领域内运作，和基金会都有关系，却全都独立作业。包括一所训练公务员的机构、一所私立大学、一个发展法制文化的基金会、一所媒体中心、一个现代艺术中心、一所经济研究所，以及一个民营化研究所。基金会协助乌克兰，提供现代社会和市场经济所需要的基本结构，如果乌克兰维持独立国家的形态继续生存，基金会一定会做出实质的贡献协助乌克兰取得经济成功。

有很多原因让索罗斯非常看重乌克兰，他看出乌克兰市场经济的重要性，只要乌克兰强盛，就不会出现帝国主义的俄罗斯，他能够协助乌克兰，因为他有很能干、很可靠的伙伴波登·郝利里辛和波登·柯劳成科，郝利里辛从日内瓦一所商学院院长的职位退休，为的是要在基辅设立一所商学院，柯劳成科是从加拿大到乌克兰作研究的教授，索罗斯请他们负责设立基金会。他们起步很早，早在1991年乌克兰独立的前8、9年，就设立了乌克兰复兴基金会，乌克兰独立时，他们决定全力推动业务，他们有一个清楚的目标，就是要当开路先锋，替他们希望随后源源而来的西方援助开拓坦途，索罗斯可以再度说，他到达了他的目标。

第七章 金钱推动主义

必须承认，开始时他对乌克兰的感觉很矛盾，他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放逐到乌克兰的匈牙利犹太人的命运，因为其中一位后来回到匈牙利，在索罗斯大约 13 岁的时候教他打拳，他的故事在索罗斯脑海里留下深刻的印象，后来成为文化部长的乌克兰作家伊凡·褚巴，要求索罗斯在乌克兰设立开放社会基金会时，索罗斯拿这些故事质问他，伊凡·褚巴回答说基金会的目的，应该是要建立一个不同的乌克兰，使那种暴行不可能再发生，索罗斯接受这一点，认为这是有价值的目标。

而索罗斯在布拉格、在捷克，所做的每件事情似乎都不很成功。

他从 1980 年起，就通过瑞典的基金会，捐赠了大约 300 万美元。天鹅绒革命发生时，他向法兰迪雪·杨努奇和卡尔·史瓦生柏格王子建议说，他们现在应该在捷克境内设立一个基金会，杨努奇负责经管瑞典的基金会，史瓦生柏格王子是维也纳国际赫尔辛基人权同盟的领袖。

1989 年 12 月他们在布拉格会面，史瓦生柏格是旧捷克王室的成员，索罗斯记得他在取得捷克签证方面仍然有困难，因为维也纳的捷克大使馆还没有完全适应新情势，当时布拉格呈现美妙、和平的圣诞节气氛，让索罗斯永远也忘不了。不过，索罗斯设立的基金会，没有正确的植根在经济生活中，从一开始，外来的协助就受到怀疑，从杨努奇手中拿到补助的人有很多怨言，没有拿到补助的人怨言更多。大家不知道索罗斯在很久之前就支持七七宪章组

极限投机

织，没有人了解索罗斯这个奇怪的美国人想要做什么，问题是索罗斯的资助都通过移民发放，大家对移民有很多猜忌，旧的争执不断爆发，大家不是生活在现在，反而专注在解决过去的纷争中。

基金会和七七宪章组织之间也有冲突，因为七七宪章认为基金会应该属于他们；到最后，这些冲突消耗了基金会的所有精力。索罗斯警告杨努力奇很多次，叫他忘记过去，为现在献身，这样仍然无效时，索罗斯于是停止资助布拉格的基金会，这是他在所有慈善活动中最失望的经验。

索罗斯过去反对设立持久性的机构，而且从来不想投资在建筑物上，但是在1989年之后，他认识到，需要一所机构保存和发展革新的精神。就革新来说，1989年的革新并未完成，革新摧毁了一些旧体制，却没有创造新式的社会组织，天鹅绒革命是以市场经济的精神推动的，但是开放社会的观念却没有发扬光大，无论在理论或在实际上，都是如此。知识文化界出现重大的需求，索罗斯设立中欧大学就是希望能够满足这种需求，中欧大学的目的不是宣扬开放社会的观念，而是实践这种观念，目标不只是一要教育出新的精英分子，也希望促成全新的了解。

这所大学的诞生具有革命意味——没有任何规划，也没有适当的法律结构。学校在1991年9月开学，也就是在做出设立大学的决定之后几个月。到现在，混乱之中已经出现秩序，大学也转型为实际的机构，他们有杰出的教

第七章 金钱推动主义

员，由著名的人士和未来一定会成名的人组成，有一位第一流的校长，有杰出的受托人理事会，在创办期间，索罗斯积极参与，亲身做决定，现在他已经把权力交给理事会，他们的学位得到纽约州的承认，教学品质很高，高到被人认为连第一学年的学生都可以颁给硕士学位。在回头来看时，索罗斯相信这是教育史上独一无二的成就，只花6个月的时间，就创办出获得承认的硕士课程。今后至少20年内，这所大学每年至少会从他这里得到1000万美元，作为办学费用，1995年秋季，学校要在布达佩斯市区一栋他们自建的精美建筑里开学。

按原订计划，这所大学在布达佩斯和布拉格都要设分校，但索罗斯在布拉格设立中欧大学的计划也失败了。

说来话长，他很希望不要开办匈牙利的大学，因为他自己是匈牙利人，这所大学一定会立刻变成匈牙利的大学。捷克政府为此向他提供一栋建筑，索罗斯欣然接受，1991年的选举后，捷克新政府取消前任政府承诺的义务，索罗斯对此要负一部分责任，因为他没有充分注意法律文件，有人强烈反对设立这所大学的构想，包括新总理华勒夫·柯劳斯在内，大学也没有得到足够的支持，所以索罗斯决定关闭在布拉格的分校。这主要不是钱的问题，布达佩斯大学花他更多的钱，他觉得，布拉格的大学没有获得当地足够的支持，原则上他不希望别人滥用他的善心，他希望参与其事的人，发展出坚定奉献的意识，并且显示出独立自主的能力。

至于柯劳斯为什么反对这所大学，这是复杂的问题，

极限投机

这所大学是自由经济学家组成的前任政府所推动的计划，效率低落，柯劳斯讨厌这些知识分子，前任政府给他们一栋建筑，柯劳斯的政府毁弃了这个义务，他不喜欢在布拉格有一所东欧的知识重镇，因为他希望更倾向西方，如果把东欧沉进海洋里，他一定会很高兴，因为这样西方就更乐意把他接上船。但是问题不只这样，他对索罗斯是个人有敌意，这件事让索罗斯困扰，因为他不需要柯劳斯这种敌人，后来柯劳斯指责索罗斯新形态的肆意投机，于是真相大白，他相信利己主义，因此，他反对索罗斯的开放社会的观念——开放社会需要大家为共同利益牺牲，现在索罗斯知道他们为什么彼此反对，他很高兴承认这一点，在他看来，柯劳斯具体表现了西方民主制度最恶劣的一面。

索罗斯并没有放弃布拉格，哈维尔总统提议在总统官邸的城堡里，为这所大学提供场所，索罗斯乐意接受他的建议，因为这显示了大学毕竟还得到一些支持。他们正计划在布拉格推动一个庞大的新计划，成立一个结合国际关系和经济关系的学系，他们已经把自由欧洲电台的旧研究部门迁移到布拉格，这个部门也要和大学结合，不过中欧大学的总部还是设在布达佩斯，在布拉格和华沙设立分校。

谁可以在这所大学念书呢？索罗斯解释道，索罗斯接受东欧和西欧的研究所学生，但是大部分学生都来自东欧，索罗斯给他们全额奖学金，学校设有人文科学的各种系所，教学语言是英语，目前很多老师都从西方大学请来，但是索罗斯希望这种情形会逐渐改变，这个计划和传

第七章 金钱推动主义

统的大学多少有一点不同，原创性的研究有比较大的空间，教学、研究和参与实际计划彼此互相补强。

同时，匈牙利的基金会比较难以适应情势的变化。匈牙利的经济制度改变后，索罗斯的基金会不再是当地唯一的活动组织。1989年前，他们在文化生活上有决定性的影响力，1998年后，文化活动有很多其他的支持来源，他们丧失了优越地位，他们的财务状况也恶化，文化机构不再炒作当地货币，“文化美元”也丧失了价值，他们不能再靠义工工作，必须付薪水给员工，必须变成专业机构。

1990年4月的第一次民主选举之前，基金会享有一段短期间的特殊地位，和丧失民心的经济状况相比，他们是自由化的具体表征，政府想和他们合作，希望基金会的合法性多少能够分润给他们，政府给他们提供对等基金，这是匈牙利和基金会历史中的颠峰时期，自由选举之后，新政府具有合法性，他们就丧失了优越地位，此后，基金会有一些活在过去、拒绝改变的倾向。

不过，自由选举为什么会造成基金会丧失优越地位呢？

道理很简单，新政府不喜欢索罗斯，虽然他们在政党政治上极力避免偏私，避免发展成派系，和基金会有关的人却都是自由民主党的党员或同情者，第一次自由选举之后，这个党变成反对党，基金会有这种情形不足为奇，因为自由民主党的政治计划，最接近开放社会的观念。

极限投机

索罗斯可以用比较普通的话解释这种情形，集权主义寻求建立全面封闭的社会，很多人反对集权主义，是因为它的全面性，因为它否认大家的民族认同。为了反对这一点，他们采用民族主义的纲领，其他人反对集权主义，主要是因为他们希望有一个开放的社会，在匈牙利，他们相当清楚的分为民主论坛党和自由民主党，民主论坛党赢得选举，自由民主党输了。

更糟糕的是，自由论坛党有一个反犹太的狂热民族主义派系，索罗斯和他们形成直接冲突，这点对基金会会有无比的好处，使基金会恢复使命感。

在新的自由政府下，基金会的状况有所改善。基金会现在可以和政府合作，以前就不能。在其他国家成功的计划，现在也可以在匈牙利推行，在经济和公共卫生方面尤其如此。

索罗斯和政府这么接近并不会形成问题，他甚至接受了一枚勋章。这样一点也不会让他困扰，他并没有丧失批判的能力，问题是在相反的一边：在大多数国家里，索罗斯受到的批评日渐增强，有些攻击极为恶毒、极为卑劣，很难承受。

为何如此呢？因为他们不喜欢索罗斯的立场，换句话说，是开放社会的构想遭到攻击。

索罗斯曾经自称“无国家的政治家”，那么，由别国公民在其他国家建立基金会，到底可以做到什么地步？这个问题很适切，很重要，索罗斯总是依靠实际住在那个国

第七章 金钱推动主义

家的人，由他们决定什么事情对他们的国家最有益；不这么做，他就会变成外来的干预者。他支持市场经济的观念，这样不能阻止反对这种观念的人，认定他是干预者。克罗地亚总统图吉曼指责他支持叛国者，并且把市场经济的观念称为危险的新意识形态，所以保守地说，索罗斯的活动常引起争议，不过反对的力量越大，就越需要基金会。

索罗斯被指责为干预内政。当然，他的所做所为可以称为干预，因为他希望倡导开放社会，市场经济超越国家主权，同时，市场经济不能由外部强加进去，担任基金会理事的本国人必须承担会务活动的责任，而且他尽可能仰仗他们的建议。

实际上，他经常发现难以决定该采取什么立场，因为每一个国家的经济情势不同，而且随着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恶化，在某一国适当的立场，到另一国可能会不被接受。例如，他在波希米亚问题上采取强硬立场时，他的声明危害了在南斯拉夫的基金会，尽管他尽量小心翼翼，但并非始终都很成功，他不知道到最后会有什么结果，在过去美好的时光或辛苦的时光里，他的状况比较轻松，因为他默默无闻，但现在他已有很高的知名度因而要保持以前那种状是不可能的。

索罗斯的基金会有什么绝对不做的事情吗？有什么他绝对不会超越的限制吗？当然有，他支持市场经济的观念，但是他坚决反对支持政党，对抗不民主政权的民主运动，他支持民主运动绝无困难，但是他的基金会绝不支持

极限投机

政党，而且从来没有这样做过，这样做会违反美国管理基金会的法律。

不过，在任何情况下，要在民主运动和政党之间划清界线，却很困难。以罗马尼亚为例，索罗斯以低价供应白报纸的方式支持所有独立的报纸，罗马尼亚总统伊列斯古因此指控索罗斯支持反对运动，索罗斯的回答是：“我支持的是多元化的自由报业，我们同意彼此可以有不同的意见。”

在中欧东欧国家里，有很多人不喜欢开放社会，喜欢封闭社会，过去的领导人是这样子，今天的民族主义分子也一样，如果是喜欢封闭社会的人想把索罗斯这种人赶出他们的国家，是再自然不过了。

在很多国家里，基金会无疑已经成为经济领域中一股力量，现在索罗斯宣称也要在东欧经投机，对这些弱小的国家来说，他和他的基金会已经变得太有力量了。但是，不用害怕，他不可能投资大笔资金，基金会是另一回事，在某些国家里，基金会变得很有影响力，可能太有影响力了，对他们反而没有好处。但是索罗斯了解这个问题，并且已经采取措施，防止基金会变成像巨石一样难以摇撼的东西，在索罗斯的基金会网路里，有很多彼此互相均衡的机制，他们也采取分权和多元化的方式，以致真正的问题是，左手根本不知道右手在做什么。

基金会最有势力的国家是在乌克兰，基金会大约支持20多个独立的组织，每个组织都有自己的理事会，这种情形非常像是一种网络，而不像是有统一方向的权力结

第七章 金钱推动主义

构。

但是，他们靠一种很有力量的关键结合在一起。他们都接受索罗斯的钱。

东欧国家都很弱小，在这种情况下，强大组织的力量会相对而言显得更为强大，如果再加上索罗斯的商业计划，情形尤其如此。基金会是否可能在有一天发现，自己处在比国家还强大的地位上？这样就和开放社会的理念发生了冲突。

对这个问题，索罗斯却说，不管国家多弱小，基金会永远都不能与国家竞争，因为国家有强制力量，基金会没有，基金会虽然可能和政府冲突，但是不能取代政府。

那么，他不能推翻政府吗？不能，这是把理念的力量和政治的力量混为一谈了。

金钱的力量呢？他完全了解这一点，基金会有很严格的规定，确保奖助是根据才能，而不是根据关系来发给，索罗斯认为，决定奖助的过程透明化，甚至比奖助本身更重要。以罗马尼亚为例，基金会就是这样建立起名声的，过去还没有见过奖助根据才能来发给的例子，即使在限于独立报纸的媒体奖助计划中，基金会也极力公平对待这些报纸。他们经常被指控为收买人心或收买影响力，但是指控他们的，通常是想象不出世界上还有其他行为方式的人，他们绝对不会这样做，这样会击溃基金会自己的目的。

索罗斯承认有人可能只是为了得到基金会的钱，宣称

极限投机

信仰某种理念或提出某种计划，所有的基金会都会遇到这种情形，基金会的职责是保护自己。他也承认，公民社会没有其他的支持来源时，基金会可能变得太有势力，他尊重收受资助者的自主性，借以防止这一点，最好的防范方法是：在他还活着的时候花掉他的钱。

这表示人们必须信任索罗斯会继续当好人。就权力应该没有冲昏索罗斯的头这点而言，这种说法不错。为了达成这种目的，索罗斯必须依靠自己的批判能力，和愿意在身边聚集一些朋友——他们在不同意他时会毫不迟疑地告诉他。但是想想看：如果索罗斯不是一直尊重接受协助的人的自主性，不可能建立现在的这种名声，如果他尝试告诉别人该做什么，大家一开始就不会来找基金会。也想想这一点：索罗斯要这一大堆东欧的仆人到底有什么用处？根据中国人的道德观，如果你帮助别人，他一生就欠你的情，从某一点来说，你拥有了他，但是他也拥有了你，他期望你永远继续协助他，如果你不这么做，你就丧失了对他的权力。

金钱军团全球出击

索罗斯以前说过他不打算在东欧投资，不但是因为他已经拥有足够的金钱，也是因为可能导致他的企业目标和慈善目标冲突，为什么他会改变主意？后来又因为状况改变了。他过去立下规定，不在他设立基金会的地方投资，这是适应复杂状况的简单规则，这样很方便，因为可以避

第七章 金钱推动主义

免任何利益冲突的可能性。今天这个规则不能再维持了，东欧金融市场正在发展，他的工作是在金融市场里操作，根据这一点，他能够否决自己的投资基金会与这个市场的机会吗？此外，东欧国家迫切需要外国资本，他不应该只因为个人的方便，放弃投资机会。

索罗斯的基金会和利益冲突的可能性，不再是使他不介入东欧市场的充分理由了。开始时，他担心别人为了影响基金会的行为，可能拿他的投资作为人质，威胁他们，但现在基金会已经够强大，足以抗拒这种勒索，当然，其中会有风险，但是远比以前小多了。

此外，经验显示，别人比较看重索罗斯的投资者身份，比较不看重他慈善家的身份，所以如果他真的想要在这些国家有影响力，他以潜在投资人的身份可能会做得更好。以马罗尼亚为例，马罗尼亚政府起初对他的基金会极为敌视，但是他在英镑危机出峰头之后，伊列塞古总统急切地想见他，基金会后来的日子也好过一些，但是他目前无意在马罗尼亚投资。

还有一个问题存在，他可能被人指控为发挥自己的政治影响力，以便取得金融利益，为了防止这一点及这种可能，他只代表他的基金会投资，而且不追求利润。例如他正在替乌克兰推动一个投资基金，以便强化乌克兰的民营化工作，因此他心安理得。让他比较困扰的是，如果他在他设有基金会的国家投资，他立刻降格为罗伯·麦斯威尔或艾蒙·哈默之流的人物，他们的基金会是商业活动的一

极限投机

部分，他觉得这种比拟多少让他觉得不愉快。但是他总是比较重实质，比较不重形象，事实上，索罗斯在这个地区设立基金会，比他从事商业活动早了十多年，他设立基金会，当然不只是为了准备好以投资者的身分进入这个市场。

但是，他又以限制自己投资来减少自己可能被攻击的地方。不过，他又刻意选择让自己曝光，当无私无我的慈善家实在好过头了，不太像是真的，曝光能加强他的自我形象，觉得自己就好象神一样的生物，超脱凡俗、行善和对抗邪恶。他谈过自己的救世主幻想，对这一点他不觉得羞耻，没有这种幻想，世界会变得很凄惨，但是幻想终究是幻想，变成像神一样，就是要脱离人间。对他个人而言，基金会最大的好处是引导他和人间接触，但是因为基金会的爆炸性成长，以及活动规模极为庞大，却带来让他再度脱离人间的危险，他变成令人敬畏的人物，而且他可以看得出来，大家根本不了解他的目标，在俄罗斯尤其如此。以前他对于和他的目标一样的人，从来不必解释他的动机，但是在今天的俄国，人民深陷在求生存的挣扎中，以至于追求开放社会这种抽象的善意似乎令人难以相信。1994年，他在“强盗资本主义民营化”的高潮时决定开始投资，对他来说，以强盗资本家面目出现，同时也关心文化和政治价值，比以不食人间烟火的知识分子的面貌出现，拼命宣传开放社会的好处，还比较容易让人相信。俄罗斯的强盗资本家纷纷崛起，他可以作为他们的模范，他以投资者的身分参与其事，就从奥林帕斯山上下来，成为

第七章 金钱推动主义

有血有肉的人类。

索罗斯下山的速度比他希望的速度还快，他进入俄罗斯市场之后不久，俄罗斯这个终极的新兴市场泡沫就爆破了，他几乎是一进去就已明白这一点，于是他试着退出，但是退出比进去难多了，所以索罗斯被套牢了一部分投资，让他丢脸极了，他从宛如神仙般的人骤变为非常脆弱的人。

在东欧，他的投资也未赢。大体上说，索罗斯损益两平，但他在捷克的国营事业民营化计划中，投资绩效很好。

索罗斯觉得东欧国家需要金融市场，做为金融市场的投资者，量子基金对他们的发展有益。量子基金当然不是把投资当成公共服务，而是为了要赚钱，如果他们把赚的利润从这些国家拿走，可能对他们不利，但是如果他们没有赚任何利润，对量子基金和这些国家来说可能更糟糕。不论怎么说，有关量子基金会投资金额的谣言，其实是夸大其辞，量子基金在整个东欧，顶多投资了资本的1%或2%，他们承认这笔资金对东欧并非小数目，但是对他们来说实在太小，不值得他们多费功夫，以他们的100亿美元的规模，他们像一艘超级油轮，只有几个深水港可以停泊，东欧市场这么小，其实是一种限制。

索罗斯本人只做是否投入的策略性决定。他被指控为只按自己的规则行事，而且随心所欲地改变规则。

他不接受别人规定的规则，如果他接受的话，他今天应该不会活着。他是遵守法律的公民，但是他也认识到有

极限投机

些体制不该接受，必须反对，在体制改变的时期，正常规则并不适用，个人必须调整行为以适应情势变化。

看看他在个人方面上所经历的惊人变化，想想他当慈善家的生涯，开始时，他避免任何私人介入的关系，设法保持无名氏的状态，避免曝光，后来，变化的动力加速发展，他接受自己深深参与其中的事实，1989年以后，他积极寻求举办一场听证会的机会，以便表达自己的观点，光是这一点就是重大变化，同时，他继续禁止自己在东欧做生意，现在他连这一点也放弃了。从一开始他和自己的慈善事业完全不沾关系，到现在，整个反转已经完成，不论是作为投资者或是善士，他接受他所做的一切事情，认为这是他存在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且他对这一点很高兴，因为从某方面来说，他整个人生一直是一场漫长的努力，目的是要把他存在的各方面整合为一体。

他对慈善事业的态度和对赚钱态度的演变，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起初他不希望和自己的事业生涯认同，他觉得在赚钱之外还有更高明的地方。他严格地把私生活和事业分开，但他在1962年经历一段艰辛的时光，当时几乎倾家荡产，这件事对他影响很深，甚至让他为此出现一些身心疾病的征兆，例如头晕目眩。这使他了解，赚钱是他生活中最根本的一部分，现在他抛弃投资者和慈善家两种行为之间的人为隔绝，完成了整个程序。

他的心障已经瓦解，整个人成为一体，这样让他得到极美好的满足感，他明白他创造了一个英雄般的人物，对这点他觉得矛盾：一方面他觉得这样让他满足，但另一方

第七章 金钱推动主义

面，他的事业和行善活动规模都极为庞大，这点又使他觉得不安。他必须承认，他希望保持这种情况，而且如果他不是超脱生活，他很可能无法感觉到自己身心合一，这样使他觉得有一点不正常，而且成为他不舒服的原因。不过有不正常的成就，远比胸怀有不正常的野心好多了，在他人生头 50 年里，他觉得好象他有一种罪恶般的秘密，现在秘密摊开来了，他对自己的成就很自傲。

对索罗斯内心发生的变化，另有一种解释：他这个人主要的兴趣在于创始、在于暴风雨般的开始时期，现在这种时期已经结束，整个基金会要面对平凡的例行公事，这些琐事不再能吸引他的兴趣，他已经厌烦了，长期而言，当基金经理人一定比当慈善家有意思，就这点来说，应该说他内心里的基金经理人战胜了慈善家。

他关于创始方面的冒险和烦琐工作的话很对，但是人们认为基金经理人胜利这种话不对。比较正确的说法是，索罗斯希望超越这两种角色，希望他像与量子基金的关系改变一样，使他和基金会的关系改变，他希望像自己摆脱基金的管理一样，让自己摆脱基金会的管理工作，变成只负责制订策略，在必要时能够出面，却把职权和责任授予他人。他希望解脱这些日常重担，以便探索新境界，目前他正在探究理解的界线，他赚钱和施舍的能力已经大大地增加，他担心自己思考和理解世界快速变化的能力，没有跟上脚步。

就整体而言，索罗斯认为他在东欧的基金会是会成功

极限投机

的，施舍这么多钱是要有代价的。

他经营这些基金会所接触到的东西主要是问题，但是他到处旅行时，强烈体会到基金会所做的一切美好事物。

他说过基金会现在处在后革命时期里，和以前在集权制度下的做法应该不同。

基金会必须变得比较专业，这种变化是他难以接受的，开始时他希望有一个反基金会的基金会，有一阵子他成功了：匈牙利的基金会摆脱困扰正常基金会的一切问题。接着社会动荡，他起而迎接挑战，当时有一个改变世界的机会，他投下一切去推动，现在变动的热度降低了，但是任务并没有完成，对基金会的需要仍然像以前一样强烈，但是继续以没有制度的方式推动，一定有很大的害处，以没有官僚体系的方式运作，一定会让他感到浪费和变化不足，他逐渐了解基金会需要一个坚强的组织，也可以说是需要一个官僚体系，他已经和这个事实妥协：基金会必须从短距离冲刺变成长距离赛跑。

他预期这些基金会可以持续运作到钱用完为止，但是他希望基金会尽快地花钱。

他认为这样至少可以运作8年，还可能比8年更长，要看量子基金的表现如何而定。中欧大学获得长期捐赠，但是即使基金会也可能活得比他还长，他现在体会到，基金会建立开放社会的任务，不可能在短时期完成。至于为什么基金会不能永远生存，索罗斯这样解释：因为基金会一定会背离原始目标，他们是有任务的机构，机构通常会将其本身的利益放在原始任务之前。

第七章 金钱推动主义

那么，他是怎样假设基金会居然会变得没有用处的呢？即使在运作大致还算正常的西方社会，也可能因为拥有开放社会的基金会而获益。

东欧社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一定需要这个基金会，但是索罗斯必须假设基金会将来会劣化，他们不应该从一个不再能发挥批判能力的死人手中，接受这个人捐赠的钱。

他确信在10年或40年里，大家会寻找新的赞助者，让他的基金会不会结束。而且，这种事已经发生了，这一点他很高兴，这表示基金会证明了他们生存的权利。

但是，基金会网路会有什么变化呢？

最大的变化是他们现在有预算，到目前为止，每个人只要有很好的计划，符合他们的标准，都可以收到钱，如果计划不成功，就不能再得到钱。这样子很混乱，适于用在东欧革命阶段的乱局，这个方法现在不适用了，他们现在整整提早一年规划，这一点改变了基金会的性质。

基金会也从爆炸性成长期进入整理期。1995年会成为索罗斯不能用经常收入支应基金会所需的经费，而必须动用本金的第一年。

他不在乎，事实上他相当喜欢这样，他正在遵循家父靠老本生活的路子，但是基金会不像他那么高兴，这样对基金会好比是重重地摔了一下。有人曾经指责他只遵循自己的规则，并且随着自己的需要改变规则，他对这种指控也认罪了，他喜欢随着不同的状况改变自己的运作方式，这样让他觉得主控全局，但是组织不能这么欣然接受改

极限投机

变，组织喜欢稳定，他好不容易才学到这点。例如，匈牙利基金会在以前表现极为杰出，但却根本不能适应新的状况，基金会网路对目前发生的变化如何适应，还有待观察。

对此，他将进行调整。他正在表现示范性的行为，他承认他不是属于组织化的人，他准备把一切和组织有关的事情，授权给比较适合的人去做，但是他保留塑造策略的权力，他决心尽可能的保留基金会的精神。

第八章

看不见的巨手

无处不在的基金力量

索罗斯对东欧国家的经济前景表现了空前的兴趣。东欧国家成为独立自由国家的时候，正逢西方最强大的几个国家都遭遇重大危机，面临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克服的问题。

1989年，西方国家运作得很好，他们对东欧未能采取有远见而慷慨的政策，不能归咎于经济困难，情形正好相反，西方世界今天面临的困难，可能有一部分是起因于未能适应苏联的崩溃。

谈到东欧地区的经济前景，索罗斯必须划出一条明确的界线，一边是中欧的波兰、捷克和匈牙利，另一边是前苏联，两者之间有若干个国家：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中欧走向市场经济方面有长足的进步，他对这种

极限投机

方向会持续发展基本上很乐观，如果发生政治或军事政变干扰，那就另当别论，波罗的海国家爱沙尼亚、拉托维亚和立陶宛，可以说情形相同，只是他的信心比较低一点，他们拥有稳定的货币，虽然目前的情况很困难，这些国家已经熬过最艰苦的时期，正朝正确的方向走去，斯洛文尼亚也符合这个标准。

在前苏联地区，情形很不相同，苏维埃制度已经崩溃，却没有新的制度取代，整个大方向还在向下走，走向分崩离析和衰微。无法预测还要走到什么程度，这种事有过前例，就是16世纪末期，和俄国大革命时的艰困时期，从1913到1917年，工业生产下降75%，从1917年1921年，又下降75%——未来可能出现这种程度的大衰退，索罗斯曾经谈到，这是一种会摧毁文明的“黑洞”。

但是工业生产大致已经稳定下来了。的确不错，很多仍然要运作的工业企业，已经学会保卫自己，前苏联经济像一条被砍头的八爪鱼，长长的触须已经适应大致算独立的生存，之所以是“大致”，是因为很多触须仍然依附国家预算来养活。

1994年，俄罗斯发生一些很有趣和意外的事，在大规模民营化计划中，国营企业的股票几乎等于免费分发给大众，这样把企业分为两类，一类是股票有价值的，另一类是股票没有价值的。大致说来，能源和原料生产部门属于第一类，使用能源的部门属于第二类，这种分类以前就存在，民营化计划使两者的益异更明显。

第八章 看不见的巨手

民营化计划也孕育了一个逐渐加强的狂潮，代表天然资源权利的股票，可以用只占潜在价值极小部分的代价购得，在世界其他地方，储藏在地底的石油，每桶可以卖到二至三美元，在俄国，用两三美分就可以买到，这样吸引了国内外一些有企业精神的投资者，引爆历史上最奇异的股市热潮之一，虽然投入其中的资金相当少，只有几亿美元，但是股价上涨的比率却高得惊人，有些股票在几个月里——从1994年3月到8月——价格上涨10倍。

这个市场残缺不全，没有清算和管理安排，股权登记方面也没有适当的管理，银行和经纪商极度缺乏资金，乐于每个月付出10%以上的利息来吸收美元存款。索罗斯在那个时候改变了主意，他开始投资。那时他取消了投资限制，他不能对抗那种诱惑，好一个具有惊人上涨潜力的雏形金融市场，他为什么要避开呢？但是他1994年初秋到莫斯科，在看过整个情势后，他吓坏了，这个市场具有泡沫即将破灭的所有特征，他下令卖出，但是他得到典型的答案：卖给谁呢？

总之，在1994年里有一段时间，人们可以模模糊糊地看到新秩序从旧秩序的灰烬里出现的迹象，这很像19世纪末期美国的强盗资本主义，但是情形比美国差多了，因为俄罗斯的法治基础软弱得多，大家纷纷谈论黑帮，但是黑帮什么都不是，完全就是公共安全部门的民营化，是俄国民营化运动中最成功的一部分。

当然，法律和秩序并没有完全崩溃。但是主管官署也追求私人利益，人们所谓的黑帮，其实就是企业家和官员

极限投机

水乳交融、志同道合组成的网路，这是自由企业的黑暗面。

索罗斯觉得这让人厌恶，但是这样可能比另一种情形好，人们会当强盗资本家，是因为在没有法律的社会里，这是成为资本家唯一的方法，他们当中很多人都很有教养，对这种情形的厌恶不下于他，只要给他们一半的机会，他们就会变成正直的公民。在美国，过去芝加哥、波士顿和纽约民主党的腐败，促成全民大声疾呼，要求廉洁政府。如果强盗资本主义能够成功，同样的情形会在俄国出现——因为俄国人真的很喜欢诚实。

但是这一点完全不能确定，因为强盗资本主义还没开始就遭到摧毁。1994年夏季，股票上涨10倍的企业并没有得到任何好处，所有利润都被买股票再卖掉的人赚去，要到民营化的第二阶段，企业才会得资金。但是泡沫已经破灭，是否会有真正有点规模的第二阶段还令人怀疑。若干能源公司毫无疑问地会尝试进行，因为他们的经营阶层发现，他们确实可以靠着卖股票筹得资金，因此他们热切的准备民营化，但是索罗斯认为他们不会有什么进展。

他为什么这么悲观？原因之一是新兴市场热潮已经破灭，而俄国是其中最后一个和最奇异的新生儿，另一个原因是受俄国内部的政治情势影响。

想想俄罗斯强盗资本主义制度在政治上的影响，天然资源生产部门会欣欣向荣，但是军事和工业部门会没落。天然资源部门的繁荣会造成进口热潮，因为消费者偏爱外国货，比较不喜欢本地产品、服务业部门，例如银行、金

第八章 看不见的巨手

融服务、分销和贸易业也会发展。但是工业产品几乎不会有市场，然而，工业部门却是构成俄罗斯经济的最大部分，前苏联经济扭曲得令人难以相信，包括制造军事产品在内的生产事业，叫做第一部门，占工业生产的 75%，轻工业叫第二部门，只占 25%，在市场经济中，比率正好相反。使用能源的工业一定会遭到处罚，因为石油和其他天然资源卖到世界市场上，比在国内加工为成品更有价值，但是军事及工业部门拥有惊人的政治影响力，政治斗争已经可以简化为这两个利益团体之间的冲突，总理维多切尔诺梅尔金代表能源生产部门，第一副总理欧利·索斯科维兹代表军事及工业部门。实际斗争的情形当然复杂多了，莫斯科和圣彼得堡市长和其他地方上的有力人士，不容易纳入大局，但是主要的政治斗争会根据这些分类，进行战斗，在这场斗争中，大家看好能源使用者会得胜，不只是因为他们拥有的政治力量大多了，也因为他们有坚强的政治主张：他们可以诉诸民族主义情绪，说强盗资本主义会导致俄罗斯经济被掏空，大部分的产业工人会失业，必须重新安置，在任何国家里都会有政治反抗声浪，俄罗斯也不例外。

强盗资本主义的丑陋一面还没有冒出头，政治势力就联手来对付了，从 1994 年年中开始，索斯科维兹就逐渐压倒切尔诺梅尔金，连进攻车臣——虽然处理得一塌糊涂——也成为军事及工业部门的筹码，强盗资本主义这只金鹅还没有生下半个金蛋，就会被吃掉了。

对进攻车臣的事件，索罗斯没有特殊看法，进攻车臣

极限投机

显然是要利用民众对于车臣人的反感，因为在大众眼里，车臣人就等于是黑帮；另一个目的是要略微恢复叶利钦总统的声望，但是事情处理其差无比，开始时是秘密的情报行动，是所谓的内乱，结果完全失败，变成全面的军事攻击，这件事会有难以估算的后果。

索罗斯预期几乎一切都有可能，权力斗争已经加强，到达几乎一切都可能发生的地步。在人民准备盗取一切的国家里，国家本身就是逐鹿的目标，到目前为止，俄罗斯这个国家还不值得窃夺，是因为经济无法支持国家机制，尝试窃国的人失败了——回想一下，就是那次无能官僚想把戈尔巴乔夫赶下台的失败政变。但是时机已经过去，大家已经恢复理智，连经济也稳定下来，现在国家又值得窃取了。

目前已经有人这么做，一群相当邪恶的团体聚焦在总统叶利钦身边，想要夺取权力。这些人当中，最显眼、也很可能是领袖的是柯札尔科夫将军，他是总统警卫队长，也是叶利钦的长期酒友，总统侍卫队已经扩张成一支私人武装，而且也发生一些恶劣的事件，这些情形令人不寒而栗。例如，总统侍卫队的成员戴着滑雪面罩去攻击一位银行家的保安，而这位银行家控制一家批评总统的电视网，在包围车臣首都格洛斯尼期间，国营电视网表现出相当高的自主性，结果这个电视网的重要人物遭到谋杀；一位著名的异议人士公开指责滥用国家权力，同一天，他儿子就在一场离奇车祸里死亡。这一切似乎是一种协调一致的行动，目的是要在总统选举之前，让独立自主的媒体消音或

第八章 看不见的巨手

害怕。

索罗斯的一位朋友告诉索罗斯，他看不出独裁——如果独裁逐渐形成——为什么不能与强盗资本主义相容？事实上，这就是法西斯主义的根本精神。

这是很深入的观察，但是索罗斯认为他不能认定法西斯主义在俄国一定会获胜，人民不会不经过一番战斗，就放弃刚刚得到的自由，媒体已经播出进攻车臣凄惨之极的景象，大家深受震惊，就像波希米亚的血腥景象让西方舆论震惊一样。事实上，那种影响大多了，因为俄罗斯人第一次看到这种景象，索罗斯认为，俄罗斯大众不会起而行动，他们会保持长久以来受苦受难和被动的态度，但是他的确预期媒体会用救世主的热忱，为辛苦得来的自主性奋斗，难怪最近的暴行都针对和媒体有关的人士。

索罗斯说：“如果没有对应的压力，他们很可能无法抵抗。”

但是，对应的压力要从哪里来呢？索罗斯认为，首先要从外国来。俄国人很在乎世界各国对他们的看法，叶利钦本人就很在乎，他可能受到一小撮小人包围控制，但是他对这一点不会高兴。德国总理科尔为车臣，打过很多次电话给他，他也尝试回应，不幸的是，他的命令没有人服从，这就是人们看到叶利钦宣布停止轰炸车臣却毫无效果的真相。科尔表现出真心的了解，并且关心俄罗斯的内部情况，索罗斯希望他可以替自己的政府说同样的话。

另一个角色，就是军方的重要性还没有被人正确了解，军方到目前为止，一直置身于政治之外，但是车臣事

极限投机

件是巨创痛身的经验，司令官拒绝服从命令，装尸体的尸袋大量送回国，军方现在有很深的裂痕，而且深受伤害，当军事政治化时，事情会发生得很快，而且会深刻的改变政治版图，这就是西班牙内战爆发之前所发生的景象，也是今天在俄罗斯即将发生的事情。

所以，索罗斯预言会发生内战，他预期军方会扮演比以前积极的政治角色，而且无论谁取得国家的控制权，都要遭遇抵抗，至于情势会不会恶化到全面内战，就无法预测了，几乎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内战也有可能。有一件事情可以肯定，就是政治上的不稳定对投资不利，这就是至少在近期内，他相当不看好强盗资本主义和法西斯独裁的原因，不稳定程度逐渐升高的可能性大多了，他们正接近索罗斯提到黑洞时心里所想到的状况。

投资就是革命

很多人仍然不明白，索罗斯在这种状况下居然想去投资。1994年的情势很不相同，那时索罗斯预期到今天会发生的情势，但是，强盗资本主义的兴起出乎他的预料，也不符合金融市场的正常规律，正常情况下会先建立法治基础，其次是外国的直接投资，最后是外国组合投资的发展。在这个情况下，秩序正好相反，外国的组合投资先来，成为强盗资本主义兴起的触媒，索罗斯看了之后，可以认清这种情形，瑞士信用银行波士顿第一公司的波理斯·乔丹协助开发这个市场的方式，让索罗斯特别动容，乔

第八章 看不见的巨手

丹不像某些其他对手一样，乔丹没有设法垄断市场，而是留给别人一些余地，并且设法发展制度化的基础结构，这点让索罗斯想到，自己年轻时率先开发瑞典和其他市场的情形，他不想待在场外观看。但是因为许多个原因，包括他禁止在自己设有基金会的地方投资，以及牵涉到的角色转换问题，他的行动慢了一些，不但没有先进先出，反而是最后进最先出，不但没有获利反而亏损。

他会想，他投下了大量资金，光是国际科学基金会就让他花了1亿美元以上。如果俄罗斯完蛋，这些钱可能大部分都会被浪费掉。

但是索罗斯告诉他的朋友，他预测会有现在这种情势变化，他正尽力防止现在这种情势变化，而且在这方面他没有遗憾，即使他的行动没有成功，也值得尝试，因为关系太重大了；但是现在他预期中最糟糕的状况已经出现，他不知道该怎么办。他不能撤出资金，撒手不管，因为这样做，就等于是在他想支持的人最需要的时刻背弃他们，同时，这样偷鸡不成反蚀把米让人厌恶，他陷在弄巧成拙的陷阱里，他用社会团体死后还有生命的想法安慰自己。不论近期内俄罗斯发生什么事情，他们播下的种子当中，有一些可能会生存下来。

有人问索罗斯里是不是想脱身，他回答：“不是，奋斗还没有结束。”

但是索罗斯在投资上会做停止动作。

他投资是为了获利，行善是为了一个大目标，即使最后变成无谓的目标也一样。他现在不能退出，他有一个策

极限投机

略，会随着情形的发展而进行调整。

国际科学基金会本意是一次完成的紧急行动，用1亿美元在经济失序时期，挽救用国际标准来看也很杰出、而且在前苏联是独立思考和行动主流的科学界。

这个科学基金会已经完成任务，原定两年用完的资金，在一年半内统统拨完，这个计划备受赞扬，因此各个有关的政府——俄罗斯、乌克兰和波罗的海国家——都提供对等基金，要索罗斯继续进行。他接受他们的建议，承诺拨出额外的资金，供1995年使用，但是除非他也能从西方得到对等基金，否则不会把计划延伸到1996年。

索罗斯认为他居然是西方国家中唯一支持俄国科学界的人，的确很不恰当，欧美政府计划所分配到的资金没有利用时，他这样做尤其不恰当；科学家敦促他去游说，争取政府的支持，但是他拒绝这么做。让他们去游说！索罗斯已经慢慢地缩小作业规模，国际旅行计划已经结束，晚一年开始的科学教育计划也适用同样的策略，除非有外界支援，否则会在一年后结束。但是他打算继续供应国际科学学刊，因为这些发行人提供索罗斯认为优惠的条件，在他看来好比提供对等基金一样；他会保留刚刚开始加速推动的国际网络计划，即使他没有得到外界的支援也会继续推动，因为他认为在建立开放社会的先决条件方面，这个计划至为重要。

目前索罗斯设法尽量推动人文教育转型计划，基金会今年要印几百万本教科书；他也会继续努力维持所谓的“厚书”计划，这种文化书籍在俄国历史中扮演至为重要

第八章 看不见的巨手

的角色；他也准备推动支持文化、公民社会和媒体的新计划，但是规模没有俄罗斯期望的那么大，只要公民社会支持这些基金会，而且主管官署容忍他们，索罗斯打算沿着这些路线继续努力，但是对于前景，他却觉得很沮丧。

索罗斯深信局势本来可以有不同的变化，在减缓苏联的分崩离析，并且在封闭社会崩溃前奠定开放社会的基础，完全是西方民主国家力所能及的事情，只需要针对戈尔巴乔夫的开放和改革政策，提供若干积极的强化措施就行了。他极为渴望这一点，他有一种天真的想法，认为只要他打开一道门，自由世界就会拥进来协助，但是西方政府缺乏远见和政治意志。1989年春季，索罗斯在波茨坦的东西方安全会议上，提议推动新版的马歇尔计划，这次主要由欧洲国家出钱，根据《法兰克福大众日报》的报道，他的建议得到的反应是好笑，要是大家严肃一点看待这个建议，历史应该是另一番局面。

他并没有高估西方干预的力量，毕竟这是苏联的内政。

早在1988年，他就向苏联当局建议，设立一个团体，研究在苏联经济中建立一个所谓的“开放部门”，他当时没有今天这么著名，实际上那时他是无名小卒，不过他还是得到积极的回应，必须承认苏联当局的合作顶多是随便应付，但是他一坚持，总理利兹科夫就立刻下一道命令，强迫有关的官员配合，当然，结果不好，他想在中央计划经济中创造一个市场导向的部门，这个部门和消费者的关系不会太疏远，在生产环节中也不会太下游，如食品加工

极限投机

业。他心里想的是在中央计划经济的母体里，孕育一种市场经济的胚胎，但是没有开过多少次会，他就发现母体病入膏肓，不可能培养健全的胚胎。

他这样是不是自相矛盾呢？如果中央计划在 1988 年已经越走上末路，西方的援助能够有什么成就呢？索罗斯认为，这可以延缓分崩离析的过程，可以让人民有一种物质改善的感觉，并且建立对经济改革的支持。这样不会花多少钱，例如，引进卫生棉条，应该会在妇女当中激起很大的欢迎热忱，她们到那时为止，都必须依赖最原始的卫生产品；或者引进新奇电子产品，应该会鼓励比较年轻的一代，在他所提到的这个时期里，苏联仍然拥有这一流的还债信誉，因为苏联始终都准时支付债务，在这些年月里，苏联借了数百亿美元。

但后来，为什么这些钱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这是因为贷款没有附任何条件，说得更正确一点，所附的条件，意在使贷款国有利，而不是对借款国有利，德国借几十、几百亿美元，目的是要获得戈尔巴乔夫同意德国统一。索罗斯记得意大利拨出 50 亿美元的融资，以便推展意大利的出口，出口商必须支付 5%，给目前身陷囹圄、当时是意大利外交部长的吉安尼·米奇利斯的兄弟。但是没有人考虑到对苏联经济的影响，如果贷款国坚持，他们可以规定任何条件，苏联当局急切地希望有人告诉他们怎么做，索罗斯和“开放部门专案小组”在一起时就看出这一点，他当然没有资格规定条件，因为他没有借他们几十、几百亿美元，但是他一定会规定条件，一定会要求遵照办理，

第八章 看不见的巨手

那是应该多管闲事的年代，对方一定会感激。

这样很可能没有效，当时什么事情都没有效，一定会功败垂成，但是也一定会有一些正面的结果，而这种结果可能改变历史的方向，戈尔巴乔夫所缺少的，就是一点点小小的成功。

这样做有可能让苏联不分裂吗？这样做符合大家的期望吗？

索罗斯确信苏联最后一定会瓦解，但是他深信如果过程慢一点，有秩序一点，应该会比较好。看看大英帝国的分裂，整个过程花了半个世纪才完成，其中并非毫无冲突，但结果几乎全部都是有利的。

不过，与前苏联相比，英国是西方民主制度的摇篮。这更表明苏联需要更多的时间分裂，如果索罗斯今天说苏联不崩溃比较好，就像说南斯拉夫不崩溃比较好一样，一定会让他自己不受欢迎，不过有更多时间的话，就有可能使苏联从计划经济转型为市场经济，要求市场的呼声一定会出现。举例来说，最后一定会有一个独立的乌克兰，但是应该要经过比较长的时间，才发生这种事，这要乌克兰独立时，应该会变成比较稳定和比较健全的国家，胚胎都需要9个月的时间，才能变成健康宝宝生下来，从苏联分裂出来的新国家，都没有足够的时间发育，他们全都是早产儿，不由得让人怀疑他们能不能生存下去。

索罗斯大力支持所谓的夏塔林计划，夏塔林计划就是

极限投机

大家熟知的“五百日计划”，他从计划一开始就参与其事，专案小姐成立当天，他和戈尔巴乔夫的经济顾问尼古拉·皮特拉可夫见面，他提供一群著名的国际经济学家来评判这个计划，还赞助一群律师协助设计所需要的法规，并且带领计划起草人组成的代表团，由格里哥里·雅夫林斯基当团长，把他们带到华盛顿，参加1990年国际货币基金和世界银行的联合年会。夏塔林计划的要旨是从苏联手中把主权转移到所属的各个共和国，但同时把主权的若干要素，从各个共和国手中，转回到新成立的独联体手中，理论上，要用比较像欧洲联盟的新联邦取代苏联，实际上，是要让独联体这个新权威对抗苏联的旧权威，因为旧的政治中心几乎遭到普遍唾弃，新的政治中心靠着对抗旧中心，应该会得到普遍的支持。

这是个高明的政治观念，但是没有被人正确了解，这个计划要是得到国际支持，索罗斯确信戈尔巴乔夫一定会采用，即使没有西方的支持，也是一触即发的局面。他记得雷昂尼德·阿巴尔金对他吹牛，说他怎么说服戈尔巴乔夫反对这个计划，他说他在12个共和国组成的国协会议中，会成为第13位成员，除了他之外，每一个成员都有一块确定的基础疆域，因此他会成为新国协会议中最没有权力的成员。这种说法当时占上风，但是一年以后，叶利钦利用俄罗斯作为权力基础，推翻戈尔巴乔夫，解散苏联。如果戈尔巴乔夫接受夏塔林计划，他可能还在掌权，苏联可能会改革，而不会四分五裂。

苏联解体后，索罗斯没有参与俄罗斯的改革过程。他

第八章 看不见的巨手

和耶戈·盖达尔是朋友，随时准备协助他，但是他很早就断定改革走上了错误的道路。1992年4月，他发现俄罗斯企业应收帐款增加的速度，大约只有工业生产速度的一半，这点表示，大约有一半的生产没有接受货币控制，而货币控制是盖达尔政策的基础，一半企业不理睬货币讯号，继续根据“国家命令”的旧制度生产，而不管是否收到帐款。这是令人震惊的发现，盖达尔某一天晚上来纽约看索罗斯时，索罗斯质问他这一点，他承认确有其事，那一周稍后，他在华盛顿发表一篇充满乐观、令人振奋的演说，他开始公开主张，西方援助应该有条件，要和创立社会安全网结合为一，这样应该能够让俄罗斯政府迫令不遵守货币信号的企业破产，但是，他的建议没有多少效果。

索罗斯所支持的政策似乎都没有实施，这样的事实确令人失望。但是他可以独力实施的政策成功了，他设法在一个先导计划中，证明社会安全网的建议正确，这就是国际科学基金会的由来，他们对大约3万名科学家，每年分发五百美元，他很满意这个计划成功了。私底下他建议过对军官实施同样的计划，但是他不愿意提供资金，这个计划可能要花5亿美元，但是应该会大有影响。

索罗斯严厉批评西方的政策，今天他会国际货币基金作什么建议呢？

他不愿意替他们设想，不过话说回来，他也不很喜欢他现在的状况。

他认为，想真正影响俄罗斯的时势发展，为时已晚，俄罗斯人过去对西方期望过高，但是现在他们已经失望

极限投机

了，不存一丝幻想，索罗斯的影响力已经大大降低，即使是进步分子也变得反西方。开放政策的设计者和国营电视前董事长亚历山卓·雅科夫列夫，就曾经对索罗斯痛切抱怨过美国的政策。

把住历史的脉搏

但是索罗斯仍然积极参与乌克兰的工作。乌克兰是他可能发挥影响的地方，而且他尽最大的力量去追求，这是他第一次不觉得沮丧，他有一种成就感。从1989年到现在，西方强权第一次做出正确的事情是在1994年那不勒斯高峰会联合公报中，西方工业强国承诺：如果乌克兰推动改革计划，他们要提供40亿美元的援助，这种承诺正好配合新选出的总统雷昂尼德·库奇玛。

前任总统雷昂尼德·克拉夫丘克知道乌克兰的问题超出他的处理能力，他连试都没有试。他只想继续掌权，在狂暴的大海中随波逐流，他觉得机不可失，就从集权路线改走民族主义路线，这个方法有一阵子管用，他当选总统，得票率之高，几乎超越任何其他的总统——超过60%，为了维持声望，他玩弄黑海舰队和其他民族主义问题的冲突，但是经济崩溃使他声望大大的降低。

库奇玛这个人很不一样，他在军事工业部门一家重要企业里当过经理，具有解决问题的倾向，他明白照当时的情形下去，乌克兰不可能以独立国家的身分继续生存，他决心要采取一些行动，那不勒斯高峰会给了他一条生命

第八章 看不见的巨手

线，他决心抓住这个机会，他对市场机能没有深入的了解，但是，他很清楚 40 亿美元可以帮忙乌克兰做什么，因为那就是乌克兰进口能源的费用。在这种情形下，经济援助承诺做到了应该要做的事情，就是改变经济政策的方向，主要的功劳属于美国财政部高级官员，他们在联合公报里写下实际的数字。

乌克兰当时是极不稳定的国家，现在仍然如此，乌克兰的经济崩溃远比俄罗斯严重，部分原因是乌克兰缺乏能源，另外部分原因是没有认真尝试总体经济稳定或结构改革计划。根据索罗斯的盛衰理论，这样其实更容易使主导方向改变，他很有资格协助乌克兰，他也迅速出面，提供协助，他安排专家，组成一个小小的团队，由安德斯·艾斯伦率领，负责协助乌克兰发展自己的经济改革计划，并且和国际捐助单位打交道。他们的合作很成功，因为合作是以互信为基础，而且他们在破纪录的最短时间内，和国际货币基金签订了初步协定，但是成功还完全不能确定，运作过程随时可能出轨，而且索罗斯已经发挥了好几次影响力，把列车拉回轨道上来，但是索罗斯强烈感觉乌克兰已经走在正确的方向上。

不过，索罗斯对乌克兰改革计划的成功完全没有信心。他可以看出若干明显的缺点。就改革计划的现状来说，和 1992 年的盖达尔计划一样，遭遇到相同的问题：货币的发行虽然受到相当好的控制，但是国营企业的预算和行为仍然不受控制，花钱的部门会继续花钱，企业继续赤字经营，负债继续累积，工资和应收帐款根本都没有支

极限投机

付。这种情形不能长久维持，但是可以改正，所需要的是结构改革，索罗斯希望改革不会很久之后才出现，和盖达那个时候相比，他可以做比较多的事情，而不是只能预测失败而已。

这点对索罗斯是新的经验。而且这种经验令人满意。可为什么这件事要花这么久的时间才出现？索罗斯从1988年就在努力了。因为要花时间才能赶上革命性的变化，这点适用在国际主管机关上，适用在乌克兰人身上——例如乌克兰这个团队的主要角色罗曼·施佩克，他是豪利理新商学院最初的毕业生之一——这一点也适用在索罗斯自己身上。

但是索罗斯对于比别人更了解革命性变化很自傲，要证明他有资格协助，需要花时间，他也学会变得比较冷静和等待时机，早年他太热心，每个机会都想把握，现在他准备随时撒手不管或撤退，他不需要什么功绩。

他在其他国家像这样亲身深入参与的事也有，那是在马其顿。在巴尔干半岛诸国中，马其顿是最后一个还继续生存的多种族民主国家，马其顿能够以独立国家的身分继续生存，完全是因为有一个奉行开放社会的政府，不然的话，马其顿人和阿尔巴尼亚人之间的种族冲突，早就把这个国家撕为两半了。马其顿是希腊封锁的受害者，希腊是欧洲联盟的会员国，西方民主国家应该来协助马其顿，但是他们没有这样做，美国在那里派驻一些维持和平部队，但是没有提供任何经济援助。索罗斯填补了这个空隙，提

第八章 看不见的巨手

供 2500 万美元的贷款，让马其顿购买石油，也提供空运补贴，好让马其顿出口早生蔬菜。他也继续鼓吹各国对马其顿采取比较有建设性的政策，但是没有什么效果。

马其顿经济恶化时，种族关系也随之恶化，最近其紧张关系已经到达即将爆发的时刻，阿尔巴尼亚族裔的激进分子未经政府许可就建立一所所谓的大学，这是政治上的挑衅行为，目的是像阿尔巴尼亚人在科索沃所建立的组织一样，替阿尔巴尼亚族裔建立一种类似的非法平民机构。索罗斯亲自请求戈里格洛夫总统不要受到挑拨，但却不受采纳，他派出警察去处理，造成若干伤亡。现在阿尔巴尼亚族裔和马其顿族裔都变得越来越激进，住在阿尔巴尼亚族裔地区的马其顿族裔居民，逐渐倾向采用米洛塞维奇在科索沃处理阿尔巴尼亚族裔问题的方法。

政府没有提供坚强的领导，情势随时可能恶化，索罗斯觉得忧心忡忡，在提出早期预警和预防方面，没有人比他更努力，但是这样仍然无济于事。他可以看出巴尔干半岛的第三次战争正在酝酿，但却不知道该怎么办，他打算去马其顿，呼吁他们做出更高明的判断，但是他有点怀疑他们是否有比较高明的判断。

索罗斯认为民族主义崛起是这个地区最大的威胁。集权主义代表全面封闭社会的理念，这种理念已经失败了。全面开放社会的理念有小小的立足机会，但是需要自由世界的开放社会支持这个理念。和封闭社会相比，开放社会是比较进步的社会组织形态，没有外界的有力援手，不可

极限投机

能在一次变动当中就完成其转型。西方民主国家缺乏远见，机会已经丧失。全面封闭的社会已经崩溃，没有一种具有统合能力的新原则取而代之，全面性的理念通常都声名狼藉，人民最关心个人的存亡，只有在他们的集体生存受到实质威胁，或在想象中受到威胁时，才可以煽动他们起来支持一个共同目标；不幸的是，这种威胁不难制造，种族冲突可以用来动员人民支持领导人，并且创造特别封闭的社会。

有人认为民族主义是普遍的威胁，这个问题有一点自我矛盾，因为从定义上来看，民族主义应该是特殊性的，但是民族主义有一个普遍的特点，就是有传染性。在缺乏人权或文明准则之类的普遍理念时，民族主义会蓬勃发展，民族主义和种族冲突兴起，代表缺乏国际法和国际秩序。从这点来看，民族主义是普遍的。

就苏联来说，索罗斯相当悲观，因此有人听到他对中欧国家表示乐观时，觉得很惊讶，他对东欧的展望确实胜过前苏联；但是在人们看来，他们走向市场经济和自由社会的步伐却不很确定，而且不是不能逆转的。

人们的这种态度也让索罗斯很惊讶，集权制度已经消失，这些国家除了斯洛伐克之外，都坚决奉行民主制度和市场经济。他主要关心的是，欧洲联盟是否有足够开阔的胸襟来接纳他们。

在匈牙利，社会主义自由主义联合政府成立时，索罗斯包着很高的希望，但是他对总理吉拉·何恩有点失望。

第八章 看不见的巨手

因为何恩没有改变。索罗斯大约在 1987 年认识他，那时他认为何恩是政府中最有活力的人，到 1989 年，因为情势已经改变，他却没有变。匈牙利最大的问题是债台高筑，这些债务是卡达尔当权时积欠的，何恩的政治态度就是在那个时期形成的，他把那种态度带到他现在的职位上，希望靠着借更多的债务，维持经济成长。但是这个做法已经失灵了，匈牙利在墨西哥之后面临金融危机，这个危机极为明显，所以索罗斯认为这么公开说出来，也不会有什么伤害。

索罗斯曾经提出一个解决债务问题的方法。那是在 1990 年选举时提出的，他看出一个机会，可以和前政府积欠的债务划清界限，在断绝的时代，合法被非法政府取代时，或许可以采取这种行动，但是机会已经失去，不会再出现。

现在已没有可能得到纾解债务的机会了，旧债和新债已经纠缠在一起，银行债务已经被市场债务所取代，连谈这个事情都有可能使事情变得更糟，同时，在目前这种市场状况下，索罗斯不知道匈牙利要如何重新融集偿还债务所需要的资金。

有人说，这岂不是和索罗斯先前所说的乐观抵触吗？索罗斯说：“不见得，我认为匈牙利在政治和经济上都有成就，匈牙利像很多其他国家一样，有严重的债务问题，由于国际投资突然急速减少，使这个问题变得更严重，这样很可能迫使匈牙利采取一些本来可能延后实施的痛苦措施；如果匈牙利这样做，我希望德国会拯救匈牙利，因为

极限投机

德国特别亏欠匈牙利，但是金融危机可能摧毁这个国家，所以有理由抱持审慎的态度。”

波兰没有严重的债务问题，因为波兰已经还清旧债，现在的债务也经过重新安排偿债日期，索罗斯认为波兰是欧洲今天最健全的国家，波兰经济正在成长，但是更重要的是，波兰有正确的精神。在他的印象中，波兰公职人员比较不腐化，和很多其他前东欧国家相比，波兰的人民也比较关心公共的利益，他对于他在波兰设立的基金会散发出来的知识性气氛，印象特别深刻。但这是很奇怪的看法，因为大多数人认为捷克和匈牙利走在波兰的前面。

他们可能是走在前面，但是波兰迅速地赶了上来。索罗斯对改革的速度和方向很有兴趣，他唯一担心的是政治情势可能使波兰丧失动力，以团结工会为基础政府才刚刚发愤振作起来，选民就抛弃了他们。

很多人会说捷克的进步最大，尤其是在割舍斯洛伐克之后，更是如此。毫无疑问的，捷克因为和斯洛伐克分开而获益，但是捷克的收获是欧洲的损失，麦西亚正尝试要把斯洛伐克和俄罗斯结合起来，他的野心是想成为新俄罗斯帝国第一个前哨，如果他成功了，这对欧洲是恶兆，因为斯洛伐克会成为指向欧洲心脏的短剑。

罗马尼亚也会变成问题地区吗？索罗斯认为不见得，罗马尼亚是残破的国家，没有成为开放社会的先决条件。罗马尼亚拥有前政府人士组成的政权，不幸的是，这个政权觉得有必要和一些极端民族主义的党派联合，这样就带

第八章 看不见的巨手

来问题的种子。但是问题可能会受到控制，因为罗马尼亚政权不希望切断和欧洲的关系，民主势力很脆弱，但幸运的是他们从来没有机会治理这个国家。

他们没有准备好，而且他们会像保加利亚的市场经济人士一样，一定会失败，或是像捷克的异议知识分子一样。他们需要时间成熟，索罗斯也看出一些成熟的迹象，他们已经比较愿意合作，不是每一个人都必须成为大富翁，但是他们剩下的时间没有多少了，随着新的经济和社会结构出现，选举再也不会由理念决定，而是由选举经费和对媒体的控制决定。下次选举会很重要，如果市场经济人士没有任何进展，他们可能永远被冻结在权力之门的外面。

随着国家的不同和时间的不同而有所不同。中欧国家需要的是欧洲的市场和欧洲联盟会员国的席位，罗马尼亚在建立民主制度和独立媒体——特别是电视方面——需要协助，一般说来，越往东、往南走，越需要技术援助和其他形式的援助。

索罗斯曾经严厉地批评西方的政策，他认为援助的分配应该改善，问题是技术援助由官僚负责提供，伴随而来的是官僚所有的不利特性，官僚有时候是很高尚、很有善意的人，但是他们受到规定限制。索罗斯在基金会里曾经开玩笑说，西方援助是计划经济里最后的残存部分，因为援助的目的是要满足捐助国的需要，而不是满足收受国的需要，索罗斯的基金会尝试颠倒这种秩序，方法是设法因应有关国家的需要。在乌克兰，他们的技术专家替乌克兰

极限投机

人工作，由乌克兰人选择，而且乌克兰人可以解雇他们；但是随着基金会逐渐官僚化，这个笑话也逐渐适合自己。

他把整个情形说明如下：西方援助经过三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他们应该提供援助，但是没有提供；到第二阶段，他们承诺要提供援助，却没有实现诺言；到第三阶段，他们送出援助了，但是援助已经发生不了效用。他们现在正处在第三阶段。

索罗斯的基金会在分配援助方面，发展出一种很有用的观念，就是你必须找到你能信任的当地伙伴，你必须授权他执行任务，但是你最好保留资金的控制权。

索罗斯认为自己改变了东欧的市场，要是他没有去那里，东欧的经济会有不同的局面。

索罗斯能设想在某种情况下，会让他从某些国家撤退，这很容易。他很惊讶的是到现在都还没有发生过，随着地区性的冲突蔓延，他们在某一国的立场可能会引起另一国不快，通讯和旅行可能会受到更多的限制。但是他不会自愿离开，他的人遭到的压力越大，他越坚定地支持他们。冷漠反而比较可能叫他们走路，在布拉格的情形就是这样，那里的基金会既不受到攻击，也没有得到支持，不过最近基金会有了一些复活的迹象。

他们也可能因为钱用光了，面临结束的局面，不过那最少是8年以后的事情了。除了中欧大学之外，索罗斯不希望他的基金会永远延续下去。

第九章 奇谋怪论说欧美

第九章

奇谋怪论说欧美

后冷战政治

索罗斯最近说他把注意力从东欧转到西方。这是因为东欧的制度变化已经满5年，在高潮时期，几乎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他尝试抓住时机，但是整体来说，结果并不符合他的期望。目前出现的形态并不是开放社会的形态，趋势反而是往相反的方向走，他并没有放弃希望，但是他承认趋势已经决定，要花很长的时间和费很大的力量才能改变方向。

同时，另一个制度变化逐渐开展，和前苏联发生的变化相比，大家还没有认清这种变化，冷战时期稳定的世界秩序已经瓦解，但却没有新的秩序取而代之。大家现在都知道发生在前苏联的变化，却大都没有注意到国际关系发生的革命性变化，受到苏联制度崩溃直接影响的人，不能

极限投机

不了解自己生活在革命时期；世界其他地方受到的直接影响则比较小，因此要花比较长的时间，才能了解世界秩序所发生的重大变化。

冷战不是很有吸引力的秩序，但是其中具有很大的稳定因素，由两个超级强权，代表两个完全相反的社会组织形态，彼此陷在你死我活的战斗当中，但是他们被迫尊重彼此的重大利益，因为他们在保证互相不毁灭的状况下行动。

这种制度已经结束，因为其中一个超级强权从内部瓦解了，没有新的制度取而代之，瓦解的过程继续进行，毫不衰退，现在更从苏联蔓延到大西洋同盟，瓦解的原因，是自由世界的开放社会里没有真正信仰开放社会的观念，他们不愿意为开放社会观念的胜利努力，并且做出必要的牺牲。索罗斯在东欧的目标是提倡开放社会的观念，现在他觉得他必须把注意力转到整个世界。这是非常有野心的目标，有人问他：“你打算怎么做？”他摊摊双手：“老实说，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把自己的注意力局限在东欧是不够的，东欧从封闭社会转型到开放社会失败了，因为自由世界没有提供足够的支持。我以为我在前面带头开路，别人就会跟过来，但是现在我回头一看，发现后面其实没有人，我问自己：到底出了什么差错？”

或许他太理想化了。他也承认，但是，他不相信自己高估了理想的重要性，人拥有信仰才能推动世界，问题是大家根本不相信开放社会是值得奋斗的目标。

索罗斯多次说过开放社会的观念太复杂，充满太多的

第九章 奇谋怪论说欧美

矛盾，不能作为统合的原则。大家可能愿意为国王和国家奋斗，可能准备自卫、对抗实际或想象中的民族或种族迫害，却不可能起来保卫开放社会。如果对这一点有任何疑问的话，波希米亚就证明了他的说法。他认为波希米亚出了问题，而且，这个问题太大，他只能把答案限于西方世界的行为上面。情形很清楚，西方人民不了解波希米亚冲突的真相，这不仅仅是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和波希米亚回教徒的内战。从深一层来看，这是种族和公民社会观念之间的冲突，正确地说，这场冲突让塞尔维亚的乡下居民和萨拉热窝及波希米亚其他城市的居民对抗。

比较不清楚的是，不知道是有意还是无意，人们并不了解真正问题所在。毫无疑问，一些决定不介入的西方国家政府深感困惑，有很多人轻率地谈到，巴尔干半岛是种族冲突频繁的混乱地区，这种说法违反 400 年来，三个民族和四种宗教在萨拉热窝共同存在的事实；但是西方国家政府也缺乏真正的了解，处理这个问题时也很无能，因为他们没有学到在开放社会与封闭社会的架构中思考、处理这类问题。

职业外交官和政客习于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他们的心智上没有准备好，不知道怎么处理南斯拉夫这种国家分裂的状况，他们首先尽一切力量维持南斯拉夫的完整。在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脱离南斯拉夫之前一周左右，美国国务卿贝克访问贝尔格莱德，不久之后，索罗斯和美国驻南斯拉夫大使华伦·辛默曼见面，他告诉索罗斯，只要南斯拉夫在 6 个月之内举行联邦选举，即使南斯拉夫军队

极限投机

想用武力维持南斯拉夫的统一，美国也不可能反对。

事实证明南斯拉夫不可能维持统一时，国际社会尝试把组成南斯拉夫的六个共和国，当成已经全面发展完善的国家一样对待，这一点，德国人要负最大的责任，因为他们坚持要承认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这样等于强迫波希米亚和马其顿选择独立，因为他们如果不这样做，就会成为拥护种族原则、以塞尔维亚人为主的国家的一部分。

承认波希米亚和马其顿，并且接纳他们进入联合国之后，国际社会就背负若干义务，然而，在关键时刻来临时，国际社会又不愿意承担这些义务。就这一点，责任转到英国身上，种族灭绝这种恐怖之至的景象在电视上出现时，英国正担任欧洲联盟的主席；西方国家政府知道这件事已经有一段时间，却刻意压制这种信息，英国政府不能坐视不管，但是他们决心不要军事介入，他们想出来的解决之道特别邪恶，他们建议派遣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去，但那里并没有和平可以维持。英国人知道自己的所作所为，而且从头到尾坚持一贯，美国和法国则在权宜和崇高的原则之间徘徊。

结果造成西方民主国家历史上最可耻、最让人沮丧的经验，联合国部队得到的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他们的任务是对城市居民分发人道援助，为了达成任务，他们必须得到所有交战团体的同意和合作，这点迫使联合国部队在侵略者和受害者之间保持中立。他们的行为像集中营里的警察一样，只举一个小小的例子，他们不让外界的邮件送到萨拉热窝的城市居民手上，这是无法无天的做法。

第九章 奇谋怪论说欧美

不同的司令官反应也不相同，法国莫理龙将军超越职权，保卫格拉兹迪的人民；英国司令官罗斯爵士则设法找波希米亚人的麻烦，以便证明他采取的是中立立场。这种情形比慕尼黑协定还糟糕，因为慕尼黑协定是事实发生前的姑息，而波希米亚的情况是事实发生后的姑息。

在慕尼黑协定的羞辱之后，索罗斯他们准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暴发几十年之后为自由民主和开放社会而战，他们的自由观念很一致，他们的目标不只是保卫他们的国家，也要把这些理念散布到世界各地，他们在对抗以前的敌人德国和日本方面，表现相当好，而且他们相当坚决地对抗集权主义的威胁，但是在这些帝国瓦解之后，他们似乎丧失了方向。

索罗斯相信他们的自由观念观变了，由比较狭隘、追求自利的观念取代，这一点表现在外交政策上，是地缘政治现实主义的兴起，在经济上，是自由放任的理念抬头。地缘政治现实主义认为，国家最好依据地缘政治地位追求本身的利益，坚决奉行共通的道德原则是一种妨碍，在达尔文式的生存竞争中可能导致失败。根据这种观点，在羞辱苏联方面，拥护开放社会的价值观，可能是很好的宣传利器，但是要注意自己不能相信自己的宣传。在经济上，自由放任主义认为，市场参与者自由追求本身的利益，会带来更有效的资源分配；而在达尔文式的生存竞争中，最有效率的经济会获胜。

索罗斯认为这些人不适合，而且有误导作用，他们强

极限投机

调体制内竞争的重要性，但是毫不注意保护体制本身。这些主义认为，大家可以自由竞争的公开社会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是，如果他们能从苏联解体中学到任何教训的话，这个教训就是：绝不可以把开放社会视为理所当然的事情。封闭社会崩溃不会自动促成开放社会的诞生，自由并非只是没有压制，开放社会并非只是没有政府的干预，开放社会是很复杂的结构，以法律和制度为基础，需要某种思考方式和行为准则。这种结构极为复杂，所以很难看见，容易被视为理所当然，在封闭社会里，权威的角色无所不在，随着社会越趋开放，权威干预的程度越来越少，他们这么容易忽略开放社会赖以维持的结构，原因就在这里。但是过去 5 年的经验显示，要为开放社会催生有多么困难。

所以索罗斯认为集权国家不能演进为开放社会，西方国家要负责。不过应该承认：即使西方国家做了一切正确的措施，这个过程也一定是很漫长，很艰苦，当中会有很多错失，但是至少集权世界会走在正确的道路上，而且更重要的是，西方民主国家也会有一种方向感。欧洲特别需要东欧来丰富本身的精神道德和情感内涵，西欧因为没有和东欧结合，目前正在沉沦。欧洲联盟是一团乱局，由复杂的规定和官僚机构构成，欧洲联盟的理想曾经鼓舞人民的想象力，尤其是德国和法国的年轻人，其他国家的年轻人也一样，都觉得能够克服历史上的歧见，属于同一个政治实体是好事；现在他们却越来越不满，所有的投票形态都显示出这一点。

第九章 奇谋怪论说欧美

索罗斯曾经说过欧洲以后会分裂，他在1993年9月，就这一点在柏林发表过演说，当时他说的一切似乎都成真了，看看过去所发生的一切变化：一方面，一些新国家纳入欧洲联盟；另一方面，英国政府几乎完全变成妨碍者。

德国现在向东看，法国向南看，完全是因为两国下定决心，坚持彼此不争执，才得以维持欧洲的团结。现在货币制度之间的紧张再度上升，不久之后，大家会开始主张应该免于受币值低估的货币侵害，共同市场的生存又会成为问题，这只是时间的问题而已。

同样，美国正遭遇严重的认同危机，美国过去是两个超级强权之一，也是自由世界的领袖，这两个名辞是同义字，可以交替使用，但是苏联崩溃改变了一切。人们可以称他为超级强权，也可以称他为自由世界的领袖，但是不能同时具有两种身份。美国缺乏维持这种主导地位的经济实力和经济利益，它不再是国际贸易和金融制度的主要受益者，它没有力量担任世界警察。在19世纪大部分时间里，英国拥有凌驾一切的地位，是世界金融、贸易、航运和保险中心，英国拥有一个散布全球各地的殖民帝国，有力量维持庞大的舰队，以便派遣到任何出问题的地方。美国今天拥有军事力量，但是既没有经济利益，也没有政治意志，参与遥远地区的冲突，美国可以维持军事超级强权的地位，以便保护本国的利益，但是国家利益是否需要这么庞大的军事经费，值得怀疑。

极限投机

其他国家像日本，躲在美国的军事保护伞下，从美国的超级强权地位得到的利益比美国人自己得到的还多。即使如此，美国仍然不能宣称自己是自由世界的领袖，因为在世界迫切需要干预时，国家利益不能证明美国人需要在许多混乱地区，采取军事行动，他们从索马里撤军；他们在决定是否干预海地时碰到极大的困难；他们甚至拒绝考虑派遣地面部队到波希米亚。他们能够维持自由世界领袖的唯一方法，应该是在联合国的架构下，不单独行动，而是和其他国家合作行动，但是“联合国”这三个字在美国政治上已经变成肮脏的字眼，美国人对联合国的敌意极为强烈，以致他们可能让联合国死亡，而不是把它变成维持世界和平和秩序的有效力量。

索罗斯觉得这种敌意有道理，坦白地说，他和大众的感觉一样，他认为联合国没有效率而且浪费。他在做慈善工作时，只要碰到任何一个联合国机构，他都对他们敬而远之，只有一个例外，就是联合国难民总署。自从干预波希米亚之后，他的观感变得更恶劣。

索罗斯说，这样说不会太过分，但是他还是必须说明，他对联合国组织没有责怪到这种地步，主要的责任落在安全理事会会员国，特别是五个拥有否决权的常任安理国身上，因为安理会只是他们手中的工具，他们决定联合国可以或不可以做什么事情。要进一步追究波希米亚问题的责任，就落在三个西方常任理事国：美国、英国和法国身上，如果这三国能够达成协议，他们可以执行想要的任何政策。

第九章 奇谋怪论说欧美

他们可以运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如果他们想做，安理会可以委托北约在波希米亚维持和平，其他理事国会同意这样做，俄罗斯后来或许会反对，但是在1992年不会反对。联合国秘书长加利写过一封信给安理会，请求安理会不要把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加在联合国部队身上。北约信用卓著，第一次干预时，波希米亚的塞尔维亚人就让步了，但是西方强权各有各的原因，不希望北约负责。

有人以为是盖里反对，索罗斯却认为那是后来的事情，是官僚内斗的问题：谁应负责呢？如果安理会让北约负责，一定不会有问题，照现在这个样子，波希米亚在摧毁联合国方面，比任何其他危机的伤害都大。加利喜欢说波希米亚只是十七个同样重要的人类危机之一，他忽略了一个重点：波希米亚成为西方联盟分裂的催化剂，如果西方不团结，联合国不可能生存下去。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安理会负有维持世界法律和秩序的权力，当初的设计就是要大国彼此达成协议时，能够发挥效用。联合国一诞生，大国之间彼此就争斗不已，联合国一直不能像原先设计的那样运作，反而变成公共论坛，让敌意无法化解的敌对双方开会和谴责对方，争取不结盟国家的支持。只有在极难得的达成协议的情况下，联合国才可以负起监督协议的任务，这是联合国维持和平任务的起源，这种安排唯一的例外可能是朝鲜战争，当时苏联犯了在重要时刻杯葛会议的错误。

接着戈尔巴乔夫上台，他极为相信联合国，人们应该

极限投机

还记得，他到联合国来，并且把苏联积欠的会费全部还清，他对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说，描绘他对联合国的期望，他的期望其实就是回归联合国原始的构想，这是他的计划中唯一经过深入探讨的部分，因为外交部是苏联官僚机构中，唯一真正支持改革的部门。他期望看到北约国家和苏联之间的大联盟，苏联会在政治上支持西方国家，西方国家也应该在经济上支持苏联，使苏联转型到市场经济，这样应该可以让安理会照原来的设计运作，因为强权会合作，但是美国并没有认真看待他的话。

苏联解体，俄罗斯大致是在苏联留下的地方起步，俄罗斯太迫切渴望和西方合作，联合国在历史上第一次可能成为一个有效的组织。这就是波希米亚事件的发生和西方联盟误用联合国，让人觉得这么可惜的原因，他们至少有5、6年的时间，可以让联合国发生作用，但是他们完全错失机会。说波希米亚在联合国命运上所扮演的角色，和1935年阿比西尼亚促成国际联盟瓦解的角色相同，一点也不过份。

索罗斯不能放弃对联合国的希望，正好相反，这样让他更相信他们应该尽一切力量，防止联合国重蹈国际联盟的覆辙。

但是就像索罗斯本人所说的，联合国已经丧失信用，在共和党“与美国有约”当中，有一部分议员正在减少和限制美国对联合国维持和平任务的支持。

美国忽略戈尔巴乔夫带来的机会，又加重他们过去所犯的错误，联合国的失败就是美国的失败，把联合国当成

第九章 奇谋怪论说欧美

与美国无关的独立组织来痛加批评很容易，但是这样根本不正确。安理会设计时，就是要美国和其他常任理事国协调一致行动，才能发挥功能，美国现在成为唯一的超级强权，被赋予领导的责任，如果联合国失败了，原因是他们决定联合国应该死亡。美国应该尽一切力量来挽救联合国。

这样是否和索罗斯本人的话矛盾？

一点也不。美国发现自己处在矛盾的状况中：一方面他们需要一个维持和平与秩序的国际组织，因为他们不能、也不应该担任世界警察；另一方面，现有的国际组织联合国并不适用，因此人们必须发挥他们的力量，使这个组织发挥功能。

索罗斯反复说联合国没有效率而且浪费，这是为什么呢？很简单，联合国是主权国家的结合，会员国遵循自己的国家利益而非集体利益，而且这个组织不是对一个主人负责，而是对很多主人负责，这样更加重官僚组织的缺陷，因为官僚组织的主要目标是生存，有很多主人会促成一种“少做少错、保护退路”的态度，经由自然选择的过程，只有对维护自己工作最关心的人，会在他们的职位上生存下去。但是这种选择一开始就不是自然的，会员国相当无耻的运用赞助者的权力，员工几乎享有最彻底的职业保障，这样几乎使任何事情都做不好。

谈到补救方法，索罗斯认为，没有这么简单，根本原因也就是国家主权无法消除，如果执行人员不对会员国负

极限投机

责，要对谁负责呢？他们不能容许一个自己管理自己的官僚机构存在，以欧洲联盟来说，也像联合国一样遭到大致相同的缺陷，却可以赋予欧洲议会比较重要的角色以作为矫正。但是在联合国方面，考虑设世界议会无异是乌托邦的玄想，因此，唯一的可能是设法让会员国把集体利益放在国家利益之前，但是，这听起来也相当于是幻想。

毫无疑问，联合国需要重大改革。人们不能容许一个只为员工谋福利的国际组织，很多功能早就荒废了，但是没有办法可以结束这些功能，最好的例子是：最后一块托管地独立之后很久，托管理事会仍然继续运作。但是人们不能期望各国政府放弃本身的利益，因此必须动员舆论，对各国政府施压，需要彻底改造联合国的运作方式，但是在很多相关国家根本不民主时，舆论如何施加压力呢？而且要怎么样动员舆论呢？首先，过去有无数的研究探讨改革联合国，但是全都毫无效果，你需要一些像“赞成选择自由”、或“尊重生命权”、或“十全十美”、或“与美国有约”之类简单的口号，索罗斯就正在寻找这样的口号，他会建议用“再造联合国”这个口号。

联合国已经届满 50 周年。一般说来，随着时间流失，组织会腐朽，现在正是重新回到设计室，为这个组织未来 50 年重新设计的时候。要分项实施改革很难，因为改革需要所有会员国同意，因此，改革应该以整批的方式推动，世界主要国家应该合作，提出新的结构，然后邀请其他会员国签署新宪章，就像他们签署原来的宪章一样。其实联合国宪章不需要太多的改变，需要的是组织结构方式

第九章 奇谋怪论说欧美

的再出发，需要一种“日落”条款，以便在现有的争论过时的时候，可以重新出发。

索罗斯认为这是务实的主张，可能不实际，但是可行，年前甚至更可行。

但为什么他不在五年前提议“日落”条款？因为没有人会认真听他的话，事实上根本没有人会听他的话，他那时只是个无名小卒。

至于他现在是否拥护这个建议，他说还没有完全决定，他担心美国本身就可能不签署新宪章，他怀疑如果今天投票的话，美国是否会通过自己的宪法还成问题呢。

他觉得北约应该担任某种角色，他支持北约向东扩张吗。如果北约国家和前苏联组成大同盟，让中欧国家加入北约，纳入联盟的保护伞，应该完全不成问题，即使在苏联解体之后，也可以和俄罗斯一起追求同样的政策，但是西方缺乏远见，和平伙伴计划是这个大同盟注水后的版本，但是这个计划没有发生作用，因为西方不愿意用大量资金援助俄罗斯来支持这个计划。现在一切已经太晚，西方和俄罗斯的关系已经恶化，更糟糕的是，俄罗斯本身也恶化了，西方不可能再推动北约向东方扩张的计划，却仍然能够和俄罗斯保持友好关系。俄罗斯反对北约扩张，1993年夏季，叶利钦访问波兰时，还同意波兰加入北约成为会员国，后来是因为他的将领反对，他才打消同意的念头，从那时候起，俄国的立场就很明白了。

索罗斯认为，不妥协的俄罗斯是错误的，波兰应该纳入北约，但是西方应该尽一切力量让俄罗斯安心，或许可

极限投机

以像北约若干欧洲会员国所提议的，由北约和俄罗斯签订某种形式的条约，向俄罗斯保证这一点。

此外，北约有一个更大的问题，北约为什么存在呢？如果联合国需要“日落”条款，北约更需要。

理论上，北约的原始构想仍然正确，是要作为保护会员国领土完整的防卫协约，但是几乎找不到理由来维持北约，即使俄国变成民族主义的独裁政权，也要花很多年时间才能重建具威胁力量的攻击能力。事实如此，人们可以说，如果俄国变成民族主义独裁政权，而不是变成市场经济国家，想重建那种能力，所需要的时间一定会更长。因此在实际上，很难想象北约国家的领土会遭到任何实际的威胁，相比之下，北约国家疆界之外的状况却很不稳定，而且这种不稳定可能更进一步加剧。因此问题在于北约有没有能力把本身的武力用在疆界之外，但北约在这方面不但缺乏政治意志，甚至也乏政治上的理解。

索罗斯建议北约应该转型，变成保护开放社会价值观和原则的工具，不但在会员国疆界之内这样做，也能运用到北约集团之外。这并不表示这种原则遭到蹂躏时北约应该插手，只表示会员国一致提出这样的要求时，北约应该随时准备行动。开放社会的价值观和原则具有普遍性，如果会员国单独行动，没有一个国家可以把保护这种价值观当作国家利益问题来处理，但是应该当成集体利益的问题来处理，这一点应该成为北约的新任务。要是经过适当规划，波希米亚危机爆发时，北约应该已经做好准备；要是北约真的做好准备，对于波黑的情况，北约就非常可能形

第九章 奇谋怪论说欧美

成强而有力的阻遏，整个惨剧或许就能够避免。

索罗斯认为英国会采取不同的行动，这点可以想象得到，英国决定避免军事干预，原因之一是他们害怕自己会承担责任。美国人说，这是欧洲的问题；德国人受宪法和过去在南斯拉夫的历史限制，一开始就不能采取军事干预，只剩下英国和法国可以行动；英国深深陷在北爱尔兰的泥潭中，即使有心动用武力，也无兵可用，如果北约愿意承担责任，英国或许会尽最大的力量参与其事。但是这样就需要美国贡献地面部队。这就是问题所在，美国拥护崇高的原则，却不愿意动用地面部队，美国必须重新思考自己在世界的角色，如果北约的角色经过适当界定，并且对民众解释，索罗斯相信美国地面部队可以动用，而且应该动用。他认为在集体基础上，把美国军事力量投入世界各地，运用北约这个组织，远比运用联合国适当多了，原因有好多个：第一，北约有由美国创造和领导的，不过未来美国的领导方式可能必须略微修正；第二，北约由心态相同的民主国家组成，联合国的组成分子却复杂得多；第三，北约是一支有效的多国部队，联合国却缺少军事行动成功所需的指挥结构。

新的危机

马克·吐温说过，每一个人都在谈论天气，却没有人采取行动。如果反射理论正确，谈论社会或政治目标，可能是能够有一点作为的方式。具有讽刺意义的是，索罗

极限投机

斯在思考和谈论这些问题时，另一个更接近他的专长领域的问题已经出现，就是国际金融体系已陷入分崩离析的危险，这个危机在他没有注意时出现，但是既然出现了，他会更加注意。

索罗斯认为实际的危机已经成形了，从某一点来看，这个危机类似国际政治制度危机，因为危机没有直接影响到美国，因此美国人并不知觉，这个危机影响到拉丁美洲和其他所谓新兴市场的国家。新兴市场危机是 1929 年以来最严重的一次，只要危机局限于新兴市场，国际金融制度就没有真正的危险，但是，如果危机波及工业国家时，不但金融制度可能崩溃，国际贸易制度也可能瓦解。

这听来好象杞人忧天，索罗斯是故意这样说的。他已经说过，墨西哥危机一定會在墨西哥和美国的贸易收支方面造成急剧的变化，如果正好碰上美国经济衰退，政治上会出现强烈的抗议，可能导致 1996 年选出主张保护主义的总统，这样和 1992 年大崩盘的后续发展就会太相似，让人难以安心。

索罗斯没有预测自由贸易会崩溃，但是可以想象得到，真正的危险在于大家不知危险即将来临，每个人都好象觉得全球金融市场可能走回头路，但这是错误的观念，好比拿金融市场和内燃机之类的科技创新来比较，是一种错误的类推，汽车发明后，像野火一样蔓延，汽车可以改进，甚至可以由更优异的发明取代，但是不可能被废弃，金融方面的创新不是这样，金融创新和科技发明不同，就像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不同一样。

第九章 奇谋怪论说欧美

19世纪即将结束时，美国几乎拥有以金本位为基础的
全球金融市场，但是这个制度崩溃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结束，布雷顿森林制度建立时，当时几乎没有民间国际资
本流动，现在大家不记得了，但是布雷顿森林制度经过特
意设计，创造出一些机构，以便在缺少民间资本流动的
情况下为国际贸易提供融资。资本移动增加之后，布雷顿森
林制度的固定汇率制度随之崩溃，布雷顿森林创造的国际
金融机构——国际货币基金和世界银行——成功的适应局
势的变化，和民间资本移动的规模相比，他们的资金简直
是小巫见大巫，而且他们没有管理的权力；各国政府之间
虽然有某种合作，但是规模相当有限，瑞士巴塞尔的国际
清算银行就是国际合作的主要工具。问题是大家没有普遍
认识到加强国际合作的需要，当前有关金融市场运作方式
的看法是错误的，根据错误假设运作的全球市场不可能长
久生存，全球市场崩溃是极为惨痛的事件，后果难以想
象，但是索罗斯发现这样想象比较容易，目前的制度要继
续生存比较不容易。

这是相当惊人的说法，为什么国际金融市场会崩溃？
到底如何崩溃？索罗斯认为国际金融市场现在已经接近崩
溃边缘，以墨西哥为例，墨西哥从第三世界转型成第一世
界国家，大多数选民没有得到多少利益，现在却必须承受
调整的痛苦，目前的制度能否继续生存还大有疑问。不论
目前的制度是否存续，已经让人清清楚楚的感觉到，国际
投资的风险很大，即使危机消除了，其他债台高筑的国家

极限投机

风险也不会消失，这些国家能否承担这么高的风险，仍然大有疑问，如果他们不能为债务找到重新融通的资金，就会面临倒帐，这是一种自我强化的程序。

那么，有什么方法可以避免吗？可能有个别的拯救方案，索罗斯有一个更好的想法，他们应该建立一个新的国际机构，协助债台高筑的国家推动金融整顿，无法挽救的国家要容许他们进入降低债务的计划，其他的国家只要协助他们得到重新融通债务的资金。协助的形式必须以替新发行的债券提供保证的方式出现，提供保证的国际机构，当然要坚持适当的财经调整政策，资金可以靠发行新的特别提款权取得，如果这个做法成功，这笔资金甚至不必动用。有了这种机构之后，将来可以防止市场的过度行为，因为投资人如果没有得到保证，就不会借钱给债台高筑的国家。为了应付日渐成长、但已经变得无法继续维持的国际借贷，在现有的机构之外增加这种机构，确有必要。

为了避免太抽象，索罗斯用这样的话来阐述上述观点：“我们在开放全球商品与服务自由波动方面已经有长足进展，更重要的是，在开放理念的自由流动方面也有长足进展，国际资本流动大致已经不受限制，连人也可以比以前更自由的迁徙。但是大家并未配合这种全球制度的建立，普遍接受开放社会的原则，情形正好相反，国际关系继续以国家主权原则为基础，许多国家的政治制度离开放社会的标准很远，在经济方面，几乎没有人认识到金融市场、尤其是国际金融市场天生具有的不稳定性。

根据定义，市场是有竞争性的，但是不顾公共利益、

第九章 奇谋怪论说欧美

不受限制的竞争，可能危害市场机能，这个想法和当前认定竞争是公共利益的观念冲突，即使有人认识到必须维护这个制度，在制度里也属于次要事项。看看近几年来大家的说法，全都与竞争有关，很少谈到自由贸易，在这种态度下，人们看不出全球制度如何生存下去。政治不稳定和金融不稳定会在自我强化的情况下彼此补充，索罗斯认为，我们已经进入全球性分崩离析的时期，只是们还没有察觉到这种状况。

听到索罗斯严厉批评竞争行为，实在很奇怪，因为他是大家公认的在金融市场上最有竞争力的人。

索罗斯赞成竞争，但是他也主张维护竞争得以存在的制度，他和自由放任主义末世圣徒相反的地方，在于他不相信市场是完美的。在他看来，市场走向无法维持的过度状态和走向均衡状态的可能性一样大，但是他的反对有更深层的意义，他不相信竞争会促成最佳的资源分配，他不认为适者生存是最合乎要求的结果。他认为我们必须追求某些基本价值观，例如社会正义，基本价值观不是靠毫无竞争的限制能够得到的。正因为他在市场上取得成功，他才有能力拥护这些价值观，索罗斯是古典自由主义分子，他认为从这个制度获益的人，应该发挥影响力，使这个制度变得更好，索罗斯也请别人注意这个事实，他是一直到赚了 2000 万到 3000 万美元，才设立他的第一个基金会。

所以他的动机是，回馈让他致富的制度。

当然，不完全如此，富有让他能够做一些他想做的事

极限投机

情，他行善时，从来没有让钱的多寡牵着他的鼻子走。开始时，他一年捐赠 300 万美元，但是经过 5 年多，一年的支出才达到 300 万美元，只有一段很短的时间，大约是 1992 年时，他拥有的金钱超过他的捐赠能力，现在形势已经逆转，他拥有庞大的网路，必须努力赚钱以维持网路继续运作。

他已经开始在美国从事一些活动。

协助加强开放社会的活力，始终是他计划中的一部分，但是过去他极度沉迷在东欧动荡中，所以没有时间做这件事。大约在 1992 年动荡开始冷却时，他仍然拥有一些用不掉的钱，他开始寻找机会。

对于开放社会，索罗斯认为有一定的问题。首先是价值观不足。在他的开放社会和封闭社会的理念架构中，开放社会价值观不足，一直是论点之一，过去 5 年他所见的一切，证实了他这种观点。

向传统挑衅

人们都知道索罗斯曾经捐钱寻求毒品合法化，并且研究美国式的死亡。但他不承认，他说：“我不是支持毒品合法化，而是支持发展出不一样的方法来解决毒品问题。在死亡问题的研究上，也是出于同样的态度。在这些问题方面，误解和缺乏了解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善意的行动却带来不希望有的后果，药方通常比疾病本身还糟糕，就是这些看法促使我专注在这些问题上。”

第九章 奇谋怪论说欧美

谈到药方，索罗斯指的是试图靠着严格执法处理毒品问题，比毒品问题本身还糟糕。

他认为把毒品问题当成犯罪问题来处理是错误的观念。

他认为瘾君子们有一个药瘾问题，当然，如果你制订法律，让毒品变成非法，你也就有了犯罪问题。

这也是一个社会问题，想杜绝社会问题，所需要的钱恐怕连索罗斯都没那么多。

索罗斯认为杜绝毒品问题的整个观念是错误的观念，就像不可能消除贫穷、死亡或疾病的问题一样，谁也不能杜绝毒瘾。人的性格中有上瘾的因素，世界上又有让人寻求逃避现实的状况。完全没有毒品的美国根本不可能实现，人们可以劝阻大家使用毒品，可以禁绝毒品的使用，可以治疗毒品上瘾的人，但是你不可能杜绝毒品。接受这个观点之后，对这个问题或许可以发展出比较合理的解决方法；问题是，现在很难有理性的辩论，这个问题已经变得太情绪化了。

索罗斯认为，毒品有害是毫无疑问的事，但是不同的毒品也有差别，有些只对使用者有害，有些像纯古柯碱或某些迷幻药，可能对其他人有危险，不过在大多数毒品的影响下，驾车或做其他要负责任的工作都有危险。有些毒品会让人上瘾，有些毒品像大麻一样不会让人上瘾，大麻是相当无害的东西，但是你只要看看一些经常吸大麻的人，就可能知道他们已经受到伤害。

不过话说回来，酒精上瘾的人也是一样，所有毒品和

极限投机

致瘾物质，都应该劝阻大家使用，防止儿童使用毒品、酒精甚至香烟，是大家非常期望的事情，但是，这样就有理由把使用毒品变成犯罪行为吗？证据显示，这么做会有反效果，这样做会创造出毒贩，也为毒品创造出一种神话，这种神话通常会吸引年轻人，而不是把他们赶离毒品，尤其当这种神话这么脱离现实时，更是如此。但是这些人们不期望有的后果还有进一步的发展，毒品罪刑化创造出罪犯，创造出毒贩和毒品使用者，他们为了满足瘾头，就犯了刑事罪，犯罪吓坏了一般公民，而政客又利用选民的这种恐惧当选，这样就带来了对毒品的宣战。如果你是想当选的政客，就很难反对对毒品宣战，对毒品宣战创造出一个执法机构，这个机构有一种既得利益，希望法律解决的方式长久持续下去，这就是最后药方比疾病本身更糟糕的原因。

有人追问索罗斯是否主张毒品合法化，这个问题他表示他是怀疑论者，他还没有下定决心，而且从某方面来说，他其实不愿意下定决心，他愿意私下讨论这个问题，但是不准备公开表明立场，因为他虽然能看得出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却不能清楚地看出什么地方对；他可以看出现在的方法显然不对，而且造成的害处大于好处，但是对于什么是正确的方法，他还没有明确的看法，他可以看出好几种方法一定比现在的方法好，例如，专注治疗而非专注执法。他可以想象合法化是个有效的方法，可以减少毒品造成的伤害，因为他确信如果毒品合法化，而且并不是所

第九章 奇谋怪论说欧美

有的毒品合法化，只是其中害处较少、较不容易上瘾的毒品合法化，就可以减少 80% 的犯罪，这样节省下来的经费可以用来治疗。但是他认为在这个问题上，舆论已经极为激愤，宣扬合法化会直接和流行的共识冲突，一定会造成反效果，这是他支持很多种针对毒品的计划的原因，有些计划坚决反对合法化，也有一些计划比较同情合法化，他不希望有一种属于他自己的解决方法。

不过要是有人就这个问题追问索罗斯的话，他会怎么说？这提醒他想到匈牙利 1956 年的一个老笑话，当时当局设法鼓励人们更自由的表达个人意见，每次开会后，书记就问党员个人的意见，有一个党员总是回答说：“我完全同意书记同志的意见。”最后，书记说：“你一定有自己的意见。”他回答说：“对，但是我完全不同意自己的意见。”

根据这个基础，索罗斯会告诉人们，如果完全照他的意思，他会怎么做，他会建立一个受到严格管制的分销网路，使大多数毒品合法供应，最危险的毒品如纯古柯硷例外，一开始他会压低价格，低到足以摧毁毒品交易，这个目标达成后，他会不断的提高价格，很像提高香烟的货物税一样，但是登记有案的上瘾者例外，他会把一部分所得用在预防和治疗上，而且他会培养社会上对毒品使用的谴责。

索罗斯还有一个死亡研究计划，他支持这个计划的目的的是什么呢？这一点，他运用大致相同的思维方式，美国

极限投机

人普遍否定死亡，这样事实上不是把自然死亡视为合法，而是当成一种被抛弃的感觉，他从自己的经验知道这一点，他父亲死亡时，他否认这一点，他拒绝面对父亲已经死亡的事实，他认为这是父亲造成的悲剧性错误。他认为整个社会多少是在否定和扭曲的状态下运作的，人们教导一切和性有关的事情，但是很少教导与死亡有关的，然而死亡比性还普遍，死亡不能够避免，人们应该正确面对死亡。

索罗斯找到一群专家，这些人把一生奉献给研究面对死亡的问题上，他让专家们自己决定该做什么，就死亡这个问题而言，索罗斯没有任何计划，没有特定的题目，他们才有。

索罗斯是想让美国人在自己的家里，比较安心的应付死亡。要是说有什么普遍的目标的话，就是鼓励家人陪伴，减少医疗的不人道影响，他认为应该鼓励大家在家人陪伴下，在家里死亡。他希望大家改变面对死亡的观念，以便死亡对个人或家人不会变成这么恐怖的经验。事实上，大多数人都在医院里死亡，因此，这个计划的大部分力量用在教育医事人员方面。

死亡研究计划可能的结果之一，是在医疗无能为力时少花一点精力去延续生命。

索罗斯认为这是其中重要的一部分，在生命已经失去意义时，用科技延续生命毫无意义，坏处可能多过好处，因为这样造成不必要的痛苦和苦难，更别提花费了。接受死亡一定会减少不计成本延续生命的做法。对于安乐死的

第九章 奇谋怪论说欧美

态度，索罗斯说，专家在这一点上严重对立，死亡研究计划没有偏袒任何一方，他个人认为这样很可惜，但是专家可能是对的，在死亡文化方面，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不必陷入其中最具有争议性和最情绪化的局面。

索罗斯对待死亡的情况很特殊，他不替政府工作，也不是要对选民负责的政客，他不向任何人负责，他在花费自己的钱时，可以实施自己想要的任何观念或计划，他的活动没有任何管制或制衡，有人问：“你是否拥有太多权力？”他说：“这是什么问题！我们都想对这个世界有点影响。赚钱超过某一点之后，获得财富就不再有意义，除非你知道怎么样用这些财富，我希望用财富造福社会，在决定什么东西对社会有意义上面，我必须依靠自己的判断，我认为如果我们全都依赖自己的判断，这个世界会变得更美好，即使我们对自己的判断各有不同的看法。”

在各国政治版图上，有一批新形态的公共人物出现，例如美国的罗斯·裴洛、意大利的贝鲁斯柯尼，都是拥有政治目标、白手起家的亿万富翁，而索罗斯也是其中之一。他还认为，企业家当中也有一种人，靠着从事慈善活动在集权国家里做生意，哈默和麦斯威尔就是这种人，但索罗斯并不对这种行为加以批评，他不是道德执法者，他只是希望自己能与他们有所区别而已。

对国际政治的看法：索罗斯说他没有答案，但是他的理论架构让他至少可以问正确的问题，让他得到一些片段的看法。

极限投机

一、我们正进入世界失序的时期，我们越早了解这一点，越有机会防止失序变成失控。

二、在了解目前的状况时，开放社会和封闭社会的理论观念特别有用。

三、教条主义已经丧失对人心的影响力，几乎不可能再恢复，钟摆反而摆向另一边，摆向自由放任。

四、前东欧与前苏联国家确实有出现民族主义独裁政权的危险。

五、要动员社会支持国家，必须有敌国外患，民族主义兴起可能伴随着武装冲突。

六、民族主义教条可能与宗教教条结合，这种趋势可能蔓延到集权国家世界之外，人们可能发现俄罗斯或塞尔维亚保卫基督教对抗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反之亦然。

七、民主国家价值观不足是问题，他们在本国重大利益未受直接威胁时，非常不愿意采取任何行动，因此，不可能防止民族主义独裁政权和冲突蔓延。目前状况比较像第二次大战之前的混战时期，而不像冷战时期，其中有若干明显的差异。第一就是没有希特勒这种人，现在只有像墨索里尼的人。但是最重要的国家俄罗斯仍然群雄竞起，逐鹿中原。另外一个差别是欧洲联盟，但是欧洲联盟没有共同的外交政策，而且正陷入混乱，此外，联合国越来越让人联想起国际联盟，波希米亚扮演的角色和阿比西尼亚相同，但是，美国虽然减少对和平维持任务的贡献，却不等于完全撤出。

历史不会完全重复，但是已经出现的形态或盛行的政

第九章 奇谋怪论说欧美

权，确实展现出若干相似之处，索罗斯觉得目前出现的形态令人困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混战时期带来犹太灭绝运动，也带来人类历史中破坏力量最大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他预期历史不会再重复，眼前所见，看不到任何希特勒一般的人物，即使是像希特勒一样的人物夺得俄罗斯的政权，也要很久之后俄罗斯才能出现象苏联或纳粹德国一样的军事威胁；但是制造毁灭的科技能力已经大大的增加，俄罗斯拥有原子武器，伊朗和若干国家也会拥有，应该采取行动改变这种隐然成患的新形势。

极限投机

第十章

另一种恐惧： 我不辩论，我只开枪

量子基金的延伸观论

索罗斯多次对人说，他现在主要关心他的理念，虽然他的活动看起来似乎相当多样化，从投资到慈善事业都有，事实上，它们彼此密切相关，都是以他的哲学架构理念为基础，他现在能否整合他的反射理论、投资理念和对开放社会的信仰呢？他说，“把我存在的各种不同因素整合起来，成为前后一贯的整体，这毕竟是我人生的目标。”

在各种活动的背后，索罗斯有没有一个统合一切的理念呢？索罗斯想用一句话来说明梗概：他相信自己会犯错。这句话对他的重要性，好比“我思故我在”对笛卡儿的意义一样。事实上他这句话的意义更重要，笛卡儿的格言只提到思考的人，而他这句话和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有

第十章 另一种恐惧：我不辩论，我只开枪

关。掺杂在我们的决定中的谬见和误解，形成了我们所参与的事件。错误在人类事务中所扮演的角色，就像突变之于生物学。

这个观念对索罗斯极为重要，在他还不能把它简化为一句话之前，就开始指引他的人生。这句话对别人是否有同样的重要性，他就无法知道了。

自己会犯错的信念，指引了索罗斯的人生。就实际情况来说，这种信念在赚钱和捐钱方面都指引他，但是钱不是他人生的一切，对他而言，钱只是达成目的的手段。他的事业以金钱为重心，是因为他认识到我们的社会倾向于夸大金钱的重要性，用金钱来界定价值观：我们评鉴艺术家，是看他们的创作可以卖多少钱而定；我们评估政客，是看他们能筹募多少资金；政客自我评估时，也用自己可以顺道筹募多少钱为标准。索罗斯不是因为他的哲学或慈善行为得到大家的注目，而是因为他在赚钱方面很成功，重视钱财这种流行偏见，是他所谓容易犯错的例子。

将容易犯错的观念化为实际事物，并且阐明这个观点，假设除了少数例外，我们的心智构思都有缺陷或可能有缺陷。这些构思可能含有一些真理的因素，但是这种因素可能被夸大到扭曲事实真相的程度。

我们应付不完全理解的方法之一，是把我們所得到的任何知识、经验或看法，沿用到这些东西涵盖不到的领域中，这点在视觉方面确实如此，我们可以毫无困难的把视觉沿用到我们的盲点上，在最复杂的构思上也是如此。

极限投机

索罗斯说的心灵构思是指思想的产物，无论是藏在内心深处，或是形之于外表现为语言或制度的东西，如金融市场、各种汇率制度、联合国、民族国家或司法制度。留在内心深处的心智构思范围很广泛，从最简单的感觉，到与这个世界可能有关或无关的复杂信仰体系，形之于外的东西构成我们这个世界的一大部分。

索罗斯认为这一切心智构思都有缺陷。

要解释他所指的有缺陷的心智构思，最好的方法是检验例外——检验没有缺陷的心智构思。我们能够做出正确或错误的陈述，这种陈述没有缺陷，在我们可以依靠正确陈述的范围内，我们能够得到知识，只有在陈述超过这种“形式严谨”的陈述时，我们的心智构思才有缺陷。

所以我们必须检验我们可以做出哪种正确陈述，有些个别的陈述和特殊事实对应，也有一些规则可以让我们运用，以便从其他陈述中推演出若干陈述的真实性，这点主要用在数学和逻辑方面。我们最大的成就是科学，我们应用科学，把个别陈述和普遍适用的通则结合为一，形成解释和预测。但是就像波普所说的一样，这种通则不能够证实为真，只能证实为假，这些通则一直保持假设的性质，经常会被证实为假。

所有这种形态的知识具有一种共同特性，就是有些事实或规则可以当作可靠的标准，只要我们知道如何运用，就可以拿来判断各种知识的真实性或正确性，这些标准可靠的原因是它们独立于它们所判断的陈述之外，也独立于运用这些标准的人之外。

第十章 另一种恐惧：我不辩论，我只开枪

如果你考虑我们人类设法了解这个世界的立场，你会发现，我们不能把思想局限于和思想无关的事物，我们必须就生活的一切作决定。为了这样做，我们必须拥有意见，这些意见不够资格做为知识，不论我们承不承认这一点，情形都是这样，我们必须依靠信念，这就是人类的状况。

“认清人类的状况”并不完全算是知识——如果认清就算知识，就会自相矛盾——但是这样提供了一组最适合人类状况的信念。至少，索罗斯宣称自己会犯错时，他确实相信这一点，他宣称自己会犯错时，是在说明一种信念——当然这是一种适于成为哲学的合理信念，但仍然只是一种信念。他不能像笛卡儿宣称能够证实自己的存在那样证实自我的信念，他尝试过证实的信念却没有成功。能够证实自己会犯错当中有自相矛盾之处，同样的，不能够证实也有前后一贯的地方，所以他宣称他陈述中的事实是一种信念。

这点有很重要的意义，表示我们需要一些信念，在人生路途上指导我们。我们不能只依赖理智，理智有用处，但是也有限制，如果我们坚持留在理智的范围内，就无法应付自己所生活的这个世界。相比之下，相信会犯错的信念，可以让我们走得更远，可以终身指导我们。

这是索罗斯向人们提供的他自己的人生哲学。

他说：哲学已经恶质化，变成一种学院的职业，但是哲学应该扮演更重要的角色。我们的生活中不能没有一组

极限投机

理智的信念，问题是，我们是否可以拥有一组信念，其基础是承认我们的信念天生有缺陷，他相信可以，而且在他的一生中，他一直由自己会犯错的信念指导。他在传播自己的理念，让大家普遍接受这方面，做得并不成功，他承认自己是失败的哲学家，就是这个缘故。

他的这种哲学思绪的来源，受波普很大的影响，不只是受他《开放社会》这本著作的影响，他的科学哲学对索罗斯影响更大，索罗斯接受他这个理念，也就是我们对这个世界的了解天生就不完全的理念，他把这种不完全归于下列事实：我们是自己想了解的世界的一部分，而且我们参与塑造这个世界。

念经济学时，索罗斯觉得奇怪的是，古典经济理论——尤其是完全竞争理论——居然假设有完整的知识，索罗斯在数学方面也相当不行，所以他宁可质疑这种假设，不愿研究以这些假设为基础的公式。经过慎重思考后，他断定经济理论是以错误的前提为基础，这就是他发展出自己的反射理论的由来，这个理论承认思考和实际状况之间的双向互动。

索罗斯的研究使他利用罗素的记号理论和逻辑实证主义，从自我指涉的逻辑问题和说谎者的矛盾，得到他自己的反射理论。

古代的克里特哲学家艾披孟尼迪斯说过：“克里特人总是说谎。”如果这个陈述正确，克里特人未必总是说谎，因此这个陈述是错误的；会形成这种矛盾，是因为艾披孟尼迪斯在作一种自我指涉的陈述。索罗斯尝试自我指涉的

第十章 另一种恐惧：我不辩论，我只开枪

理念中，推演出他的反射观念，这样就形成逻辑的不确定，他主张逻辑的不确定和偶然的不确定有关联，因为根据不完全知识运作的参与者塑造了事件的过程。他现在没有这么肯定是否需要深入研究自我的指涉，以便证实反射的观念，他光是为了这样做，就流失了宝贵的3年光阴——从1963到1966年。

这件事为什么这么困难？索罗斯认为，尝试证明我们的理解天生不完全，当中有矛盾之处，他自己常常觉得已经相当接近答案，却总是作茧自缚，他不知道是因为他尝试做一种不可能的工作，还是因为他是个矛盾的哲学家——可能两种因素都有。或许人们必须花费三年的时光，发展出自己会犯错的信念，但是如果深入想一想，人们可能会接受有思考能力的参与者不能花3年时间得到知识、再根据知识作决定的事实。

知识和事实有关，参与者的决定和事实无关，却和未来的某些事情有关，等到这些事情变成事实时，会加入参与者的决定中，成为其中的一部分。要是你接受一点，你一定了解参与者的思考和事物的实际状态不会完全相同，却也不可能彼此完全无关。他们的关系复杂多了，一方面，实际状况反映人的思考——索罗斯把这一点称为认知功能，另一方面，实际状况受人的决定影响——他把这点叫做参与功能。人们可能注意到这两种功能在相反的方向上运动，只有很小的一部分重复：大家考虑的事件受他们的决定影响，这些事件的结构和自然科学研究的事件不

极限投机

同，必须以不同的方式思考，他把这些事件叫做反射事件。

这其中有什么差别呢？自然科学处理的是不受任何人的思考左右、一定会发生的事件，因此，自然科学可以把这些事件当成连续事实来处理。事件中加入有思考能力的参与者时，因果关系不会直接从一组事件连接到另一组事件；在参与者的思考与扮演某种角色时，关系是从事实而认知，从认知而决定，从决定而到下一组事实。所有自然现象也有一种特性，就是一组事实和下一组事实之间有直接关系，但是，在考虑比较迂迴的关系时，不能不考虑其中产生的扭曲：人的思考接近实际状况时，扭曲可以忽略，认知和实际状况差距很大时，扭曲会变得非常明显。

为什么差距会很大？因为认知和参与功能彼此互相干扰，在互相干扰的状况下，会在参与者的思考和事物的实际状况中引进一种不确定因素，两者的差异可能大到令人惊异的程度。

索罗斯对此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恋爱。别人对你的感情，深受你自己的感情和行动的影响，只有少数的例外，像但丁和比翠丝的情形，一个人的感情不能传达到另一个人身上，她爱我吗？其中有一种不确定的因素，如果这是知识性的问题，就不会有这种因素，但是这是互动的问题，感情的互动可以产生很多种结果，其中有些是可以长久维持的，有些则不能，你恋爱时奇妙的事情会发生，把爱当作事实处理相当不适宜，因为事实是和参与者的信念无关的东西。这点肯定无疑。人际关系的反射性质极为明

第十章 另一种恐惧：我不辩论，我只开枪

显，因此索罗斯想问一个问题：为什么大家没有正确的认识到反射性，例如：为什么经济理论刻意忽略这一点？因为反射性不能符合分析科学的目标，不能提供确定的预测和解释，反射性引进一种不确定的因素，妨碍了研究。

解释这些要费一点工夫，索罗斯必须引用波普精密而高明的分析科学模式，这个模式由三种陈述构成：特定的初始条件、特定的始结条件以及应用性质广泛的通则。这三种陈述可以用三种不同的方式结合，通则和初始条件结合产生预测，和终结条件结合产生解释，特定初始条件和特定终结条件结合产生通则的试验方法，要使试验可行，通则必须超越时间的限制。

索罗斯喜欢这个模式的简单性质，波普用它来解决通则的问题，也就是从特殊事项到通则，他证明科学方法不需要归纳的逻辑，科学方法可以依靠实验。只有能够实验的理论，才有资格称为科学。

索罗斯想用这个模式显示反射性质破坏了这个模式，如果反射性的互动可以改变参与者的思考和事物的实际状态，不受时间限制的通则，就不能够拿来测试。如果你重复一个实验，过去发生过的结果不见得会再度发生，于是整个精美的结构就崩溃了，这点不足为奇。这个模式的基础是不言而明的。如果现象不遵从超越时间限制、普遍正确的法则，这些法则怎么能用来产生预测和解释呢？

索罗斯的反射理论和海森柏格量子物理学的不确定与量子物理学原则有什么关系？有些批评者认为，索罗斯的

极限投机

理论只是采取海森伯格的原则。

但索罗斯认为他谈的不确定是不一样的，这种不确定不只影响及主题事件，也影响跟主题事件有关的理论。海森伯格建立了不确定原则，而且根据这个原则，量子物理学产生了具有预测与解释力量的重要统计通则，不确定原则主张观察量子现象会影响量子的行为，但是不确定原则本身、或量子物理学提倡的任何其他理论，都不影响量子现象的行为，因此，这些现象提供了可靠的标准以判断理论的正确性。假设索罗斯现在提倡一种预测股票市场行为的理论，这个理论一定会影响股市的行为，这样创造的不确定，和量子物理学遇到的情形不同，会影响据以判断陈述真实性或理论正确性的标准。

在股市里，真的理论可能是假的，假的理论可能是真的，这就是索罗斯的反射理论的最通俗的反映。

当然，索罗斯说的话有更深一层的意义，他认定大家普遍接受真实性观念需要修正，在他看来，我们需要理解的类别不只是真和假两种。逻辑实证主义者宣称，不真或不假的陈述没有意义，他完全不同意，理论如果和主题事件有关、可以影响主题事件，绝非毫无意义，这种理论可以改变世界，也证明思考在塑造实际状况方面可以扮演积极的角色，索罗斯认为必须调整人们有关真实性的观念，将这些情况纳入。

他建议我们需要三种类别：真、假和反射，反射性陈述的真理价值在于不确定，或许我们可以找到其他具有不确定真理价值的陈述，但是我们的生活中不能没有这些陈

第十章 另一种恐惧：我不辩论，我只开枪

述，不能没有反射性陈述，他几乎不必强调这个命题的重大意义，对我们的思考而言，没有一件事比真理的观念更重要。

索罗斯从来不曾这么强有力的陈述过，他不知道这样说是否能通过严格的检验。如果能通过检验，会有什么结果？那么人们需要彻底修正自己的世界观。他举了一个小小的例子，现在有一个普遍的信念，认为市场是完美的，这个观念是以政府管制不能达成目标的认识为基础，如果你引进第三个类别的真理——反射性的真理，情形会很明显，就是管制失败不表示自由市场是完美的，反之亦然。两种安排都有缺陷，第三种选择是反射性安排。

反射性陈述缺乏可据以判断其真实性的独立标准，这种陈述的真实价值不确定，可是它们绝非毫无意义，没有这些陈述，我们不能理解自己所居住的世界，而且这些陈述也不只是被动的反映现状，而是积极的建构这个世界。可以确定的是，在我们的思考之外，有一种不受我们意志左右的实际状况，我们的思考、陈述都包容在实际状况中，并且构成其中的一部分，然而我们却在想象中认为，世界和我们对世界的看法构成了不同但却相近的领域，而且可能在两者之间建立足以使陈述反映事实的一致性。这是错误的、会造成误导的一幅景象，它适用于科学方法和数学及逻辑之类的原理系统，但是不适合我们，不适于活生生有思考能力的人类。

这样的理论对经济学之类的社会科学有某种影响。波普主张，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应该适用同样的方法和标

极限投机

准，他把这点叫做方法统一主义，索罗斯对这个主义有一些怀疑。他把怀疑表现在他的《金融炼金术》里，他认为，社会科学这个名词是错误的比喻，反射性事件不能用普遍适用的法则来解释和预测。

他认为，波普把自己的主张引伸得太远，自然科学的方法和标准的确有可能用在社会现象上，而且在其指涉的范围内产生有价值的结果。但是我们必须记住，指涉范围排除了反射性质，例如经济理论作为假设性的构思是正确的，这种假设性构思把反射性质排除掉，我们在实际世界中运用经济理论的结论时，可能是扭曲的景象，在反射性质扮演重要角色的金融市场中，这点特别重要，随机漫步理论和效率市场理论具有严重的误导作用。

经济理论设法模仿物理学，古典经济学家以牛顿为师，却忘记牛顿曾在南海泡沫事件中丧失一大笔财富；经济理论能够模仿物理学的唯一方法，是从经济主题中消除反射性质，如此才能做出完整知识的假设，然后将假设修改为完整资讯。最后，索罗斯在伦敦经济学院的教授李昂·罗宾斯身上发现完整的借口，他说经济学既不关心手段，也不关心目的，只关心手段和目的之间的关系。换句话说，手段和目的都必须视为已知的事实，这是方法学上的设计，目的在于连研究反射性互动的可能性都要排除掉。

波普攻击弗洛伊德心理分析学派，因为这一类理论宣称是科学理论，却不能够用试验证明为假，因此，他们的主张是错误的。索罗斯同意这一点，但是他愿意更进一步指出，他认为他用来攻击教条主义的主张，也适用于完全

第十章 另一种恐惧：我不辩论，我只开枪

竞争理论之类备受尊敬的理论。完全竞争理论宣称在某些假设下，不受限制的追求自利会导致最有效率的资源分配。他不是要攻击经济学，他认为经济学是很高明的理论构思，他质疑的是经济学用在实际世界的可行性，他也质疑经济学能否通过金融市场的考验，他相信，光是量子基金的表现，就足以证明随机漫步理论是错误的。

开放社会的光芒

索罗斯认为社会科学因为具有想模仿自然科学的野心，因而违背其本身的主题，现在正是把社会现象从自然科学的紧箍咒中解脱出来的时候，尤其在自然科学本身正在经历剧烈的变化时，更应该如此。分析科学限于研究封闭系统，这是它们可以产生确定结果的原因，综合科学研究演进式的开放系统，不期望产生确定的解释性预测，只寻求建立模型或运用模拟——电脑科技的发展使这种预测成为可能——或是产生模糊的哲学通则，这种通则没有波普模式的预测力量。

索罗斯相信这种方法和社会现象的研究，比分析科学和社会现象的研究更有关系，但即使在这方面，他发现社会现象和自然现象的差异，没有得到充分的认识。大多数电脑程式处理群体的演进时为了研究思想和实际状况之间的互动，人们需要建立一种具有建立模式功能，而这种模式又必须具有建立模式功能的功能，这种功能接着又必须含有建立模式功能的模式，如此无限延伸下去。就目前为

极限投机

止，还没有一种电脑模拟能够做到这一点，如果这种模式要有任何实用功能，这种无限延伸的模式必须在某个地方结束，因此，这种模式不能完全反映现实的复杂状态。要得到参与者的了解天生就不完全的结论，这是另一种方法。

假设人们接受索罗斯所有的主张，他的反射理论如何解释和预测事件的进程呢？索罗斯说他的理论做不到这一点，他的理论甚至不会假装它是一种科学理论，海森伯格的不确定原则和统计上的或然率有关，这个理论不能决定特定粒子的行为，但是能够就粒子某种行为的或然率，产生极为可靠的估计。相形之下，索罗斯是对特定事件的过程有兴趣，身为投资者，他发现统计上的或然率价值有限，真正重要的是特定状况下会发生什么事情。同样的原理在历史过程中甚至更适用；他不能就历史事件做出可靠的预测，只能形成若干假设性的情境，然后可以拿实际的事件过程和假设过程比较，这种假设没有科学上的正确性，但是有相当的实用性，能够为现实生活中的决定提供基础。他不能根据普遍正确的通则预测事件的过程，但是可以设计出一种一般的架构，协助他根据经验预测和调整自我的期望。

换句话说，海森伯格建立了不确定的科学理论，索罗斯的架构只是协助他用不科学的方法应付不确定状况。这点是很重要的差别，用科学标准来判断，索罗斯的理论毫无价值，不能产生决定性或机率性的预测和解释，海森柏

第十章 另一种恐惧：我不辩论，我只开枪

格是研究物理现象的科学家，他的理论是科学理论。索罗斯是一个有思考能力的参与者，想找出人类状况的意义，他的理论是不科学的理论，本来就应该这样，因为他认识到，有思考能力的参与者的状况，基本上和科学观察者的状况不同。

这是索罗斯把书名叫做《金融炼金术》的原因。这是因为他认为他的理论只是炼金术，不是科学。

炼金术士犯了大错，想靠密法把非金属变成黄金，炼金术对化学元素无能为力，但在金融市场上却很有用，因为密法可以影响塑造事件过程的人的决定。炼金术意味着对物质实施某种干预、操纵和改变。

一点不错，在金融市场里，理论可以改变和它有关的实物。例如，效率市场理论为衍生性金融商品的广泛使用催生，而衍生性金融商品可能在某些情况下造成市场崩盘。索罗斯正好对真理有上瘾一般的渴望，因此他坚持社会科学是一种炼金术，不是科学，科学有崇高的声望，因此说你在研究科学很有吸引力，这是一种有魔力的说法，社会科学家可能被这个说法迷惑了。

索罗斯不希望过度强调他的看法，社会学家和自然科学家一样有心追求真理，但是社会学家们有玩弄魔法的机会，自然科学家大致上没有这种机会。要防止滥用，最好的方法是承认这种可能性，索罗斯宣称社会科学是一种错误的比喻，并且坚持他自己的方法比较像炼金术，比较不像科学，就是希望达成这个目的。

有人问索罗斯：“如果你的理论不能提供任何用来预

极限投机

测或解释的通则，那有什么用处？”

索罗斯说：“我的理论开启了整个宽广的研究领域：思想和实际状况的关系。我连皮毛都还没有摸到，就已经得到一些有趣的门径，我发现近乎均衡和远离均衡状态之间的差异，特别有研究潜力，在某些状态中，认知和实际状况相距不远，而且有一些力量在发生作用，这些力量通常会把两者拉近，我把这种状态叫做近乎均衡状态。在另一些状况中，认知和实际状况差距相当大，没有任何复合的可能，把这种状况叫做远离均衡状态。”不均衡有两种：一是静态不均衡，在这种状况中，流行的教条和流行的社会状况都很僵化，但是彼此差距很远；第二种是动态不均衡，在这种状况下，实际世界和参与者的看法变化都太快，以至于彼此不得不越分越开。

这一来，又把读者拉回先前索罗斯没有回答的问题上，看他如何界定不同的状况，从哪里划分它们的界限。

就像索罗斯前面说的一样，他还没有清楚的答案，但有一点他可以肯定，就是分界线和指引大家行动的价值观有关。他拿水作个比喻，水是否变成冰或蒸气，是压力和温度的问题，这里却是价值观的问题，但问题是价值观不能像温度一样量化，所以我们必须寻找质方面的差异，这就是他变得犹豫不决的原因。

对于价值观，他说他所知极为贫乏，他研究经济学，但是经济理论把价值观视为已知的事实；他研究哲学，但是他主要专注在认识论，忽略了伦理学。然而，他仍然相当了解分界线在什么地方，但是他不能确定自己可以清楚

第十章 另一种恐惧：我不辩论，我只开枪

的说明。

看看静态不均衡和近乎均衡的界线，索罗斯会说在近乎均衡的状态中，大家明白思想和实际状况的差异，并且承认两者并非始终一致，大家愿意从经验中学习，发挥自己的力量，实现自己的期望，这种努力使他们的思想不至于过分脱离现实。相比之下，在静态不均衡中，大家不能分辨主观情势和客观情势的差别，不然就是接受教条，把教条当成最终的真理，人们可以把原始民族的万物有灵论，或前苏联的教条主义作为这个例子的佐证。

在谈到界定动态不均衡的界限时，索罗斯在正确理清自己的想法上，碰到一些困难；思想和实际状况的差别变得很模糊，但这次是因为实际状况变得太不稳定，不再像近乎均衡状态中一样普遍受到尊敬，实际状况同时变得比较有威胁性，而且比较多变，这种情形不会单独发生，参与者的价值体系也瓦解了，在指导大家的价值观和事件的过程之中，有一种共同的自我强化互动。再来看盛衰过程。

问题是，失控的盛衰过程和半途而废的盛衰过程之间，到底有什么差别？这个问题在金融市场中比较容易解答，在完全抽象的形式中比较难以回答。如果人们回忆索罗斯用过的几个例子，就会发现在所有过程失控的情况下，流行的价值观都有缺陷，常见的缺陷是大家都认为是根本价值观的东西，结果只是反射性的玩意。在集团企业热潮中是这样子，大家相信每股盈余是和股票市场价值无关的东西；在国际借贷热潮中也是这样，银行家认为，他

极限投机

们用来判定债务国借贷能力的负债比率和银行本身的借贷活动无关，此外还有很多例子。但是另外有运作，大家都承认市场具有反射性，而且承认趋势是你的朋友时，市场事实上会变得不稳定，这就是外汇市场所见到的情形。就像索罗斯在《金融炼金术》里提到的，追随趋势的投机使自己浮动汇率制度变得不稳定，这里不稳定有累积的力量，时间越久就变得越不稳定。

从金融市场谈到一般的历史过程，他想说的是，为了保持近乎均衡，大家必须同意一些基本价值观，必须拥有共通的对错观念，如果丧失这种观念，容许自己完全由权宜的东西指引，状况会变得不稳定，他认为这种不稳定的来源和目前的状况特别有关系。人们可以看到在股票市场里，大部分的玩家是机构投资人，他们不关心基本价值，只关心成绩的高下，于是人们在这种成绩的竞争中，看到每一个人彼此竞争，这样会鼓励追随趋势的行为。

索罗斯认为这种情况与政治制度更有关系，政客只受唯一的考虑——如何当选——所指引，这样侵蚀了建国先贤规划的民主制度根基，代议制民主制度有一种理念基础，就是候选人站出来宣布他们的政见，选民再从中抉择，但是大家出来竞选时，最先研究选民的看法，然后发表他们认为可以吸引选民的政见，于是就产生短路，过程会变得不稳定，全面利用电视广告使这种情况更加恶化。

所以索罗斯认为，目前的股市状况和选举过程，都是反射性行为的好例子。两者都日渐不稳定，而且有崩溃的危险，理由一样，都是缺乏基本价值观，但是问题比乍看

第十章 另一种恐惧：我不辩论，我只开枪

之下严重。反射理论认为，人们所有的价值观都有缺陷，而且在某些状况下，这些缺陷会变得很明显，但是基本价值观是维持近乎均衡状态所必需的，如果人们承认价值观具有反射性质，并且放弃所有的基本价值观，我们会使状况变得更不稳定，所以在近乎均衡的状态中，有一些自我矛盾的东西。不过，一经深思人们就会发现，这样相当符合索罗斯的反射理论，如果近乎均衡的状态是稳定的，远离均衡的状态就没有机会出现，近乎均衡注定是一种不安定的状态。

这种说法真的让人不好懂了，但索罗斯这样解释：就金融市场而言，如果反射理论普遍被大家接受，市场会变得更具有反射性。索罗斯不赞同绩效评比的观念，他完全根据绝对绩效的基础管理自己的基金，他认为这是正确的指标，他认为如果大家用绝对绩效而不用相对绩效作为衡量标准，金融市场会比较稳定。但是人们投资的目的是绩效，因此，重要的是股票上涨或下跌，不是股票的基本价值，如果每一个人都抛弃基本价值，开始追求绩效的高下，市场会变得不稳定，大家只好随波逐流。

从宏观的角度来看，索罗斯看出了制度性的问题，为了拥有稳定的制度，我们需要一些基本价值观来支持这个制度。

这点适用于市场，更适用于政治，如果基本价值观有缺陷，甚至更糟糕的是，大家断定所有基本价值观都有缺陷时，会发生什么情况？制度会变得不稳定，进入动态不

极限投机

均衡的状态。问题是，根据索罗斯的反射理论，所有基本信念的确都有缺陷，所有人类的构思都有缺陷，在某些状况下，缺陷可能变得明显，如果他的反射理论普遍被人接受，所有基本价值观的潜在缺陷会变得很明显。人们又怎么能够依靠他们知道可能有缺陷的价值观呢？难处就在这里，索罗斯认为稳定、近乎均衡的状态最合乎要求，可是他的反射理论却侵蚀了大家对基本价值观的信念。

所以他的反射理论本身就是反射性的，好象自我毁灭的预言。这个理论导出一个问题：你怎么能够相信你知道有缺陷的信念呢？有解决之道吗？有，如果我们接受“我们的理解天生就不完全”，我们可以根据这一点建构一个价值体系。当然，索罗斯相信自己会犯错的观念，就是在建构价值体系。可以说得不那么抽象。

但是这里必须引进开放社会和封闭社会的观念，开放社会的基础是承认我们自己会犯错，封闭社会则是否定。事实上，如果我们都会犯错，开放社会就胜过封闭社会，因为在封闭社会里，没有思想和选择的自由，但问题是，只有亲身经历社会的压制或对封闭社会强烈反感的人，才会拥有这种观点，生下来就享受开放社会好处的人，不会自然而然的抱持这种看法。

索罗斯最近在英国和一群知识分子讨论这个问题时，有一个有趣的经验。有人说：“我从来不知道我活在开放社会里。”这点是开放社会的严重缺陷，自由像空气一样，大家都认为是理所当然，但是从另外一方面讲，自由和空气很不相像，如果你不珍惜、不保护，你很可能会丧失自

第十章 另一种恐惧：我不辩论，我只开枪

由。干净的空气也是这样。这个比喻比索罗斯想象的贴切。总而言之，开放社会植基在承认自己会犯错，如何把这一点变成确切不疑的基本价值观呢？这是个问题，不过他已经满意的解决了这个问题，但是不能确定是否可以阐述清楚，这是很难的工作，相信人们拥护的东西代表最终真理很容易，要拥护一种以承认自己可能以错误为基础的社会组织形态就比较难。你必须证明最终的真理不可能得到，这需要时间，需要很多时间，因为你必须为索罗斯在这里提到的东西彻底辩护，时间可能逐渐不够——尤其是你和一个手上恰好有枪的人辩论时。

去年夏季，在波普死前，索罗斯和他在布拉格见过面，他告诉索罗斯一个故事，说他好多年前在奥地利的一个湖边，试图和一个人辩论这一点，那个人说：“我不辩论，我只开枪。”这个人穿衣服时，他穿上一件纳粹黑衫队的制服。

奇怪的是，这一点仍然是世界今天所面临的主要困难，如果我们希望有开放社会，我们必须准备好保护开放社会，我们必须相信这是共同的利益，个人的利益必须置于共同利益之下，但是自称献身于民主和自由市场的人，很少有人会同意这种看法。

目前似乎有一种很抽象的观念，普遍得到认同，就是自由竞争的理念，这种观念几乎已经变得像母乳一样。允许大家追逐自己的利益，市场机能会照顾其他一切事情，这种主张的背后是假设市场总是正确的。人们知道索罗斯采取反对的立场，人类所有的构思天生都有缺陷，政府管

极限投机

制无效的事实，并不保证没有政府管制会运作得更好，市场机能之所以会变得比其他的安排好，完全是因为它能够提供回馈，并且容许错误改正。这点和邱吉尔对民主制度的名言相同：这是最差的制度，除了其他所有制度之外。

漫步的历史

索罗斯相信自由市场和民主制度，但是有一点他和主张自由放任的人不同，他认为追求自利是不够的，你必须把自由市场、民主制度和开放社会的共同利益，摆在自我利益之上，否则这个制度无法生存。

金融市场有一个缺陷：它天生不稳定，金融市场需要主管当局某些监督，主管当局显然有维护或重建稳定的责任，历史已经显示，不受管理的市场可能崩溃，中央银行就是在一系列的银行危机之后，发展出来的结果。

但是在这里我们发现另外一个问题：主管机关不会比市场完美——事实上，他们甚至比较不完美，因此，管制总是会产生意料之外的结果。通常是在市场机能的运作有缺陷时，才会实施管制，但是管制经常造成扭曲，最后管制变成无法运作，管制本身也崩溃了。接着我们会经历一种钟摆式的摆荡，从自由放任摆到过度控制的另一个极端，索罗斯认为这种摆荡是无法避免的，重要的问题是，这种摆荡会摆到什么程度，会局限在可以容忍的范围内呢，还是超出。在运作顺畅的金融市场或政治制度里，管制往往高明到几乎让人浑然不觉，但是在系统崩溃时，就

第十章 另一种恐惧：我不辩论，我只开枪

会造成崩盘或大萧条，然后随之而来的管制可能也会变得过度。同样，如果开放社会不至于崩溃的话，封闭社会就没有存在的空间。

所以索罗斯把历史当成一个巨大的形态，封闭社会和开放社会在其中交替出现。当然，也并不尽然，这种情形只有在历史遵循预定的形态时出现，他的理论的整个论点是事件的过程并不确定，如果大家费心维护开放社会，开放社会可以永远延续下去，是否延续要看众人。封闭社会有时候看来似乎可以永远存续，即使封闭社会不能永远存续，他们也尝试宣称自己具有永恒价值。如果你停下来想一想，人们提到开放社会和封闭社会交替的形态并不属于历史，是因为我们辨明了开放社会和封闭社会的差异后，它们才进入历史中，如果这是我们所能找到的唯一差异，它就是我们能够观察到的唯一形态。

应该指出，开放和封闭社会其实不是历史观念，历史受到时间限制，而这些观念超越时间的限制，他们恰好与历史的现阶段相关，而且就 1989 年的东欧巨变而言，这些观念变得特别清楚，但是在历史中有很多时代，其他的差异比较突出。如果开放社会不是历史观念，那它是什么？索罗斯说，他是以思想和实际状况有矛盾为基础的纯粹理论观念，处理这种矛盾有两种方法，开放社会承认矛盾存在，封闭社会否认有矛盾，这些矛盾是抽象的模型，实际的状况可能会接近这种模型，但是从来不会非常接近，否则思想和实际状况之间就不会有矛盾了。

极限投机

那么，索罗斯是如何在开放与封闭社会的架构和近乎均衡与远离均衡的差异之间建立起关系的呢？开放社会等于近乎均衡状态，封闭社会等于静态不均衡状态，这一点不足为奇，因为，两种二分法都是根据同样的前提，也就是参与者根据不完全理解而行动。动态不均衡属于哪个部分？近乎均衡可以等同于开放社会，极端的僵化等同于封闭社会，但是极端的变动等同于什么？

极端的变动是制度的变化，而不是制度本身，是一种压缩在时间里的程序，而不是有某种持续程度的事物状态，就像海森柏格理论中的量子一样，可以被视为粒子，也可以视为波，两者可以互换。

近乎均衡和远离均衡的差异，以及开放与封闭社会的差异合并在一起，可以变成制度变化的研究，索罗斯对制度变化特别有兴趣，但他要强调的是，开放和封闭社会不是历史上可以观察到的唯一制度，事实上，在历史里观察不到这些制度，因为这两种东西是理论的构思。可以观察的制度有很多不同的种类：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盛行在特定公司行业或机构的制度，甚至在个人生活中的制度，例如和不同配偶结婚的制度，思想学派、流行风尚等等的制度，索罗斯他的制度变化理论也应该适用在这些领域内。在理论和实务上，他一生都参与制度的改变，在理论方面他一直没有很大的进展，因为他不能够定义制度的组成分子是什么，制度是某种心灵构思，但是哪一种心灵构思呢？

在现实生活中，人们不可能发现单独运作的制度，即

第十章 另一种恐惧：我不辩论，我只开枪

使在金融市场里，盛衰程序也经常遭遇外来的打击，例如国际投资盛衰程序，受到墨西哥危机的打击。索罗斯很少谈制度的组成因素，以及制度彼此如何冲突之类的问题。

但是他从年少时代，就得到很多实际经验，像在纳粹占领的匈牙利，他以 14 岁的犹太裔小男孩，开始得到经验，接着又在苏联的占领中得到经验，他开始在金融市场活跃时，对盛衰程序有专门研究，他设立基金会时，就参与了一场针对自己和金融市场革命。

在他的开放和封闭社会观念，以及他的盛衰理论之间，怎么能够扯上关系呢？要在孤立状态中研究盛衰过程和其他形式的制度变化很难，因为制度不是孤立的，此外，不同制度之间的关系很不清楚，他们不是整齐地聚在一起，不是较小的制度包含在较大制度里，而是以随机的方式构成、相融和重叠在一起，这就是大家这么经常地谈到外在震撼的原因。

在这方面，开放社会和封闭社会相当特别，这两种社会都是涵盖一切的，影响力及于生存的所有层面，包含所有其他制度的社会，这一点使它们特别适于拿来当作制度变化的研究，能够研究一个封闭社会的兴衰，例如像苏联这种全面涵盖的封闭社会，是极为难得的机会。

开放与封闭社会在另一方面也相当特殊，他们都拥有大家可能渴望的理想，索罗斯坚决拥护开放社会是理想的社会组织形态，很多人也是——尤其是那些曾经在封闭社会中生活过的人。

但是作为一种理想，开放社会并非毫无缺陷，不稳

极限投机

定、缺乏价值观都是不好的特质，开放社会这种理想这么脆弱，原因就在这里。封闭社会提供的远景就比较有吸引力，但是在封闭社会里，理想和现实差距太远，在开放社会里两者则相当接近，人们必须了解思考和现实状况之间的矛盾，才会选择开放社会。

重建价值观

索罗斯把开放社会当作最重要的理想。这是因为开放社会的基础是承认我们的理解天生就有缺陷，这点听起来像是不好的特质，但是不妨反过头来看，不完美的东西可以改进，如果接受伴随我们会犯错而来的不确定，就开启了持续改进的宽广空间。

科学是最好的例子，科学是人类智慧的结晶，科学稳固的根基在会犯错的观念上，如果科学理论包含最终真理，再试验科学理论就毫无意义，科学的进步就会停止。科学是一个特殊的例子，因为，它有可靠的标准可以利用，也就是说，有事实可以利用。人类从事的其他领域，像哲学、艺术、政治学、经济学，就这种严格的程序而言，就不像科学这么适宜，不过，人们仍然可以正确的说，如果你放弃追求完美这种不可能的要求，就开启了进步之道，开放社会通常都伴随着进步和繁荣的确证比比皆是。

但是开放社会有一个致命的缺陷，在开放社会里生活的人，不把开放社会的观念当成值得奋斗的理想，为什

第十章 另一种恐惧：我不辩论，我只开枪

么？很简单：开放社会提供选择的自由。没有选择的自由，就值得去奋斗，但是如果有选择的自由，就不足以成为奋斗的目标——这时仍然需要选择。你不可能只是民主人士，你必须在社会民主、自由民主、基督民主、或任何其他形式之中选择，这是民主人士之间总是争执不下的原因，而拥护封闭社会的人可以保持纪律和团结。

这绝非代表开放社会注定会失败。只要开放社会被视为共同的价值观，民主人士之间就算继续内争，也仍然抗拒开放社会的敌人，问题是，开放社会是本身最大的敌人，因为开放社会没有被人们视之为共同的价值观，这一点波普没有指出来。前面索罗斯已经说过，大家可能愿意为国王和国家牺牲——其实这种情形也越来越罕见了——但是他们绝对不愿意为开放社会的观念牺牲。

那么，为什么美国人应该为其他国家的开放社会而牺牲呢？这个问题问得好，答案是开放社会是普遍适用的观念，犯错是人之常情，所有的人类都如此。美国独立宣言宣称人生而平等，就它的原始含义而言，这点并非不辩自明的道理，但是如果把它当成叙述人类状况的陈述，就可以证明这样说确实有道理，就我们会犯错（和会死亡）来说，我们的确是生而平等的，这点可以做为人类共同价值观的基础。

索罗斯从自己会犯错的信念导出开放社会作为共同价值观基础的概念，这个过程很多人仍然不明白。索罗斯便反复解释，因为过程不明显，他可以说明到令他自己满意的程度，事实上，他也已经说明；但是他不能期望别人分

极限投机

享他的观点。的确如此，必须承认，他在某些方面与众不同，我们不必提才智学问，世界上没有几个人能像他一样拥有超出自己需要的金钱，这点使他和其他人不同，就好象他不受地心引力法则拘束一样，他可以纵容自己的梦想任意飞翔，他的梦想是提供开放社会的观念，但是在这里，他遇到自己会犯错的问题，这个限制他无法跳脱。

为了创造开放社会，光是他信仰这个理念还不够，社会必须共同拥有这种信念，这就是他惨遭欺骗的地方，他发现生活在集权政权下的人，衷心信仰开放社会的观念，只是名称可能不同，人们不需要清清楚楚地说出来，人们拥有同样的价值观，索罗斯可以强化这种价值观，利用他的基金会加强他们的力量。他也从自己的理论架构中得知开放社会有缺乏价值观的弊病，他觉得欧洲特别需要一种振兴和激励的观念，因为条约本身不足以使欧洲团结一致，他认为热心拥护开放社会观念的东欧可以提供这种激励作用。

但是，情势背道而驰，西方没有捉住机会，火焰已经熄灭，现在很难在前集权国家里提倡衷心拥护开放社会的观念。索罗斯有一个基金会的网路，这些基金会维持火焰不熄灭，但是他必须自问，他是否在追求不可能达成的梦想。总体而言，为基金会工作的人都相信开放社会，就这点来说他并不孤独；但是他利用基金会提供金钱给他们，使他们免于受影响他人的限制所拘束，就这点而言，他们纵容自己活在一个共通的幻梦中。要把他们的梦想变成实际，整个社会必须变成共同拥有开放社会的价值观，但是

第十章 另一种恐惧：我不辩论，我只开枪

在这方面索罗斯发现有一种无法克服的困难，这不是迫不及待的工作，因为开放社会的观念逐渐退潮，但是假设这些国家成功的转型成为开放社会，他们会变得像西欧国家一样，追求本身的利益，不再关心开放社会的理想，他已经在捷克共和国看到这种事情发生。

这点促使他把注意力转向西方的开放社会，他必须说服西方国家，需要把开放社会当成同共的利益、共同的价值观，但是他不知道如何进行。一个人通常可以根据自己的信念作推测，他在亚里斯多德的著作里读到：人根据自己的形象创造神。但是就他的情况来说，这样必定愚蠢之至，他必须认定自己是个特殊的案例，他也必须记住他这么热心献身于开放社会的观念之前，曾经相当专心的只想赚钱，他不能把自己当作典范，必须找其他的方法鼓吹他的理念，但是他遭到困难，他明白自己是在对抗流行趋势。作为投资者，他会打退堂鼓，但是这件事关系到的利益太重大了，他可以清楚的看到，流行的趋势威胁到人们文明的生存，即使会输也值得他去奋战。

但是如果没有任何一个人掌握最终真理，人们就需要一种确保每个人有权选择的社会组织形态。这是索罗斯的另一个观点。

不过如果没有人握有最终真理，谁给人们权力，把他们理想中的社会组织形态强加在别人身上？

这种社会组织形态铭刻在美国宪法中，而且也是英国不成文宪法的根基。

极限投机

但是人们仍然需要一个强力的主张，能够让每个人都能在别的国家为开放社会奋斗。索罗斯认为，这正是问题所在。我们需要一个提倡和保护开放社会原则的世界秩序，但是没有人认识到这种需要，我们从来没有过世界秩序，为什么现在需要呢？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总是由权力主导，和平及稳定总是依靠均衡来维持；但是冷战期间极为稳定的权力均衡已经破坏，眼前看不到新的均衡，我们需要找到一种共同的立场，一些普遍被人接受的概念，使我们能够经由冲突，抗拒创造民族主义或原教旨主义教派独裁政权的诱惑。索罗斯相信开放社会的观念能够作为这种共同立场，但是他的信念并未受到普遍的赞同，没有一些共享的信念和稳定的权力关系阻止人们的文明走向危机，这点是他一直尝试沟通的理念，也是他到目前为止——无论作为哲学家或行动者——没有成功的地方。

第十一章 他并不想赚很多钱

第十一章

他并不想赚很多钱

权力之谜

25 年来，索罗斯的人生呈现出很大的变化，但是最重要的变化，很可能是他变得有很大的个人权力。这一点改变了他的人生。他认为，这是变得更好，虽然有一些不利的地方，但是在他一生大部分时间里，这一点他都没有做得很成功，一直到英镑危机之后，他变成公众人物，他在世界上的地位才真正的改变，他现在主要担心的是，他的理念是否配得上人们对他的注意。

在 1990 年年初，索罗斯的一位朋友对他说到：他无法使美国财政部和国际货币基金接纳你对东欧的一些看法，华盛顿认为不过是另一个在华尔街赚了很多钱，希望变成要人的人。当时我们讨论到你加强争取知名度，得到

极限投机

新闻界更多的注意的方法，因为那样做是让人注意自己的最佳方法。”不错，索罗斯是发动了一次重大的个人公关活动，得到他现在所拥有的权力，这点和他以前的风格不同，但是对他很有用处。

不过，索罗斯认为这点不完全正确，他并没有发动公关活动，他只是不像 1989 年以前那样回避新闻界。他知道准确的转折点是在什么时候，是在 1989 年 10 月或 11 月，当时他希望面见布什总统，和他讨论用什么新方法对待当时仍未解体的苏联，他没能见到布什，只见到助理国务卿拉利·伊戈柏格，就是这个时候索罗斯决定写一本书。但是，甚至在更早的时候，他曾尝试去见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因为他希望她赞助一个为苏联而兴办的撒切尔计划，他觉得她是唯一能够领导世界走向正确方向的人，因为她在美国和欧洲都有广泛的影响力，他没能见到她，他可以把自已的一些备忘录送给她看，但是不能和她见面，一直到她离职，她才打电话给他，希望他对她设立基金会提供意见。索罗斯也不能和戈尔巴乔夫见面，他回避索罗斯，因为他害怕讨论经济事务，所以虽然索罗斯相当活跃，而且相当有影响力，他还是不能拥有他希望有的关系。遗憾的是，他之所以得到大家的认同，并不是因为他的善行或哲学，而是因为他的赚钱能力，他在英镑上赚到惊人的利润，使他得到很高的知名度，他认为这点为我们社会流行的价值观增加了注脚。

索罗斯在英镑上的成功，加上他能够接近新闻界，的

第十一章 他并不想赚很多钱

确让他建立起了公共形象，因而发展他的权力

但他却说：“我对这种权力的观念很困惑，大家都说我有很多权力，但是，这种权力由什么组成呢？我能够推动市场吗？或许可以，但是只有在我猜对市场走向时；如果我猜错了，我会一败涂地。我能影响政府吗？我现在开始可以影响政府了，但完全是因为我所建立的名声。”

索罗斯的权力来自他的名声，而非他的名声来自权力，但是名声是来自新闻界。

不过他并没有去恳求新闻界，他只是在亚当·史密斯的电视《金钱世界》里接受访问，谈论英镑危机而已，这个节目正好配合英国一个电视节目，打响了他的名声，使他成为“击败英格兰银行的人”。要是他这么容易采访得到，新闻界一定会比实际上更早就设法摧毁他了，因为索罗斯不恳求新闻界，所以他们才对他说的话有兴趣，可是他不能选择话题，他们找他谈论金融事务，而且大部分时间里他都不回答。英镑危机让索罗斯与媒体的关系热乎起来，起来人们也许不相信，一直到1992年，他想在《华尔街日报》或《纽约时报》的舆论版上刊出一篇谈论东欧事务的文章，都有困难。

基本上，索罗斯在大部分西方国家里，得到新闻界的友善待遇比预期的时间长，但不久之后，大有可能是因为大家听烦了他一切不可思议的行为，才开始对他吹毛求疵，对于这一点他不应该觉得难过。但是有一些事情让他备受困扰，因为他的权力遭到夸大，他变成目前最新版反

极限投机

犹太阴谋理论的首要目标，要是有谁符合犹太财阀激进复国主义阴谋家的典型，那就非他莫属了。事实上，这正是索罗斯在东欧逐渐被人抹黑的形象，在西欧也有某种程度的抹黑，但是在美国倒不太多，这种情形正是好事多磨的好例子。他设立开放社会基金会的原始目的，是创造一个让这种阴谋理论不会蓬勃发展的社会，但是在拥护开放社会的过程中，他得到一种神秘的力量，这种力量事实上助长了这种阴谋理论，人们看得出当中的讽刺意味吗？

索罗斯不知道这是不是名之所至，谤亦随之。一开始，索罗斯是新闻界好奇、追求的对象，新闻界想报道他，因为他很成功；但是，在每个人都知道他的一切之后，唯一让人有兴趣的是找到一个攻击他的理由，所以他的一位朋友认为这是一种正常情形，没有什么更深的意义。索罗斯却认为：

“那是因为你是美国人，而且不了解在欧洲——尤其在东欧——流行的那种神话，反犹太主义有很深的根源，起源早在希特勒之前，可以回溯到上世纪末对犹太人有计划的大屠杀，甚至起源在更早之前。这种神话深藏在人心的黑暗面，在困难、动荡和混乱的时候，就会公开表露出来。”

犹太血统：理念风暴的血肉基础

索罗斯的犹太血缘，对他的理念发展有深远的影响，

第十一章 他并不想赚很多钱

请设身处地想想，因为他是犹太人，在14岁时就面临被处决的危险，这样的处境对你难道没有影响吗？这还是问题出现在他的意识前端时的情形，但是这种事从他出生就潜藏在他的背景里，他花了一生大部分的时间来应付这个问题。

同样，他的犹太血缘也是他拥护开放社会观念的原因。

毫无疑问其中有关联，看看犹太人对待迫害的方法，人们会发现他们通常遵循两种方式逃避：不是超越问题转向某些普遍被接受的事情，就是和压迫者认同，尝试变成像压迫者一样。索罗斯出生在同化主义的家庭，他选择第一条路线，另一个路线是犹太复国主义，就是在犹太人占多数时建立国家。

关于犹太复国主义，索罗斯说，他对普遍的人类状况有兴趣，犹太复国主义根本不能吸引他，但是他从来没有积极反对犹太复国主义，他觉得身为犹太人，除非他真的变成以色列国民，否则他没有权力反对以色列这个国家，他相信如果他搬去那里，他大部分时间都会像许多以色列人一样，站在反对的一方，像现在这种情况，他只是置身事外，或许可以说是逃脱吧。

他访问了以色列，发现自己完全支持拉宾和佩雷斯联合政府尝试达成的和解政策，唯一的问题是，他们将打交道的对象搞错了，阿拉法特大致上已经失去阿拉伯人的支持，这是他愿意达成协议的原因，索罗斯怀疑如果不把哈

极限投机

玛斯组织拉进来，和平过程不可能完全成功。他告诉佩雷斯，在波兰开始和解过程、让团结工会掌握政权之前，他和雅鲁泽尔斯基将军见过面，雅鲁泽尔斯基告诉他，除了团结工会之外，他愿意与任何人打交道，因为团结工会的人是叛国者。索罗斯告诉他，说他犯了重大的错误，因为团结工会的领袖是爱国者，虽然和解会侵蚀团结工会的权力基础，因为他们的权力基础在重工业，而经济改革会摧毁重工业，他们仍然急着达成和平协议。后来索罗斯听说自己的说法让雅鲁泽尔斯基动心，他不能对佩雷斯说同样的话，因为话说回来，团结工会这批人远比哈玛斯那批人好多了。

索罗斯并没有反对所有形式的民族主义情感，他只是反对“不管对错，这是我的国家”的那种民族主义主张，巧合的是，这种态度在海外犹太人身上比较明显，在其他国家的国民身上反而不明显。海外犹太人在爱尔兰、希腊或波罗的海国家中制造很多困扰，更别提在以色列了。此外，他认为民族情感或种族认同，是开放社会可贵的东西，是备受欢迎的多元化来源。

索罗斯以身为犹太人为荣，虽然他必须承认他几乎花了一辈人的时间才走到认识这一点的地步，他一直受到自尊心低落的困扰，这是主张同化主义犹太人的锥心之痛，是一种沉重的负担，只有在他承认自己成功时，才能够卸下这种重担。他认同犹太血缘就是认同少数民族，他相信有犹太天才这种事情，人们只需要看看犹太人在科学、经济生活或艺术上的成就就知道了。这就是犹太人超越少数

第十一章 他并不想赚很多钱

民族地位，获致超凡脱俗成就的结果。犹太人学会从很多不同的角度，甚至从最矛盾的观点考虑每一个问题，身为少数民族，犹太人等于被迫要用批判性的方式思考，如果索罗斯身上有什么犹太天才，完全是因为他有批判性思考的能力，就这点而言，犹太血缘是他人格中的一个基本因素，他以这一点为骄傲。

他也知道在他的思想里，有若干成分的犹太乌托邦主义，他和他的基金会就是那种传统的一部分，这是欧洲联盟的观念让他这么兴奋的原因，在欧洲联盟里，每一个国家都是少数，这点就是这个观念这么有吸引力的原因。

人通常是根据自我投射到全体，大部分人从自身的经验中得到自己的原则，索罗斯也不例外，因此对于有人最初问到他的看法和他的犹太血缘有无关系，他肯定的回答说：“有；但是，这点有什么不对吗？”

一点不错，但是他相信开放社会的观念是成是败，必须靠它本身的价值决定。犹太人不是唯一的少数民族，在大多数社会里，如果少数民族愿意为自己的意见奋斗，少数民族的意见会成为多数人的意见。

索罗斯又是如何来对付自东欧的反犹太主义的攻击呢？他认为不能直接和反犹太主义战斗，禁止不能使反犹太主义消失，只是把它赶到地下；最好的对付方式是通过教育，反犹太主义是无知者的安慰，如果让它公开展现，让它暴露在日光下，它就会萎缩，就像大法官布兰迪斯说的：“阳光是最好的杀菌剂。”在匈牙利发生过这样的事情，有一个极端右翼团体攻击索罗斯的基金会，也对索罗

极限投机

斯本人作人身攻击，说他传播非匈牙利的观念。但是他们犯了说出自己理念的错误，舆论判断后，认为不需要他们，所以他们无法进入国会。

如何躲开媒体那只怪兽

这种攻击一点也不会让索罗斯生气。他不在乎这种攻击，他很高兴能够面对他们，对抗他们，这是一种驱邪的心态。总而言之，他是这样子看待他们的。

从这方面来说，索罗斯发现金融市场中围绕着他的神秘气氛，让他非常困扰。金融市场的一切的确很神秘，连他也不能完全了解，他现在明白，他过去其实不了解自己的影响力。举一个例子，基金会曾经出价要买下一家破产的意大利连锁旅馆，不过喜来登出的价格比他们高。但喜来登也没有取得控制权，因为股东认为如果索罗斯想要这家公司，他们当然也能要这家公司，所以就认购了新股。索罗斯觉得从那次之后，他的名声逐渐降低，他想说的是，他在金融市场的影响力并非完全凭空想象，而是有一点像炼金术士一样，炼金术会深入人心，创造阴谋。

人们不知道东欧的新闻界多么会虚构事实，他们习于含沙射影，你几乎不可能拿事实让他们了解，西方一些新闻界也好不到哪里去。

新闻界很可能怀疑索罗斯的动机，他们根本不能相信他这样做完全是为了利他的原因，他这样做在人类经验中

第十一章 他并不想赚很多钱

几乎是独一无二的，通常每个人在某些地方都有一个隐藏的目的，新闻界急于找出索罗斯有什么目的。

索罗斯不怪他们，他也会怀疑，他发现自己处在一个很奇怪的状态中，事实上他得到相当大的权威，在他设有基金会的国家尤其如此。一直到最近他和马其顿总理布兰柯·塞凡科夫斯基谈话，才发现为什么如此。据说国家只有利益，没有原则，政治家也可以这么说，但是身为一个无国籍的政治家，索罗斯其实处在相反的地位，他只有原则，没有利益，就是这点让他得到权威。股市投机客处在这种地位实在是很奇怪，但是这种地位让他很满足，无论如何他都不会放弃，所以即使有任何隐藏的目的，也不会纵容自己去达成这个目的，但是他不能期望新闻界了解这一点，他自己也是一直到最近才明白的。

索罗斯不希望宣称自己是利他主义者，他不相信行动可能不掺杂个人动机，他恰好处在很特殊的地位，因为他赚到超过自己所需要的金钱，如果他没有余钱，他不会成为慈善家，他要提醒人们，他是在致富之后才开始这样做的。这又是神奇的复利魔法，如果你每年赚 30% 到 40%，连续赚 25 年，即使你开始时只有很少的钱，也可以赚到很多钱，所以他赚到的钱的确多得惊人。他要说的是，他和其他也赚到这么多钱的人之间，主要的差异是他对理念很有兴趣，而且金钱对他个人没有多少用处。不过他很不愿意想象：如果没有赚到钱会是什么情况，这种情况应该是他的理念不会发挥多少作用吧！

极限投机

每一个人都注意索罗斯的基金会。除了基金会之外，他很少其他的慈善事业，支持艺术团体，捐钱给自己不直接参与的事业。

他的基金会支持追求相同目标的其他基金会，但是他只限于支持自己的基金会。实际上这点他相当固执，因为如果他一破例，以后就没完没了，例如他拒绝捐助设立大学讲座，也不支持歌剧院或交响乐团。

物质从来没有让索罗斯得到很多快乐，他并不收藏任何东西。

他发现收藏完全与他的个性不合，因为索罗斯拥有抽象的心灵，而收藏是人们所能够做的事情当中最有形的一种，人们不只是买一些油画，或在自己的酒窖里拥有一些酒瓶而已，而且还必须记得这些油画或酒瓶的名字，索罗斯觉得这样让他很厌烦。

金钱与快乐

索罗斯对金钱的看法很有意思，他曾经对朋友说过他有足够的聪明才智致富，但是他似乎不想赚很多钱。他认为生意没那么复杂，很多资质平凡的人都赚了不少钱，真正聪明的人要是真的努力去做，可以累积一大笔财富，他自己的问题是喜欢做有兴趣的工作，有些想致富的人不在乎他做的是什么事，只一心一意想赚钱，这些人整天想的都是怎么能够多赚钱，要是这样表示必须设立更多的擦鞋

第十一章 他并不想赚很多钱

店，他们也会这样做。

到底什么东西才能够让索罗斯快乐呢？在当学生时索罗斯看过一本书，叫做《观念的探险》，是怀海德写的，索罗斯说《观念的探险》能够吸引他，思考是他存在最重要的一部分，他是相当深思的人，喜欢理解。年轻时他花很多时间作哲学上的思考，浪费一大段青春时光在一些观念中神游，然后他发现行动比思考能够学到更多东西，所以他变成行动派思想家。从此他的思想在决定该采取什么行动时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的行动在改善他的思想上也扮演重要的角色。这种思想和行动间的双向互动，成为他的哲学和人生的正字标记。

成为亿万富翁后，索罗斯在物质上得到的最有形的好处大概是可以好好地打网球，另外还有一些其他的好处。能够和有意思的人见面，这当然是很大的好处，只是现在到处都有人邀请他去，他反而哪里都没有时间去。但是他的确参与一些有意思的活动。可以说他是对历史上瘾的人，因为他真的想影响历史，有意思的是他已经开始治疗这种瘾头，早年他几乎会不择手段的想拥有这种影响力，希望觉得自己重要，但是他开始有影响力后，反而变得比较保守，比较不那么急切的想发挥影响力。他认为这样使他更有效率，因为他不再急着到大家不敢去的地方，他保持一种距离，不再强力推销自己的理念，而是等待别人来问他的意见，不把自己的意见加在别人身上。毫无疑问，成为历史舞台上的角色对索罗斯很有吸引力，但是他再也

极限投机

没有觉得自己很重要的想法了。

索罗斯怎么看待自己在历史上的地位呢？这大有问题。在投资管理方面，他的确已经达到超凡入圣的境界，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他都不大可能丧失这种地位，只是光芒可能略微减损而已。他也靠着他的基金会，在基金会运作的国家里产生实质的影响，但是他能不能用他的理念留下一些影响呢？他能不能正确地组织和传播他的理念呢？这些理念正确吗？对他来说这是最重要的事情，也是他觉得最没有安全感的地方。同样一组理念协助他赚钱和捐钱，这种理念对他有用，却不表示放诸四海皆准。相反的，在某些方面他是个例外，他赚的钱超过他的需要，使他能够从地心引力法则中解脱出来，有能力支持抽象的原则，但是他不能期望别人也这样做，他也是致富之后才这样做的——如果他很早就支持这些原则，他可能不会致富。这就是他担心把开放社会当成政策目标的原因，别人有能力支持这种目标吗？

索罗斯有能力处在独一无二的地位上，这点可能是他在历史上的角色。

索罗斯本人也是这样看。他对这点觉得很满意，他的问题是推己及人的经验，这些东西对别人有同样的意义吗？这一点他很怀疑，但是如果大家不能一致承认开放社会是值得奋斗的目标，那么我们的全球制度又如何生存下去？这是世界所面临的问题，他不知道答案是什么，这个问题同样已困住他，他相信这个问题把我们大家都困住了。

第十一章 他并不想赚很多钱

复杂的世界问题是否让索罗斯有点退缩呢？当然如此，我们人类的能力有限。他这一生前 60 年，主要是面对外在障碍，但是他得到一些权力和影响力之后，越来越了解自己内心的限制。他在涉及情感方面有程度上的限制，在他面对一些比较恐怖的人性问题，发生波希米亚及车臣的惨剧时，他变得多少有点习惯这些事情了，他不喜欢承认，但的确是这样。他也逐渐了解自己智慧上的限制，他曾经认为他在解决世界问题方面有积极的贡献，他一向都了解很多问题没有解决之道，不过他以为自己可以带来新的思考，现在他仍然这样想，但是他发现有些情形令人沮丧，他发现世界各种问题、世界秩序问题和联合国的改革问题，几乎都不可能解决。

他现在比较注重政治问题，但是他现在记忆力没有以前好，这是年老的好处之一，大多数人很担心丧失记忆力，这点让他们不安；索罗斯倒不觉得困扰，第一，他有很多朋友替他记忆事情，第二，大家认为他有比记名字和记信息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如果不担心丧失记忆，就不是问题。不过他的头脑对于现在流行的观念，以及它们的历史参考价值仍然很清楚。

索罗斯已经走过一段令人难以相信的经历，人们不知道他是否曾经想到自己会走到什么地步。少年时间他的确拥有一些超人的幻想，他偶尔也谈到自己像神一样的救世主冲动，现在越接近实现这些幻想，他越明白自己的人性

极限投机

弱点。不过，虽然有这一切雄心壮志，有时候他对自己的实际成就，仍然会惊叹不已。在他的慈善事业方面尤其如此，他到处旅行看到结果时，觉得这些结果相当惊人，他也很感恩。

看到在公众眼中的他，他说：

“那不是我，我知道自己所占的地位，并且努力去配合做到，但是那不等于我心目中的我，我不比任何人了解真正的我，但是我知道一件事：虽然我明白那种公共角色不是我——是身外的我——但那种角色的确影响到我，我不会因为那种公共角色而有不同。在私我和公共角色之间有一种双向反射性互动，显然我在塑造那种角色方面扮演某种角色，但是那种角色也塑造了我，我可以看出公众角色如何影响我，而且我必须说，整体而言，这种影响非常好，真正的我变得比以前更快乐、更好、更协调、更满足；换句话说，我真的喜欢我的角色，那是我创造出来的角色，我引以为荣。这点和我事业生涯最有生产力的时期对自己的看法相比，是很大的变化，过去我因为某些原因，曾经以自己为耻，现在我已经完全从这种状态中解脱出来，我以前也相当孤独，现在我深入人间，所以整体来说，拥有那种公共角色，使我私下变成比较快乐的人。”

这种私我的观念让索罗斯很好奇，因为他觉得让他快乐的很多事情，都是他亲身经历的事情，有朋友问他：“你是否从其他人——你的家人和朋友——那里得到任何快乐呢？”

第十一章 他并不想赚很多钱

当然，但是必须承认，他是自己最严苛的批评者，对他来说，他对自己的评断比别人的看法更重要。他发现感谢和奉承让人尴尬之至，不过现在他对自己仍然有相当多的好评，因此他可以接受别人对他的好评，有时候他从别人对他的好感中得到很大的满足，而且因为他这么完满的实现自己的雄心，他现在有一些时间可以留给家人和朋友。

运动对索罗斯也很重要，像滑雪和打网球，但他并不希望有更多的运动时间。

他认为他已经拥有够多的运动时间，现在他的运动能力多少有些限制，他固定打网球，过去他很热中滑雪，但是现在他觉得滑雪相当耗费精力，所以他觉得他已经尽他所能地运动了。

大家一直对索罗斯个人太注意，这个主题让他有兴趣，而且他可以永远不停地谈下去，因为他对于父母之间的冲突——在他小时候，他们的冲突显然对他造成很深的影响——在他们去世很久后，仍然继续萦绕、迷惑在他的心头。但是这种偏重他自己的情形已经有一些不好的副作用，为了推广某些理念，他变成公众人物，现在问题来了，在他的合作伙伴和他自己的心里浮现一个问题：基金会网络和他所做的一切事情，是否只是为了达到壮大自己的目的。这是一个严肃的问题，他不能因为做这些事情的是他自己，就可以免于建立个人崇拜的指责，他认为他已经到达应该压制自我启示这种冲动的境界。这本书应该是

极限投机

他最后一次这样探讨他的人格，他希望有维护这种决心的力量。

附 录 索罗斯演讲与文选

附 录

索罗斯演讲与文选

一、动态避险

我很荣幸有这个机会在贵委员会之前作证，我相信贵委员会关心金融市场的稳定是正确之举，因为金融市场可能变得不稳定，需要不断认真的监督，以防止严重的失序。最近的价格波动，特别是利率工具市场的波动，显示应该密切注意金融市场的运作方式。

对市场的看法不同

我首先必须陈述我和流行的看法有基本上的歧异，一般接受的理论是，金融市场通常会趋向平衡，而且大致上会正确地考虑未来。我根据与此不同的理论操作，我的理论认为金融市场不可能正确的考虑未来，因为金融市场不只是考虑未来而已，也协助塑造未来，在某些情况下，金

极限投机

融市场可能影响基本面，本来市场应该反映基本面的，这种情形出现时，市场会进入动态不均衡的状态，并且表现出来的行为和效率市场理论认为正常的状况相当不同。这种盛衰序列不常发生，但是发生时可能有很大的破坏力量，因为它们会影响经济的基本面。

时间不够我详述我的理论，我在拙作《金融炼金术》中已经详细讨论我的理论，在这里想申论的唯一论点是，盛衰序列会出现，完全是因为市场由追随趋势的行为主宰。我所指的追随趋势行为是指大家在一种自我强化的方式中，随着价格上涨买进，随着价格下跌卖出，不均衡的追随市场行为，是产生剧烈市场崩盘的重要因素，但是不足以造成崩盘。

因此，你们需要问的关键问题是，什么因素促成追随趋势的行为？避险基金可能是一个因素。你们注意避险基金的确有道理，不过就我的避险基金而言，你们找错了对象，我认为至少有两个因素比较有关系，值得密切注意：第一是机构投资人的角色；特别是共同基金的角色，第二是衍生性金融商品的角色。

机构投资人

机构投资人的问题是他们的绩效通常是和同行比较，而非根据绝对的标准衡量，这点使他们在定义上变成趋势追随者，在共同基金方面，他们开放型基金的事实，使这种趋势更为强化。资金蜂拥而入时，他们通常会维持低于正常水准的现金余额，因为他们预期会有更多资金流入，

附 录 索 罗 斯 演 讲 与 文 选

资金流出时，他们需要筹集现金，应付赎回。这一点毫无新奇之处，但是共同基金已经有极为惊人的成长，甚至超过避险基金，而且他们拥有很多没有经验的新股东，这些人从来没有在股市投资过。

衍生性金融商品

衍生性金融商品的问题是，发行这种工具的人，通常会从事所谓的三角避险也就是动态避险，以便保护自己免于亏损。动态避险实际上表示，如果市场运作对发行者不利，发行者会被迫追随市场，采取同方向的行动，因此扩大了最初的价格波动，但只要价格变化持续进行，不会造成多大的伤害，除了可能造成更高的震荡幅度之外，这点会增加衍生性金融商品投资工具的需要。但是如果有数量惊人的动态避险，朝向同一个方向运作，价格波动可能变得无法继续，这样会引发金融失序的阴影。需要从事动态避险却不能执行订单的人，可能损失惨重。

这就是 1987 年股市发生的事情，罪魁祸首是过度使用投资组合保险，投资组合保险只是一种动态避险方法而已。后来主管机关推出所谓的“断路器规定”，使投资组合保险不能再运用，但是其他依赖动态避险的投资工具勃然兴起，在利率市场中所扮演的角色比在股市中还大，最近数周正是利率市场表现得最为混乱的时刻。

动态避险实际是把风险从顾客身上转移到市场构成者身上，市场构成者在同一时间全都往同一方向操作三角避险时，另一方毫无买主，市场就会崩溃。

极限投机

衍生性金融商品爆炸性的成长，还有其他的危险，这种工具数量极多，其中有一些极为怪异，以致所涉及的风险连最精明的投资人都无法正确了解，这些工具中有些似乎经过特别设计，让机构投资人参与原本不可以参与的赌博，例如有些债券基金投资在合成债券上，这种债券所具有的风险，是范围明确的正常风险的10到20倍，有些其他的工具额外提供特别高的报酬，因为他们附有全面断头的因素，就是这种工具，迫使一个规模6亿美元、专门从事质押贷款债务基金的余额被迫清算，产生了1994年4月4日美国债券市场的抛售狂潮。

这种衍生性金融商品的发行者很多是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在大崩盘时，主管机关可能会发现必须介入以维护系统的完整性，既然如此，主管机关就有权利和义务，监督及管理衍生性投资工具。

一般而言，避险基金不担任衍生性金融商品的发行者或卖方，他们可能是顾客，因此他们对系统所构成的风险，低于金融市场衍生性金融商品柜台的动态避险者。请勿把动态避险和避险基金混为一谈，他们除了“避险”这个字眼之外，毫无相同之处。

避险基金是什么？

我无意在此为避险基金全面辩护，近来这个名词滥用之至，已经涵盖范围极为广阔的活动，这些活动唯一相通的地方是，经理人根据绩效得到报酬，而不是根据所管理资产的一定百分比。

我们这种形态的避险基金，投资范围广泛的证券，并

附 录 索罗斯演讲与文选

且依靠避险、融资和在许多不同的市场操作来分散基金的风险。这种基金比较像精明的民间投资人一样行动，不像代客操作资金的机构，因为我们这种基金根据绝对绩效得到报酬，对于机构投资人追随趋势的行为提供健全的补救之道。

但是避险基金的收费结构并不完美，通常正绩效和负绩效之间并不对称，经理人按比例分享利润，但是不承担亏损，亏损通常往后展期，经理人落入负绩效范围时，会有提高风险、恢复正绩效收费范围的财务诱因，而不是理所当然地缩减操作规模，这种特性是 60 年代我刚刚进入这一行时，瓦解避险基金行业的原因。

量子基金集团

我很骄傲地说，我所服务的量子基金集团没有这种弱点，因为经理人在他们管理的基金中，拥有相当大量的所有权利益，这一点是关键，我们的所有权是直接有利的诱因，促使我们采取健全的资金管理。索罗斯基金管理公司操作的历史超过 25 年，在这段时间，我们没有一次无法应付追缴保证金，我们偶尔应用选择权和比较奇异的衍生性金融商品。我们的操作是逆势而行，而不是追随趋势，我们设法早期抓住新趋势，并且在稍后的阶段中设法抓住趋势反转的时机，因此我们应当是稳定市场，而不是扰乱市场，我们这样做不是当成公共服务，这是我们赚钱的方式。

因此我必须拒绝任何指称我们的活动有害或扰乱市场

极限投机

的假设或暗示，但是仍然有一点值得忧虑：我们运用借来的资金，如果我们无法应付追缴保证金，我们就可能造成问题，我们公司在这方面，这种风险很微小，但是我不能代表所有避险基金说话。

我们从索罗斯基金管理公司的经验得知，银行和证券公司极为注意确认和监视我们的活动，因为我们每天向市场揭露我们的投资组合，并且经常和银行沟通，银行可以很容易地注意自己的信用风险，我相信敝公司对银行来说是健全而有利润的业务，而且我相信，我们的业务比他们大部分的其他业务容易监督多了。

监督和管制

不过，这是主管机关需要监督、而且必需要管理的地方，主管机关如果推出新规定，应该平等适用于所有市场参与者，只针对避险基金实施是错误的。

谈到规定，请注意无意间造成的影响！例如，针对外汇或债券交易推出融资规定，看来是适当的；但是，这样可能迫使市场参与者，运用更可能扰乱市场的选择权或其他衍生性金融商品，衍生性金融商品发展的主因之一，就是希望逃避管理。

我希望清楚划分监督和管制之间的界线，我赞成最高程度的监督、最低程度的管制，我也希望清楚划分信息搜集和揭露信息的差别，我认为主管机关需要的信息，远远超过一般大众的需要，事实上，我们受法律所限必须揭露的信息，偶尔会造成不必要的价格波动。

附 录 索罗斯演讲与文选

我的结论是，此刻正适于评估新工具和其他新情势所创造的新风险，金融市场最近遭遇相当严重的回档，任何调查不可能促成调查应当防止的那种失序。

我想强调的是，我认为市场没有立即崩盘的危险，我们刚刚在资产价格发展的泡沫上，略微戳了一个小洞，因此，市场状况远比 95 年底时健全多了，我认为投资人此刻不应该有不当的恐惧。

我的一般看法到此结束，我已经用书面回答你们的问题。也愿意尽力回答你们现在可能提出的特殊问题，谢谢主席和贵委员会的委员给我这个机会说明我的观点。

即席回答

问：美国是唯一有权用自己的货币偿付债务的国家，如果美元被取代，那么我们必须用别人的货币偿付这么巨额的债务，你认为我们应该担心这种事情吗？

答：我认为在一般看法和理论方面，你担心这件事情确有道理，但是，我认为不会有实际和迫切的危险，我认为债务和通货膨胀迅速上升的时期已经过去，而且，我希望这种情势不会很快的再度出现。

问：过去 4 年来，银行交易帐户管理的一流银行的资产，增长了 5 倍多，事实上这些资产远超过避险基金的资产，请问避险基金用什么方法和银行交易帐户竞争？

答：基本上，我们是银行的客户，不是银行的竞争者，但是，他们的确有资产交易帐户，他们的业务多多少少和我们的操作相同，我认为这是值得关心、值得严密监

极限投机

督的地方。

问：你对财政部有何建议？他们应该让外汇市场自由运作，还是应该尝试防卫一定的汇价？

答：我相当不愿意提出建议，我的看法和大多数财政专家不同，我认为自由浮动汇率不能长期维持，另一方面，固定汇率制度也可能崩溃。欧洲货币体系大约顺利地运作年，接着告别统一，造成动态不均衡，促使这个制度崩溃，我认为欧洲联盟能否生存下去，要看是否拥有一种统一的货币制度，但是，要做到这一点相当困难。

问：企业、避险基金和投资银行交易的很多工具，目的在于限制某种风险，但是，系统风险是增加还是减少了？如果我们的市场规模略微缩小，而且复杂的产品略微减少，是否比较好呢？我们是否建立了半赌博性的制度呢？

答：避险工具把风险从个人身上移转到系统上，这种工具用得越多，移转给系统的风险越多——因为制造商和交易者都不希望承担外汇风险，因此在某些时候，会有价格运动无法持续下去的危险。在外汇市场中，这种情形不叫作崩盘，叫作过度变化，也就是货币的价值大幅波动，因为风险从个人移转给系统，负责系统的人必须提供稳定，每一个人都为自己打算时，可能会摧毁系统，这正是我真正想尽力表明的论点，的确有这种危险。

问：你打算怎么办？政府拥有的资源不能和民间相比。

答：我认为负责货币制度的人需要协调经济政策，以

附 录 索 罗 斯 演 讲 与 文 选

便汇率波动不至于太大，不至于造成根本的失衡。

问：避险基金会撼动市场吗？

答：我确信不会，因为索罗斯基金管理公司大约代表避险基金这一行的 15%，而且在外汇市场上，我们很可能比大多数避险基金都活跃，我确信我们每天的平均成交值不超过 5 亿美元，从绝对值来看，5 亿美元是很大的资金，但是，就每天一兆美元以上的成交值来看，5 亿美元只代表总成交值的二千五百分之一，我想这样应该说得很清楚了。

问：你说银行可以相当容易的监督他们贷给避险基金的贷款，你也说他们拥有灵通的信息，以及你们每天必须向市场揭露等等，而且你的投资人都很精明，愿意承担市场风险，并且你假设他们能够承担丧失投资的风险，这么说，这当中有什么公共政策问题呢？

答：就信息披露而言，我们和每一个人一样，都要受同样的法规限制，因此我们和任何大型机构的投资组合一样，我们的投资组合要受大众监督，我们有申报的义务，如果我们拥有一家企业的股权超过一定的百分点，我们就必须申报，所以就市场而言，我们实际上和任何其他机构一样，受到管理。我们不受管理的地方，是我们和股东之间的关系，换句话说，监管不能保护股东免于防止基金经理人的不当行为，但是，因为我自己在我管理的基金中是大股东，我认为股东得到的保护，远比任何法规所能提供的保护还可靠——也就是说，我自己的钱和他们的钱投资在同样的地方，在这种伙伴关系下，股东完全不需要寻求

极限投机

其他保护。

问：你在证词中说你完全支持加强信息披露和加强监督。

答：我认为，主管机关应该采取行动，评估避险基金在最近行情下跌中所扮演的角色，他们应该可以拿到某些种类的信息，而且我们确实准备和他们合作。但是，我认为要是我们被迫以比较即时的方式揭露我们的部位，很可能会有不利的影响，这样会使我们很难操作，我认为这样很可能造成其他投资人不当的跟风，不过他们应该知道得更清楚才对，所以我认为加强揭露没有好处。但是，如果主管机关认为他们拥有的信息不够，我们当然听命行事，会提供信息给他们。

问：你警告我们，在设计法规时要注意无意间的影响，你可以举个例子说明这个原则可能对我们不利吗？

答：可以想到的一个显而易见的地方，是在债券和外汇交易中，推出保证金规定，目前没有这种保险规定，股票交易有保证金规定，你必须拿一半的现金，可是，在固定利率商品——债券交易方面——没有这种规定。但是，债券价格也可能有变化，所以或许在债券交易方面应该也有保证金规定，例如5%或10%的保证金，但是，如果你规定的保证金太高，那么投资人就不买债券，转而购买债券选择权，因为那是避免提供保证金的方法。

问：就衍生性金融商品的影响力而言，是否实质改变了全球市场与国内市场？

答：的确如此，很多比较奇怪的新投资工具已经出

附 录 索 罗 斯 演 讲 与 文 选

现，衍生性金融商品的确已经造成可观的改变，这部分是应该调查的地方，如果你看看最近发展出来、把利息和本金分开来的工具，这些工具是很有趣的东西，但是，我不肯定是否真正需要这些东西。

问：你认为境外金融的成长，对管理有什么意义？

答：我认为任何管理规则现在都必须国际化，目前实施的主要规则是国际清算银行的资本适足性规定，这是一种国际协定。我认为现在需要处理的问题，是有关衍生性金融工具的资本适足性规定，而且我认为这个问题需要在国际论坛中解决。

问：银行业的谨慎程度是否足够？

答：每一次景气都有过度的危险，但是，我看不出目前有过度借贷的情形。事实上，我认为银行过去受到伤害，目前仍然处在复原阶段，一般说来，你不能指控银行过度贷款，长久以来，问题一直都是如何促使银行放款。

问：大型避险基金的贷款来源是什么？

答：主要的贷款者是货币中心银行，投资银行也是很大的融资来源。

问：现在投资银行的放款超过银行吗？

答：他们目前承担相当大数额的贷款，但是，我仍然认为银行才是主要的贷款机构。

问：赎回共同基金是市场不稳定的原因之一吗？

答：这一点是我在证词中提到，但没有深入研究的地方，这一点与共同基金有关，有非常大量的现金流入共同基金，因为长久以来，定期存单的收益极为低落，这种情

极限投机

形的确创造了某种情形的金融泡沫，我认为这种泡沫已经破灭，而且回档已经发生了。

问：你可否讨论你的基金的操作状况？

答：我们在很多不同的市场操作，我们有股票的投资组合，我们也操作债券——若干固定利率工具，而且我们是在全世界的基础上操作，所以我们拥有相当大的外汇部位。我们应用衍生性金融商品的程度，远比一般人所想象的低，主要原因是因为我们确实不了解它们的运作方式，因为我们是利用借来的资金，我们不太需要利用选择权来取得融资。

二、透视欧洲

欧洲共同体是令人极为满意的组织形式，事实上，就某方面而言，它是开放社会的理想模式，因为它有一个极为有趣的特征：所有参与这个组织的国家都是少数，尊重少数是它结构的基础，也是开放社会的基础；但未解决的问题是：应该赋予多少权力给多数？欧洲应该统一到什么程度？

欧洲的演化过程对东欧的发展会产生深远的影响，经过集权主义的社会无法靠本身的力量转型为开放社会，他们需要开放，欧共体应支持他们的奋斗，东德获得太多的协助，东欧其他国家得到的协助却太少，我致力于协助其他东欧国家，各位或许知道，我设立了基金会网路投入这个目标，这正是我以欧洲为演讲主题的原因。

我曾经对我称之为“盛衰序列”的现象做过特别研究，金融市场中经常可以发现这种现象，我认为它也适用于欧洲经济共同体的统一与解体，自从1989年的东欧动荡和德国统一以后，欧洲便处在动态不均衡的情况中，因

极限投机

此成为我历史理论中一个非常有趣的个案研究。

我自己也是这种动态不均衡过程的参与者，因为我是个国际投资者，我过去自称自己是投机客，也常开玩笑的说投资是出了差错的投机，但在大家对投机的口诛笔伐下，我不再觉得有趣了。国际投资者对于欧洲汇率机制的瓦解，确实扮演重要的角色，但共同市场不能没有国际资本的流动，责怪投机客就如同射杀信使。

在这里，我要用我的历史理论处理欧洲不均衡的主题，我自己也是参与者的事实，不会妨碍我运用这个理论的能力；相反的，这样使我能够在实务上检验这个理论。我对这个主题存有特殊的偏见也不会有妨碍，因为我的理论认为，历史过程的参与者总是根据偏见行动，拥护这个理论的人当然也适用这个规则。

但是我必须承认，我希望见到欧洲团结、繁荣与开放的特殊偏见，确影响我身为金融市场参与者的行动，只要我是无名的参与者，我都不会有问题，无论我是否对英镑从事投机，英镑都会脱离欧洲汇率机制，但是，在英镑脱离欧洲汇率机制后，我遭到媒体渲染，不再是无名的参与者，一变而成大师，并且可以影响市场的行为；如果装做若无其事，不免矫情，这样为我创造了机会，但也赋予我责任。根据我所有的偏见，我不想承使担法国法郎被迫退出欧洲汇率机制的责任，于是决定不投机法国法郎，希望能够提供具有建设性的解决方法，但没有人因此感激我。事实如此，我的公开谈话似乎比我在金融市场的活动更加激怒各国货币主管局，因此我不能说我在大师的新角色上

附 录 索 罗 斯 演 讲 与 文 选

是成功的。虽然如此，基于我的偏见，我仍然必须说出该说的话——即使这样会对身为参与者的我造成不便。

我评断欧洲整合统一盛衰过程时，会特别强调欧洲汇率机制，因为它在这个过程中扮演至为重要的角色。在东、西德统一之前，欧洲汇率机制在近乎均衡的条件下运作得相当良好。但是，两德统一造成动态不均衡的状态，从那时候起，事件的发展便由错误和误解一手塑造。最具体的结果是欧洲汇率机制的解体，进而是欧洲共同市场的解体可能，也会变成重要的影响因素。

领袖的宿命

我从动态不均衡状态取代近乎均衡状态谈起，这一点的时间可以十分精确地标定，就是柏林围墙倒塌时。这件事开启德国统一之途，科尔总理起而因应此一历史转机，决定统一必须完整、即时，并且要在欧洲的背景环境下完成。事实上，这件事他别无选择，因为德国宪法赋予东德人民德国公民权，而德国又是欧洲共同市场的成员国，但是，究竟是主导事件的发展或只是被动地应付，其中有很大的差异。科尔总理展现真正的领导能力，他拜访密特朗总统，实际上等于对他说：“我需要你和欧洲的支持，以便完成立即而彻底的统一。”法国实际上等于回答说：“我们一起创造一个更强大的欧洲，让统一后的德国能够完全融入。”这样使整合得到充沛的动力，启动了盛衰过程中的“繁荣”阶段。

英国反对创造强大的中央权力核心。你们应该还记得

极限投机

撒切尔夫人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发表的演说。随后艰苦的谈判势所难免，其中含有迫切感和自我设定的期限，结果各国签订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这个条约的两大目标是建立共同的货币与共同的外交政策，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还有很多其他的条款，但比较不重要，英国表示反对时，就获准豁免某些条款。总之，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是迈向整合的重大突破，是一种勇敢的尝试，目的在于建立一个强大的欧洲，强大到足以应付苏联帝国崩溃带来的革命性变化。这种进展可能比公众意见准备接受的还前进和快速，但是政治领袖抓住了机会，以便因应革命的情势，在我看来，正该如此，因为这是领袖的宿命。

问题出现在其他地方。我不准备讨论德国得到欧共体的同意，承认克罗地亚与斯洛文尼亚独立的附带协议，这件事当时很少有人讨论和注意，但有着严重的后果。我将专注讨论德国统一所产生的内部不均衡，因为就是这种不均衡使兴盛转变为衰落。

德国政府严重低估统一的成本，而且无论如何，不愿意用增税与减少公共支出的方式支付全部的成本，这点造成德国联邦银行与政府在两个层次上的紧张关系：一方面是政府的行动违反德国央行的明确建议；另一方面则是非常松散的财政政策——庞大的预算赤字需要靠相当紧缩的货币政策才能重建货币均衡。允许东德货币以平价兑换，注入了购买力，创造出通货膨胀式的繁荣，预算赤字则是火上加油。法律规定德国央行要负责维护德国马克的币值，德国央行也干脆利落地这样做，把附买回利率调升到

附 录 索 罗 斯 演 讲 与 文 选

9.70%。但是，这项政策严重伤害欧洲货币体系的其他成员国。换句话说，这种货币政策原意在于重建国内均衡，却导致欧洲货币体系的不均衡，不均衡虽然需要时间发展，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德国央行采行的紧缩货币政策，却迫使全欧洲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德国央行背负着双重任务：一是国内健全货币的守护者，二是欧洲货币体系支柱，它扮演着传输的机能，把德国经济的内部不均衡转变为欧洲货币体系解体的动力。

德国央行与德国政府之间，还有第三层、也是更深层的冲突。科尔总理为了得到法国支持德国统一，因而签署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这个条约对于德国央行身为欧洲货币政策决定者的主导身分、以至于对这个机构本身的生存，都构成严重威胁。在欧洲货币体系中，德国马克是最重要的币种，但是，在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下，德国央行的角色被欧洲中央银行所取代，德国央行只拥有十二分之一的投票权。不可否认，欧洲中央银行是以德国中央银行为模范的；但是，扮演模范的角色与实际主导两者之间有天壤之别。德国央行从来没有公开承认反对这种制度上的改变，我们也不清楚它的行动中，有多少程度是意在反对这种改变。我能够告诉各位的是，身为市场参与者，我根据这是德国央行的根本动机的假设来采取行动。我不能向各位证明我的假设是正确的，我能说的只是我的假设的确有效。

举例来说，德国央行总裁史勒辛格警告说，市场认为欧洲货币单位由固定的一篮货币组成，是错误的想法，我听从他的警告；我请教他，以欧洲货币单位作为欧洲未来

极限投机

的共同货币，他做何感想。他说，如果这种货币称为马克，他会比较喜欢这种货币。我遵从他的指引，不久之后，意大利里拉被迫退出欧洲汇率机制。

我不希望逐项讨论所发生的一切，因为我希望建立广泛的历史观，从历史观点来说，明显的征象是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在丹麦遭到公民投票否决，在法国则只以很小的差距通过，英国国会则勉强通过该条约。事实上，欧洲汇率机制已经崩溃，而且是逐次瓦解，最近一次，也就是8月份决定扩大各国汇率的波动范围，影响最为深远，因为它使欧洲共同市场里最坚韧的联系——结合德国和法国的联系——为之松弛。就长期而言，更重要的是欧洲处于严重的经济衰退，短期内尚没有复苏的希望，严重的失业问题持续加深，在景气循环此一阶段，太过严厉的货币政策将使失业问题继续恶化，我由这些现象观察，断定欧洲迈向整合的趋势已经越过高峰，开始反转了。

丹麦公民投票的挫败可以判定为反转的明确时刻，这点原本可以为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带来强力支持；如果这样，反转便不会发生，结果，反而促使欧洲汇率机制瓦解。欧洲目前已经处于解体的过程，由于我们所处理的是盛衰过程，因此无法判定它会发展到什么地步。但是，它或许会发展到超过大家目前所愿意想象、或能够想象的地步，因为盛衰过程在两个方向上都有自我强化的本质。

预测毁灭的先知

我至少可以指出5个自我强化的因素：第一，也是最

附 录 索 罗 斯 演 讲 与 文 选

重要的，是经济衰退；失业率在法国是 11.7%，在比利时为 14.1%，西班牙则高达 22.5%，这种失业率根本不能接受，这么高的失业率造成社会与政治的不安定，而且会转易转化为反对欧洲整合的力量。第二，欧洲汇率机制逐渐解体，这是非常危险的现象，因为就中长期而言，缺乏稳定的汇率，共同市场将无法存活。

10 多年来欧洲汇率机制在“近乎均衡”的条件下，运作得相当完美，但是，德国的统一暴露出这种机制的缺陷，也就是德国央行扮演了双重角色：国内货币稳定的护卫者与欧洲货币体系的重镇。只要这两种角色能够相互协调，便不会产生问题。然而，两者之间发生冲突时，德国央行就会优先考虑国内问题，搁置其国际责任，例如，7 月 29 日星期四，德国中央银行拒绝降低重贴现率以减轻法国法郎的压力。德国央行或许可以辩称没有选择的余地，说在基本法的规范下绝对要优先维护德国货币的价值，在这种状况下，欧洲汇率机制与基本法之间便存在着无法协调的冲突。

这件事也暴露出欧洲汇率机制中的另一项根本缺失：主要货币与弱势货币之间的责任不对称，所有责任都由弱势货币承担。我们记得在布雷顿森林协定中，凯恩斯曾经强调，强势与弱势货币之间需要对称性，他是根据两次世界大战之间那段时期的经验形成这种主张。目前的局面使我们想起当时的情况，而有时候也使我们认为凯恩斯似乎不曾存在。

第三个因素是错误的经济与货币政策。这方面德国央

极限投机

行并无明显缺失，问题出在反对德国央行政策的机构、或因为该银行之政策而受害的机构，前者如德国政府，后者如英国与法国。德国政府是造成内部不均衡的始作俑者，它当然必须为此负责。德国统一之后，英国犯下严重的错误，而于1990年10月8日加入欧洲汇率机制。这样做所依据的论证发展于1985年，当时却遭到撒切尔夫人的极力反对，然而，当撒切尔夫人的地位动摇时，最后她只有妥协，但是，1985年有效的论证这时已经不适用，因此，英国犯了两次错误，一次是在1985年，一次是在1990年。

英国受德国央行高利率政策的打击尤其严重，因为英国加入欧洲汇率机制时，已经处于经济衰退，被迫退出欧洲汇率机制，使英国获得极为需要的救助，英国应该庆祝，却因为过于困惑而不知反应。英国最后终于采取正确的措施，降低利率，却未能掌握先机，这使它更难以建立信心，因此经济开始复苏时，也使英国更难以控制薪资。

有人或许会认为，法国可以从英国的经验中获取教训，但是，事实证明法国更缺乏弹性。法国历经长期的艰苦奋斗，才建立起强势法郎的政策，我们应该同情它对维系法郎币值所做的努力，法国提高对德国的竞争力，即将因此获取利益时，却因为法郎一再遭到重击而错失唾手可得的利益。但是，法国察觉无法继续维持强势法郎的政策时，应该根据新的情况调整对策，相反的，法国却自愿遵从欧洲汇率机制的规定，并因此而陷入严重的困境。我自认为了解法国的动机：法国担心如何重建准备金，以及清

附 录 索 罗 斯 演 讲 与 文 选

偿法兰西银行（法兰中央银行）为维护法郎平价而向德国央行借款形成的债务。但是，法国人把优先秩序弄错了。法国处于严重的经济衰退，需要降低利率，这就是8月危机产生的原因，以高利率政策维护法国法郎与德国马克的汇价，是自杀的做法，维系法郎强势的唯一方法是拥有强劲的经济。

德国央行在追求目标方面，展现杰出的一贯性，结果十分成功，如果把机构自我求生存也算在目标内，则更是成功。德国统一之后，德国央行发现自己处于极度严重的困境中：货币存量剧增、预算赤字庞大、机构本身的生存受到威胁。然而，德国央行却胜利的脱离困境，是否值得为德国央行的存续，付出欧洲全面经济衰退与欧洲汇率机制瓦解的代价，则是另一个问题了。几个月前，我确信德国央行采取错误的货币政策，即使就德国国内的情况而言也是如此，因为德国正处于经济衰退，而货币政策应该是反循环的。德国央行坚持其中期货币目标，但我认为 M_3 所设定的水准——在近乎均衡的情况下，这项目标十分有效——已经不适用于目前远离均衡的情况；而且我认为德国央行采用紧缩货币政策的期间过长。

但是，上述情况发生在欧洲汇率机制放宽汇率波动范围之前，此后，德国马克开始上涨，德国长期债券开始转强，更重要的是，德国经济也出现复苏的征兆。我必须承认我的看法或许错了，德国央行在追求国内的政策目标方面或许是成功的。但是，无论如何，这强化了我的论证：德国央行的国内责任与身为欧洲货币制度支柱的角色，两

极限投机

者之间存在着利益冲突。过去两个月来所发生的事件明确显示，德国的需要与欧洲其他国家的需要差异极大，德国需要长期债券利率走低，因为它要借长期资金，欧洲其他国家所重视的则是短期利率，因为银行体系的流动性需要重建，他们也需要较低的短期利率以刺激经济活动。德国的需要获得满足，其他欧洲国家则不。

我对德国马克的看法可能错误，这项事实使我想到的四个因素。不只是有关当局会犯错，市场参与者也会犯错，市场经常犯错。明确地说，市场假设迈向单一货币的途径是直线，这就犯了错，国际投资人——尤其是国际债券基金经理人——追求最高的报酬，却忽略汇兑的风险。史勒辛格所提出的警告是正确的，他认为欧洲货币单位并不是由固定一篮货币所组成，有大量资本流向弱势货币的国家，例如，意大利、西班牙与葡萄牙，这些资本流动最初具有自我强化的本质，最后会自我摧毁，这种情形最先会使汇率过度僵化，然后会造成过度的不稳定。市场的错误伴随着主管当局的错误，因而形成动态不均衡。

最后，第五项促成不均衡的因素和态度有关。去年的事件使很多国家深感震惊，促成互相责怪和怨恨的气氛。法国很有理由和英国、西班牙、意大利更为交好，但是，去年的事件使它们越分越开，法国和德国结盟的承诺仍然是法国政策的基础，而且深深植入法国人心，但是，这种政策遭遇强大的压力，如果经济状况继续恶化，压力可能进一步升高。

我比较不熟悉德国的情况，但是，我可以预见一种变

附 录 索 罗 斯 演 讲 与 文 选

化即将出现。目前这一代德国人仍然执著于父亲那一代的罪恶，决心要做善良的欧洲人。1990年艾根·巴尔在柏林举行的一次会议上严肃地表示，德国除了欧洲的外交政策之外，别无德国本身的外交政策，令人深深动容。从那时到现在，已经发生多大的变化！如果新一代拒斥父亲那一代的罪恶感，而且变得比较坦然地追求国家利益，这其实是再自然不过了。在这种情况下，应该注意到强劲的德国马克已经变成德国民族认同的主要象征。

英国总是相当怀疑德国，我曾经告诉他们，在作为欧洲人方面，德国人比英国人好多了，但是，他们现在可以举承认克罗地亚和斯洛维尼亚、以及德国联邦银行的行动，振振有词地宣称他们最初的说法是正确的。

此处也需要考虑第六个因素：东欧的不稳定，特别是前南斯拉夫的动荡。我相信这个因素将会朝相反方向发展。不稳定的威胁与难民潮是团结形成“欧洲堡垒”的良好理由，同时，欧共体的不团结将强化东欧的政治不稳定与经济衰退，结果将形成和开放社会大相径庭的欧共体，而这却是我支持东欧人民的目标。

这一切令人非常忧虑与沮丧，我知道自己听起来像是预测毁灭的先知，而不像是大师，但是，让我提醒各位，盛衰序列并没有必然性；过程的方向几乎随时可能发生变化。事实上，方向反转是盛衰序列的根本性质。我尝试说明的是，目前事件正朝错误的方向发展，而且将继续朝这个方向推进，除非我们了解其中有根本错误，并采取断然措施予以修正。

极限投机

就欧洲货币体系目前的情况而言，毫无疑问的存在若干根本瑕疵：第一，德国央行对国内的责任与其身为欧洲基准货币的角色并不协调；我们甚至可以主张，德国央行正利用基准货币的角色解决国内问题。第二，强势货币与弱势货币的义务存在着不对称性，最重要的是，国际投资者、也就是投机客的风险和报酬之间，存在着不对称性，这些结构上的缺失从一开始就存在，但在过去一年来才趋于明显。一旦缺失暴露后，再也不可能恢复到过去的情况。消除欧洲汇率机制缺失最好的方法，便是完全取消汇率机能，但是，自由浮动汇率将摧毁共同市场。因此，单一货币有其必要，这点表示要实施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在拟定条约时，通往单一货币的途径被视为渐进、近乎均衡的途径，但是，渐进的途径遭到意外阻碍，继续采行渐进的途径将迈向另一个方向，因为趋势已经反转，而且我们正处在解体的过程，因此，我们必须另辟途径。如果我们无法用渐进的方式到达目的地，那么就用立刻到达的方式，胜过根本无法到达。

在8月一日所举行的紧急会议上，据说一位葡萄牙官员提出一项主张，建议加速推出单一货币，德国的与会者据说这么回答：“当然，你一定是在开玩笑！”如果我的推论正确，目前是认真考虑这个建议的时候了，这话听起来似乎有点太简单了，但实际上正是如此，除非我能提出一条通往单一货币的道路，否则我的论证将不被认真考虑。既然我们处于动态不均衡的状况，这条路一定是不均衡的道路。

附 录 索 罗 斯 演 讲 与 文 选

目前法国货币当局的第一优先目标是重建其准备金，为了达成目标，他们试图维持强势的法国法郎，这是错误的做法。第一优先的目标应该是刺激法国经济，而法国向德国央行所借的债务，在到期之后应该延期，例如，延期两年，好让法国现在能够降低利率，我所谓的比较低的利率是指3%而言。法国降低利率必须和欧洲货币体系其他成员国配合，但不包括德国与荷兰。德国马克毫无疑问会升值，德国马克高估一定会对德国经济有不利的影响，并促使德国加速降低利率，在德国经济转弱而欧洲其他国家趋于复苏时，汇率走势将出现反转，欧洲大致可以恢复到汇率波动范围扩大之前的水准，主要的差别应该只是经济的活动，开始先牺牲德国，以造就欧洲其他国家经济复苏，但德国最后仍会加入复苏的行列，一旦情况如此发展，动态不均衡将会被修正，通往单一货币的道路可以在近乎均衡的状态下恢复。整个过程所花费的时间不会超过两年，此后可以直接采用单一货币，不必用恢复过去的狭小汇率波动范围。但是，你们无法依直线方式完成此一目的，目前你们陷在恶性循环中，必须扭转成良性循环，就某种程度而言，意大利已经展现这种情形，欧洲其他国家也能如此。

我并未讨论外交政策、北约组织前途和东欧的命运等议题，但我的演讲涵盖的领域已经太多，无论如何，这些问题都和货币政策有密切的关系，欧洲货币政策是错误的，但可以修正。

极限投机

三、开放与封闭

照我最初构想的情形，说明开放社会与封闭社会的架构——也就是说，作为人类在现阶段历史所面临抉择。

这种反射性的结构具有两种层面：一种描述人类思考的方式，另一种描述事情的实际状况。两种层面以反射的形式互动，人的思考模式影响事物的实际状态，反之亦然，两者之间从来没有达到相等的程度。

我必须指出这种模式结构上的一个缺陷，他们描述的状况的扭曲情形，就明显地指出这种缺陷。这种模式是理论上的构思，而不是历史上的结构，但是它们所描述的状况是逐渐演进而来、而非亘古不变的。其中包含学习（和遗忘）过程，这种过程并未经过适当的处理，我选择的解决方法是一分为二：一是不变状态的原始形态（有机社会及传统的思考模式）；二是后来在演进过程中强制实施的不变状态（封闭社会及独断的思考模式）。

变化是一种抽象概念，本身并不单独存在，总是伴随着正在改变或受改变影响的实际物质出现。当然此处的实

附 录 索罗斯演讲与文选

际物质也是一种抽象概念，本身不能独立存在。唯一真正存在的事物是“实际物质兼变化”，人类在设法为混乱的宇宙带来若干意义时，把它分为实际物质和变化。此处我们关心的不是实际发生的变化，而是变化这种观念。

变化这种观念重要的地方是需要有抽象的思考，对变化的了解必须伴随着一种思考模式，这种思考模式的特质是运用抽象方法；缺乏对变化的了解代表缺乏抽象能力。我们可以根据这种情形构思出两种截然不同的思考模式。

在没有变化时，心灵只需要处理一种状况：目前存在的状况。过去和未来都和目前的情形相同，过去、现在和未来成为一体，整个可能性降为一种具体的情况：事物目前的状况，因为它们不能有任何其他的状况。这种原则大大地简化了思考的任务，心灵只需配合具体的信息运作，所有因为运用抽象方法而生的复杂状况都可以避免。我把这种情形叫做“传统思考模式”。

现在我们考虑一个变动中的世界，人类必须学习的不只是思考事物的现状，也要思考事物过去和未来可能发生的状况，因此要考虑的不只是现在，而是范围无限的可能性。这些可能性如何简化为可以处理的构成部分呢？只能靠引用归纳法、二分法和其他抽象方法。归纳得到的通则越普遍，越能简化事物。最好视世界为一个全盘概括的等式，在这个等式里，现在由一组特定的常数代表，改变常数，同样的等式仍可适用过去和未来所有的状况。要运用这种等式，我们必须准备接受任何一组符合这种等式的常数，换句话说，每一种事物都要视为有可能，除非你能证

极限投机

明它不可能，我把这种方式叫做“批判思考模式”。

传统和批判两种思考模式以截然相反的原则为基础，但是对两种模式对于实际状况却各自呈现出一种内部一贯的看法，怎么可能这样呢？只有呈现扭曲的看法才有可能。但是如果把它应用在同一组状况中，扭曲不见得会这么大，因为根据反射理论，状况一定会受盛行的思考模式影响，传统思考模式和我所称的有机社会结合，批判思考模式和“开放”社会结合，这点是我设法建立的理论模型的出发点。

传统思考模式

事情一向就是如此——因此不可能有别的方式，这点可以视为传统思考模式的主要论点。它的逻辑不够完美，的确如此，它包含我们预期在我们的模型中会发现到的内在缺陷。它的主要论点既不真实也不合逻辑的事实，显示出传统思考模式的一个重要性质：就是不像我们学习到的情形一样，既不这么严格，也不这么合逻辑。这种模型不必这么严格和合逻辑，逻辑和其他形式的争论，只有在我们必须在不同的方案之间做抉择时才有用处。

没有变化的社会，特征是缺乏不同的选择方案，人的心智只需要处理一组状况：事物的现状，人虽可以想象到一些选择方案，但是选择方案就像童话一样，因为没有路径通往这些选择方案。

在这种状况下，正确的态度是接受事物的现状，猜测与批评能够发挥的范围很有限：思考的主要任务不是争

附 录 索罗斯演讲与文选

论，而是配合既有的状况，这种任务用最平凡的归纳法就可以完成，这样子省下大家很多的麻烦，但也剥夺众人应用比较复杂思考工具的机会，人们的世界观注定是原始而扭曲的。

我们考虑认识论的问题时，这种思考模式的优点和缺点都变得很明显，思想和实际状况的关系不会成为问题。理念的世界和事实的世界没有分别，更重要的是思考似乎没有主观或个人化的问题，思考稳固根植在世世代代传下来的传统中，其正确性不容置疑，盛行的理念被当成实际状况本身一样接受，更精确的说，理念和实际状况间的区别根本没有划分出来。

从语言的应用方式可以看出这一点，为某种事物命名好象替它贴标签一样。我们以“具体”的方式思考时，总是有一种“东西”跟名称相符，名称和事物可以交互运用，思考和实际状况在同时间延伸。只有用抽象的方式思考时，我们才开始为与命名无关、可以单独存在的事物命名，我们可能认为自己仍然是在替事物贴标签，但是这种事物是因为我们替他们贴标签才开始存在的，标签是贴在我们心里创造的某些事物上，这是思考和实际状况开始区隔的起点。

传统思考模式以用具体方式思考来自我限制，以避免这种区隔，但是必须为这种极为简单的方式付出沉重的代价。如果思考和实际状况之间没有分别，我们怎么能够分辨真假？唯一可以排拒的陈述是不符合流行传统的陈述，传统的观点必须自动接受，因为没有标准可以做为排拒这

极限投机

些观点的依据。事物的表面状态就是事物的本质，传统思考模式不能再深入的探讨，不同的事件之间不能建立因果关系，因为我们不能证明这些关系是对还是错；如果这些关系是错误的，在我们的思考之外，就有另一种实际状况存在，传统思考模式的根本基础就会遭到破坏。但是如果认定思考和现实状况是完全相同的，每一件事情就必须要有有一种解释，一个没有答案的问题就足以摧毁思考和实际状况的统一性——就像正确和错误答案并存时一样。

幸运的是，要解释这个世界的事物可以不必依靠因果律，每一种事物都是根据本身的自然性质行动，因为自然和超自然之间没有差异，只要认为所有事物都有神，神的力量可以解释任务事件，消除了内部冲突的可能性，这样所有的问题都可以解决，大部分事物似乎都受这种力量左右，因为没有因果律，大部分的行为都具有强制性质。

思想和实际状况之间的差异不存在时，不论根据的是观察或根据不合理的信念，这种解释都具有同样的说服力。只要我们相信这一点，树神和树的本体同样存在，我们也没有任何理由怀疑我们的信念，我们的祖先也相信同样的事物。在这种情况下，传统思考模式以其简单的认识论，或许可以轻易的造成完全脱离现实状况的信仰。

相信神和神明的法力，等于承认环境不受我们控制，这种态度极为适合没有变化的社会，因为人类无力改变世界，你的任务就是默认自己的命运。谦卑的接受神灵统治世界的威权，或许可以取悦神灵，但是探索宇宙的秘密一点好处都没有。即使发现某种现象的原因，这种知识也不

附 录 索 罗 斯 演 讲 与 文 选

会带来任务实际的好处，除非他们相信自己可以改变生存的状态，然而这种事情却是不可思议的。追根究底的唯一原因是闲来无事的好奇，不管大家有什么沉迷在其中的倾向，触怒神明的危险会有效地阻止这种行为。因此大家的思想中可能不会有追求因果关系的相法。

在没有变化的社会中，社会状态和自然现象没有分别，社会状态由传统决定，就像人无法改变周遭的环境一样，人也无法改变社会状态。传统思考模式无法分辨社会法则和自然法则之间的区别，因此对待社会必须和对待自然一样，要采取同样谦卑顺从的态度。

我们已经看到传统思考模式无法区辨思想和实际状况、真和假、社会法则和自然法则。如果我们进一步研究，可以发现其他的缺失，例如传统思考模式的时间问题上非常模糊，过去、现在和将来通常融合为一。对我们而言，这种区别是不可或缺的，我们从自己所处的有利地位来判断传统思考模式，会发现这种模式相当不适宜，但是在这种模式占优势的状况中，情形并非如此。例如，在一个依赖口耳相传过日子的传统社会中，传统思考模式可以完美的发挥功能，这种模式包含所有必要的具体信息，同时避免不必要的问题。这种模式代表用最简单的方法处理最简单的世界，它的主要缺点不是缺乏敏感，而是它所包含的具体信息比用不同方法得到的信息差。这点对我们很明显，因为我们拥有优越的知识，但是这点不至于困扰那些除了传统之外别无其他知识的人，不过这样却使整个结构仍易受到外在影响的伤害，对立的思想系统可以摧毁现

极限投机

有信念的独占地位，迫使他们接受批判性的检验，这样就代表传统思考模式的终结，以及批判思考模式的开始。

以医药为例，部落里的巫医对身体功能的认识完全错误，长久的经验教导他们，使他们知道某些治疗方法的功用，但是他可能是歪打正着，然而部落的人很敬畏他，他的失败归因于恶毒神灵的影响，这种神灵他虽然熟悉，却不能为他们的行为负责。只有在现代医学和原始医学直接竞争时，正确医疗方法胜过错误医疗方法的优势才变得明显，不管部落如何抱怨和怀疑，最后还是会被迫接受白人的医药，因为白人的医药效果更佳。

传统思考模式可能也会遇到自己制造的问题，我们已经看到，至少一部分的流行信仰体系注定是错误的。即使在简单而没有变化的社会中，也会发生一些必须处理的不寻常事件，新的解释可能抵触既有的解释冲突，两者之间的斗争可能使传统世界极为简单的结构分裂。但是每次生存状态出现变化时，传统思考模式不见得会崩溃，只要不受替代方案的威胁，传统极有弹性，从定义来看，传统涵盖所有现在的解释，新的解释一流行，就自动变为传统的解释，而且因为过去和现在的区别很模糊，新的解释会变成似乎从远古以来就流行的。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是变动的世界，也可能在相当宽广的范围内呈现出没有变化的状态，例如新几内亚的原始部落能够改采货物崇拜以适应文明的入侵。

就算面对现代观念的竞争，传统信念仍然可能保有优势，如果传统信念由应有的强制力量支持，就更是如此；

附 录 索 罗 斯 演 讲 与 文 选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就不能再视为传统思考模式。宣称事物必须一如既往的原则，和绝对相信这件事情，两者并不相同。为了支持这种原则，必须宣称一种观点是正确的，所有其他观点都必须消除，传统可以当作什么观念合格、什么不合格的检验标准，但是不再像在传统思考模式中一样被视为唯一的知识来源。为了分辨这种假传统思考模式和真正的传统思考模式，我把这种思考模式叫做“独断思考模式”。

有机社会

我们已经看到，传统思考模式不承认社会法则和自然法则之间的差异，社会结构和人类环境的其他部分一样被视为不可变动。因此在没有变动的社会中，出发点总是社会整体，而不是组成社会的个人，社会成员的生存完全由社会决定，成员在决定社会的性质方面没有任何发言权，社会的性质由传统代他们决定，这不表示个人和社会整体之间没有利益冲突，只是个人总不敌社会整体。在没有变动的社会中，这样的个人根本不存在，更重要的是，社会整体不是和个人观念相对的抽象概念，而是实质的统一，涵盖所有成员。社会整体和个人的二分法像很多其他的二分法一样，是我们应用抽象思考习惯得到的结果，为了了解没有变化的社会特有的统一性，我们必须抛弃一些根深蒂固的思考习惯，尤其是我们对个人的观念。

个人是一种抽象观念，因此在没有变化的社会中毫无地位。社会拥有成员，每个成员都能够思考和感觉，但是

极限投机

个人基本上并不相同——根据身分地位而有根本上的不同。

就像个人是不存在的抽象观念一样，社会整体并非以抽象观念存在，而是一种具体的事实。没有变化的社会的统一性，相当于有机体的统一性，成员像生物的器官一样，在社会之外不能生存，在社会之内只能拥有一种地位——他们所占有的地位。他们执行的功能决定他们的权利和义务，农夫和僧侣大不相同，差距之大如同胃和脑的差别。人的确有思考和感觉的能力，但是因为他们的社会地位已经确定，实际结果有如他们根本没有意识一样，差别很小。

“有机社会”一词只适用于从未想到这种比喻的社会，这个名词一开始使用就错用了，曼内尼亚斯·艾格里帕发现必须提出这个名词的事实，显示既有的秩序已经出了问题。

有机社会的统一性是另一种统一性——人类的统一性——的诅咒。因为传统思考模式不运用任何抽象观念，每一种系统都是具体而特定的，人与人之间基本相似的性质，以及个人权利不可剥夺的理念，都是另一个时代的理念。身为人类的事实并未赋予人任何权利，从法律的观点来看，奴隶和别的动产没有不同，特权通常倾向从属于地位，而不附属于个人所有。例如，在封建社会中，土地比地主重要，地主的特权完全是靠他拥有的土地而来。

权力和头衔可能是世袭的，但是这样不会把权力和头衔变成私有财产。我们可能认为私有财产是很具体的东

附 录 索 罗 斯 演 讲 与 文 选

西，实际上正好相反，把关系分为权利和义务已经是抽象思维，具体形态的关系同时包含权利和义务，私有财产的观念有更深一层的意义，代表绝对控制权，却没有任何义务，这点和有机社会的原则截然相反。在有机社会中，每一种财产都附有相对的义务，的确如此，生产资产的私有财产权和有机社会不能配合，因为这样会容许资本的累积，带来可能造成变化的因素。相形之下，共有财产制确保财产原封不动、不会改进，因为一个人每次投入时间和精力，他要承担所有的成本，但是只得到一小部分的利益，难怪公田划分为私地代表现代农业的起点。

有机社会也不承认司法是抽象原则，司法只能是具体的权利和义务合而为一的方式存在。不过执法必须应用某些通则，除了在变化极少、近乎死水的社会中，每一个案在某些细节上都和前例不同，因此必须采用前例才能有效执法，法官没有抽象原则作为指引，司法要看法官如何执行任务而定，新的判决至少有可能和前例冲突，幸运的是这样不见得会造成任何困扰，因为新的判决本身立刻变成前便，可以指导后来的判决。

这种过程产生了和成文法相对的不成文法，不成文法以不言而喻的假设为基础，认定过去的裁判无限期继续适用；严格说来，这种假设是错误的，但是因为极有用，可能社会早已不是有机社会之后很久仍能继续。有效的执法前提是大家事前都知道法规，由于人的知识不完全，法律不可能预测到所有偶发事件，因此必须用前例来补充成文法。不成文法可以配合成文法应用，因为基本的假设虽

极限投机

然没有变化，不成文法可以不知不觉的调整，以便适应变化的状况。同理，法律编成法典后，有机社会就不可能生存，因为会丧失弹性；法律一旦成文化，没有变化的外貌就不能维持，有机社会就会瓦解。幸运的是，只要传统不受替代方案的威胁，编纂法典、订定契约或以任何永久性方式记录传统的需要，都不致非常迫切。

有机社会的统一性代表成员别无选择，只能属于这个社会。这点有另一层意义，表示成员除了属于这个社会之外别无其他意愿，因为他们的利益和社会利益相同，他们和社会认同。统一性不是权威机构宣称的原则，而是所有参与者接受的事实，其中不牵涉重大的牺牲。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可能是沉重的负担或不光荣的角色，但这是他唯一能够得到的地位，没有这种地位，人在世界上没有立足之地。

不过一定有人不遵守流行的思考方式，如何应付这种人，是这个社会的适应能力最大的考验。镇压必定会产生反效果，因为镇压引发冲突，而且可能鼓励替代的思考方式逐渐产生。容忍加上不相信很可能是最有效的办法，要应付想法不同的人，各种形式的疯狂可能特别有用，原始社会有一个特点，就是很能容忍心智有问题的人。

一直到传统关系废弛，足以让个人靠着自己的努力改变他们在社会中的相对地位时，他们才能够把本身的利益和社会整体的利益分开。这种情形发生时，有机社会的统一性就崩溃了，每个人都设法追求自己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传统关系也可能会保留，但是只能靠强制性力量保

附 录 索 罗 斯 演 讲 与 文 选

留，这样就不再是真正的有机社会，而是靠人为力量维持不变的社会，例如苏联的制度。其间的差别与传统及独断思考模式的差别相同，为了强调这一点，我把这种状态称为“封闭社会”。

批判思考模式

抽象方法

人只要相信世界是不变的，就可以愉快地认定他们的世界观是唯一可知的世界观，不管传统离实际状况多远，都可以提供指引，思考从来不必想到具体状况之外的地方。

但是在变动的世界里，现在不会盲目的重复过去，人们面对的不是传统决定的道路，而是无限宽广的可能性。为了在原本混乱的世界引进一些秩序，大家被迫利用简化、归纳、抽象、因果律以及各式各样其他的心智方法。

思想过程不但有助于解决问题，本身也会创造问题。抽象方法使实际状况出现不同的解释，因为这些解释只代表实际状况的一面，一种解释不能排除所有其他解释，每一种状况都有很多层面，要看心智可以发现多少而定。如果这个特征被人充分了解，抽象方法产生的问题应该比较少，人们应该会了解它们只是处理一种经过简化后状况的意像，而不是处理状况本身。不过即使每一个都充分了解现代语言哲学的复杂性，问题也不会消失，因为抽象方法扮演双重角色，抽象方法和它所描述的事物之间的关系，只是抽象方法描述实际状况的各种层面，本身却并非具体

极限投机

存在，例如重力原则并不能使苹果掉到地上，只是解释造成这种现象的力量；对于应用者而言，抽象方法却极像是实际状况，因为抽象方法可以影响态度和行动，因此对事件具有重大的影响力，例如重力原则的发现改变了人的行为。在人思考自己的状况时，两种角色会同时发挥影响力，使状况变成反射性状况。思想和实际状况之间不再有明确的划分，变动的世界原本就是有无穷的变化，抽象方法所产生的解释又变化无穷，使情形变得更为复杂。

抽象方法通常会创造不同的分类，使实际世界相反的层面彼此对立，时间和空间、社会与个人、物质与理想都是这种典型的二分法。不用说，我在这里所建构的模型也属于这一类。这些分类和产生分类的抽象方法一样不真实，也就是说，一开始，这些分类代表简化或扭曲的实质，但是因为分类影响人类的思考，可能为现实世界带来分立和对立，使实际状况变得更复杂，因而使抽象变得更有必要。抽象方法用这种方式不断自我增强，有变化的世界会如此复杂，一大部分是人类自己造成的。

既然这么复杂，人类为什么还要应用抽象观念呢？答案是人也尽可能的避免抽象观念，只要可以把世界视为没有变化的世界，人类通常根本不用抽象方法。即使非用抽象方法不可，人类也宁可把抽象方法当作实际状况的一部分，而非自己思想的产品，只有经过痛苦经验的教训，才能使人类把自己的思想和实际状况划分清楚。忽略复杂性和应用抽象方法的趋势，必须视之为批判思考模式的缺点，因为抽象方法是这种思考模式必不可少的部分，大家

附 录 索 罗 斯 演 讲 与 文 选

越不了解，所产生的混乱越大。

虽然有这些缺点，对我们而言，抽象方法仍然很有用，抽象方法的确产生新问题，但是心智的应付之道是应用更多的心智，一直到思考达到复杂而精美的程度为止，这种程度是传统思考模式想象不到的。变动的世界不可能像没有变化的社会一样，为自己带来随时可用的确定性，但是用比较不完美的方法思考，可以提供更有价值的知识。抽象方法会产生变化无穷的观点，只要拥有相当有效、能在不同观点之间选择的方法，批判思考模式应该比传统思考模式更接近实际状况，因为传统思考模式只有一种解释可以掌握。

批判过程

在这种情况下，在不同方案之间选择可能被视为批判思考模式的主要功能，这种工作如何进行呢？

首先，由于思考和实际状况之间有差异，一组解释会比另一组更适合一种特定状况，所有的结果不会同样好，所有的解释不会同样正确，实际状况提供选择的诱因，也提供做抉择的标准。其次，因为我们对实际状况的了解不完全，可能无法充分掌握据选择的标准，因此人们不见得会做出正确的选择，即使做出正确选择，也不是每一个人都接受，并把它当成正确选择。此外，正确选择只代表现有可行方案中较好的一个，而不是所有可行方案中最好的，新构想和新解释随时可能出现，这些构想和解释也注定会有缺陷，新构想和新解释只是有可能逐渐接近答案，因此不同方案之间的抉择，牵涉连续性的批判检验过程，

极限投机

而不是机械式的应用确定的规则。为了强调这些观点，我使用“批判思考模式”这个名词，不要误以为这是指在变化无常的世界里每一个人都保持开放的心灵，人们仍然可能毫无保留地信奉一种特殊的观点，但是至少他们不会不知道还有其他的选择。传统思考模式毫不批判的接受各种解释，但是在变动的社会里，没有人可以说“事情就是这样，因此不可能有任何别的方式。”人必须用论证来支持自己的观点，否则的话，除了自己，他们不能让任何人信服，而且无条件的相信一种其他人都排斥的观念，是一种疯狂的形态，连相信自己拥有最后答案的人都必须考虑可能的反对意见，必须反驳批评，为自己辩护。

批判思考模式不只是一种态度，也是一种流行的状态，代表有很多不同解释的状态，支持者必须为他们相信的理念寻求别人接受。如果传统思考模式代表知识的垄断，批判思考模式可以视为知识的竞争，这种竞争超越特定个人的态度或思想流派，有些理念是尝试性的，会遭来批评；有些理念是独断性的，不容反对。只有在大家完全理性时，才能期望所有的思考具体表现批判的态度——这与我们的基本前提矛盾。

批判态度

我们可以主张批判态度比独断态度更适合变动的世界，试验性的意见不见得正确，独断性的意见也不见得完全错误，但是互相冲突的看法出现时，独断性的看法只会丧失一部分说服力，因为对独断性的看法而言，批判是一种危险，而不是动力。相比之下，批判性的态度可以从批

附 录 索 罗 斯 演 讲 与 文 选

评中受惠，而且的确从中受惠；人们提出来的观点会被修正，直到不能再提出有效的反对意见为止，从这种严格过程得出来的东西，可能比最初的陈述更能有效的达成目的。

批评基本上令人不快，难以接受，批评能够被人接受，完全是因为批评有效，因此人们的态度大部分要看批判过程运作的状况有多好而定，相反的，批判过程的运作要看人的态度而定。这种循环性、反射性的关系，是批判思考模式生气勃勃的主因；反之，传统思考模式则不变如恒。

什么东西使批判过程有效？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回想前面提到的近乎均衡与远离均衡两种状态之间的分界线。如果思考和实际状况之间有明确的分界线，我们就拥有一种可靠的标准，可以在偏见变得太有影响力之前认清它，并且予以修正。但是在参与功能积极运作时，偏见和趋势变得难分难解，因此批判程序的有效性，要看主题及思考的目的而定，但是即使在本质上就没有分界线的范畴里，也可以靠思考引进分界线。

科学方法

批判程序在自然科学界运作得最有效，科学方法已经发展出自己的规则，发展出所有参与者默认的协定，这些规则承认不管人多有天分、多么诚实，没有一个人能够拥有完全的理解，因此理论必须接受科学界的批判检验，这种从不偏不倚的过程得到的东西，会达到一定程度的客观性，这种客观性是个别思想者都不可能达成的。

极限投机

科学家采用彻底的批判态度，不是因为他们比一般人更理性或更有容忍力，而是因为科学批判比其他形式的批判更不容轻忽，他们的态度比较像是批判程序的结果，而不是原因。科学批判的有效性质是几种因素综合形成的结果：一方面，自然界提供容易得到的可靠标准，可以据以判断理论的正确性；另一方面，有一种强烈的诱因，让大家承认和遵守这些标准，因为大自然的运作不理睬人类的愿望，我们如果不先了解自然界的运作状况，就不能利用大自然造福人类。科学知识不只是用来建立真理，也协助我们生存。人们可以不理睬伽利略的实验，继续相信地球是平的，继续愉快的生活，伽利略的主张会变得无法抗拒，因为有人在美洲发现了黄金和白银。这种实际的结果是人无法预见的。如果科学研究限于纯粹的实用目的，这种目的不会达成，可是这种目的为科学方法提供最优越的证据：完全是因为有一种实际状况存在，而且因为人类对实际状况的知识不完全，科学才可能发现实际状况的某些面向，这些面向是人类过去根本想象不到的。

在自然现象范畴之外，批判程序比较没有效果，在形而上学、哲学和宗教方面更是没有这种标准；在社会科学方面，遵守标准的诱因没有这么强烈，大自然的运作不理睬人类的愿望，但是社会可能受相关的理论影响。在自然科学方面，理论必须真实才会有效，社会科学方面并非如此，其中有一个捷径，人类可以受理论左右，遵守科学规范的意愿比较不迫切，这种不偏不倚的过程也因此遭到伤害，想改变社会的理论可能冒用科学的假象，以利用科学

附 录 索 罗 斯 演 讲 与 文 选

的名声却不遵守科学的规约。批判过程不能提供什么保护，因为和目的有关的规约不像自然科学规约那么真确无误，真实性和有效性是判断理论的两种标准，现在这两种标准不再统一。

大多数拥护科学方法的人，提倡的补救方法是加倍努力，采用自然科学发展出来的规则。波普提倡科学统一主义，以相同的方法和标准，主张研究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就像我在《金融炼金术》里讨论的一样，我认为这种主义有误导作用。两种研究之间有根本差异，社会科学的研究主题具有反射性质，反射性会摧毁陈述与事实之间的界线，这种界线正是批判过程在自然科学中有效的原因。“社会科学”这个名词是错误的比喻，把社会现象的研究称为炼金术似乎比较恰当，因为社会现象可以依实验者的意愿塑造，自然物质却不能这样做。把社会科学叫做炼金术，应该会比科学统一主义更能保存批判程序，应该会承认真实性和有效性的标准并不统一，并防止社会理论利用自然科学的名声，开启目前遭到阻碍的调查方法：不同的主题应该采用不同的方法。社会科学因为太盲目的尝试模仿自然科学，已经遭到很大的伤害。

民主政治

放弃客观性的约定后，要如何判断社会理论？科学理论的目的是描述社会状态，政治理论的目的是设法决定社会应该如何，两种理论之间的人为差异消失后，就有很大的空间容纳不同的意见。各种意见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看法主要是提倡一种固定的方式，另一类看法主张社会组

极限投机

织的形式由成员决定。因为我们不是处理科学理论，没有客观的方法决定哪种看法正确，但是情形显示后者代表批判态度，前者则否。

主张固定式社会组织的人，认为社会要受成员制订的法律以外的法则约束，最重要的是，他们宣称知道这些法则是什么，这点使他们不受批判程序的任何良性因素影响。相反的，他们必须积极寻求压制其他替代性的看法，因为他们只能靠禁止批评和防止新观念出现，才能获得大家普遍的接纳，简单的说，就是靠摧毁批判模式、阻止变化来达成目的。相比之下，如果大家可以自行决定社会组织的问题，解决方案不见得是最后方案，可以用达成这种方案的相同程序推翻，每一个人都可以自由表达自己的看法，如果批判程序有效的运作，最后获胜的看法可能比较接近代表参与者的最佳利益，这就是民主的原则。

民主制度要正确运作，必须符合一些可能相当于使科学方法那么成功的条件：首先，必须要有一种标准，做为判断对立观念的依据；其次，必须有遵守这种标准的普遍意愿。第一种前提由宪法定义的多数提供，第二种由相信民主制度是一种生活方式的信念提供。意见纷纭不足以创造民主制度，如果不同的派系采纳对立的教条，结果不是民主制度，而是内战，大家必须相信民主制度是一种理念，必须认定靠合乎宪法的手段达成决定，比看到自己的看法获胜更为重要。唯有民主制度创造出来的社会组织确实优于独裁制度创造出来社会组织，这种条件才能达成。

这里有一种循环关系，民主制度只有在有效时才能当

附 录 索 罗 斯 演 讲 与 文 选

成理想，而民主制度唯有在被人普遍接受为理想时才能有效，这种关系必须经由一种反射过程演化出来。在这种过程中，民主制度的成就会强化民主制度这种理想，反之亦然，民主制度不能够靠敕令强制实施。

民主制度和科学相似之处很明显，科学方法的客观性和有效性的约定也是彼此依赖的。科学依赖发现来打破这种恶性循环，发现比任何主张更有说服力。民主也需要良好的成就，以确保本身的生存，这些成就包括扩张的经济、知识和精神的刺激、比其他形式的政府更能满足人类期望的政治制度。

民主制度可以达成这些成就，容许可以称为这完全知识的良性层面——也就是创造力——自然发挥。我们无法知道民主制度会产生什么成果，就像在科学方面一样，这种无法预测的成果可能是民主制度最好的理由；但是民主政治不能确保进步，只有参与者可以提供良性的贡献，参与者思考的结果不能预测，他们可能继续努力，使民主制度成功，也可能反其道而行。相信民主制度是民主制度存在的必要条件，却不是充分条件，这点使民主制度的确变成一种棘手的理想。民主制度不能靠着消灭对立的想法强制推行，即使它被人类普遍接纳为理想，也不能保证成功，民主根本无法保证，因为它以参与者的创造力为前提。但是如果希望民主制度盛行，必须把它视为一种理想，相信民主制度的人必须相信不完全知识积极的一面，希望它会产生期望中的结果。

追求确定性

极限投机

民主制度的理想带给人一些好的期望，它不能提供确定的计划和明确的目标，只有在这些东西遭到剥夺的社会里才能够提供。人如果可以自由追求不同的目标，就必须面对决定目标的必要任务，这就是批判态度不尽令人满意的地方。一般假设人会追求自身物质福利的最大化，这点的确是事实，但不是全部的事实。人在物质福利之外还有别的期望，这种期望可能在物质需求满足之后才会浮现，但是这种期望通常优于狭隘的自我利益。其中有一种期望是创造物欲望，现代西方社会在物质需要满足之后很久，仍然继续追求物质财富，很可能正是因为这种追求能够满足创造欲，在其他社会中，财富在价值观的层次中居于比较低落的地位，创造欲会找到其他方法表面出来，东欧人比西方人关心诗和哲学，就是一个例子。

另有一组期望是批判态度特别不易满足的，就是追求确定的期望。自然科学可以产生确定的结论，因为它有一种客观标准可以运用。社会科学的基础不稳固多了，因为反射性会干扰客观性，在创造一种可靠的价值体系时，批判态度根本没有多大用处。我们很难把价值体系的基础建立在个人之上，原因之一是个人受制于最大的不确定性：死亡。原因之二是个人是他们必须应付的状况的一部分。真正独立的思想是一种幻觉，不管是家庭、同事或者只是近代精神的影响。总之，外在影响力比人们愿意承认的大多了。但是如果我们要避免不均衡的危险，就需要一组独立的价值观。

在满足追求确定性的期望方面，传统思考模式比批判

附 录 索 罗 斯 演 讲 与 文 选

思考模式有效多了。传统思考模式在信仰和实际状况之间没有明确的划分，宗教或原始的宗教形式——万物有灵论，涵盖了整个思想范围，并且要求毫不置疑的忠诚。难怪人类会向往太古时代失乐园的至上幸福，独断的意识形态承诺要满足这种渴望，问题是这种意识形态只有在消灭对立的信仰后才能达成目的。这点使它们对民主制度的危害，几乎像出现不同的解释对传统思考模式的危害一样。

批判思考模式在其他方面的成就，或许有助于尽量降低教条主义信仰的重要性，物质生活状态可能改善是一个具有重大意的地方，人通常会在可以产生结果的地方努力，忽略比较没有希望的问题。这就是西方社会重商业而轻诗歌的原因。只要能够维持物质方面的进步，而且可以继续享受物质进步，就可以防堵教条的影响力。

开放社会

完全竞争

完全变动的社会似乎难以想象，事实上，社会必须拥有固定的结构和机构，才能确保稳定，否则如何支持文明当中的复杂关系？然而人不但可以主张完全变动的社会，而且在完全竞争理论中，已经深入研究过这种社会。完全竞争可以提供经济单位替代性的状况，这种状况只比人实际占有的状况稍微差一点，要是环境出现最细微的变化，他们随时准备行动，同时他们对现有关系的依赖降到最低程度，结果是一种可能完全不变的社会。

极限投机

我根本不同意完全竞争理论，但是我要用这个理论作为起点，因为它与完全变动社会的观念有关。

完全竞争理论假设有大量的经济单位，每个单位都拥有完全的知识和流动性，每个单位都有自己的偏好表，并且面对一定数量的可选择机会。即使粗略的检视，也显示这些假设完全不切实际，缺乏完全知识是这个研究的起点，也是科学方法的起点。完全流动性会否定固定资产和专业技能，而这两种都是资本主义生产模式不可缺少的因素。长久以来，经济学家一直容忍这么令人难以接受的假设，原因是这样做可以产生多方面令人满意的结果：首先，这样可以把经济学建立成和物理学地位相当的科学，完全竞争的静态均衡和热力学相像，绝非巧合；其次，如此证明完全竞争可使福利尽量扩大。

在现实状况中，只有新观念、新产品、新方法和新偏好使人员和资本移动时，才会接近完全竞争的状况。流动性是不完全的，流动也不是毫无成本的，但是人仍然被较好的机会吸引，或者因为环境变化而流离失所。人一开始流动，通常会流向拥有较佳机会的地方，这些人并未具有完全的知识，但是不断流动比他们终身占据同样的职位，更能了解有比较多的其他机会。他们会反对别人占据他们的位置，但是因为有这么多次机会出现，他们对既有状况的依恋不会那么强烈，而且他们比较不能取得其他人的支持，因为其他人实际上或可能也处在同样的状况。流动越来越频繁时，人会在调整过程中发展出某些才能，因而降低他们可能学到的任何专业技能的重要性。一种我们可以

附 录 索 罗 斯 演 讲 与 文 选

称之为“有效流动性”的观念，取代了不实际的完全流动性观念，批判思考模式取代了完全知识，结果不是经济学所定义的完全竞争，而是我称为“有效竞争”的状态。使这种状态和完全竞争不同的是，价值观和机会根本是变动不居的。

如果均衡可以达成，有效竞争的状态就不适用，每一个单位都会占有一个特定的职位，使别人不这么容易得到这种职位。原因很简单，因为个人会为这个职位奋斗，个人发展出特殊技能后，流动会造成他的损失。

他会抗拒任何侵害，必要时他宁可接受减薪，也不愿意流动，特别是如果流动代表必须和别人奋斗，争取别人的潜在利益时，更是如此。鉴于他这种坚定的立场，以及他为了保卫这种立场愿意做的牺牲，外人会发现难以跟他竞争。结果不是几乎没有限制的机会出现，每一个单位反而多少受到现有安排的拘束，因为没有完全的知识，他们甚至可能不知道自己所错失的机会，这根本不是完全竞争！

不稳定

这种情形和完全竞争的古典分析之间的差异值得探索。我在《金融炼金术》这本书里，已经探索了一部分，我并没有尽我所能的申诉我的主张，我并未坚持经济理论的基础中有一个缺陷：假设需求和供应曲线是独立的——实际情形不见得如此——需求曲线的形状可能因广告改变，更糟糕的是，可能受价格变化而影响，在追随趋势投机风气盛行的金融市场中尤其如此。大家买期货合约，不

极限投机

是因为他们希望拥有合约代表的商品，而是因为希望靠期货合约获得利润。在股票、债券、外汇、不动产，甚至艺术品方面，这一点可能也同样正确，获利展示并非依据物品的真正价值，而是根据别人买卖的意愿而定，这种意愿表现在价格的变动上。

根据经济理论，价格由供需决定，如果供需曲线本身就受价格变动影响，价格会有什么变化？答案是根本不确定，在这种不稳定的状况中，追随趋势的投机经常是最好的策略。此外，采用这个策略的人越多，报酬就越高，因为价格在决定价格趋势上担任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价格运动本身会增强自己的力量，直到价格变得与真正价值完全无关，最后价格变得无法支持，崩盘就随之出现。金融市场的历史中到处都有这种盛衰序列的痕迹，在这种远离均衡的状况下，基本因素和估价的差异变得很模糊，情势由不稳定主导。

独立呈现的供需曲线决定价格的主张显然不是根据事实来讲的，进一步检视的话，这种主张变成部分自我成立的幻觉。因为这种幻觉被人普遍接受，有助于促成稳定，一旦大家认清这是幻觉，维持金融市场稳定的工作就会变得极为复杂。

不稳定可以视为市场经济的流行问题，市场力量的自由发挥不但没有产生均衡，反而产生持续不断的变动过程，一种过渡现象之后是另一种过渡现象，在某些状况下，尤其是其中涉及信用时，不均衡可能有累积性，一直累积到临界点为止。

附 录 索 罗 斯 演 讲 与 文 选

这种结论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古典分析完全以自利为基础，但是如果只追求自利不能带来稳定的制度，个人自利是否足以确保制度生存的问题就出现了，答案显然是大大的否定。只有通过某种形式的管理，才能维持金融市场的稳定，一旦我们把稳定当成政策目标，其他有价值的目标会随之出现。在稳定的状态中，当然也必须维持竞争，公共政策以维持稳定、竞争和其他谁也不知道的目标，会和自由放任的原则冲突，两者之间一定有一种是错误的。

19世纪可以被视为大家普遍接受自由放任的时代，而且在世界一大部分地区是实际流行的经济秩序。显然它的性质不是经济理论宣称的均衡，这是经济迅速进展的时代，在这段期间，新的生产方法发明，新的经济组织形式成形，经济活动领域向各方面扩展。经济管制的旧架构已经崩溃，进步极为迅速，以至于没有时间作计划，发展极为惊人，以至于没有已知的方法来控制发展。国家的机能相当不适于承担这些额外的工作，在迅速膨胀的城市和其他扩张的领域中，国家几乎没办法维持法律和秩序。

成长率慢下来之后，国家的管制机能赶上其要求，政府开始收集统计资料，开始征收租税，自由竞争体系一些比较明显的不正常和滥用现象也改正了。新兴国家采用工业化路线时有前例可循，国家首次能够对工业发展发挥有效的控制，人民在自由放任和计划之间有真正的选择。出现这种情形时，事实上代表自由放任的黄金进代结束：首先出现的是保护主义，随后其他形式的国家控制也将陆续

极限投机

出现。

到 20 世纪初期，国家已经有能力制订游戏规则，金融市场不稳定带来银行制度普遍崩溃，造成 30 年代的大萧条时，国家已经准备好插手期间。

近年来，自由放任原则大力卷土重来，里根总统利用市场的魔力，撒切尔夫人鼓励适者生存。我们再度活在迅速变化、创新和不稳定的时代，但是自由放任原则就像在 19 世纪时一样，有着同样的缺陷。

事实上，每一种社会制度、每一种人类构思都有缺陷，发现一种运作方式的缺陷不应该用来证明相反的运作方式正确，这样做是常见的错误。从最近经验学到的一个重大教训是：狭隘的自利不能提供适当的价值观以应付我们今天面临的政策问题，我们必须采用与制度生存有关、比较广泛、而不仅是与个别参与者繁荣发展有关的价值观。我在下文考虑价值观问题时会再探讨这一点。

自由

有效竞争不会产生均衡，但是会减少个人对现有关系的依赖，从而扩大个人自由。自由通常被视为是一种或一系列的权利，包括言论自由、迁徙自由、信仰自由，由法律或宪法规定。这种观点太狭隘，我希望赋予这个字眼更宽广的意义，我认为自由是有选择的，如果选择比个人目前状态还差劲，或是迁徙要花费很大的精力和牺牲；人就变成要依赖现有的安排，因而承受各种限制、侮辱和剥削。如果他们拥有的选择只比现况差一点，他们就可以免于这些压力，如果压力出现，他们只要迁徙就可以摆脱压

附 录 索罗斯演讲与文选

力。在这种情况下，自由是个人脱离现况能力的函数，选择只比现存状况略差时，自由的程度达到最大。

这点和大家通常看待自由的方式大不相同，不过话说回来，自由通常被人认为是一种理想，而不是一种事实。自由当作理想时，通常伴随着牺牲，当成事实时，意义是不必牺牲，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相信自由是理想的人，可能会为自由全力奋斗，但是他们不见得了解自由，因为自由对他们只是一种理想，他们通常会把自由认为是一种无限的幸福。事实上自由并非毫无阴暗的一面，牺牲开花结果及自由实现之后，这种情形可能比自由还是理想时更明显。英雄主义的光环褪色，以共同理想为基础的团结消失，剩下的是一盘散沙组成的群众，每个人都追求心目中的自利，自利可能符合公益，也可能不符合。这就是自由在开放社会中所表现的状况，对于为自由奋战的人而言，这样的事实可能让人失望。

此处所定义的自由不仅限于人类，也及于所有其他生产工具，土地和资本也可以“自由”，意义是它们不局限于特定用途，而是拥有略有差别的其他多种用途，这点是私有财产制的前提。

生产因素总是和其他因素共同运用，因此一种因素的运用方法改变，一定对其他因素有影响，所以财富从来没有真正的私有过，财富会影响其他因素的意义。有效竞争降低一种因素对另一种因素的依赖，而且根据完全竞争这种不实际的假设，依赖会完全消失，这点使财富的所有者解除对其他参与者的任何责任，为认定私有财产是基本权

极限投机

利的说法提供理论基础。

我们可以看出私有财产的观念需要完全竞争理论来肯定，如果没有完全流动性和完全知识这种不实际的假设，财产不仅伴随着权利，也伴随着对群众的义务。

有效竞争也赞成私有财产制，但是比较有限制，个人的决定对社会的影响减轻，受影响的因素可以转为选择其他方法，不利的影响也得到舒缓，伴随着社会财产的责任变得比较模糊、比较普遍化。财产由私人拥有和管理还有很多理由，在公有制缺点更大的情况下更是如此，但是和古典分析相反的是，私有财产权不能视为绝对的权利，因为竞争是不完全的。

社会契约

自由是事实时，社会性质完全依成员的决定而定，就像在有机社会中，成员的地位只能从“整体”的角度来了解一样，现在社会整体是毫无意义的东西，只能从个人决定的角度来了解整体。为了强调这种差异，我使用“开放社会”这个名词来描述，这种社会比较常见的方面，也就是成员能自由进出方面，也可能是开放的，不过这一点在我看来是附带的因素。

在文明社会中，人拥有很多层关系，在有机社会中，这些关系由传统决定，在开放社会中，关系由相关个人的决定塑造而成：关系由成文和不成文的契约规范，契约关系取代了传统关系。

传统关系是封闭的，因为关系的条件不受相关团体的控制，例如土地的继承是预选决定的，农奴和地主的关系

附 录 索 罗 斯 演 讲 与 文 选

也是如此。这种关系是封闭的，也是因为关系只涉及直接有关的人，不涉及其他任何人。契约关系是开放的，因为条件是由相关团体磋商决定的，可以由双方同意更改，签约团体也可以由其他人取代，契约经常是大家知道的，涵盖类似状态的不同安排之间，如果有重大差异，就由竞争来修正。

就某方面而言，传统关系和契约关系的区别，等于实质思想和抽象思想之间的差别，传统关系只适用于直接有关的人，契约关系可以视为具有普遍的正确性。

如果关系由参与者决定，那么组成文明社会的不同机构的成员，应该也是契约的主体。就是这种推论导出社会契约的观念，这种观念最初由卢梭倡议，既无理论正确性，也没有历史正确性。以完全独立的个人自由参与契约的说法来定义社会，一定会产生误导，把文明社会的历史起源归因于这种契约，则是一种时代错误；不过卢梭的观念正确指出开放社会的精义，就像曼内尼亚斯·艾格里帕以寓言定义有机社会一样清楚。

开放社会可以视为理论模型，其中所有的关系都具有契约性，具有强制性成员或限制成员的机构存在，和这种解释并不冲突，只要有很多地位大致相等的不同机构，对每个个人开放，个人可以选择属于哪个机构，个人自由就得到保障。即使有些机构如国家拥有强制力量，其他机构如社会俱乐部限制成员人数，这一点仍然正确，国家不能压迫个人，因为个人可以用移民的方法解除契约，社会俱乐部不能放逐个人，因为个人可以加入其他俱乐部。

极限投机

开放社会不对所有人保证平等机会，相反的，如果资本主义生产模式和私有财产权结合，注定会有更大的不平等，如果置之不理，不平等通常会增加而不是减轻。开放社会不见得是没有阶级的，事实上这种状况难以想象——虽然并非不可能。阶级的存在如何能与开放社会的理念并存？答案很简单，在开放社会中，阶级只是社会阶层的简化概念。

美丽新世界

让我尝试把开放社会的观念导向合理的结论，并且描述完全变化社会应有的状况。这时在所有生存的方面中，都存有选择，例如在个人关系、意见和理念、生产程序和生产物资、社会组织与经济组织等方面都是如此，在这种状况下，个人会占有最高的地位。有机社会的成员毫无独立性，在比较不完全变化的社会中，既有的价值观和关系仍然限制人的行为，但是在完全开放的社会中，没有一种既有的关系是固定的，个人和国家、家庭以及同伴的关系，完全由他们自己决定。从反面来看，这点表示社会关系的持久性消失了，社会的有机性结构崩溃，到达社会的原子——也就是个人——四处无根漂流的地步。

个人如何在可供选择的方案之间抉择？若将此问题，变成经济问题，经济分析就能提供最方便的起点，个人需要做的只是扩大运用经济分析。在每一种行动只是选择问题的世界里，经济行为成为所有活动领域的特质，这点不

附 录 索罗斯演讲与文选

见得表示人会更注重拥有物质，比较不注重拥有精神、艺术或道德价值，只是所有的价值都可以简化为货币条件，这点使市场机能的原则延伸到极为广泛的领域，例如艺术、政治、社会生活、性和宗教。并非所有有价值的东西都能买卖，因为有些价值纯粹属于个人，不能交换，例如母爱；也有一些价值在交换过程中丧失价值，例如名声；还有一些实际上是不可能交换的，例如气候；或者交易是非法的，例如政治任命。然而在完全变化的社会中，市场机能的涵盖范围会延伸到最大的极限，即使市场力量的运作有法律规范，法律本身也是与经济行为有关的讨价还价过程的结果。

前辈根本不能想象的选择出现了，安乐死、遗传工程和洗脑变成实际可行的事情，人类最复杂的功能，例如思考，可以分解为不同的元素，用人工方法复制，每一种事情似乎都是可能做到的。

或许完全变化社会最明显的特征是个人关系的没落，个人关系的特点是与特定人有关，朋友、邻居、夫妻即使不能互换，至少也会变成随时可以由略差（或略好）的替代品取代，这些关系会在竞争的条件下接受选择，父母和子女关系应该假设不会变，但是这种关系可能变得比较没有影响力，个人之间接触的重要性可能没落，因为比较有效的通讯工具会降低亲自出面的需要。

这样的景象不会让人满意，开放社会成事实之后，可能比作为想象中的理想时更让人不满意。正确地说，我们应该记住，任何社会制度导向合理的结论时，会变得荒谬

极限投机

而不能忍受，不管是摩尔的乌托邦、狄福的理想国度、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或奥威尔的《一九八四》，都是如此。

价值观的问题

开放社会的重大好处以及使它足以成为理想的成就，就是个人自由，自由最明显的吸引力是负面的：没有限制；但是自由也有好的一面，这一面更重要，让人可以为自己设想，决定自己需要什么，并且把梦想化为实际，把能力发挥到极限，在知识、组织、艺术和实际事物方面，达成原本可能不敢想象的成就，这点可能是让人极度兴奋和愉快的经验。

在不利的方面，个人享有的崇高地位成为沉重的负担，有时候可能难以忍受，个人要在自己面临的所有抉择当中做决定时，在哪里可以找到作为依据所需的价值观？期望独立的个人根据一些固定的价值观行动，本身即是一种矛盾。价值观其实和其他事情一样，只是选择的问题，选择可能是有意识的，可能是搜索枯肠和反省的结果，更可能像是冲动的决定或是以家庭背景、意见、广告或若干外界影响为基础的，价值观可以变动时，改变价值观注定是商业活动中重要的一部分，个人必须在沉重的外在压力下选择自己的价值观。

如果只是消费方面的选择，应该不会有多大困难，选择香烟品牌时，愉快的感觉可以当作适当的指引——不过鉴于香烟广告的巨大花费，这一点也值得怀疑。但是社会不能只建立在享乐原则上，人生包括痛苦、冒险、危险以

附 录 索 罗 斯 演 讲 与 文 选

及最后死亡的可能，如果享乐是唯一的标准，资本就不能累积，许多构成社会的协会和机构就无从生存，许多构成文明的发现、艺术和工艺创造就不可能达成。

缺乏目的

脱离可以提供立即满足的选择时，我们会发现开放社会遭遇可以称为“缺乏目的”的问题，我这样说不表示找不到目的，只是说每一个个人都必须自行寻找和发现自己所需要的目的。

就是这种义务创造了我所谓的负担，个人可能加入一个团体或献身于一种理想，尝试与比较大的目的认同。但是自动加入和身在有机社会中不同，没有同样令人安心的可靠效果，这种归属感不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而是有意选择的结果，因为有太多的选择，个人很难对一个团体全心全意的奉献，即使真的全心全意的奉献，团体也不会报答，个人始终有被排斥或遗弃的危险。

理想的情形也一样，宗教和社会理想彼此竞争，所以缺乏能让大家普遍接受的确定性，忠于一种理想变成和忠于一种团体一样，是一种选择，个人仍然是孤立的，他的忠诚不代表认同，而是有意识的决定，这种行动中的意识卡在个人和他接纳的理想之间。

自行寻找自身目的需要使人陷入困境，在组成社会的所有单位中，个人是最脆弱的一环，生命也比大多数以人为基础的机构短暂。个人独力提供一种很不稳定的基础，据以建立一种足以维持某种结构的价值观，这种结构比人的生命还长，并且在其眼中必须代表比个人生命和福祉还

极限投机

大的价值观，但是这种价值体系是维持开放所必要的。

个人作为价值观的来源并不妥当，这种不当可能以不同方式表现。孤寂或自卑、罪恶和无用的感觉，可能与缺乏目的有直接的关系，人通常把这种感觉当成个人的问题，而不放在社会的架构中处理，使这种精神困扰益趋恶化。精神分析在这方面毫无用处，不管精神分析有什么治疗价值，过度偏重个人通常会变成治丝益棼。

个人拥有的财富和权力越多，个人意识负担的问题越大，入不敷出的人不能停下来询问人生的目的。但是我所谓的“不完全知识的积极面”，可以用来使开放社会富裕，因而使这个问题可能全力发展，到达连享乐原则都可能遭到危害的地步，也就是变成人可能无法从自己努力的成果中得到足够的满足，以便肯定追求这些结果的努力。创造财富可能提供发挥创造力的理由，通常要到享受成果时，消化不良的现象才会出现。

个人如果不能自行找到目的，可能会受到驱策接纳教条，教条可以提供现成价值观和在宇宙中的稳固地位。消除缺乏目的感的方法之一是放弃开放社会，如果自由变成无法承受的负担，封闭社会看来可能是救赎之道。

独断思考模式

我们已经看到批判思考模式把决定对错、真假的责任，完全放在个人身上，鉴于个人的不完全理解，有很多重要的问题特别是人和宇宙的关系及在社会中定位的问题

附 录 索 罗 斯 演 讲 与 文 选

——一个人无法提供明确的答案，不确定很难承受，人可能走上极端以逃避不确定。

独断思考模式是逃避方法之一，这种模式表现在建立一种主义至高无上的地位，一般相信这种主义起源于个人以外，来源可能是传统，或是和其他意识形态竞争后得到至高无上地位的一种意识形态。不管是哪一种情形，都被别人宣称是对立观点的最后仲裁者，和这种意识形态符合的观点被人接受，和它冲突的被排斥。人不需要考虑替代方案，每一种选择都是现成的，没有什么问题没有答案，不确定的可怕幽灵消除了。

独断思考模式和传统思考模式有很多相同的地方，独断思考模式规定一种权威是所有知识的来源，设法保持或重新创造奇妙的简单世界，在这样的世界里，盛行的观点不会受到怀疑或质问的检验。但是，它和传统模式不同的地方，就是缺乏简单性质。在传统思考模式中，不变是普遍被人接受的事实；在独断思考模式中，不变是人为规定的，不变并非是唯一被人普遍接受的观点，反而是有很多可能不同的解释，但是只有一种符合规定，其他的解释都必须排除。使问题更复杂的是，独断思考模式不能承认它制定了什么规定，因为这样会破坏它所尝试建立的不容置疑的权威。为了克服这个问题，可能需要难以想象的心智扭曲，独断思考模式虽然努力尝试，却不能重新创造传统模式特有的简单改造性质，其中根本的差异是这样的：真正不变的世界不能有历史，一旦大家了解过去和现在的冲突，规定就丧失其必然性。这点表示传统思考模式限于人

极限投机

类发展的最初期，除非人能忘记过去的历史，否则不可能恢复传统思考模式。

因此从批判思考模式直接转为传统模式完全不可能，如果独断思考模式能够无限期的流行，历史可能逐渐被人淡忘，但是在目前这种时刻，这一点不能视为实际可行的事情，因此人们只能在传统和独断模式之间选择。

独断思考模式通常诉诸一种超乎人类的权威，例如：神或历史，神或历史用某种方法启示人类，这种启示是真理唯一和最终的来源。人因为不完全理解，因而为这种主义的应用方式和意义争论不休，主义本身却继续散发堂皇的纯洁光芒。虽然人的观察记录变化不断发生，超乎人类力量的权威却不受影响。这种设计维持世界秩序确定不移的幻象，即使众多证据否定这一点仍然如此。如果独断思考模式成功，通常会维持社会状态不变，使这种确定不移的幻觉强化，但是即使在独断模式最成功时，也不能拥有传统模式特有的简单特质。

传统思考模式完全处理实质的状况，独断思考模式却依赖一种主义，这种主义可以适用在所有想象得到的状况中，主义的训条是抽象思想，在直接观察的范围内不存在，也不理会直接观察。抽象思想的运用带来传统模式所没有的复杂特性，以致独断思考模式不但并不简单，甚至可能比批判思考模式还复杂，这点不足为奇。为了维护不变动假设，又不承认做了一种假设，其实是扭曲实际状况，人必须利用复杂的扭曲，才能达到近似可信的程度，因此在心智的努力和紧张方面必须支付沉重的代价。的

附 录 索 罗 斯 演 讲 与 文 选

确，如果不是历史确实提供例证，人很难相信人心能够做出这么严重的自我欺骗。人心似乎是一种工具，能够在某些地方创造出新的矛盾，并解决任何自我创造的矛盾，这种趋势在独断思考模式中自由发挥，因为就像我们所见到的情形一样，它的信念绝少暴露在可以观察的现象范围内。

独断思考模式因为把所有精力用在解决内部冲突上，因此在改善知识本体方面毫无所成，独断思考模式不能承认直接观察是证据，因为如果产生冲突的话，教条的权威性就会遭到侵蚀。这种思考模式必须继续限制自己只运用主义，这点导致文字意义上无休无止的争论，特别是具有原始启示意味的文字，例如：深奥、法典、神学、意识形态方面的讨论尤其如此；这样每解决一个问题，通常会创造更多的新问题，因为思考和实际状况关系极少或毫无关系，推测越深入，越容易变得扭曲和不实际。一根针头上到底能够容纳多少天使跳舞呢？主义的实际内容如何要看历史状况而定，而且主义的内容不能成为归纳的主题，传统可能提供一部分的材料，但是要这样做，必须经过剧烈的改造。独断思考模式需要能够普遍运用的陈述，而传统原来适用实质名词的表述，现在必须经过归纳，以便运用在原有目的之外，和范围广大的事件建立关系。这种目的如何达成？很明显的表现在语言的增加方面，语言适应情势变化的方法之一，是把原来只含有实质含义的字眼用在象征意义方面，象征意义只保留实质情况中唯一的特性，然后可能运用在其他有同样特性的实质状况中。传教士也

极限投机

运用同样的方法，从《圣经》文字中取出一段，作为他们演讲的主题。

主义也可能取材自开放社会的理念，每种哲学和宗教理论只要是对存在问题提供详细的解释，都具有主义的特质，所需要的只是无条件的接受和全面强制推行，就可以达到目的。复杂哲学的创始者可能无意推行一种主义，使之成为无条件接受和普遍推行的主义，但是在理念的发展中，个人的意向毫无影响力，一旦理论成为唯一的知识来源，不论创始者的意愿如何，这种理论都会取得某些压倒性的特质。

因为批判思考模式比模式有力，它发展出来的意识形态也比传统本身更可能成为教条的基础，一旦地位确立，这种意识形态可能披上传统的外套。如果语言具有足够的弹性，容许实质陈述做象征性的应用，也可以用在相反的过程中，使抽象观念变得个人化，《旧约圣经》中的神是一个例子，佩雷斯的《黄金大道》提供很多其他的例子。实际上我们会可能发现，我们所谓的传统，包含化为实际意义的许多批判思考的产物。

教条的首要规定是要涵盖全面，必须提供一个用来衡量每一种思想和行动的标准，如果不能用它来评断每一件事情，人们就会被迫寻找其他方法来评断对错，这种寻找会摧毁独断思考模式，即使教条的正确性没有遭到直接攻击，运用其他标准通常也会侵蚀教条的威信。如果主义要尽到做为所有知识来源的功能，就必须在每一个领域确立至高无上的权威性，主义可能不必随时提到，但是靠着主

附 录 索 罗 斯 演 讲 与 文 选

义可以开垦土地、绘画、作战、发射火箭，每种情形都可能自由的运用，但是任何观念或行为跟主义冲突时，主义一定优先，在这种情况下，连比较大范围的人类活动都可能受到主义控制。

教条的另一个主要特征是僵化。传统思考模式极有弹性，因为传统是不受时间限制的，任何替代方案不但立刻被现在接受，而且被视为从远古以来就存在的东西。独断思考模式并非如此，它的主义提供一种标准，所有思想和行动都需要用这种标准来判断，因此必须持久不变，不管有多少挑战都不能要求改变，稍微脱离标准就必须立刻改正，教条本身必须维持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

鉴于我们的理解天生就不完整，显然新发展可能和既有的主义冲突，或是以人无法预见的方式造成内部矛盾，任何改变代表一种潜在的威胁，为了使危险降到最低，独断思考模式通常在思考和行动方面都禁止任何新的探索，不但消灭任何违反其宇宙观、不受规范的改变，也积极镇压不受规范思想和行为。这方面会做到什么程度，要看它本身受到攻击的程序多寡而定。

独断思考模式和传统思考模式不同之处，在于前者和某种形式的强制密不可分，为了确保教条超乎实际和潜在替代方案的优越性，强制是必要的。每一种主义都可能引发问题，不能纯靠深思自行解决，在缺乏界定主义和保卫主义纯粹性的权威之下，独断观点的统一性注定会分裂，成为对立的解释。要应付这个问题，最有效的方法是确定人为权威，负责解释主义正确性所系的超乎人类力量的意

极限投机

志。解释可能随着时间的变化而演化，如果权威的运作相当有效率，流行的主义在相当大的程度内可以配合实质状况发生的变化。但是任何未经权威检查的创新绝不能容忍，权威必须有足够的权力，以便消灭对立的看法。

在某些状况下，权威可能需要略微求助于强制力量，只要流行的教条尽到应有的功能，提供涵盖一切的解释，人们通常会毫无疑问的接受，毕竟教条拥有独占性，虽然某些特定问题可能有不同的看法，但是讲到整体实际状况时，保持一种观点存在，人们在这种观点的保护下成长，并且接受以这种方式思考的训练，接受这种观点比质疑还自然。

但是内部矛盾发展到更不实际的辩论，或是发生不符合既定解释的新事件时，人们可能开始质疑这种独断观点的基础。这种情形发生时，独断思考模式只能靠武力维持，利用武力注定会对理念的演化产生深远影响。思考不再是遵循本身的路线发展，而是变成和权力政治密不可分地交织在一起，特定思想和特定利益结合，解释的胜利与否，比较依靠支持者的相对政治力量而定，而非支持这种主张的正确性，人心变成政治势力角力场，反过来说，主义就变成交战派系手中的武器。

因此靠着与主张正确性无关的手段，可以维持主义的优越地位，维持教条所用的强制力量越大，教条越不可能满足人心的需要，最后教条的独断地位崩溃，人们可能觉得终于从可怕的镇压中解放，宽广的新境界出现，多元的机会激起希望、热情和惊人的知识性活动。

附 录 索罗斯演讲与文选

我们可以看出来，独断思考模式无法重新创造使传统模式这么有吸引力的任何特质，结果变成错综复杂、僵化和有压迫性。困扰批判思考模式的不确定性，的确被独断思考模式消除了，代价却是创造出人心无法忍受的状况。就像以超乎人类权威为基础的主义，可能提供一种逃避之道，让人逃避批判模式的缺点一样，对于遭遇教条压迫的人而言，批判思考模式可能也是解救之道。

封闭社会

对于观察有机社会的人来说，这种社会来得及现出一些很吸引人的特质：强固的社会统一性质、没有质疑的归属感、每个成员和集体的认同感。有机社会的成员即使不知道关系可能有任何不同，几乎都不认为这是优点，只有知道自己社会中有个人和整体社会冲突的人，才可能认为有机的统一性是美好的目标；换句话说，有机社会存在的条件不再盛行时，它的好处最容易被了解。

整个历史中，人类居然都表现出渴望恢复原始纯真幸福的状态，的确不足为奇。从伊甸园被驱逐是一再出现的主题，然而纯真一旦丧失之后，就不可能再恢复——除非忘记一切经验。在任何试图用人为力量创造有机社会状况的努力中，最难以达成的任务，正是所有成员和所属社会毫无质疑、而且不容置疑的认同，为了重建有机的统一性，必须宣称集体的优越性，但是结果却和有机社会有一个重大差异：个人利益并非和集体利益相同，而是屈服在

极限投机

其下。

个人和公共利益的差别引发一个令人困扰的问题：公共利益到底是什么？公共利益必须由人界定、解释，而且在必要时，必须压倒个人利益，这个任务最好由一位活着的统治者执行，因为他可以根据状况调整政策。如果把这种工作委托给一个机构，执行起来可能变得绑手绑脚、没有弹性，最后会变得没有效率，这个机构也许会设法防止变化，但是长期而言，这样不可能成功。

不管理论上共同利益如何定义，实际上可能是反映统治者的利益，统治者宣称整体利益至高无上的地位，统治者也把整体意志强加在心存反抗的个人身上，除非假设统治者完全无私无我，否则受益的也是统治者。统治者不见得要以个人身分扩大本身的目的，却可以阶级身分从现行制度中获利，从定义上而言，他们是统治阶级。因为阶级成员很明确，个人屈服在社会整体之下，等于一个阶级屈服在另一个阶级之下，因此封闭社会可以视为以阶级剥削为基本的社会，开放社会中也可能发生剥削的事情，但是因为个人的地位并不固定，不能根据阶级的基础运作。

如果封闭社会公开宣称的目标是确保一个阶级（种族或民族）的优越性，这种目标可能可以有效地完成；但是如果目标是重回有机社会悠闲的状态，这种目标注定会失败。社会统一性的理想和阶级剥削的现实之间有差距存在，为了克服这种差距，必须有一套复杂的解释，从定义上看这种解释和实际抵触。

统治权威的首要工作和成功标准，是促使大家普遍接

附 录 索罗斯演讲与文选

受意识形态，人接受的程度越高，集体利益和实际执行的政策之间的冲突越小，反之亦然。威权体制致力于重建宁静祥和的有机社会，顶多只是当成长远目标，比较常见的事情是，必须采用某种程度的强制力量，接着必须大费唇舌解释这种事实，这样使意识形态的说服力降低，从而需要使用更多的强制力量，到最后最差的情况出现：以强制为基础的制度及其意识形态会脱离现实。

吉恩·柯克派斯克曾经说明威权体制和极权体制的差别，我对她作的划分有若干保留意见，因为她用这种划分来区别美国的盟友和敌人，但是其中有一点确实有道理，威权政权致力维持自己的执政地位，多多少少能够公开承认自己的目标，可能用不同的方法限制人民的自由，可能残暴而具有侵略性，但是不必为了保持自己的霸权地位，把影响力延伸到每一个生存层面中。